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王韬评传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内容简介

本书约三十余万字，全面介绍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王韬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动态地剖析了他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思想变化的历程以及此一历程与“西学东渐”潮流和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关系，恰如其分地指出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应得的历史地位。

本书行文采用夹叙夹议、“传”“评”结合的笔法，既有对传主思想原貌的忠实白描，也有作者对历史问题的新鲜解释，读来不无启迪。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作者简介

张海林，1957年12月出生于南京，1986年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90年—1991年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进修。现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要论文有《论严复的历史代价意识》、《论王韬的外交思想》等二十余篇。合作项目有《太平天国通史》等。

王韬评传

第一章新人来到世界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折的激流涌进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时代浪峰上的弄潮儿。他们以笔做枪，勇敢进击，向旧世界宣战，以辉煌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构筑了一座座丰碑。在这片碑林之中，有一座不是最高最大但却处在前排显眼位置的碑碣，上面镌刻着：王韬，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思想家、政论家、教育家、新闻工作者，曾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批判现实，提倡西学，倡导改革，为中国现代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就是本传的主角。

一、甫里诗书之家

吴中之地，山清水秀。碧绿的田野、银带般的小河、千姿百态的青石桥、阳光下的谷仓构成了一幅恬静而又美丽的图画。古镇甫里（现名角直镇）就座落在这一图画之中。甫里不仅地杰，而且人灵。它是历史上文人荟萃之地。自唐以降，陆龟蒙、皮日休、罗隐、苏东坡、赵孟頫、高启、刘基、归有光、吴梅村等著名文人词客都曾在这里生活或隐居过。公元1828年11月10日（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王韬也在这里诞生。此时他的名字叫王利宾，字兰卿。

当王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吴中大地上的画卷虽然还是那样恬美，甫里虽然依旧是人间天堂的升平景象，但是远方已经隐隐约约传来西方炮舰的隆隆机声，一只硕大而无形的魔掌正向吴中大地横扫过来，恬静而美丽的画卷处在微微的震颤之中。

这一切，王韬的父辈们毫无察觉。当他的父母亲把他包在襁褓里，满心欢喜地注视着这个可爱的小生命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儿子金榜题名、高官厚爵和家族中衰局面的复振。

王氏家族是一个日趋没落的家族，他的祖上在明代原为“宦宦之家”，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使这个世家大族急剧地瓦解衰落。清兵南下之后，王家惨遭兵焚之祸，几乎阖门遇难，始祖王必宪时在垂髫之年，得免于难，避居昆山。自此至晋侯、治孙、载颺，居昆山凡四世，读书习儒业，有声庠序间，其中载颺尤为士林所推重，品行端正，学问渊博，曾开馆授徒。载颺去世过早，遗子科进尚幼，“戚串中有觊觎者，乃迁甫里”。科进即王韬祖父，字敬斋。他是一个子贡式读书兼行商的人物，在他那一辈，王家确是风光阔气了一阵，他读书知礼且富有家财，因好行善举，热心赈贫而被乡里称为“善人”。王韬父亲王昌桂，字肯堂，“著籍学官，邃于经学，九岁尽十三经，背诵如流，有神童之誉”。由于王韬祖父在世时的乐善好施，捐资散财，王家至王昌桂一辈家境复告衰落。为衣食计，王昌桂不得不于家乡开设学塾以教授生徒。这分散了他的精力，使他终生在科举道路上一无所获。

自王韬始祖必宪至王韬略经历二百四十余年，七代共得男子十五人，其中五代为一线单传，人丁极稀。王韬一辈虽为兄弟姐妹六人，但三个哥哥都在刚刚出生十日内“以痘疾早殇”。王韬的弟弟王利贞（字叔亨，号谿卿）也因从小受家庭溺爱，缺乏体魄锻炼，复因“涂饰绮靡”，吸烟成瘾，二十七岁便早早谢世。王韬的姐姐王瑛长王韬三岁，嫁于吴淞江边吴村周氏，亦无男儿。王家的“衰宗”局面颇使成年以后的王韬感觉到“无后不孝”的心理压力。

在成年之前对王韬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朱氏和父亲王昌桂。朱氏为苏州城外陈墓镇人，也是读书人家出身，能诗会赋，知书识礼，尤善课子。王韬四五岁时，朱氏即启蒙教读，为之剖析字义，讲授诗词，“夏夜纳凉，率为述古人节烈事”。王韬与母亲朝夕相处，“八九岁即通说部”。王韬后来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清光绪九年香港排印本）。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哭舍弟谿卿”（清光绪六年（1880年）《弢园丛书》本）。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喜欢搜集和创作怪异讽世小说，即种因如此。王昌桂为旧式乡村饱学之士。他自己没中过科举功名，一心希望自己的儿子实现他的梦寐以求的理想，以光宗耀祖，重振家道。因此，他除了设馆授徒外，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培养教育儿子上。他期望高，耐心也大，课子严厉，日夜不辍，除八股帖括外，从诸子百家到汉赋唐诗、历代史册，无所不教。无论他在甫里还是外出设塾授课，他都把王韬带在身边精心教诲。这些加上王韬本人“少时好学，资赋颖敏，迎异凡儿，读书数行俱下，一展卷即终生不忘”，使王韬学业大进。王韬后来的诗词、小说、文章、函牍写得典雅而质朴，用典恰到好处，与他父亲此一时期对他的家教甚有关系。王韬自己回忆说：“少承庭训，自九岁以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一生学业悉基于此。”

从十三岁开始，王韬来到长州青萝山馆，就学于明经顾惺。顾惺，字涤庵，学问博杂，不宗一家。王韬从他读到传统学问中许多流派的著作，包括经学，小学音韵，二十二史，资治通鉴，诸子文集，唐宋诗词和野史稗抄等，学术视野大为拓展。顾惺尤善诗词，在乡里颇负诗名，他的诗集《涤庵诗钞》清新朴实，贴近生活，得到王韬推崇。在教学过程中，顾惺亦把研讨作诗技巧列为一大项目。遇有喜怒哀乐之事也总喜欢出题出诗要学生作和。蒙师对诗歌的偏好影响了学生的兴趣，少年时代的王韬写下了大量的诗篇。1880年，王韬将他所写的诗编集成册，题名为《蘅华馆诗录》印刻问世。正是从这一诗集中，我们才得以知道不少王韬在青萝山馆的读书生活和思想状况。

顾惺是一位具有两重性格的封建读书人。一方面，他看重德行，强调积极的入世精神，曾作“反游仙诗”以言志，认为与其追踪山人隐士，不如“积硕学为世用”，在他的严格督教下，王韬接受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模塑和修齐治平经世思想的灌输。这些正是日后王韬在主张学以致用和提倡变革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害怕伦理道德崩塌的历史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他洒脱不羁，从不为所谓师道和俗见所左右。他喜欢游览山水，喝酒成癖，时常招集生徒对酒唱和。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王韬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名士性格。王韬后来喜好谈古论今，臧否人物，酷爱饮酒斗诗和看花逐妓，创根溯源都可追踪到这位顾老先生。

由于顾惺教学不拘形式和态度和霁可亲，王韬非常喜欢青萝山馆的读书生活。他与顾惺虽为师生，相处却犹如学友。教学之余，两人常常把盏对酌，谈论道德，切磋学问。王韬诗文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小饮青萝山馆呈顾涤庵明经师》一诗，记叙了一次两人围着火炉放量饮酒尽情谈论的情景：

欲雪不雪天酿寒，啾啾冻雀愁檐端。
地炉活火聊取暖，一尊入口僵颜欢。
新坼瓮泥出饷客，香浮色淡味独完。
王郎本耻作小户，深杯不厌一吸干。
酒阑每易生感慨，敢抒愚论披心肝。

王韬终身都与他的这位蒙师维持着师生和朋友之谊。两人经常有书信往来和唱答之作。顾惺的诗集托王韬校刊发排。王韬的文字中也多有经顾惺手

王韬：《遁窟谏言》，卷一，“天南遁叟”。

王韬：《张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小饮青萝山馆呈顾涤庵明经师”。

订之章。在遇到困难和忧虑之时，他们还互相请教对方，寻求解决办法和精神安慰。如王韬后来在上海生活时深感苦闷抑郁，时常写信向顾惺请教应对之方。一封写于 1858 年的信这样恳求说：

迩来瞻企之劳，寸阴若发，独居异地，触绪感怀。江上梅花，谁传别意，邻家爆竹，徒怆客衷。回忆细君，团聚者不过三载有奇，琴弦乍歇，墓草垂青，遗挂空悬，堕叙犹在，黄门述哀，无此奇痛；兰成叹逝，只益伤心，幽怨填膺，抑郁谁诉，夫子何以教我也……遁迹海滨，见闻日隘，词章之学，久已弃捐，况燕巢于幕，雉罹于罗，可为惴惴，吾夫子谊切友生，情深师弟，倘能为韬画一万全之策，使自拔于泥途，幸甚幸甚。可以预见，象王韬这样内心矛盾重重的人，是找不到什么满意答案的，但王韬对顾惺推重和信赖之情干字里行间殷然可见。王韬与顾惺的长久师友之谊和经常性的书信来往，是王韬离开青萝山馆而终究无法摆脱传统文化间接影响的又一注脚。

青萝山馆时期的王韬年龄虽小，雄心锐气却大得惊人。他“志锐气壮，自以为可奋讯云霄”。每天坚持读书、写诗、作八股文，期望有遭一日在科场大显身手，一举成名。然后修齐治平，成不世之功，留永久芳名。家人亲友见王韬胸怀大志，才学俱佳，亦欣欣然以此相劝勉。王氏家族中衰的局面就等着王韬出来重振雄风了。

王韬：《弢园尺牘》（光绪癸巳，沪北淞隐居本）。卷二，“寄顾涤庵明经师”。

二、坎坷的科举道路

科举是明清两代读书人参加国家政权的唯一通道，也是衡量读书人才能大小的唯一社会标准。读书人若想被社会承认有能力，有才气，有出息，或有功国家，福被桑梓，光宗耀祖，凡此等等，他就得在科举考试中博得功名，而且越大越好。王韬出身诗礼之家，自幼就在封建文化氛围里生活，饱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父辈重振家业的希望，出人头地“凌踏堂奥”的抱负，都逼着王韬不得不沿着科举的道路向上攀爬。

1844年，王韬虽然只有16岁，可已经是一个熟读四书五经和其他传统典籍的少年有学之士了。家乡的人都称赞王韬的才气，羡慕王昌桂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们动不动就说“某家有子矣”。是年，王韬赴昆山县第一次参加童子试。此次考试虽然没捞到一个秀才，但王韬却也借此露了头角。据王韬说，主试者见到他的文章后，击节叹赏，认为他虽然位在幼童之列，但“文颇不凡”。王韬对自己在科举道路上的第一次拼搏甚为满意。考试后，‘他兴致很好。与朋友大游马鞍山，蹬百里楼，“御风而行，衣袂飘举”。他在马鞍山之绝顶处，迎风披襟，大喊“快哉，此大王之雄风也”。第一次考试归来后，在父亲的催督下，他更加夜以继日的用功读书，作八股文，帖括之术猛进。1845年，他再次应试昆山。一年的书斋功夫总算没有白下。进入号房后，一见到“见于孔子曰季氏非人所能也”的考题，便即刻思如泉涌。

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不到一个时辰，便走出考场。主考官张芾非常赏识王韬的文章，称赞“文有奇气”，提笔圈为第一等，“拔冠邑痒”。

王韬对考上秀才一事喜不自禁，以为此是未来仕途步步青云的最好起点，举人、进士、翰林等等都是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一一可致的囊中之物。高兴之余，他把名子利宾改为瀚，以此作为这次首战告捷的纪念。而对于拔擢他的考官张芾，他更是从心里感激不已，表示知遇之恩，必当后报。可后来直到张芾被农民军杀死，王韬也没能发迹报恩。为此他甚觉亏疚。他在为张芾做传的时候不无自责地叹惜说：“知遇之感乌能忘也，记此不禁涕零。”

王韬考中秀才的消息使王家沉浸在极大的欢乐和希冀之中，家里张灯结彩，燃鞭放炮，贺客盈门。在大喜大庆的气氛中，王韬抑制喜悦，故作镇静，持卷吟诵，“置不如意”。这愈发引来亲朋好友一片赞叹。王韬族兄向客人们夸奖他是王家的“千里驹”，并征引诗句“见榜不知名士贵，登宴未识管弦欢”相调侃。王韬却释卷应对道：“区区一衿，何足为孺子重轻，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客人们对王韬不受区区一矜的限制，胸怀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愈发惊奇，称赞他出语不凡，必有后贵。

王韬考中秀才，对王韬父亲王昌桂来说，无疑是王家起废振衰的开端。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登山延眺”，第50页（1985年，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登山延眺”，第50页。

徐家疇编：《昆新青衿录》，“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张宗师新榜”。（光绪二十七年洒埽局本）。

王韬：《瓮牖馀谈》，卷一，“张小浦中丞师殉难”（陈戍国点，1988年，岳麓书社版）。

王韬：《瓮牖馀谈》，卷一，“张小浦中丞师殉难”。

王韬：《遁窟谰言》，卷一，“天南遁曳”。

王昌桂未中过科举，从王韬的牛刀小试中他看到了希望。倘若王韬能够乘初胜之威，坚持不懈地在科举这条道路上拼搏一阵，就一定能够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状元，到高官显爵，进而买田置产，扩大家业，重现祖上风光。他耳提面命，不断督促，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让王韬静心读书。王韬在父亲的严加管教下，强压住少年人活泼好动的天性，每天徜徉于《四书》《五经》之中。他准备在下一轮的乡试中大显身手，以不辜负父亲的教诲和期望。

然而，王家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如从前了。王韬已经无法再在他的书斋里安心地做他的八股文了。此时的王家，已经衰败不堪。祖上所传下的财产，几乎典当殆尽。王昌桂教书所得的微薄而又不稳定的收入难以养活五口之家。出身读书人家的王韬母亲朱氏，此时已不得不从早到晚纺纱织线，以补不足。王韬少时又羸弱多病，常在药罐子边渡日，这更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为扩大家庭经济来源，王昌桂于 1846 年前往上海设馆授徒。年仅 18 岁的王韬也不得不走出甫里的书斋，来到离甫里 20 里左右的锦溪教书，挣些束修钱补贴家用。

锦溪原名陈墓，相传北宋南渡时，贵妃陈氏病死后葬于此，因而得名。王韬的母亲朱氏就出身在锦溪，王韬选择这里设馆，恐怕与朱氏家庭的推荐不无关系。王韬前往锦溪的时间大略是在这年的开春季节。当行舟渡越范迁湖的时候，王韬触景生情，自感自叹。他作诗自嘲说：

此湖旧以攀清名，水色澈底玻璃清。
或云范蠡迁家至，湖滨卜筑名遂传。
当年功就知机早，一舸载得西施好。
屡散千金溷俗贾，上士大笑未闻道。
晚年想已厌纲罗，乃来此地娱烟波。
嗟予亦为名利缚，何时归钓隐邱壑。

范蠡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他帮助勾践灭吴后，改名陶朱公，悄然退出政治舞台，经商致富。后散尽千金，携美女西施隐居山水之间。王韬羡慕范蠡晚年美女在怀，消遣自在的隐士生活。但他也深知这种生活对他来讲只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望。陶朱公曾经成不世之功，积万贯之财，其退隐是功成名就、大财大富之后的闲情逸志，而他只是一个未曾释褐的默默无闻的穷秀才。“尚未能逃俗，谋生愧负薪”，为了衣食温饱不得不四处奔波，寄食他人檐下；为了挤入上层社会不得不低首吟哦于八股帖括之中。相比之下，王韬自惭形秽，嗟叹不已。

王韬是一个自尊心极强而又情绪敏感的人，锦溪的教读生活并不能使他满意。他始终认为自己开馆授课是大才小用，形同乞食。他在这一阶段所写的诗篇几乎全含有一种淡淡的生活的苦涩。例如，他在一次饮酒后写道：

主人巩室村之麓，门前新涨一江绿……
仲宣乞食来此邦，忝与主人群纪行。
主人为具酒一石，呼与邻翁相对酌。
嗟我结庐淞水东，年来飘转如飞蓬。
人生苦为微名累，不然种秫谋日醉。

但力耕田闲读书，安辞长作农家居。

王韬此时真正的用意并非想去做农人。他最焦虑的是如何结束这种有辱尊严和屈才的乞食生计。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结束这种乞食生活的道路有两条：一是遁入山林，出家为道；二是用功科举，出人头地。前者意味着安贫守拙，默默无闻。王韬对此不甘心，家人师友亦不同意；选择后者，意味着埋葬青春，扼杀天性，王韬对此不乐意，但这条道路指向修齐治平，光宗耀祖。这是王韬和他的家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掂量的结果，王韬选择了后者。

1846年夏，为了准备举人考试，王韬暂回甫里，隐于迦陵精舍，闭门苦读，此次王韬发愤读书的决心和毅力很大，大有志在必得之心，但他似乎对自己获取成功的信心也略有怀疑。他对好友杨醒逋说：“樗栎之材安可任栋梁之重乎？泉石之性安可处庙堂之尊乎？”。他此时写成的“夏日读书迦陵精舍”组诗也写得十分灰暗消沉，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

复作归欤想，扁舟至里门。蹉跎惭未补，文字向谁论。

岸远疑无树，云深若有村。暮鸦斜照外，帆影总

昏昏。

在落日黄昏中，乌鸦不吉利地飞来飞去，远处的一切都昏昏暗暗，似有似无。此情此景正是对前途未卜的形象揣测。

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边的贡院举行。王韬在老师顾惺等人的陪伴下，登舟前往金陵应试。出发之前，顾惺设酒壮行，期望马到成功。王韬也信心倍增，志在必得。从苏州到南京，王韬与老师一路上联诗斗酒，兴致极高。船入长江后，王韬仁立船首，遥望大江上下的帆影，追思前朝兴废，“江山代有人才出”的感慨和“舍我其谁”的自许从心底油然而生。

金陵为六朝金粉之地。十里秦淮更是商女云集之所。王韬一行正巧投宿在秦淮河钓鱼巷龚家，“左右多青楼，弦管之声嗷嘈不绝。”这种氛围使他们一点看书的情绪都没有。不久，他们就一起走街串巷，寻找“佳趣”去了。龚氏水阁终于听不到读书声，空留下一堆翻开的书籍和没有做完的八股文。

放纵行为与八股科举显然背道而驰。考试的结果，王韬一行自然是名落孙山。考试的失败彻底消除了王韬一行心理上的顾忌。他们整个儿掉进山水和风月场中去了。

王韬一行在南京乐不思蜀，几乎忘了归期。王韬是阴历七月出门来南京的，原拟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之前赶回甫里与家人团圆。可中秋这一天，他们根本没想到回家。直到中秋后两日，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秦淮风月之地，买掉归家。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饮锦溪书舍示主人”。

王韬：《弢园尺牍》，卷一“与醒通”。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夏日读书迦陵精舍。”

三、教读自娱与借酒浇愁

象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落第秀才下了场子后呼天抢地的情形差不多，回到家乡的王韬一时觉得昏昏噩噩，百无聊赖。他视科举如蛇蝎，见到笔墨、书籍一类东西就心惊胆颤，以至好多天精神恍惚，似醉似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悒悒不能自解者数日，迩来文字因缘忤除殆尽，旧时结习，弃若隔生。”有朋友劝他不必灰心，来日再搏，他立即怒不可遏。他的最好朋友、未来的妻兄杨醒通也为此遭他抢白了一顿。杨醒通在一封信里劝王韬以孝道为重，争取再考一次，以搏取功名，光耀门庭。王韬很不客气地连回了几封信，驳斥了杨醒通不得功名就是不孝的看法，他写道：

足下何教我之深，知我之浅也……足下谓科名者，士子之进身，非得之不足为孝，以是为仆劝，其意不可为不厚，然仆闻有一时之孝，有百世之孝，吾人立天地间，纵不能造绝学，经纬当世，使天下钦为有用之才，亦当陶冶性灵，扬榷古今，传其名以永世，若不问其心之所安，搏取功名富贵，以为父母光宠者，乌足道也……况士各有志，仆不能强足下为古，犹足下不能强仆为今也。豪杰自命不凡，岂可苟阿世俗，仆之不才，何足辱齿颊，足下之过虑甚矣……于时文中求经济，吾未见其可，足下勿挟尺寸之见，令人堕

实而废时，则幸甚。

调侃的背后藏有怨愤之情，既语气委婉，又义正词严，容不得杨氏再加反驳。

在另一封信中，王韬把科举功名视为身外之物，认为它与身内之物的“孝”风马牛不相及：“夫浮名仅丈，学必根德，形弗胜心。此圣贤所以宅衷，豪杰所以自命也。”然而，此时王韬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否定，主要还是一种科举考试失败后的愤激之语，是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情绪的自然宣泄。与他后来在接受西学的洗礼后，对八股取士制度理性批判和正面提倡近代务实教育不可同日而语。

对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士人来说，科举失败后有几条生活道路可走。一是继续低首下心，钻研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一生中不断地考将下去，直到头发花白而后止。《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走的就是这条道；二是与科举决裂，也与当朝统治者决裂，以昔日攻八股文之精神，转而研究民生疾苦，从事农民起义的组织、宣传和发动工作，以彻底推倒旧王朝，改革考试制度。洪秀全、冯云山等太平天国农民领袖走的就是这条道；三是从此遁迹山林，对酒当歌，不再过问世俗事。道观佛寺中常有这样的失意读书人；四是教读乡间，诗酒自娱。王韬的父辈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完了一生。

王韬没有耐心走第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太清苦、太漫长、太消磨人性；也没有勇气走第二条道路，尽管他象洪秀全一样失败后回家大病了一场，也遍历幻境，但“落第”在他大脑皮层上所留下的阴影并没有把他的梦引伸到否定“阎罗妖”的地步。他在梦幻中悟到的只是自我忏悔，他向友人吐露道：“一昨病中，遍历幻境，顿豁悟人世一切是非，从此当一意离垢，忏种种罪孽，修种种善果，依大比邱座，即登彼岸，不昧宿因，回忆前事，如沤如泡，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与朱癯卿茂才”。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与杨醒通”。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复杨醒通茂才”

如影如尘，杜门养荷，凝神淡虑，契除诸薶恼，解脱无限缘，比奉天龙偈，偈曰：人无嗜欲念，自无争竞心，慧根欲不灭，含素而葆贞，弟子与众生，无件亦无求。”然而他又决不甘心走第三条道路。他自幼就认为自己有经济长才，有强烈的修齐治平意识，甚至在科场失败后回来的路上，他还在作“反游仙诗”。在诗的序言里，他赞同顾涤庵师“…餐霞饵玉，通人寓言，不如积硕学”的观点，表示“遁迹山林或可藏拙，亦心鄙之矣”。王韬的确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苦闷，他不知道怎样应对这突然的打击。刚刚回到甫里的头几个月，他“掩关却埽于里门，谢绝诸故欢”，闭门苦索，百无聊赖。在他这一时期的书信和诗词中，充斥着落魄文人那种无法排遣的抑郁彷徨和多愁善感，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朱颜已非故，元发倏变白，勋业不早建，零落随萝柏。

陈篋发残书，青编展日夕，俯仰天地中，皆为寓居客。王韬的“掩关却埽益复无聊”精神状态大概引起了家人的紧张，他们催促王韬赶快成婚，希望以新婚的喜悦冲淡科场失意心头留下的阴影。1847年农历正月，王韬与举人杨隽之女、好友杨醒逋之妹杨保艾结婚。然而，新婚的喜悦并不能完全驱散他心底的挫折感，蜜月里，他依然陷在愁城之中，以至他经常夜不能寐。《蘅华馆诗录》中有“不寐披衣夜深起，侧听空阶残露滴”之句，反映了他此时的精神状态。王韬最后选择了第四条道路：教读乡间。1847年，他再次前往锦溪设塾课徒。此次锦溪之行显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若不是生活的负担，他是不会愿意在忧愁之上再加上新婚后的离愁的。他临别赠诗妻子道：

春来百感正茫然，又著离愁更断肠。

伴我寒灯昏似墨，照人残月冷于霜。

梦为离别都成泪，魂入温柔别有乡。

作茧红蚕多自缚，宵阑再拜炷心香。

在锦溪，王韬的生徒只有二三个幼童。教学之余，他得暇研读经史和作文写诗。他在致内兄杨醒逋的诗中描述了这种悠哉清闲而又凄凉抑郁的生活：

寂寞锦溪路，萧条淞浦滨。囊笔情无限，捻书愿未真。交游长契阔，世事剧艰辛。地僻客朋少，村深风俗醇。检点诗篇富，登临景物新……宵阑搜旧怯，酒醒忆前尘。飘零今已惯，书札寄来频。却病教丸药，谋生愧负薪。芳时怜肮脏，古道叹沉沦。

此时的王韬依然没有从科场失败的消沉情绪里解脱出来。他消极的自我解嘲，悲观地解释人生，触目皆愁。天之阴晴，花之开闭，均能引起他的一连串的叹唱。有一风雨之夜，他对着一枝凋零的芍药这样吟道：

前夜雨萧萧，春去苦不知。芍药开何晚，石阑红一枝。雨中色更媚，折供古军持。晓起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与觉阿上人”。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反游仙寺并序”。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不寐”。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一舸”。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自花朝后至锦溪春杪未归寄醒速三十韵”。

忽相见，顿减昨日姿。因其已萎后，想其方开时。荣悴固不久，迟暮深足悲。物当保厥真，以全赋异资……人生变若是，感慨以系之。从王韬的物我相吊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负担何其沉重。1847年秋天，王韬因妻子杨保艾已怀有身孕，且正在病中，家中无人照顾，急忽忽地辞却教职，由锦溪返回甫里。

从1847秋到1849年9月，王韬除了中间去过上海“省亲”过一次以外，几乎是足不出甫里。他此时的主要活动是读书和写作。

在这段时间里，王韬决心“上挾圣贤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变，期以读书十年，出而世用”。广泛阅览古代典籍，“留意古诗文词”，“日积月累，见闻稍扩”。在读书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对有清一代的正统学术汉学与宋学均提出了质疑。在《呈严馭涛中翰师》一书中他分析道：“夫考据祖孔郑，理学宗程朱，两家自分门户，而学汉者，伤胶固，师宋者，病空疏，则又失之一偏。”他认为汉学、宋学各持一端，均不足以为当代学者效法，正确的方法是博采众长，以冀经世致用。王韬“治学为用”的实用思想在这里已初露端倪。

基于“求博”的观点，王韬对所谓正史与稗史的关系问题予以重新解释。他指出，正史与稗史的关系是相对的。名称虽有高雅与粗俗之分，但包含和保存历史真实却是一致的，“稗史虽与正史背，而问有相合，足以扩人见闻记览，又何必名高哉？故野乘亦可怕情，艺谱亦为秘帙，山经典记，各专一家，唐宋文人，类以此自传，韬心窃慕之”。在以后的治学过程中，王韬的确不为所谓的正宗所限。他读书不拘守于经典之作。野史小说以至神仙怪异均不排斥。在他的书信中，《洞天清录》、《格古要论》、《考盘余事》、《域外丛书》、《搜神记》、《关汉卿杂剧》等驳杂书名屡有出现；作文喜欢旁征博引，兼采众长，“取资于稗史，折衷于正史”。他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等有关中外史地的著作都有这种特点。

王韬在甫里乡居期间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写作。他向朋友说：“韬屏弃帖括，一志读书，阅先贤典籍，未得万中之一，迩年妄怀述作，而凤毛麟角，剖校非易，然或自此得稍益学问。”只读不作，乃为书虫之举。王韬自认为读书已经是“学富五车”，现在应该出而著书立说了。此时他主要写了三个作品：一是《琐窗笔记》，二是《丁未诗集》，三是《蒿目论》。其中《琐窗笔记》与《蒿目论》未曾公开印行，所写内容因而不为今人所详知。据王韬与朋友的书信推测，《琐窗笔记》可能是笔记小说一类，他说：“蒙著有《琐窗笔记》，蹊径未甚新异，惟意所托，覆瓿之物，无足当一笑。”这与他后来写作《淞滨琐话》、《遁窟谏言》一类讽世小说的命意是一致的。《蒿目论》为时事议论。王韬曾在《与省补茂才》一信中这样提到它：“迩来留心当世，酒酣耳热，援古证今，著有《蒿目论》，中有十不可治、七必当去之说，倘为政者采而录之，或亦可作杜牧邮模之痛哭也。”显然，这是王韬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初夏斋居即事”。

王韬：《弢园尺牋》，卷六，“与英国理雅各学士”。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呈严馭涛中翰师”。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呈严馭涛中翰师”。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王紫竿茂才”。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王紫竿茂才”。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与省补茂才”。

有心挟策以献当道和针砭现实的作品。至于《丁未诗集》，则是王韬以诗的形式对自己青年时代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是他平时以诗赠友，借诗言志日积月累的自然成果。王韬以后将它重新定名为《蘅华馆诗录》，并增收他以后各个时期的感时之作，于1880年正式刊印行世。

王韬是一位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人。在乡居读书写作的日子里，他常把三国时代耕读田亩的诸葛孔明当作安慰自己的先贤大哲，希望也有那么一天，在朝的大官贵人会三顾甫里茅庐，请他出来指陈大计。然而，他又更清楚地知道诸葛孔明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此人”的幸运机会是永远不会落到他的头上的。他在作完《蒿日论》之后就曾说过：“然而庙堂之上，不乏皋夔，其汗漠硕画，必远轶儒生，如用草莽而见效，不几显朝廷之无人耶？以是知吾说之必遭斥也。”

一举得第早已如泡如影，挟策以进亦如镜花水月，才长志大的王韬未免对自己的境遇黯然神伤。生活的贫困更加强了他的这种悲凉的心境。他向一位与他一样“丰于才而啬于遇”的秀才徐仲宝说：“君既深秋士之悲，蒙亦为物情所感。叹萧梁之任昉，门户衰迟，愧唐李之孟郊，诗词寒瘦，贫剩长卿四壁，偷存于敬一甃，所以引杜甫之杯，时深慷慨，弹冯驩之铗，不尽低徊也。”中国历史上怀才不遇者的悲哀似乎全集中在他身上了。

于是，雄心壮志的王韬又变得心灰意冷，觉得世界上万事皆空。仕途功名、道德文章、青史英名均如枯木秋草，既无价值，又增烦恼。“人生蹋地后，颠倒名利，曾无一刻闲，魂魄一去，皆如秋草浮云耳。复有著书立说，博身后之誉，亦思数百年后空名，岂泽枯骨哉，而况未必传也。”他甚至开始钻研佛经，忏悔自己不悟生活真谛。又在书斋前“艺菊数本”，学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神情，有事无事地品味吟咏。

然而，王韬真的象释迦摩尼那样看破红尘、象陶渊明那样超脱喜怒之界了吗？没有。王韬既无释氏的大彻大悟，也无陶氏的平常心态。王韬表面上的看破红尘是他内心愁绪郁结的表现形式，是强烈的功名欲遭到挫折后的愤世嫉俗。

愁城与酒国往往同处一个空间。王韬在这一时期深深陷入了刘伶之癖，王韬周围一大堆失意的乡村秀才们与王韬同病相怜，进而从旁推波助澜，或设会相邀，或索酒请诗，引得王韬愈发不可自拔。请看他在一封给妻子的信里所作的自画像：“朝来彤云如幕，山容不开，殆天工欲飞六出梅花矣。亟宜端整诗牌，涤除茗碗，以待膝六之至，余已折短筒以招同志，约于桥南酒家，冲寒毕集，夜深薄醉归来，烦卿剪冰芹烹雪水，于清寒中作冷淡生活，亦嘉话也。”自己与一群朋友放量豪饮不说，还把自己的“山妻”也卷进去，叫她半夜三更起来为自己“剪冰芹烹雪水”，王韬饮酒已到了“文人无状”的地步了。从王韬此时的诗文看，“酒”字出现频率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春风冬雪，菊、梅、荷、牡丹诸花或开或闭，友朋相会，贺生吊死，他几乎无事不酒，无时不酒。而且想出花招来喝，他在《漫游随录》中回忆他在家乡“鸭沼清风亭”三五成群狂饮大嚼时的情形说：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与省补茂才”。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与徐仲宝茂才”。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再与梦蘅”。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与梦蘅内史”。

陆天随在时喜斗鸭，有斗鸭栏，中央筑一亭，曰“清风亭”……里中诗人夏日设社于此亭，集裙履之雅流，开壶筋之胜会，余亦获从诸君子后，每至独早，时，余年少嗜酒，量颇宏，辄仿“碧筒杯”佳制，择莲梗之鲜巨者，密刺针孔，反复贯注，自觉酒味香冽异常，一饮可尽数斗。又取鲜莲瓣糝以薄粉，灸以香膏，清脆可食，亦能疗饥。社友群顾余而笑曰：“子真可谓吞花卧酒者矣！”

纵饮给王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危害。他经常“形疲神倦”、“连日病酒”，可怜一个只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三天两头地在药罐边讨生活。连他自己也觉得不是滋味，曾作诗自嘲说：“无计著书且闭户，药炉经卷度朝昏”，“闭户且倾卮，多病惟缘酒。”

不宁如此，放荡不羁的纵饮还使王韬遭到许多乡里物议。他的内兄杨醒逋就曾以娘家代言人的资格教训过他，要求他与那些酒食秀才绝交，认认真真在家读书作文。王韬对这些物议不以为然，他在给杨醒逋的回信中申辨说：“辱来书教以仟除绮语，杜绝面朋，意良厚也，然仆则有说。仆年二十，而于尘世周旋之故，已厌弃之矣，惟以二亲冀望之深，不敢自弃，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至于绮靡障碍，未能屏弃，亦是文人罪孽，然浓艳风华，乃其本色，儿女之情，古贤不免，此亦只与匝茗炉香供消遣而已，不足为学业累也。若夫取友之道……仆闻君子弗遗其旧，苟可节取者，未尝概摈之门外，自问生平，何者优于人，何者继于人，而素所交接之士，尽有一善可师，片字足录，可以匡我未逮者。如必尽范张槛吕而友之，毋论盛气难亲，抑亦所见不广矣。子宁以他规我，勿徒屑屑于其未也。”在王韬看来，这些物议至所以产生，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由于他材大遭忌和凡夫俗子根本不了解他的苦闷。他以比喻的手法写道：

空谷有幽兰，其品轶芳杜，非无高尚心，徒与众草伍。从未知媚人，亦非生当户，竟以见嫉锄，奇冤报千古。鸾凤翔天末，不与鸡鹜争，梓楠生山中，不共桃李荣。操守良独异，识见殊群情……惟以妒者众，谣泳始丛生，材大乃被弃，品高终见轻。

任何人都无力改变王韬那种放荡不羁，他的父亲、他的内兄、他的妻子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王韬的放浪形骸并非是由于王韬天生喜欢如此。它是王韬怀才不遇之后内心苦闷和抑郁的发泄，是他积极人世精神遭到严重挫折之后的变态。只要社会环境没有变化，产生心灵苦闷的根源没有铲除，王韬以及千千万万个乡村落第秀才便不会停止在这条道路上沉沦。可以断言，如果不是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把中国引入世界资本主义万国相通的大潮，从而打破甫里乡村青山秀水的宁静，阻断旧日文人学士的生活惯性，王韬准会象甫里的前代文人一样，于放浪形骸和牢骚满腹之中潦倒一生而一事无成。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无题”；卷一，“怀吴江徐仲宝”。

王韬：《弢园尺牋》，卷一“与杨醒逋内兄”。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一，“感遇”。

第二章 闯荡上海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之后，“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老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西方国家以其坚船利炮和经济实力为后盾，硬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契进了几块资本主义的“飞地”。上海正是其中最大的一块。

对中国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在东南沿海的“飞地”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国通商口岸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切断了周边地区原有自然经济的纽带，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解体。都市繁荣与乡村凋弊的两极发展，使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和一些穷愁潦倒的文化人开始抛弃传统的谋生手段，离开农村，前往上海一类通商大都市去“撞运气”。日趋衰落的王家也加入到此一潮流中去。青年王韬也因此不自觉地被卷进了东西方文化冲撞与交流的漩涡，在经历了人格矛盾和精神苦痛之后，开始了世界观的最初转变。

一、佣书西舍

1847年，王韬父亲王昌桂因家乡招不到生徒，“饥驱作客”，被迫到上海设馆授徒。这是王家与上海结缘的最初举动。但其时王韬并没有随父赴沪。从王韬此时所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中，也看不出设馆上海的王昌桂在介绍资本主义文明方面对王韬有过什么重要影响。

王韬首次目睹上海景象是在1848年。这一年农历正月，王昌桂滞留沪北，无法旋里，王韬前往上海“省亲”。行船一入黄浦，王韬立即就觉得“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漂渺云外，飞瓮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也。”

陌生的事物、崭新的世界诱发了青年王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听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所主持的墨海书馆颇多新奇之物，便特地前往拜访。他记载当时访问的情形说：

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缈插架，满日琳琅……

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谨醇醒也……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

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

至1848年，上海虽已开放七八年之久，但一般内地乡村却还没有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文化辐射。传统的封建文人对西方事物既知之甚少，也鄙夷不屑。他们宁愿死守“华尊夷卑”的古老教条而闭起眼睛无视西方文明的存在，更不愿意向“非我族类”的“夷狄之人”学习请教，作为封建文化中的一员，王韬此时当然没有摆脱封建文化人的价值观和心态，但他主动访问传教士主持的墨海书馆，与夷狄之人饮酒谈话，却也透出了王韬日后与顽固封建文人分道扬镳的端倪。王韬好奇爱动崇尚自然的个性和他所信奉的变易哲学，是他能够跳出传统藩篱的主观内在因素。

1848年的上海之行，特别是第一次与西方人士的友好善意的接触，打开了初出乡间的王韬的眼界，使他对西万文化和科学技术有了最初的印象。这为王韬后来世界观的转变和生活道路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契机。

此次上海之行，王韬在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蓬勃生机的同时，也在它辉煌的五光十色之中看到了随之而来的中国生存危机。后者留给王韬更深的印象，引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愁绪。当他放眼黄浦江，注视着一艘艘外国商船和兵舰自由自在地在中国的江河里来往游大的时候，他无法按下自己愤怒的心情，提笔写下四首感事诗：

其一：海上潮声日夜流，浮云废垒古今愁。

重洋门户关全局，万顷风涛接上游。

浩荡东南开互市，转输西北共征求。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黄浦帆樯”。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黄浦帆樯”。

朝庭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

其二：茫茫水国 殢 春寒，鲸鳄消余宴海澜。

间里共欣兵气静，江山始叹霸才难。

殷忧漆室何时已，恸哭伊川此见端。

远近帆樯贾胡集，一城斗大枕奔湍。

其三：烽人当年话劫灰，金银气溢便为灾。

中朝魏绛纤漠画，穷海楼兰积忌猜。

便出羁縻原下策，能肩忧患始真才。

于今筹国诬容误，烂额焦头总可哀。

其四：海疆患气未全舒，此后岂能防守疏。

应有重臣鹰管钥，早来绝域会舟车。

土风谁补蛮彝志，波毕今登货殖书。

千万漏卮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这里，王韬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仇恨、对国运的担忧，在强度上超过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欣赏。这一点正是他拒绝麦都思邀请而毅然返回甫里乡村的主要原因。在情感上他还不能接受西方人士在中国自由居住和活动的现实，更不能允许自己与之“同流合污”。然而，命运似乎故意与王韬开玩笑。家庭生活的波折使王韬除“麦笔佣书于沪上”之外，别无选择。1849年6月，王昌桂因病去世。王家生活的经济来源顿告断绝。年仅20岁的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担子。但是，靠一介寒士的王韬“设馆授徒”所得的微薄收入无论如何已经不能维持一家老少三代的生活开销。而且，1849年又恰是一个大灾之年，江南地区暴雨连绵，“三旬罕见日，五月要披裘”“江村成巨浸，远近起哀音”，米价暴涨，家家生活不易，哪里去招收生徒？面对此一局面，王韬只有外出赚钱谋生，养家活口。恰巧麦都思此时需要一个中文助手，遣使来书再次相邀，王韬遂于1849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此后，他与麦都思一同工作，“谬厕讲席，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一个中国乡间的落第秀才就这样被家庭的不幸推进了中西方文化对抗与交流的漩涡。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能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而作为传教士的麦都思也不会想到他的邀请会成为一位改革思想家产生的“催化媒”。他做了不自觉的历史推进者。

王韬的离家赴沪是环境逼出来的“违心而行”的跳槽之举，其内心的苦涩是不难想见的。有一首长诗反映了他离开甫里时既迫不得已又依依不舍的矛盾心情：

瘁叶悲陨树，病乌唳离巢，岂余非人情，甘作秋蓬飘。少小惯为客，里居多无聊，今兹远乡县，独处耐寂寥。顾念白头母，忧于心滔滔，更怜小弱弟，久已诗书抛。吾躬事丛集，此举敢惮劳，日卜一座宅，涂茨为诛茅。吴天胡不吊，鞠凶丁我躬，葛屐走风雪，忍饥敢

言穷。一朝落海上，夫岂由余衷，根本诬弗重，饘粥何由充。嗟予事大舛，磨蝎在命宫，动如金跃冶，嘲消丛吴蒙。岂有伯通虎，令我安赁舂，因之决行计，仰视寥天鸿。我家居里中，及今阅三世，即我住此庐，亦已逾十岁。先人立门户，辛苦心力散，前年遭大水，研田继生计。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黄浦帆樯”。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雨中感事”。

王韬：《弢园尺牋》，卷六，“与英国理雅各学士”。

含凄急出门，仓卒麻鞋系，门柩感衰微，骨肉惊飘逝。庭树色依依，对之屡挥涕，再拜从此去，衔哀告家祭。

此一最初心情一直潜伏在上海时期王韬的深层意识里，每当王韬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场合，它就会不自觉地崩泄出来。

初至墨海书馆，王韬住在上海北门外的一间破陋的小屋里。小屋与一片坟地相连，前后荒凉不堪，里面开间亦只可容身，王韬描写为“小屋三椽，聊以容膝，老屋多隙，时来黄沙，小窗不明，罕睹白日”，冬季北风怒吼，窗栏欲飞，夏日来临，枕簟皆湿。在这样的环境里起居生活，王韬当然觉得了无情趣，如同楚囚。所以在此一时期的文字里，王韬留下了大量的怨愤之词。他抱怨时运不济，自叹佣书西舍，贱如犬马，咏怀往日甫里乡间优游自得的且耕且读和无拘无束的诗友唱和。

然而，王韬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甫里乡间去，墨海书馆的薪金毕竟比教授生徒的束脩来得丰厚。肩有全家生活重担的王韬不能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忍受暂时的困厄。经过一年的咬牙坚持，他积蓄了一些钱，终于在墨海书馆的后面租借了两间稍好一些的房子。1850年夏天，他把妻子和女儿一起接到上海合住。家庭的团聚多少冲淡了一些郁积在他心里的怨愤。

王韬及其家人的离乡赴沪，特别是王韬“卖身事夷”的举动引来了家乡亲戚朋友的诸多指责，一时“物议沸腾”，“姍笑者蜂起”。连王韬的妻兄杨醒通也以儒家大义责备王韬，希望他不要“附腥慕膻”，托足夷狄之间，而要见歧路而返，回头是岸，继续科举的道路上奋斗。王韬对来自乡间的责备姍笑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思来想去，总觉得他维一的选择只能是继续“颌首悴面，倒行逆施”。他在给杨醒通的信中述其苦衷说：

韬也不才，无所表见，以光于间党，遁迹海上，是用殷忧，鸿雁西来，手书远贲，十读三复，谷所适从。

然有不能无言者。昔年先君子见背，韬固不欲行，眷顾家庭，又难中止。使有二大力者提挈其间，俾成素志，决不敢自甘湮没。乃经秋卧病，闻问阙如，虫声满庭，鼠迹盈案。历此况味，只自伤矣。然后戢翼长征，浩然不顾，知韬者当为播痛哭流涕而不置也……天地生才不数，处世亦不苟，韬常以为然，及至今日，有不敢尽信者，韬年十九，已事博涉，才虽不逮古人，而风雨一编，靡间晨夕，不可谓非勃书媚学者，初不料时命之不偶而沦落于无知之俗也。事至于此，诚为已

矣，岂复能嘤嘤然诩名尚品炫智矜奇哉。

杨醒通是一位古典唯理主义者，他的处世哲学代表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对他来说，儒家的道义是最重要的，是做人的根本，而“物欲”层次的衣食则是次要的，非根本的，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愿“安贫乐道”，更不愿为守道而“饿死”的王韬自然成为他责备的对象。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王韬需要他的资助的时候，他又是那样看重物质财富，以致吝啬得对王韬不闻不问。王韬这一封回信无疑是对他的冷嘲热讽。

人类生存法则的历史逻辑原来就是先物质后精神的。王韬为了养活自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移家沪上作”。

王韬：《弢园尺牋》，卷二，“与杨三醒通”。

《王韬日记》，第67页（方行、汤志钧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

王韬：《弢园尺牋》，卷二，“与所亲杨茂才”。

己、养活全家，只能选择这条被封建文人们所不耻的道路，尽管他是那样的不情愿。

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麦都思牧士修改、润色他的译著。麦都士牧士是英国伦敦布道会最早派遣来华的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在马六甲和广东一带进行传教活动。最早的中文月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麦都思与马礼逊两人在马六甲合作创办的。鸦片战争后，麦都思来到上海北门外设点布道。墨海书馆是他创办的宗教印刷机构。麦都思来华时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即准备把圣经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翻译成通俗易懂平实流畅的中文，使中国人都能乐于接受基督的启示。1847年，他把上海的传教士组成一个编译委员会，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但是，尽管麦都思的气魄很大，其中文能力却明显不足。他以及在他周围工作的传教士们虽然懂得中文，口语水平甚至不低于中国人，可翻译出来的文字总是免不了“拘文牵义”，“洁牙罄口”，王韬讥之为“即使仲尼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这样的宗教作品极易引起中国民众特别是文人学士的反感，削弱了福音的传播能力。麦都思邀请王韬，就是期望借助王韬的中国学功底，对他们所译的书籍加以疏通、润色。王韬居沪初期此一工作占据了他的大部分的时间。

延续了六年之久的新；日圣经翻译工作是单调而乏味的。一位自始至终参加这一工作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W. C. Milne）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说：“我们每天集中讨论，先读一段圣经和祈祷文，然后逐字逐句地翻译。每位传教士都有发言和修改译文的机会，以使译文更尽人意。这样的工作从上午十点一直延续到下午二点半。有几位传教士带着有用的土著汉文导师或工作助手。”

作为一个有着良好儒学基础、生性又好动的青年才子，王韬每天跟在传教士后面修饰他认为桔屈聱牙的译文，的确叫他生厌万分。他愤愤不平地向友人抱怨他的境况说：

佣书西舍，贱等赁春，闭置终日，动遇桎梏，学蒙庄之牛呼，为史迁之马走，因此萋萋自甘，惘惘不乐，每一念及，行坐都忘。——

每日辨色以兴，竟晷而散，儿于劳同负贩，贱等赁春。疏懒之性，如处豨豲，文字之间，尤为冰炭。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

王韬讨厌宗教著作的翻译工作，可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工作却怀有极大兴趣。此一兴趣是他讨厌西方宗教而又与传教士周旋揖让的又一原因。他在《弢园老民自传》中说：“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住适馆授书焉”此话当属由衷之言。十九世纪中叶的王韬不曾受到希腊神话普罗米修士为人类窃取天火故事的启发，但他为师夷长技而甘受折磨的坚忍精神却如出一辙。中国近代第一代进步思想家大多具有与普罗米修士一样的品格和精神。

王韬：《弢园尺牋》，卷二，“与所亲杨茂才”。

Alexander Wylie, *The Bible in China*, pp.103-104. 转见于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l' 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2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奉朱雪泉舅氏”。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王韬在上海时期参预翻译的科学性著作主要有五种，即：《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王韬后来将它们与《泰西著述考》一道编辑成册，名之为《弢园西学辑存六种》。

《格致新学提纲》是王韬在 1853 年与艾约瑟 (Joseph Ed-hns) 合作翻译的，其后王韬又“屡加补辑，多所增入”。因此，它不仅仅是翻译，而兼有编撰的成份。此书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学、化学、重学、光学、电叫学、气学、声学、地学、矿业、医学、机器、动植，无所不具”。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就能读到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性著作，实在是历史的大幸。王韬的革路蓝缕之功不可谓不大。《光学图说》也是王韬与艾约瑟合译的，是一本介绍光学知识的入门书，配有图绘，浅俗易懂，所论望远镜制造原理及工序尤其实用。《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是王韬与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合作译成的，翻译程序是伟氏“口译”，王韬“笔授”、“润色”。《重学浅说》为物理学著作，王韬曾在《弢园著述总目》中概括该书的要旨说：“西人于器数之学，殫精竭思；其最奥者曰重学。以轻重为学术，行止升降，必藉乎力；高下疾徐，必因乎理：而所以制器测象者，非此不可。凡助力之器有六：杠杆轮轴滑车斜面螺丝尖劈。赖此可以举重若轻，其中各有算学比例在。”《华英通商事略》是一部叙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发展商业贸易的历史著作。在当时，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商业为本”的情况还相当陌生，更谈不上在内政上予商业以应有之地位。王韬选择此书翻译有其针贬时事，警醒国人之动机。《西国天学源流》是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学发展史的著作，“读之可以讨源溯流”。王韬试图通过此书的传播使国人认识西历的精确性和它的科学测量方法。

由于王韬中文造诣的深厚，他参预编译的作品，不论是宗教作品还是科学著作，均获得相当的成功。前者如《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代表本“文辞雅达，音节铿锵”，水平远在前辈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和郭实腊 (Charles Gutzlaff) 所译圣经之上。《新约全书》并被英国圣经会正式采纳为规范精译本而加以推广。至 1859 年它已被再版 11 次，直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此一译本仍在中国流传。后者如《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等也都下径而走，被文人学子们视为至宝。

王韬对宗教译著和科学译著两种成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前者，他除了不时表示只配“糊窗覆瓿”外，从无一点“成就感”；相反，对后者却总有一股压抑不住的自豪感，每当朋友向他索要这些书籍时，他总要在自谦之词中流露出得意之色。

他也常常把这些书籍作为贵重礼物赠给朋友。晚年他还把这些译著汇编成集，铅印再版。对两种“成功”的不同态度表明了王韬在宗教与科学之间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

Paul A.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第 78 页。（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

R.WardlawThompson, GriffithJohn, TheStoryofFlfyYearsinChina (NewYork, 1906) p.431 转见于

PauIA.Cohen, "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 p.

的好恶取舍，也说明王韬滞留沪上除了经济上的客观原因以外，的确还有试图“窥破西学堂奥”的主观动机。

二、沪上畸零人

五口通商后的上海是中西两大文明板块撞击的热点，也是大清王朝行政权力失落的特殊空间。这里聚集着许多中国落魄文人。这些落魄文人或为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或为官场角逐的失意人。在传统封建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结构里，他们是处在最外缘的“离子”。当两大文明相遭遇的时候，他们极易在外力的撞击下脱离原来的结构而成为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美国中国近代史专家柯恩（Paul A. Cohen）在他的著作《传统与现代之间》对这一群“中间人”有过精辟描述。他说：“他们大多都是儒家经典训练出来的文人，且往往具有秀才一类的头衔。西方人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把他们吸引到上海。不落俗套、行为怪僻而又不乏才华是他们的个性特征。他们的诞生象征着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口岸知识分子（Treaty Port Intellectual）的出现。他们在中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生存，其工作在初期似乎与中国历史的主流相脱离，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他们日益显示其重要性。”

“逃儒逃墨难逃世”。飞离出去的“离子”并没有就此找到一个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和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哲学。个人的不幸、国家的耻辱、东西文化认同的困惑，在他们的心灵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抑郁孤独而又牢骚满腹，愤世嫉俗而又放荡不羁。这是一群离开传统堤岸跳入陌生海洋而又一时没有找到彼岸依归的“畸零人”。

在这些“畸零人”中，王韬是不幸最多、忧愁最深的一位。其经历之惨，精神负担之重，几乎使上海时期的王韬“无复有生人之乐”。

（一）家庭多变故 1850年夏，王韬把妻子女儿接到上海，打算以他“岁得二百金”，从此摆脱困厄。不料未及半载，妻子杨梦蘅“久劳患病”，“遽遭惨变”，不治去世。王韬与杨氏结婚刚刚三年，且离别多于相聚，迁沪后伉俪之情犹如新婚。突遇此变，王韬顿惑天昏地暗，痛不欲生。他写诗自咏道：

偕隐难期白首归，长离早把青鸾跨。
院落天风响佩环，人海茫茫永不还。
银烛窗前明昔昔，旧衣架上黯斑斑。
残灯孤馆真凄怆，回廊独立悄无语。
最怜孤鸟不成鸣，底事宵长未肯曙。
凄凉无计作悲歌，零落天涯怨更多。

妻子病故后，王韬因“顾思白头母，忧子心煮煮，更怜小弱弟，久已诗书抛”，便把老母与小弟一块接到上海同住。王韬每日辛苦劳作，“奉高堂，教弱弟”，指望家庭从此太平过活，小弟早日成人。可接下来的打击让王韬更加失望。弟弟王咨卿来沪后与游手好闲之徒混在一块，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整日醉生梦死，不事读书。王韬被他弄得钱囊拮据，伤透脑筋。在一封致杨醒速的信里王韬无可奈何他说：“舍弟咨卿，供养烟云，已成痼癖，迩来为之赁屋一椽，聚徒三五，聊以收其放心，然犹且典研鬻书，以供片芥，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悲秋曲”。

劝之不可，徒唤奈何。”后来，王韬花尽积蓄，“心力耗瘁”地为他娶了夏氏作媳妇，以期能对他有所匡正。不料又是“未及三载，遽以疾殒”。愁郁之下，王谔卿的烟瘾愈发不可收拾，“呼吸烟霞”，“迷津难返”，未三载也溢然逝去。

如果说家人一连串的去逝所带来的悲哀使王韬长年累月“如坐愁城”；那么“无后”的忧虑便在这座愁城之上又加上了一层沉重的精神黑网。王韬本来有兄弟五人，但三个哥哥均于幼年夭折，只剩他与吸烟成癮的弟弟谔卿活至成年。王韬生有二女，次女且“生不能言”；王谔卿生有三子，但一个也未成活。从传统意义上讲，王家血脉香火自此而断。一位思想开放的现代知识分子或许对此“衰宗”局面不以为意，但对还未走出传统、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十分强烈的王韬来讲，则仿佛是人生最大的磨难，是命运对他的最大惩罚。他经常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伦理来谴责自己，闭门枯坐思过，同时诅咒命运的不公，凄凄惨惨，哀哀怨怨。在《哭舍弟谔卿》一诗中他这样叹息道：

痛杀北堂母，同谁奉甘旨。三兄殇可嗟，一个弱如此。

衰宗安得振，时陨滂沦涕，只鸿迷所向，此痛何时止。

直到他后来亡命香港，还在为亲人接二连三的谢世和王氏家庭的断后状况耿耿于怀。一封写于逃亡香港一年之后的信这样写道：“懒叟所虑者，尤在嗣续，已逾潘岳之年，将逼商暨之岁，膝下萧然，顾对谁供。我家七叶相传，二百三十七年，仅存三男子。从侄二人，长者清狂不慧，次者荡越绳检，不可教训，世乱家贫，年壮无室，我之所遇则又如此，呜呼，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弗可冀也已。”甚至在他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成为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之后，他还不能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无后”一事。一封写于1881年前后的信函这样说：“言念吾宗，伤心欲绝，悠悠苍天，易此其极。王氏一支，自明崇祯至此，七叶单传，今殆绝矣。岂刑官之后，遂至不祀，而若敖之鬼，长此终馁矣。宁不痛哉！宁不哀哉！”

（二）正统华夷观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封建时代中国的知识界被包裹在“严夷夏之大防”的封闭甲壳里。未出甫里时的王韬也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华尊夷卑论”的维护者。

有一件小事典型地反映了王韬们这种文化价值观。大略在1848年前后，王韬的一位朋友因家庭陷入困境被迫前往上海洋人处做事。王韬获知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给这位朋友，劝他不要因为一时“身处涸辙”而失儒者之节，卖身事夷。他写道：“儒者立节，不必鸣高，君子持躬，务期绝俗，经权常变，惟所用焉，而独至处身之道不可不谨……夷人自议款通商以来，包藏祸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燕乎？……春秋责备贤者于失身尤为重。仆于酒酣耳热后，能不为足下击碎唾壶，感愤位下哉！然裹足

王韬：《弢园尺牋》，卷三，“与醒逋”。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慰舍弟谔卿悼亡”。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哭舍弟谔卿”。

王韬：《弢园尺牋》，卷六，“寄吴中杨醒逋”。

王韬：《弢园尺牋续钞》，卷一，“与杨醒逋明经”。

不入者，保身之哲也，决心舍去者，果断之士也；事机犹可转目，昔非何必今不是，翩然辞去，鼓棹而西，弹长铁以归来，谢知音于海上，尚不失为佳士耳。若复羁栖异地，沦落青衿，以垂暮之年，蹈不测之域，不独知者为之兴叹，即己之心何以安？”字里行间饱蘸着对西方“夷人”及与之共事的“士林败类”的鄙夷不屑之情。

十九世纪中叶时代的变化也把王韬自己抛到了上海这个听谓的“腥膻之地”。在与西方人士的接触之中，他逐渐体察到西方文明和西方人士的优异之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在日记中就曾多次赞赏合信、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西人聪明好学以及对他的生活关照。

但是，王韬仍没有全部放弃他的旧观念。封建传统文化早年所赋予他的文化价值观依然牢固地存在。尽管后来王韬成名后曾说他在上海时与外人“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上海时期，特别是1859年以前的王韬仍然是一个“华尊夷卑论”的笃信者。他的思想变化远远落在他的生活变化之后。与西方人士朝夕相处被他看成是“日与异类为伍”，是“耻莫大焉”，“害莫大焉”。一封写于1858年的致舅舅朱雪泉的信这样写道：

自来海上，绵历岁序……托迹侏^儻，薰莸殊臭。

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饮食者欲，固不相通，动作语言，尤所当慎……文字之间，尤为冰炭，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此邦氛浊之场，肩毂摩击，腥膻萃附，鸦雀之声，喧旬通衢，金银之气，熏约白日。聆于耳者，异方之乐，接于目者，犹杂之形。——

这里，没有一丝“雅称契合”之意，而传统士人那种“华尊夷卑”的潜意识却暴露无遗。在另一封致密友的信中，他以更直接明了的语言谈论“夷性乖张”和“夷夏大防”。此信引述了《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词滥调后指出，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因此，宜严加防范。

即使不能将其驱逐，至少也得格绝中外。王韬断言，“中国英俊士子”不顾“中外异治”，尊西人为“西儒”，“乐与之游”，将会“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蠹贼，其害有不可胜言”，长此以往，“华风势将浸成夷俗，名教大坏”。

在王韬心目中，夷人夷俗是如此的可鄙可恶且可惧，而作为“华人”的他又不得不为了向其学习和谋求生计与其周旋，王韬确实陷入了痛苦的精神炼狱。在他与传教士一块工作了一天之后，他常常独伴孤灯，以负罪的心情审视自己的行为，谴责自己“逐臭海滨”，“败坏名教”，后悔自己饥不择食，“误陷腥坛”。从赴沪之初直到1859年左右，他的这种惜也痛哉的对自我丢失的忏悔，充满了他的书信和日记。1850年秋，他在给弟弟王谔卿的信中自责并责人地写到：

我自去岁抄秋至此，今已又及秋矣，时物一周，不禁触目生感。呜呼，人生如白驹过隙，

王韬：《弢园尺牘》，卷一，“与友人”。

《弢园尺牘》与《王韬日记》均收此信，略有导处，此据《王韬日记》，第81页。

王韬：《弢园尺牘》，卷二，“再寄孙惕庵”。

诚不知老之将至。贫贱何足耻，富贵不可求，但当安吾贞守吾素

而已，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

此后，在给舅舅的信中又不无后悔地表示“使当日者却三聘之金，以为污我，严一介之意，不妄干人，鸡林之使，摺诸门外，乌泾之行，绝诸意中，决然辞谢，舍之他图……上可以博功名，下可以垂著述，计不出此，悔焉已晚。”1859年3月的一天，王韬的朋友管小异来拜访王韬，言及他拒绝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延修《旧约》一事。管小异在向王韬表白拒绝助译的理由时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王韬听后汗颜涔涔，喟叹不已，他在当日的日记里写道：“噫！闻小异言，窃自叹矣。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一失足，后悔莫追。苟能辨其大闲，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

正统的华夷观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复因亲朋好友的不理解而加剧。王韬赴沪后，许多朋友“以此为获罪名教，有玷清操，或则肆其妄谈，甚者加以丑诋”，还有的与他割席绝交。这种外在的压力使王韬内心时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惶恐不安。他试图找到一条能够“洁身自好”的生活道路，但最后没能实现。他曾以沉痛而又无可奈何的语气写道：“呜呼，留则百喙莫辨，归则半顷未置。名誉不立，谁停侯芭之车，汲引无闻，孰赁伯通之庞。左右都非，进退维谷，坐是忽忽若忘，懵懵不乐。”

（三）事业的困顿王韬每年“卖文所入”约有二百金，一人生活尚有节余，可以此作为整个家庭的生活之资则难免捉襟见肘。王韬居沪初期要担负六口之家的生活费用。1857年以后，因续娶继室林氏和弟弟王利贞娶妻生子，他一人竟有“八口之累”。于是“以布衾质钱、金钗贯酒”一类等米下锅的事便不断发生。王韬此一时期留下的书信及日记中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记载，略举数例，以见其贫困之一斑：

岁暮囊空，百费猬集，徒张空拳，辄唤奈何，以诸窘迫状，真阎浮提中苦恼众生也。

授书西舍，绝无善状，局促如辕下驹；笔耕所入，未敷所出，平仲之书，渐以易米，蔡泽之釜，时复生尘，倘非知我者，必以此言为河汉也。

度岁之资，尚无所措，乃作札致恂如假得数金，粗能过去，摒挡店逋，为之一清，从此安稳清眠。即有剥啄双扉，亦不疑为索债来者。——

王韬：《弢园尺牋》，卷二，“与谿卿舍弟”。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奉朱雪泉舅氏”。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92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92页。

王韬：《弢园尺牋》，卷三，“呈涤庵明经师”。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奉朱雪泉舅氏”。

王韬：《弢园尺牋》，卷三，“寄应雨耕”。

王韬：《弢园尺牋》，卷三，“呈涤庵明经师”。

王韬：《弢园尺牋》，卷三，“与许壬釜”。

面对如此窘境，埋藏在王韬心底的功名心又悄然复苏。他在“寄周丈侣梅”的信中承认说：“遁迹海滨，真如匏系驾骀下才，无志腾骧，只增伏枥之悲耳，桐叶已落，槐花正黄，见人家泥金遍贴，功名之念未尝不稍动于中。酒酣耳热时，复潜焉自讪。同学少年，亦多不贱，彼此相形，益觉泪下。羸靡于此，势非得已……安能郁郁久居此哉？”1956年，他竟然在丢弃八股帖括十年之后重操阿婆生计，到昆山参加科举岁考。如此仓促上阵的结果，自然是一人号房便不知所云，枯坐了几个时辰，败兴而去。

王韬还未死心，1858年11月9日，他在30岁生日这一天的日记中还在念叨“壮志未酬”的苦衷。他自我解嘲说：“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徒天路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由于思之过多，虑之过切，连做梦他都想着金榜题名的事发生。就在30岁生日前几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三更得一梦，甚奇。梦予生前系姓贾，亦士人，筑屋西冷桥畔。娶妻美而慧，能歌咏，伉俪甚相得。后妻卒再娶，容亦丽而才不逮，因此郁郁寡欢，诣云栖大师处祈梦，以卜终身。梦云栖授以一钱，上镌“云阶万里”四字。贾受钱而寤，旋应省试获第，予醒后，历历不忘，心甚异之，不知何解也。强烈的功名欲促使他于1859年又参加了一次考试。王韬这次考试的结果更加糟糕。从他考试期间的日记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

十有八日己未（3月22日）是日，考生员经古第一场，寅初即起，至辕门抵候，顾点名甚晚，已东方日出矣。辰正，有题《五经庶几才赋》，以“讲论五经庶几之才”为韵；诗题《君子养源》，得“源”字七排一首……予在场中，未知底细，迅笔直书，午后始出。

二十三日甲子（3月27日）晴。是日，考昆、新、太属七学，点名殊早。卯刻有题。昆新题《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太属题《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经题《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诗题《岭上晴云披絮帽》，得“云”字，系苏东坡诗。予草划毕事而出。

醒通、恂如、康甫约作登山之游，予欣然重往，连袂出行。……茶寨四壁，疥诗几满，而可诵者略有数首，雒诵久之，吟思忽发，乃与庙祝借笔题一诗其上云：“头颅三十不成名，竿木逢场悔此行。”

失败后自悔自嘲，并不表示他从此不再期冀通过科举摆脱困境。实际上，他的功名心依然有“噓而复燃”的可能性，如果他对帖括之术稍有把握，他一定还会再参加这样的考试。就在他岁考失败后两个月，他的一个朋友来书劝他参加江苏省借浙江省考场举行的秋闱，他不无遗憾地说：“邱伯深寄书至，劝予秋闱必去，以酬先人未竟之志。其意良厚。奈予于帖括一道，束诸高阁已十余年矣，今复欲执笔为此，断不能如时世妆之争妍取怜也，因此功名之心益灰。虽有名师益友，亦不能鞭策，念及辄自悔自憾也。”依依不舍

王韬：《弢园尺牋》，卷二，“寄周丈侣梅”。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34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29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96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97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113页。

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跃然纸上。

家庭的不幸，正统华夷观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以及事业的困顿，使王韬陷入了精神的苦闷。他在书信中叹息说：

阮籍不名一钱，仍嗟垂囊，刘备空绕三匝，犹欲觅枝。所谓耕三于一，损益积赢，为他日退步者，仅成虚愿耳。兼之舍弟读书未就，学贾不能，呼吸烟霞，已成痼癖，迷津难返，凡百堪忧。顷篋乏迭唱之欢，手足无交推之雅，三十之年又艰举子，无以遂老亲含饴之弄，退处闺闼，左顾少愉。命也何如，要难相强，境遇之厄塞既如彼，家门之所值又如此，人生乐趣，混然

尽矣。

坐此贫困，已累岁年，少圃一里，未邀乡曲之知，长游四方，罕识诸侯之面，加以文章憎命，科第无名，今兹秋赋，欲往未果，将为仕耶，则不能随行逐队，学南郭之滥吹，将欲隐耶，则又为问舍求田，被北上所腾笑，穷通皆失，左右都非，吁其悲矣，心滋戚矣。

悲之大，愁之深，心理倾斜之严重，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韬需要找到一条排解愁郁的渠道。他找到了“醇酒妇人”。上海时期王韬生活之放荡，行为之怪异，几乎到了半疯狂的程度。

放浪的生活破坏了王韬的健康。王韬在上海的13年正当他生命中的20岁到30多岁的黄金年华，但从他的身体状况看他显然已经未老先衰。他患有“酸齿”、“洛血症”、“肝气不畅”、“烂脚”等多种疾病，外表“虽二毛未见，而引镜自照，精不泽肤，气不充骨，销铄之验，殆已见端”，体态过早发福，被上海滩上的朋友戏称为“吴门王胖”。至35岁时，便已经“目眵齿腐，面皱发稀”。这那里象是一位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分明是一位老态龙钟的病叟。

王韬狂放不羁的间接后果是“开罪士林”。王韬每每衣衫不整，“佯狂乎市廛之上，涵辱于沽屠之间”，或聚友于酒楼妓轰饮达旦，抵掌雄谈，声惊四座。这些难免引起士林的谴责，指其为狂生。王韬对此虽不介意，但这的确是后来他不被某些当权者所重用的原因之一。

王韬曾在一首诗中咏叹：“遭乱离忧百事灰，生平怀抱几时开，万言羞学纵横术，四海谁知经济才？兄弟朋友皆至性，妇人醇酒有奇哀”，社会制造了他的不幸，酿成了他的苦恼、忧愁和悲哀，可又没有为他提供任何合情合理的可资寄托的支点或可供渲泄的渠道。他只能以他自己待有的方式来平衡心灵的倾斜。从王韬的非理性的“放浪形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荒唐的病态社会。

《弢园尺牋续钞》卷五有“呈胡云楣观察”一函，内云：“甲子夏间，规复金陵，仲冬之月，举行宾兴盛典，韬以秘迹炎荒，未遑预试，闻阁下告人云，是年平阁学以榜无韬名，致搜落卷，仍不可得，阁下入谒，犹蒙垂询，此韬生平文字知己也”。可见，王韬在流亡之前可能有再次赴试的打算。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奉朱雪泉舅氏”。

王韬：《弢园尺牋》，卷三，“奉顾涤庵师”。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44页。

陈振国：“长毛状元王韬”，《逸经》第33期，第42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五，149页。

三、转变中的思想

如前所述，王韬原来是一位典型的“华尊夷卑论”者。直到1859年迁沪十年之后他还在抱住陈旧的观点不放。这一年，他写给他的朋友、时任曾国藩幕僚的周弢甫的一封5000多字的长信集中反映了他的保守落后思想。从这封信分析，王韬此时的保守落后思想有四个方面：

（一）将西学东渐、中外贸易等与西方侵略相提并论，反对中外相通。

王韬对西方侵略中国一事特别愤恨，信中以大量笔墨谴责了自葡萄牙占据澳门以来至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但是，象古典爱国论者一样，王韬被仇恨的情绪挡住了视线，看不清西学东渐、中外通商与西方侵略的区别所在。他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也反对中外相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有目前以为甚便而后蒙其祸者，当时以为无伤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于中国是也，西人工于贸易，素称殷富。五口输纳之货税，每岁所入不下数百万，江南军响转输，藉以接济。此海禁大开，国用以裕，一利也。西人船坚炮利，制度精良，所造火轮船车，便于行远，织器田具，事半功倍，说者谓苟能仿此而行，则富强可致，西情既悉，秘钥可探，亦一利也。西人学有实际，天文历算，愈出愈精，利氏几何之学，不足数也。且察地理，辨动植，治水利，讲医学，皆务析毫芒，穷其渊际。是以有识之士乐与之游，或则尊之曰西儒。中国英俊士子，诚能屏弃帖括，从事于此，未必无实用可裨，则又一利也。然识音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蠹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西人素工心计，最为桀黠。其窥伺海滨诸处，虽非利吾土地，而揣其意，几欲尽天下之利而有之……今者滨海岛壤，江汉腹地，尽设埠头，险隘之区，已于我共，猝有变故，不能控制，此诚心腹之大患也。有豪杰起，必当有以驱除之矣。”

王韬甚至利用清朝对民间聚众起义的恐惧和仇恨，以“加祸于人”的手法，把西人与中国内乱中的“贼”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强他的“夷心颇测”的观点。他说，洪杨之乱，以左道惑众，其毒源就是“粤东教会”，而“粤东教会”的始作俑者是西方传教士“洪逆之师罗孝全”。更有甚者，西方外交官和商人还与占据南京的“粤匪”暗自联络，买卖枪炮，这些都是“西人有害于中国大势之明验也”，说明他们都是“好异酿乱”之徒。

说来道去，旁征博引，王韬在这里力图要告诉人们的是：西方一切都是包藏祸心的，一切接近西方的活动，特别是通商活动是害大利小得不偿失的。最好的治国之方是唤起豪杰将西方之人尽数驱除。王韬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保守的，它与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二）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反对大规模学习西学。

王韬在这封信里指出，中国与西方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因此西方之学根本不适应中国，倘中国学习模仿，必然是“不蒙其利，反受其害”。他声辨说：“至其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测之妙，非无裨于日用者，而我中国决不能行。请言其故。西国地小民聚，政事简易，凡有所闻易于邮递，水则有轮船，陆则有火车，万里遥隔，

王韬：《弢园尺牘》，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王韬：《弢园尺牘》，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则有电气通标。而中国则地大民散，政事繁剧，若仿西国月报，必至日不暇给。水之大者，海而外虽有江、淮、河、汉，而内地支流，其港甚狭，即轮船之小者犹不能驶。九州之区，半系涂泥，土松气薄，久雨则泥泞陷足，车过则倏洞窟穴。而轮车之道，必熔铁为衙，取径贵直，高者平，卑者增，遇河则填，遇山则凿，不独工费浩繁，即地利有所未能。农家播获之具，皆以机掇运转，能以一人代百十人之用，宜其有利于民。不知中国贫乏者甚多，皆藉富户以养身家。一行此法，数千万贫民必至无所得食，保不生意外之变。如令其改徙他业，或为工贾，自不为游惰之民。而天地生材，数有可限，民家所用之物，亦必有时而足，其器必至雍滞不通。况中国所行水碓风篷，甚易而巧，而用者尚以为贪天之功，省己之力，或致情而生疾。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然一器之精者，几费至百余金，贫者力不能购，玩物丧志，安事此为。其他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韬谓此数者，即中国不行，亦不足为病。”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特点。这一点王韬算是说对了。但把这种相对性的特点强调到极端，并用来作为反对中国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理由，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封建顽固派才常常操演的思想逻辑。

（三）讥笑西学，美化中学。

王韬此时虽已意识到中学在某些方面不如西学，但还没有放弃传统文人“尊己卑人”的心态，“西”字号的技艺和学说往往被他视为不够完善、不大可信或不能长久的一类事物，如他这样说：“天算推步之学，中法固远不逮西法，今法固大胜于古法，以疏密之不同也。顾韬以为古法有用而今法无用。今法易时必变，而古法可以历久无弊。何则？愈新奇故也。新益求新，奇益求奇，必有以别法驾乎其上的者，故今法不逾二百年必悉废矣。其间得之实测者，如日月之食，皆有一定不易之时刻。而其言彗星所行之轨道为椭圆，至有定岁，究未全验。无他，依一法以推之，言人人同，各依一法以推之，则千万人之言皆不同。而习一家之言者，遂谓此学可以泄天地之秘，探造化之原，穷阴阳之奥，吾弗信也。数者六艺之一耳，于学问中聊备一格。即使天地间尽学此法，亦何裨于身心性命之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使天地间竟无此法，亦非大缺陷事也。若夫鸟兽草木之学，其精者谓能得一骨，可知全体，得一叶可辨全株，徒闻其语，未见其人。察地理者，能干地壳中细分层累，得一物即知其时代之远近……第怪其于诸石皆可悉其等次，而独于中国研石、印石、宝石等品，瞠目不识为何物。此非天地间生成之物耶？何以通于此而不通于彼也，是其格致之学有时而穷矣。”

于此相反，王韬对“中”字号的技艺学说却极尽推崇以致美化之能事，他指责有些人以为西人来中国后“出其新法秘制，开我聪明不少”是一种不懂历史的糊涂观点。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墨子之筹守具”、“公输子之刻木鸢”、“诸葛武侯之木牛流马”、“祖冲之之千里船”、“戚继光之兵船”等为例，反问说，中国技艺“讵不如西国之迅捷”？嘲笑西学，美化中学，表明了王韬的文化取舍态度依然在传统的窠臼内徘徊。

（四）主张尊道贬器，以柔克刚。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王韬在这封信里虽然承认中国在“火器用于战”、“轮船用于海”和“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等三个方面有“取法”西方的需要，但指出这是“用之亦出于甚不得已耳”，是为了“用其法以制其人，壮我兵威，锄彼骄气，明其定律，破彼饰词”；“苟非西人远至中国，又何需此，岂非所益者小，而所损者大耶”。从价值观上说，此时的王韬依然是“重道轻器论”者，他这样写道：“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中国立治之极者，必推三代，文质得中，风醇民朴，人皆耻机心而贱机事。而西国所行者，皆凿破其天，近于杂霸之术，非纯王之政。其立法之大谬者有三：曰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商贾之富皆归于上，而国债动以千万计。讼则有律师，互教两造，上下其手，曲直皆其所主。男女相悦而昏，女则见金夫不有躬，而无财之女终身无娶之者。尚势而慕利，贵壮而贱老。籍口于只一天主而君臣之分疏，只一大父而父子之情薄。陋俗如此，何足为美。夫所贵乎中国者，能以至柔克至刚，至弱克至强也。说者谓如是则西国不难驱而远之矣。则请一言以决之曰：在德不在力。”以德胜人，以柔克刚，这是儒家道德主义与老庄相对主义诡辩术的混合物。在近代民族竞争剧烈的国际背景下，它显然是一种“阿Q理论”，除了安慰不思进取、害怕竞争的弱者灵魂外，不能带给中国任何益处。王韬此时相信此一学说，表明他这时还不理解历史进步的真正含义。

但是，十里洋场毕竟不是一如既往平静无澜的甬里乡村，西方之学、西方之物和西方之人触目皆是的新环境对他的旧观念形成了强裂的冲击和震荡。前文提到，王韬曾参与不少科学书籍的翻译。他既然逐字逐句地把这些西方科学书籍翻译过来，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其中部分的科学知识以及隐含在知识中的科学精神，而这种“接受”无疑是与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放弃”互为因果和同步进行的。

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是在华西方宗教人士的汇聚之所，在翻译西书的过程中，王韬结识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开放后的上海，这些传教士一方面以传播福音为宗旨，竭力进行所谓拯救东方灵魂的工作，有些甚至直接涉足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世俗活动，象麦都思就曾担任过英国侵略军的翻译；另一方面，他们在不违背宗教旨意的条件下也从事一些对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介绍工作。由于传教士们大多都是经过近代西方文明洗涤过的“学问之士”，其文化与科学著述无疑具有开启中国民智的作用。王韬所熟知的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合信(Benjamin Hobson)、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在这方面都留下了值得肯定的活动记录。伟烈亚力精通数理与天文，除了与王韬合译过《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华英通商事略》等书籍以外，还与中国数学家、王韬的好友李善兰合译过《几何原本》，并有《满蒙语文典》(Manchou—Tartar Grammar)、《中国文献记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著作问世；艾约瑟除了与王韬合译的著作以外，还自译出版了《希腊罗马史》、《重学》、《光学》等书。韦廉臣是广学会的创立者之一，1855年到1857年在上海传教译书，推广西学，颇有建树。合信是马礼

王韬：《弢园尺牘》，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王韬：《弢园尺牘》，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逊的女婿，既是传教士，又是医生，曾为王韬治愈多年不治的足疾，著泽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英汉医学词汇》等，对近代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推广和中国近代医院的产生贡献巨大。慕维廉与王韬关系亲密，常对王韬讲述世界地理，著有《地理全志》。林乐知为美国传教士，曾随王韬学习中文经典和历史，并为王韬讲述西洋历史。著有《中东战纪本末》一书，王韬曾为之作序。王韬在上海与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周旋揖让”13年之久，大大拓展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知识结构，日后他能写出《泰西著述考》、《美利坚志》、《法兰西志》、《俄罗斯志》、《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火器图说》、《四溟补乘》、《西古史》、《西事凡》等著作及大量有关西学的文章，追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这一段因缘。而更重要的是，上海时期的这些社会生活必然要引发王韬对华与夷、中学与西学关系的重新认识；前者与后者到底何者为优？

有一件小事很能反映西人与西学对王韬思想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王韬来自地气潮湿的苏南水乡，患有多年不愈的“老烂脚”。1857年左右此病骤然加剧，四处溃烂得使王韬无法行走。王韬没有办法，只好回乡治病。但是，“遍谒吴门名医”的结果却是“皆穷于技”。弄得王韬为此不但“阮囊钱尽”，而且抑郁寡欢，疑心“是中有鬼”，“几无复有生人之乐”。有人建议王韬去看西医，但王韬从来不信西医，置之未理。一个偶然的机，主持上海仁济医院（座落在墨海书馆的隔壁）的西医合信发现了王韬的脚病，主动提出为他根治。王韬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治疗。未出数月，顽疾“霍然若失”，“健步远行可二十里许”。此一亲身体验，使王韬对西人西学的态度大为改变。此后他在对西医介绍时已不无推崇之意，如他在介绍西方医学时曾这样写道：

西人于医学最严，必先于其国中考证无讹，然后出试其技，慎以疏庸杀人也……合氏前时行医于粤东，著有《全体新编》，讲论脉络脏腑，殊为精详。其目击多由于剖割，虽逊于仁者之用心，而审治较切，或

鲜至误……合氏自信其书必得享盛名于百年之后，洵非虚也。

在《外国牙科》一文中，王韬对比中西医对牙病成因的不同解释，更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西医的推重。他说，中国民间称“牙有虫者，以芍敷之，顷刻可出”的说法是不明事理的胡编乱说；而西医“牙府”、“牙痠”、“烂牙”的病理解释却“实能洞究其原”。因此，求助中医治牙几无善法，只有西医才能求其疗治，无不获痊。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上海，西方人士周围往往都聚集着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可被称为新兴口岸知识分子。与这些人的交往也促使王韬转变思想。王韬在上海时期时相过从的朋友有李善兰、龚孝拱、应雨耕、蒋剑人等。他们大多是精于西学的一时之秀。海宁诸生李善兰为数学家，“在沪十年，著

王韬：《弢园尺牘》，卷三，“与朱癯卿茂才”。

王韬：《弢园尺牘》，卷三，“呈涤庵师”。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16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198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五，121页。

有《续几何原本》、《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重学》、《植物学》等书，皆与西士从泰西算术中绎而出之者也。其所自著者，为《则古昔斋算学各种》。”据伟烈亚力说，这些著译，即使是在近代早期的英美，也足以使李善兰成为名人。龚孝拱是龚自珍的儿子，时在英国领事馆工作。应雨耕为浙江人，随父做官至广东，入英国领事馆当通事。龚与应都曾去过英国，懂得不少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王韬日记中有多处向他俩请教的记载，如咸丰三年七月十一日（1853年8月15日）日记这样记道：“应雨耕来，告知英国之行及海外见闻，秉笔记之，名之曰《流海笔记》。”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六日（1860年4月16日）日记也记道：“顺道访孝拱……欲留心于数学，因乞《数学启蒙》一书，为人门阶梯。”蒋剑人为上海宝山诸生，时在慕维廉处教中文，佐译过《大英国志》等西学书籍。与上述这些朋友唱合交接，甚至同室工作，要想完全维持注原来的对西学西艺的鄙夷和排拒态度显然已是不可能的了。

上海滩上随处可见的物质形态的西方科学技术也对王韬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正面的催化作用，逼迫他放弃夜郎自大的对外心态，因为，在蒸蒸日上的西方物质文明面前，谁都无法再继续坚持“天生贵胄”的优越感而大骂“奇技淫巧”。请看王韬自己对他第一次见到西洋“奇技”时的感受所作的描述：

闾闾间所陈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创立新法，巧不可阶。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器秘机、火轮机、自鸣虫鸟，能行地球之类，下至灯瓶孟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无。

余寓之南邻，美国妇秦娘者，国色也。家有西国缝衣奇器一具，运针之妙，巧捷罕伦。上有铜盘一，衔双翅，针下置铁轮，以足蹴木板，轮自旋转。手持绢盈

丈，细针密缕，顷刻而成。余偕孙次公往观，次公口占二十八字贻之，云：“鹊口衔缕双翅开，铜盘乍展铁轮回。掺掺容易缝裳好，亲见针神手制来。”近时此器盛行，缝人每购一具，可抵女红十人。

这一类的记载可从王韬的上海时期文字中找出一大堆来，象煤气路灯、自来水、照相机、牛痘苗、挖泥船等他都有记载。这些记载的共同特征是：字里行间已抑制不住对西方器物与技艺的倾慕赞美之情。

人是社会的产物。西器、西学、西人充斥的商埠文化环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活在王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王韬参与的科学活动在洗刷他的旧观念方面功效卓著。人一旦接触科学，接受了以实验、实证为前提的科学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要以理性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中的事物，而建立在儒家教义基础上的旧观念也就不可能再四平八稳地保持它旧日的姿态。陈学旧说抵挡不住新兴西学的强劲进攻。王韬正

王韬：《瀛壖杂志》，卷四，127页。

转见于 Pau I.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

王韬：《瀛壖记事》（抄本藏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复制件。此据 Pau I.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15 英文转译。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157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二，36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五，166页。

处在一个从传统封建文人向近代改良思想家转进的中转站上。

上海时期后一阶段王韬的思想变化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承认西人与中国人一样，同属文明种族。在某些方面，西人且略胜中国人一筹。

初到上海时，王韬常以《左传》上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类的语言来形容西方人，认为他们都是“不若我甚”的野蛮人种。但到了后半阶段，他已经能以比较平静和理性的态度来客观地看待西方人。他开始但承西人也有人类共有的“颇喜为善”的天性，认为耶稣亦能使人迁善改过，“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亦足以证明彼土有杰出之士”。至于“智”的方面，“西人于学，有实证可据”，“皆精思苦诣，穷极毫芒”；“天算之学，西人精于中土十倍”；西人注意体育，身体壮实，西方女子，“姿质明莹，肌发光细，中国江南佳丽亦难于比美”。因此，西方人不论是在体质上、智力上，还是人格上均不在中国人之下。在 1860 年的一封致徐有王的信中，他甚至对封建顽固派“拘牵义例罔识变通”、“执春秋内中国外四夷之说”的言行提出了批判，喊出了中国“甲兵不如彼、财赋不如彼、机械不如彼”的令人震惊的口号。

第二，承认科学的价值，强调中国有学习和引进的需要。

王韬在给周弢甫的信中对数学曾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天地间毫无此法，亦非憾事”，但时隔两年，他就在日记中表示要“留心数学”了，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事实上，1860 年前后的王韬已经非常着重西方之学，如在他的另一则日记中，他又这样记道：“清晨，吴子登来，同访艾君约瑟，将王叔所译《照影法》略询疑义。艾君颇肯指授。”在他这一时期的书信中还多次出现赠西书给地方官或朋友的记载。这些都表明此时王韬不仅重视西学的价值，而且已经把学习西学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王韬还进一步呼吁中国统治阶级应尽快放弃尊己贬人的心态，主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他曾这样写道：“予以为国家当于西人通商各口设立译馆数处，凡有士子，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其果精深英文，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今君青先生开府吴中，其算学为海内宗师，可于各县书院中别设历算一科，悉心指授，则西学不难大明……此亦千载一时不少失之机也。”

王韬思想的变化在上海时期虽然才刚刚开始，但它却具有跨世纪的历史意义。尽管这种变化还主要表现在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方面，没有涉及更广泛更深层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其中甚至不乏对传统的怀念之情，以至新旧杂陈。可它的历史指向性、进步性则是毫无疑问的。它预示着中国历史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机。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197 页。

王韬：《弢园尺牘》，卷三，“与韩绿卿孝廉”。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205 页。

王韬：《弢园尺牘》，卷四，“上徐君青中丞第二书”。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 156 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 156 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 86 页。

第三章多角之“恋”

上海时期的王韬面临着对未来生活道路的选择。他此时的处境就如同他正站在一个四周布满门洞的迷宫中央。他看不清门洞后面的东西，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通向幸运还是灾难。他心里十分明白的只是：照着前辈秀才们的老道走无论如何走不出一个光明的天地，而放胆闯开“旁门左道”也许能得到他实现夙愿的机会。

王韬“走着瞧”的“行动哲学”是“冒险的多角恋哲学”。他不是一个个地闯开门洞，而是向几个门洞同时行进——在西方教会、清朝政府、太平天国三者之间进行“多头试探”。不幸的是，这一次他彻底失败了。因为这是三条方向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时选择的结果只能是进退相抵，欲速则不达。

一、投身宗教活动

王韬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是王韬经历中最令人困惑和最耐人寻味的部分。王韬原是一位有浓厚的“华尊夷卑”意识的传统文化人，对西方宗教更是厌恶至极，认为它是圣道衰落、华风日下的罪恶之源。但是，同一个他，未几何时就变成了一个列名在案的基督徒。英国伦敦海外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简称 L.M.S.）档案曾正式记载说，王韬（原文为 Wang—Lan—king, 即王韬当时所用名王兰卿）在 1854 年 8 月 26 日已经受洗入教。

王韬几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及他曾参加洗礼，但根据他在上海时期的社会活动分析，伦敦布道会的档案记录显然不是无中生有。他所留下的《蘅华馆日记》在记录他的 1854 到 1855 年的社会活动时有如几段文字：

八月二十四日，庚申（1854 年 10 月 15 日）。是日赋闲，至医院听英人说法，受主餐。

八月二十六日，壬辰（1854 年 10 月 17 日）。是日麦、慕二牧师将至云间洞庭，令予从之往游。

八月二十七日（1854 年 10 月 18 日）。中午，抵达闵行镇，缆舟登岸，散发圣经。

八月二十八日（1854 年 10 月 19 日）。午后，抵东村，与麦都思及慕维廉牧士一块登岸，散发圣书。

当地百姓群集围观听道，所携圣书顷刻散尽。

九月朔日（1854 年 10 月 22 日）。是日礼拜，麦、慕二牧师登岸讲书。

二日，戊辰（1854 年 10 月 23 日）……午后至吴江，城外人家观者不少……申刻至平望，分送书籍。

二十九日，乙未（1854 年 11 月 19 日）。是日礼拜，至会堂听英人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的王韬日记，从 1853 年夏天到 1854 年秋天这段时间几乎完全中断。而在此之前的最后一篇日记内容则是关于他的好友应雨耕及另一好友孙次秋向麦都思表示愿意受洗入教，并在麦都思指导下每天在墨海书馆学习圣经的事。王韬极可能随后便参与其中，这段不翼而飞的日记也极可能充满了有关他参加宗教活动的记载。他害怕这种记载落入他人之手对他的政治活动产生严重不利，故意销毁了日记。“卖身事夷”的骂名已经够让他苦恼的了。

王韬身为基督徒却又竭力掩饰的情形可从下面一事窥其一斑。王韬逃亡香港后于 1873 年曾给传教士理雅各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手稿与他后来自己整理发表在《弢园尺牘》中的印刷稿有几处明显差异。第一，手稿中称理雅各为“牧师”，而印刷稿中改称“君”；第二，手稿中称颂“阁下的主要事业就是传播福音，拯救整个世界和引导人类走向永生以使基督教义的光芒照耀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印刷稿中这句话被另一句无关乎基督教的活所取

The Report of the Director to the Sixty—First General Meeting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n Thursday May 10th, 1855.
转见于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20.

王韬：《蘅华馆日记》，转见于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20.

王韬：《蘅华馆日记》（上海图书馆藏，档号 052509）。

王韬：《沪城闻见录》，转见于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

代；第三，手稿中有“香港教会成员”的自称，而印刷稿中却只字未提。还有两项不被人们注意的事实能够佐证王韬加入过基督教。一是王韬对基督教与天主教态度不同。终其一生，王韬一直与基督教传教士保持良好关系，且承认基督教在西方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他曾说：“西域远处海隅，敦庞初变，悍厉成风，而耶稣一人独能使之迁善改过，以范围而约束之。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呜呼！谓非彼土之杰出者哉？”而对同为西方宗教的天主教则嗤之以鼻，他说，基督教“惟尚清修，而无一切拘挛陋习，尚近于儒”，其教徒“守己奉公，绳趋尺步”，而天主教却“盛事科仪”，“教旨反昧”，其教徒“嚣然不靖，不独在中国为然，即在欧洲诸国何莫不然”。态度的好恶反映了他与两者关系的亲疏有别；二是王韬对西方传教士与西方商人态度不同。王韬具有浓厚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曾主张将所有外国人通通驱赶尽净，但后来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主张对待外国传教士与商人要采取不同的态度。他在为封锁太平天国而呈给苏淞太道吴煦的方策之中这样写道：“密发札谕饬团练各长用心稽查，日夜勿懈，遇有外国旗号之船，即行阻截，入舱细加搜查……果有枪弹违禁物件，立即将奸商砍倒，并尽杀舟子以绝口……若遇教门讲书者，则用好言理谕劝回，教门中人为道起见，并无别心。”有意无意的偏袒之情还是隐然可见的。

王韬虽然加入了基督教，但却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情感上并不喜欢基督徒，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夷人）播煽异端，灭裂正教，尤足以簧鼓世俗，渐渍于无形。愚夫愚妇，为所蛊惑无论矣。而一二身列庠序者，亦靡然从风，恬无知耻。逢兹浊世，生是乱民，有心人蒿目怆怀，屡为长太息者也。瀚观西人教中之书其理诞妄，其说支离，其词鄙晦，直可投于溷厕，而欲以是训我华民，亦不量之甚矣。顾瀚窥其意，必欲务行其说而后止，行之则人心受其害矣，”当他听说有英国传教士准备在苏州布道的时候，他忧心忡忡地在日记中写下这样几句：“近英人杨雅涵至吴门赁屋讲书，言后将择地建礼拜寺矣。侏漓日迫，为祸日深，将奈之何。”

其次，表现在他对基督教义的理解总脱不了儒家思想的范围，基督教义常被曲解为儒学教义。以他加工润色过的圣经代表本为例。与其说它是一个基督教作品，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一位传教士在1890年曾对王韬助译的圣经代表本下过如此评断：“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有一种全新的风韵。它相当地自由，摆脱了呆板生硬的结构。它是一个翻译者渊博学问的纪念碑……但对它最经常最广泛的批评不是针对它的文学光彩，而是它与原作意义的偏离。它使人更多地联想到圣人的教诲而非天堂的神秘，一个缺乏经验和精神的读者很容易错把基督当成孔子。”再次，王韬从不理会基督教教义的规范，他的个人生活的放荡恰恰是对基督教的讽刺。

参见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21.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196页。

参见王韬：《瀛壖杂志》，卷六，196页；《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传教上”。

王韬：《弢园尺牋》，卷五，“与某当事书”。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王韬日记》，第91页。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转见于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22.

1855年3月18日的王韬日记这样写道：“是日礼拜，赴五老峰听英人布道。下午，往访蒋剑人，一同赴虹桥左边勾栏访妓。接客者为沪上名花，来自扬州。稍可人意。”上午唱赞美诗，下午逛妓寮，人格分裂一至于此，毫无基督徒精神可言。

毫无教徒意识的王韬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投身基督教事业呢？王韬自己的回答是：“教授西馆，已非自守之道，譬如赁舂负贩，只为衣食计，但求心之所安，勿问其所操何业。”此话道出了王韬在事业选择上的实际功利取向。对此时的王韬来说，生存原则是最大最优先原则，而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只能占据从属位置。王韬从甬里到上海，一文莫名，走投无路，是麦都思牧师为他提供了墨海书馆翻译圣经的工作机会。作为受恩之人，王韬对此铭刻不忘，他曾为此作诗说：“知己平生首数公，海邦物望最为崇，学从天授推无敌，道自西来证大同，有愧粗才怜阮籍，不将奇字诧杨雄，八年聚首情如昨，岁月因循感慨中。”为了感恩戴德，也是为了保持继续工作的权利，王韬自认为有加入基督教的必要。因为，所有的传教士，包括麦都思在内，虽然并不强迫所有的与其一块工作的中国助手都受洗入教，但他们希望助手成为基督徒的情感倾向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容易博得他们的好感，因而也易于得到工作和较高薪金。

王韬对基督教机会主义式的认同态度不是孤零零的历史事实，而是五口开放以后沿海都市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王韬在沪上的朋友大多具有与他一样的人生经历，如与他和李善兰合称为“海天三友”的蒋敦复生前也是一个基督教事业的热心人，但同样不欣赏基督教教义：他甚至留下遗文在死后发表，以儒家学说大批基督教教义，弄得曾经赞颂过他的艾约瑟等传教士大为尴尬，不得不在《北华捷报》上著文予以解释。“蒋敦复现象”或“王韬现象”印证了这样一种文化结论，即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生功利为目的的世俗的伦理文化，宗教意义上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历来就相当缺乏。

缺乏宗教信仰和追求并不等于缺乏文化归属感。王韬在现实利益的考虑下投身于基督教事业，却不能因此而一刀斩断他与固有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只要这种精神联系或文化归属感存在一天，王韬对基督教的“认同”就只能是物质层次的勉勉强强的“屈从”。而“屈从”必然带来精神世界的人格分裂。可以毫不夸张他说，王韬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一方面，他为生活和工作环境所迫，不得不表示相信基督教，愿意为传播福音四处奔走；另一方面，他又竭力掩盖自己与基督教的关系，甚至对基督教出言不恭，大加讥讽谩骂。王韬所写的书信、日记至所以时而出现赞赏西方宗教的文字、时而又恶言相向，其根因正在于此。

王韬；《蘅华馆日记》，转见于 PauIA.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P.

《王韬日记》，第92页。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送麦西士回国”。

NorthChinaHerald.September18，1891。（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二、挟策以干当道

王韬居沪时期，中国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中国官场士林令人窒息的一潭死水犹如被投入了一块巨石，再也不能维持旧日的平静。

鸦片战争后，清廷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平衡鸦片进口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敲榨勒索。道光皇帝公开发布上谕说：“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各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勒限催迫完交。”“人民为了反抗清廷的横征暴敛，掀起了一连串的武装暴动。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其雷霆万钧的气势在广西金田村拉开序幕，随后，北进东下，一路势如破竹，无攻不克。同年3月19日占领南京，改名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分庭抗礼的农民政权。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1853年秋，王韬居住的上海也爆发了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起义军发布文告，表示要扫除贪官污吏，全行蠲免赋税钱粮。接着连续攻克宝山、南汇、川沙等县。上海和东南地区是清朝“钱粮”来源的主要地区。上海海关的税收更是清军江南大营的命脉所在。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军在这一地区翻搅；使清廷阵脚大乱，惶惶不可终日。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正当清王朝被农民起义弄得精疲力竭之际，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自南北上，攻占了大沽。清王朝于1858年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此后，清廷一度打算重振军威，改写条约，但结果更糟。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仓惶出逃。清廷留守王大臣向侵略者屈服，签订了更加屈辱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彻底失败，暴露了中国国力的积弱不堪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内忧外患诱发了王韬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也激活了他“大丈夫生当成功立业”的早年志向。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歌里写道：

鼓角如雷动地来，氛缠三楚肆奇灾。
襄樊险堑成孤注，褒鄂威名非将才。
坐使拥兵全局坏，安辞疏寇暮营开。
似闻早下贤良诏，应有征书到草莱……
投笔终军思报国，上书卜式助输边。
将帅即今天下选，要凭庙略计安全。
江南乍见经烽火，直北俄闻动甲兵。
拱极星辰愁失位，环城将士忽空营。
中持和战原非计，不在恩威始乞盟。
我正艰难渠跋扈，海疆从此后患生。

既有对清朝文恬武嬉、主政失策的责难，也有对国家危亡命运的担心，更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自勉，王韬似乎已体悟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王先谦辑，《东华录》（道光朝），卷五十八。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28页。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拟杜诸将”。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沪读杂感”。

的关系。

但是，一介落魄书生凭什么来影响国政、干预现实、进而一展个人抱负呢？王韬选择了上书言事这一封建社会读书人常加利用的干政形式或进身之路。从 1858 年起，至 1862 逃离上海止，他接连上书清朝大吏，系统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

综观王韬这一时期的上书，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下述几个方面：

（一）抨击清朝政府举政乖蹇。

王韬认为清王朝之所以落到“内乱”与“外患”俱来的局面，不是因为“匪”和“夷”有什么制胜法器，而是由于清王朝本身政策失当。他写道：

今东南之祸烈矣，贼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是岂贼之能兵哉？皆我备御无方耳。

方今边事之坏，我谓在朝廷御之之失策。当粤东之启衅也，朝廷必别简星使，专与筹议，不妨面见酌商，两得尽其情意，事有不可行者，则为婉言开导。

即委之于叶督，亦必明示意旨，俾知趋向，有所遵奉。

奈何庙算弗及，一人是信，任其刚愎浅躁，以致债事。逮乎粤省被据，叶督见虏，中国之辱，未有如是之甚者，而乃置不一问，若无是事。期年之间，声问寂然，西人于是径驶津门，叩阊请命。至欲遣使驻京，增

埠易约，即滨海各省督抚，亦未闻有出一议，建一说，以是事若何处置入告者……其意视粤东一省之得失，无与朝廷之轻重，朝廷御戎之当否，无与于外省之休戚。以至西兵之调集，番舶之出入，何时启行，何时往北，外省侦缉之不告，京师之斥堠不明。突见其至，官民惶骇，城下之盟，大可寒心。

为了挽救已成之局，王韬提倡要痛革官场相互推倭的风气，裁汰昏庸无能和贪生怕死之辈，不次拔擢才能之士，并“专其任而重其权”，使之权责相符，无可逃于事外。然后推倭者必罚之，失地者必诛之，立功者必赏之。王韬认为一旦清王朝真正做到这些，“内乱”可以指日肃清；“外患”亦可消解于无形。

（二）提议“和戎平贼”。

王韬原来对外猜忌极深，在前述致周弢甫的信中还在惊呼开埠失策，“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蠹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希望“有豪杰起必有以驱除之”。在这种排拒意只的作用下，他坚决反对“借兵平贼”之说。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

说者有谓赭寇之罪，上通于天，假手西人以剪灭之，正可同泄普天之愤耳。此言实未深观大势，而熟察全局也。触之武告秦穆公曰：“邻之厚，君之薄也。”西人于我之损也则喜，于我之益也则忧，方欲逆

焰之张，坐收渔翁之获，谓其视我如秦越之肥瘠者，犹浅言也。即使果肯借师，如突厥故事，而需索酬饷，动以数百万计，或迁延时日，未必成功，或只剿一隅，未能全数肃清，即

王韬：《弢园尺牋》，卷六，“拟上曾制军书”。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上徐君青中丞第一书”。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使果能迅扫妖氛……而中原全土，皆侏 儻 之足迹矣，通盘筹算，朝廷又何必有此举也。

他甚至把封建政权与农民起义的对立比作一家人的父子不和，反问主张借夷助剿者“父搥子而嗾噬狗噬之，有是理乎”？

但他的观点很快就转变了。在 1859 年给徐有壬的信中，他指出在中国所面临的“贼乱”和“戎祸”两大危险中，“戎祸”固然是天下之大患，是“乱之所生”之根因，但从摆脱危险的可行性角度分析，“贼乱”却是需要最先解决的难题。“事固有缓急，有先后，今日之事，要惟先其所急后其所缓而已。彼虽为心腹之患，而在今犹未大决裂，可先以和弭之，而后徐为之图。”

他对清廷保守派于《天津条约》签订后仍然盲目言战并准备在大沽与英法再一决胜负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颛预之气。他说：“我必先有预备之兵，以应其非常之变。而自揣我气足以震慑乎彼方可，否则，毋宁出于和。盖我今日兵率孱弱，财用空竭，外之国威未振，内之强寇未锄……吾诚有不敢知者矣。”他认为：“西人之所请于我者，最大者增埠驻京两事而已。以愚度之，朝廷意见，增埠犹可许也，遣使驻京断不可行……吾谓此二事其患实均。江汉腹地，据上游之势，南控皖、豫，北连关陕，一旦有变，长江非复我有，黄河以南非我国家所能争……顾吾谓朝廷既可许其增埠。何不可许其驻京。今朝廷之上，所以待远人者，漫无成见，来则与之和，去则旋背之。受诳愈大，结怨愈深。衅隙之开，将不可终弭……况乎驻京一节，在我国为骇闻，在彼邦乃为常事。欧洲以行商为国本，凡通商之国互遣公使，驻居其都，所以总制其事，权归于一，原非有窥伺之心，其志在利不在土地。”王韬对公使驻京的理解显然比盲目主战的保守派人物的理解要符合世界潮流。这是他高于前者的地方。但是，他把对外主和与专意镇压农民起义放在一起考虑，则又暴露了他的地主阶级的顽固立场。

（三）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出谋画策。

王韬对苏沪两地社会与地理情况了如指掌，加之他曾陪同传教士到太平天国占领区去活动，对“贼情”有所闻见，便自然而然地以平贼“内行”自居。他多次向清朝地方官献计献策王韬的计策可分战略与战术两部分：

战略上，王韬声称太平天国已“失其天时，失其地利，失其人事”。他说，咸丰二、三年间，天下嚣然，民气不静，贼略得天时，但咸丰六年后，人心厌乱，气运渐转，“此时虽有煽之为乱者，彼不动也。故言乎时，贼已不足恃矣”；江宁虽城垣广固，池堞崇深，而非可守之地。“盖有江南者，远必兼蜀，近必兼淮，而后势据上游，足与天下相抗。今贼所争者苏、杭耳，苏、杭地势洼下，民情懦弱，实不可用，虽得之不足以有为。……故曰贼无地利之可据也”；“贼所破城邑，不留一民于内，比屋错处，无非贼巢，衢市荒秽，有同鬼境，此亦流寇中之创局。所行如是，尚得谓之能收拾人心也乎”。面对此一局面，王韬提出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平贼”战略，即：“修省恐惧，振励奋发，以合天时；力争上游，顺流进取，以得地利；抚集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上徐君青中丞第一书”。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上徐君青中丞第一书”。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上徐君青中了第一书”。

流亡，解散协从，以尽人事。而尤要者，则在简立大员，分兵三道：一由上海以收复嘉、青、太、昆而进攻苏州；一由宁波以联络湖郡，保障杭垣，而进扼嘉兴，誓守广德，俾毋得过浙东西一步；一由安庆以克芜湖诸要害，直抵金陵，捣其巢穴：必当同时并进，合攻夹击，使贼首尾不能相顾，而后贼势孤矣。”从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角度而言，王韬所提出的总体战略确有独具慧眼之处，因而得到了清朝当权人物的赞许和采纳。后来曾国藩攻打太平天国的套路，基本上与王韬所呈谋略相吻合。

战术上，王韬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方策。这些方策大都是直接呈给苏淞太道吴煦的。据已经公开出版的《吴煦档案选编》和《弢园尺牋》统计，王韬在1860年太平天国东下苏常后连续上书吴煦达十多次，其内容几乎全是关于保卫上海和剿杀太平军的“管见”。“管见”思考周详，具体细致，不厌其烦，单条目就有三十多项。略举几项，以窥一斑：

- 一、两广逃勇必宜设法招回也；
 - 二、江宁难民宜安置妥密也；
 - 三、民团与官军宜分用以责其成效也；
 - 四、领兵员并须用外国武官，藉以箱制也；
 - 五、假冒贼之旗帜衣饰混杀并战以乘其不备也；
 - 六、设空房以焚贼也；
 - 七、杜截接济以断贼来路也；
 - 八、佯做村民投贼、诱之使来而杀贼以坚民志也；
 - 九、城宜设立巡防总局，与西官相为联络，派委干敏员并专事稽察，以靖地方而缉奸宄也；
 - 十、水路之通苏、昆者，宜设卡要道，以清其源也；
 - 十一、各处妓家烟馆茶坊酒肆宜派干役日夜逻查也；
- ……

王韬在战术方面的“管见”不如他在战略方面的“管见”来得高明，大多属于一种“文人论兵”，但也不乏致太平天国于死命的杀手锏，如“领兵员并须用外国武官”一项，就是“洋枪队”的滥觞。王韬自己在这一项下解释其具体内容说：“兹以外国武官一员，领兵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其上则领数于人数万人，而配以中国官一员，通事一名。每战则外国官首先冲锋，而我军随后奋进，有退缩不前者，立置军法，中国官亦临阵弹压，计其功过，以定赏罚。如是则借兵少而收功广矣。”吴煦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组成中外混合编制的洋枪队。洋枪队在保卫上海和镇压苏浙太平军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韬也为此洋洋自得，他在晚年写就的《弢园老民自传》中写道：“十年，金陵大营溃，贼串吾吴，常、镇、大同时俱陷，东南半壁至此糜烂，四郡村乡亦蹂躏无完上。老民于是志愈孤，心弭苦。方奉上官檄督办诸乡团练，老民知其贪诈畏怯，万不可恃，屡上书当事，代画方略，言过切直，当事外优异而内忌之，顾所言颇见施行，能多见效，其最要者以西人为

王韬：《弢园尺牋》，卷六，“拟上曾制军书”。

王韬：《弢园尺牋》，卷五，“与某当事书”。

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后行之益广，卒以此收复江南。”又如“假冒贼之旗帜衣饰混杀并战”一项，对太平天国亦损害甚大。太平天国军装简单，加之后期官制混乱，旗号不一，极易被清军伪装假冒。清军后来在剿杀苏浙太平军的过程中也确实多次用此毒计，颇为奏效。

王韬积极上书的动机之一，是为了使清朝地方大吏能“因言贵人”，拔擢他于布衣之中，以便他进一步伸展抱负。他在上书中曾多次旁敲侧击地向清朝地方官“邀官”。如他在“上徐君青中丞”一信中写道：“纳顽矿于洪炉，或有跃冶之效，处钝锥于囊底，非无脱颖之期……若其桀戟门高，容书生之长揖，蓬莱山近，许浊客之同登，即当舍此卑楼，以图远志，是则羈鸟脱笼，尚可期于振翼，驾骀负轭，不终困于摧轮。祷望孔殷，衔戟何极。”但是，除了徐有壬还给他一些“润笔费”以酬其劳外。几乎所有的清朝大吏对他都是“用其言而弃其人”。新阳王韬依然是一介穷困不堪的落魄秀才。

王韬不甘心就此默默无闻。他试图以建立“实功”来换取清朝大吏对他的价值的承认。上海时期的王韬至少参与了两项对抗太平天国的实际行动：

1、为“借夷助剿”奔走活动。

王韬在上海居住多年，与西方人士关系密切。清朝地方官知道这一点，敦促他出来为“借师助剿”穿针引线。王韬积极响应，毅然自任。1860年6月太平军围攻苏州、清军惊恐万状之际，他和好友李善兰正在上海加紧谋划与英法两国联络。王韬的6月3日日记载了此事缘起：

清晨，王叔乘舆款关至。晶顶貂尾，焕然改观，急蹴予起曰“吾与足下且成此大功！”余瞿然曰：“瀚甚矣惫，万不能起，所谓大功者何？”王叔曰：“苏城现将被围，徐巡抚欲向西人乞师，以拯数百万生灵于贼手。事若成，真莫大功德。”余曰：“此事宜与吴观察偕见英公使，弟人微言轻，万不能助一臂。足下怀中可有抚军文移致英、法二公使乎？”王叔曰：“无之。”余曰：“若然，则事不得谐。盍访孝拱，与之谋言？”

李善兰依计而行，前往龚孝拱处游说。龚孝拱当时为英国公使额尔金(Lord, Earl of Elgin)帮办文案。李、龚相见之后，龚孝拱表示如欲英国公使帮助，必须要有正式的徐有壬官书文移，否则，“事恐不得当”。李善兰随即再函徐有壬，索取文移。但是，他太迟了。太平军在他发信当天，就已经打下苏州。

王韬还没死心。几天之后，他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当时正居住在云间的郭福衡（字友松）的一封手札。它实际上是一封“乞师书”。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衡所以不避迂愚之名，冒昧之罪，而敢与吾兄商之者：一则，同为上帝所生之人，何忍使苏、淞十三郡之生灵尽遭涂炭。二则，国家养士，首重肢库，报我君者，正在此日。三则，苏城为吾兄桑梓，若得安全，尸祝不替。而徐抚军又有书于吾兄，亦一知己，今日聊以分忧……伏望吾兄以此函达之于西士艾君，俾知云间郭福衡者，非贪生恶死、不学无术之流，则艾君枉顾之意，亦不可谓无知人之明矣……衡虽三尺微命，窃愿学申胥之哭、霁云之涕，以为艾君之

《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王韬：《弢园尺牋》，卷五，“上徐君青中丞”。

《王韬日记》，第173页。

本国，一时虽不能得师，而数百之众，直达苏城，器械之精，兵卒之用令，久为我军称羨，及贼所畏慑。

王韬对郭氏“忠臣烈士”之举极为叹赏，立即将此信送呈艾约瑟，期望以郭氏之忠勇打动艾氏去劝说额尔金答应出师代剿。由于英法两国公使此时打算乘机勒索清王朝，王韬的穿针引线活动进展缓慢，清朝大吏后来等得不耐烦，亲自出马与英法当局直接交涉，王韬从此受到冷遇。

尽管如此，王韬似乎依然乐此不疲。他的日记中有经常赴道署打听“借师助剿”进展情况的记载，如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860年6月10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午后，偕吴沐庵、屠新之、蒋萃钦往道署访袁伯襄，则无锡何菊村、湖州谈厚甫皆在伯襄斋中，因共纵谈。余曰：“何宫保至此已数日矣，乞师有成议否？恐受西人辱耳。”伯襄曰：“闻法已允，而英尚未报命也。”《吴煦档案》中有一《袁熙赞禀》，更能反映王韬这时不甘寂寞的活动情况，它这样写道：“昨诸翟团董来城，以贼氛密迩，随在可虞。具请大人筹拨西兵会剿，并请三四十人驻乡教练火器，其实欲借夷势以资防守。赞当即拦阻，谓西兵不肯出剿，无从议请，驻守一节，大为难行……晚间，王兰卿、吴锄非、武生庄仰之等复来，俱言已见法国教头梅神父，具说贼踪飘忽，乡民将届收割，势难安堵。乡团现议办剿，须在藩宪处具禀请拨西兵出助，并往公使处递呈，未谕允否。渠一力担承，言法兵近日已到六千余，来正无既，尽堪做事。藩台商拨，便要筹费，恐无银可筹，不如汝辈邀集各乡董事联名具呈，地愈广，人愈多愈好，我迭公使，待公使转请英国，非惟不须筹费，包可出兵，或剿或守，为近地先行肃清，徐及苏州云云。”显然，王韬正在积极联络地方士绅集体向清朝官员游说和施加压力，一心要拔取“借师助剿”活动的头筹。

2. 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

王韬在苏南乡间和沪上文人之间颇负才名，清朝当局一直想利用这一点让他出头组织乡间地主团练。刚好王韬有心投笔从戎，主动请缨。双方一拍即合。1860年7月，王韬被苏淞太道吴煦任命为诸翟团练局董事。

在出发之前，王韬与逃亡在沪的诸翟地主严缙园谋划，打算通过游说吴煦，将一位被上海县令刘郁膏收押在狱的讼棍陈少逸保出来做团总。他的日记连续几天记载了他为此事所进行的活动。如8月2日日记写道：

严缙园来，同往道署进公禀，保陈少逸也。少逸前后与余数书，谓：罪苟可赦，即当荷戈前驱，杀贼报国，以为士卒先。情词凄烈，不殊邹衍狱中上书。余即以是书呈观察，冀其少垂怜也。

8月3日日记又记道：

闻贼东窜，势甚炽，各团皆能用命。诸翟董事沈、李诸君等屡为请命，欲陈少逸出狱办团，

《王韬日记》，第176页。

《王韬日记》，第178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427页。

《王韬日记》，第192页。

观察已允矣。而尚未提释也。

王韬达到了目的，陈少逸终于被他保了出来。1860年8月15日他毅然赴任，抵达诸翟镇。

诸翟镇属淤江府，处于上海县与嘉定县的交界点上，是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双方军事力量拉锯争夺的前线。王韬不顾白发老母在堂，冒险以赴，表明他建立事功的愿望十分迫切。

下车伊始。他立即召集团练局各董事开会，颁布“团练十二条”。旋募勇三百人筹议抵抗太平军事。此时，太平军已攻占嘉定，不时到诸翟一带活动，与诸翟团练局有所交火。王韬给吴煦的呈禀中有对具体情况的描述。如1860年8月22日王瀚上吴煦禀：

初一日，贼至七宝，民不能敌，下午已窜蟠溪，离诸翟仅四里，瀚偕同武生庄兆麟等带自募勇百余人防堵腹里诸村。日色昏暮，贼声渐逼，乃多设灯火，遍缚草人为疑兵，是夕贼仍退回塘桥。

1860年8月27日王瀚上吴煦禀：

初九日，陈常密约各处义民同时举事，所有土匪四散奔逸，西刻，攻入南翔有市梢，贼匪余党搜杀净尽，生擒十二名。经陈常身光率队，奋勇先进，故各民勇皆肯齐心并力。现探闻嘉定城中贼已稀少，集众齐进，无难立时克复。

实际情况可能没有王韬描述的那样辉煌，战功更没有如此之大。王韬在这里未免言过其实了。否则，他不会在赴诸翟数天之后就以“经费难筹”为由“飞舟”转回沪上的。他显然是在躲避太平天国的扫荡。

王韬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一遇实战便逃之夭夭的做法引起了苏淤太道吴煦的不满，加之他先前在上书中时有“言过切直”之处，吴煦难免忌恨有加。因此，王韬觉得在沪上难以立足，决定回到家乡去进行一项新的冒险。

《王韬日记》，第192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第401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第401页。

三、上书太平天国

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王韬对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曾作诗言志说：

男儿生不必封万户侯，死不必崇千尺邱，但愿杀贼誓报国，上纾当宁南顾忧。
丈夫拔剑誓杀贼，迺持寸铁奔狼群。
手梟贼头掷账上，功成却赏名甘沦。

在他的日记中更有要“生刮”太平军一类的字眼，如1860年3月30日日记写道：“一片佳山水，蹂躏至是，可为扼腕。愿从大侠，出筐中匕首挽其腹也。”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王韬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仇恨，只是一种地主阶级文化人对敌对阶级武装抗争的一种阶级本能反应。从利益分配角度讲，王韬祖上和他自己不仅均未食过清朝俸禄，相反却是因为清朝的建立而使昔日的王家大族“阖门遇难”，一蹶不振。王韬怀才不遇、被迫谋食西舍、“贱等春赁”的经历更使他对既得利益者怨恨不已。随着王韬对太平天国了解的加深和他对“清朝拔擢”的彻底失望，他心底原先的出自阶级本能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逐渐让位于一种权衡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太平天国攻占苏浙大片土地之后，势力出现衰而复振局面。1860年8月19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指挥蔡元隆、郜永宽等部三面围攻上海，焚毁江海关，兵锋直逼英法租界。王韬从诸翟逃回上海正是由于此次太平天国东征军攻打上海、外围团练纷纷解体所致。此后，太平天国虽然因上游告急没有打下上海，但上海再也不能保持昔日之安静。区区一隅，已在太平天国的包围之中。灭顶之灾的威胁无日无之。处在这样的“危如垒卵”的形势之下，王韬大有“未日来临”的感觉，他在诗歌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忧时只觉鬓毛非，厌听频年说乱离。
带甲几锭于地满，运筹谁答庙廊知。
堪嗟吴越无完卵，尚望淮徐速济师。
只是目前已难料，况能远虑计安危。

既然自己从来没有从清朝那里得到过什么，既然清吏已经是“只是目前已难料”，王韬认为他没有理由去做大清王朝的陪葬品，继续留在上海。于是在1861年冬天，他携其家眷逃离上海。

与一般地主、商人所不同的是，王韬没有向北逃难，而是向仍在太平天国控制之下的苏州甫里进发。对此时的王韬来说，太平天国已不象地主分子想象的或风传的那样可怕。他去过太平天国占领区，亲眼目睹过太平天国治下商业繁兴、“百货云屯”的实情，也略知太平天国尊称基督教徒为“洋兄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闻客谭近事有感”。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我生”。

《王韬日记》，第151页。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频年”。

弟”、尊称文化人为“先生”的基本政策。而与他经历相仿、1854年和他在墨海书馆曾一同研读过圣经的洪仁汗，此时跃升为太平天国总理朝政一事更使他产生了太平天国用人不拘一格和“需才孔急”的印象。

对多次深入太平天国了解情况一事，王韬一直讳莫如深。但综合各种记载，可以确定他说，王韬不仅数次陪同外国传教士前往苏州地区考察，而且访问过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蘅华馆日记》手稿中有如下记载：

十一年二月朔日，作金陵之游，英国牧师艾君迪谨（即艾约瑟，Joseph Edkins）招余作金陵之游，不获辞。金陵久为贼窟，丙午秋试一至，今屈指十六年矣。

王韬的换帖好友、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赵烈文在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二日（1861年4月11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此次王韬访问天京的情况。日记写道：

王兰卿来。兰卿自汉口返，言绕城外有官兵，而黄州已失，武昌方面纷纷移徙。伊去时过江宁，曾进城。城中街市繁盛，绝不盘诘。贼渠伪于王之子出见夷酋，意甚畏之云。

文中所提夷酋是指英国在华海军司令何伯和参赞巴夏礼。他俩奉英国特使额尔金之命于1861年3月初访问天京，与太平天国讨论太平军是否进攻上海问题。英国传教士、王韬的雇主艾约瑟和慕维廉等也搭乘何伯的军舰随访太平天国首都。王韬作为传教士的雇员自然也一道上岸活动。

在王韬自己印行发表的文字中，虽然没有随同传教士访问天京的记载，但亦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他的《蘅华馆诗录》中有一首“从舟中望金陵诸山”这样写道：

击揖中流素志违，片帆迅挟浪花飞。
江山满目悲残劫，云物遥天有杀机。
六代兴亡王气尽，中原战伐霸才稀。
怆怀为洒新亭泪，风景依然时事非。

有关王韬陪同外国传教士访问苏州等地的情况可参阅艾约瑟和杨笃信苏川访问报告，见于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 24（1860）。

王韬：《蘅华馆日记》。转见于胡适：“跋馆藏王韬手稿七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年5、6月。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二日。

关于英国传教士在天京的活动详情，艾约瑟有“南京访问记”一篇，收在他妻子 Jane Edkins 所著的 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 with Notices of Christian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Lif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 Various Parts of China, with a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 by Her Husband, The Rev. Joseph Edkins, (London 1863) 中。笔者未见到原著，茅家琦先生《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引述了部分有关外国传教士在天京活动的内容，从中可见艾约瑟一行的主要活动是宗教活动。另夏良才先生在《王韬与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中国人物》第三辑，里提到西方传教士曾向太平天国首领递交说帖、信件，其目的除宣传基督教教义以外也包括劝阻太平天国进攻上海。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从舟中望金陵诸山”。

明眼人一看此诗就知道它作于南京下关的船舰之上。作诗讲比兴，没有金陵之行，哪来“六代兴亡王气尽”的感叹呢？

此次金陵之行，不仅使王韬看到太平天国境内的真实情况，了解到太平军的实力，而且使他获悉太平天国攻打上海的时间，何伯、巴夏礼与太平天国领导人谈判的结果，只是得到了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和吴淞的许诺。因此，王韬在1861年冬抄将老母妻女匆忙送回苏州家乡。此事也反证了王韬确实去过太平天国首都天京。

为了改变受人蔑视的地位，地主阶级的下层或外层人物在农民革命时代往往有做开国元勋的欲望和举动。王韬此次举家离沪旋里，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太平天国攻打上海的兵锋，另一方面显然也有“坐山观虎斗”、“择木而栖”的考虑。他曾经为清朝出谋划策，甚至不惜冒险直接对抗太平军，但结果却是“忌恨猜集”。这不能不促使他考虑另辟成功之路。建立功业的欲望使他改变了忠诚的方向。兵威正盛的太平军、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以及王韬本人与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干王洪仁玕的相似经历和特殊关系都不断地向他昭示：“如果他投身叛乱者行列，他赢得权位和影响的机会将比他站在清王朝一边更大。”在“忠诚”与前途必须二者取其一的时候，他最后选择了后者。

王韬回里居住，自然引起清朝官员的怀疑。为了遮避清吏耳目，他假装奉令回籍“侦贼”、“杀贼先结贼”。可是后来的事实是，“侦贼”、“杀贼”未见其行，“结贼”却水到渠成。他与太平天国乡官周旋揖让，过从甚密。随后又通过他们结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抑不住对新政权上策图功的冲动，以“黄畹”名、“兰卿”字向刘肇钧上书一封，并请刘肇钧看后将其转呈忠王李秀成以资决策。

王韬在这封信里开宗便说，他恭呈此信是为了报答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知遇”之恩，他写道：“窃以畹承大人推毂以来，无日不以兢惕持躬，以期尚副厚望，下济穷黎为念。伏枕筹思，急于报效……今畹之老母山妻，弱息稚胤，尽已迁徙至里。从兹托庇字下，实望栽培而嘘噢之。”接着，王韬从战略高度为太平天国领导人剖析了太平军攻打上海的利弊。他指出，虽然洋人自通商中土以来“欺凌我民人，藐视我儒士”，“桀骜难驯，隔阂不仁”，但它不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敌人，“与我争天下者，清也，而非英法也”，所以，太平天国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打击上游和北方的清军上面。他引经据典地说：“事固有先其所急而后其所缓者，昔曹操先并袁绍而后取刘表，以成鼎足之势；明太祖先攻陈友谅而后张士诚，遂以混一宇内。方其时，表与操势固相远。而士诚地处逼近，似宜先除，而明祖以为士诚自守庸才，不足为虑，友谅雄姿跋扈，诚恐伐张而陈蹶其后也。今洋人特知自守，决不远出一。曾郭藩（亦曾国藩）之踞安庆，乃真心腹大患耳。夷人之性尚势而重利，趋盛而避衰。我苟姑置不问，用兵上游，一二年问荡涤腥秽，奠安区宇，削

CorrespOndenceRespectingtheOpeningoftheYangtzeKiangRivertoForeignTrade.32 转见于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03页。

参见 PaulACo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55.

“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钧禀”。见于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66—471页。

平僭伪，则洋人必稽首称臣，愿世为屏藩而罔敢二心。夫王政隆而四夷宾，大道昌而异学息。”

王韬主张先用兵上游，但并不绝对坚持“上海必不可取”。他以为如果太平天国一定要攻打上海，也得遵循“舍坚而攻瑕，避锋而挫弊”的用兵之道。为此，他提出一套攻取上海的方略，即所谓：“明告而严讨之，阳舍而阴攻之，徐以图之，缓以困之。”

他进一步解释说，“明告之而严讨之”就是要太平天国忠王先移文于英法二邦领事，明告“两国相争例不相助”，谴责英法“前者何以袒清”。然后视洋人反应而采取行动。如果洋人果肯将清朝军队“驱而远之”，上海“全为通商境界”，则太平天国可以不烦一兵，不折一矢，“但遗一介行人通问好足矣”；如果洋人固执谬见，一味袒清护清，则“彼气已衰，我怒甚烈”，自然不难攻克。

何谓“阳舍之而阴攻之”？王韬指出，英法二国刚从各地调兵遣将来沪，其气正壮，其志正盛，当此之际，太平天国应该“勿复骤犯”，而转用兵于他城他地，缓以时日，“有若舍而去之之意”，以使敌人以为太平天国惧其威而退，逐渐松懈戒备。“然后令我兵刻期大集”，上海自可一战而下。

“徐以图之，缓以困之”就是主张太平军用兵要统筹考虑，按部就班，先将上游之地控制在手，设关征税培养元气，然后再进占上海外围之地如奉贤、南汇、淤江、川沙、金山等城，筑垒设卡，断绝交通，以使上海“百物立匮”，“民食不支”，如此“但相持数月之久，内好必生，闽粤之民必乘机起事。强者乱而弱者死，洋人必不能禁……必舍之去矣”。

王韬原为清朝营垒中人物，熟知清朝官吏和清军的弱点。1849年以后他长期居住上海，对上海的民情、地理和“夷情”特点了如指掌。他又研究过天下相争大势和用兵之道，曾先后上书徐有王、吴煦、曾国藩等清朝大吏讨论对付太平天国的战略战术。因此，他的反戈一击的上书能够准确地击中清朝的要害。江苏巡抚薛焕在该上书曝光后“阅之大惊失色”，后怕不已。李鸿章在接获报告后也认为其书“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其畏慑威棱形诸意，言之表”。可惜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国策已定，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也因戎马倥偬，未来得及将此书进呈忠王和转报太平天国中央。忠王李秀成在1862年上半年依照太平天国既定战略进攻上海，结果无功而返。翌年，英法侵略军公开丢弃“武装中立”原则，与上游调派而来的清军联合进扑苏常。太平军被迫与上游清军和下游中外混合军两线同时作战，腹背受敌，终于不支。1864年6月4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血泊中落幕。倘若当初忠王接到王韬上书并以他的“和戎策”代替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既定政策，专意对付上游清军，太平天国的历史结局以至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结局也许大为不同。

王韬的上书一直压在刘肇钧的军营之中。同治元年三月六日（1862年4

“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钧禀”。

“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钧禀”。

“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钧禀”。

“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钧禀”。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第37页。（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上曾相”。

月4日)，清朝副将熊兆周督率清军、华尔洋枪队及部分英法军队会攻上海外围七宝王家寺太平军营垒。刘部不支败退。清军攻占后在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清副将立即将其上呈江苏巡抚薛焕。薛焕阅后觉得事关重大，星夜呈报清廷。三月二十七日（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逆党黄畹为贼策划，欲与洋人通好，与军务殊有关系……至该逆所称派乱党与赴洋径滨潜住，并勾结游民作内应，计殊凶狡，并着李鸿章、薛焕严密防范。黄畹是否见匿上海，或窜赴他处？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清朝地方官接到谕旨后立即四处张网，着手捕拿王韬。

“上书案”案发之时，王韬正在甫里家中。获知遭到通缉的消息，立即潜赴昆山乡间，密而不出。昆山乡间久为太平军占领，清吏一时无从拘拿。王韬的雇主、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知道消息后，一面通知王韬不要急于赴沪，一面与清朝苏淤太道吴煦进行交涉，“查探黄畹所犯何事”，并请求吴煦保其无事，吴煦口蜜腹剑，玩弄两面手法，要慕维廉尽可放心。慕维廉害怕吴煦出尔反尔，坚持要求吴煦立一字据。吴煦亦不推托，“书给字片”，并表示“兰卿如肯仍来我处，定当妥为安置，毋恤人言”。但慕维廉和英国领事麦华佗（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均不相信吴煦的保证，王韬亦不敢冒险一试。商量的结果，决定王韬暂时潜回上海墨海书馆避风，视事情发展而决定行止。不料王韬行踪不密，被吴煦侦知。吴煦准备前来墨海书馆捕人。此举激怒英国领事麦华佗，认为吴煦不但欺骗了王韬，还欺骗了英国传教士，是一个反复无常、“失信无耻”的小人，遂把王韬从墨海书馆接到更加安全的英国领事馆避难。王韬从此“闭置一室，经一百三十五日”。清吏迟迟捕不到王韬，引起清廷不满。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再次发出上谕，责令李鸿章和薛焕“务即设法购拿，必将疏纵逃官各罪，一并惩处”。在清廷一再催促下，上海清吏加紧与英国领事麦华佗交涉，要求交出王韬。麦华佗是王韬前雇主麦都思的儿子，与慕维廉、王韬均相熟识，不答应清吏的要求。清吏通过清朝总理衙门直接与英国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William Bruce）交涉。卜鲁斯对总理衙门的要求也一概加以拒绝。他以英国钦差大臣的名义照会清朝总理衙门，声称“王瀚有无通贼之事，本大臣无庸置疑”，但其事出有因，显系恐贼疑有异心，本人及家眷难免被害，故假为此贼同心之论，令贼改图不进攻沪，此良民在贼踞之地不肯协同，必致于死，两全之难也”。卜鲁斯进而指责吴煦“佯言妥为安置，诱其回沪”是“用其欺诈”，因而英国不能协助清廷捕捉王韬。

清朝新败不久，慑于英国公使和领事的强硬口气，未敢强行捕人，但在英国领事馆外面和港口布置探哨，伺机行动。因此整整四个多月王韬未敢离开英国领事馆半步。他的老母亲在此期间连惊带吓，含悲而逝。王韬也不能亲往含殓送终。至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一日（1862年10月4日），王韬在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出走，乘英国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从而最终结束了他在上海的多角之恋。急于成功而又情系三方的王韬终于未能叩开他的幸运之门。他的不幸遭遇正好应验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东华续录》，卷七，“同治元年三月己酉上谕”（光绪十三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版，第179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中英关系类，第0622号《逆党黄畹案》，“吴煦给宪台的复禀”。《王韬日记》，第195页。

问题至此并没有结束。自王韬逃离上海之前一天起，终其一生，他始终对上书太平天国一事矢口否认，并声称这是当道对他的政治陷害。他在临行前给其妻兄杨醒逋写信说：

天特厄之，致斯奇困，此寢寐中未及料也。疑生投杼，冤至覆盆，不思从中之或有嫁名，反以局外者居为奇货。当路势位烜赫。固无难指龟而成鳖，淆素以讹缙，欲戮一细民，亦何求而不得。兹虽西官力为周旋，为之请于彼国驻京公使，而当事者转益其疑。

……呜呼！即使韬衔冤斧钺，饮恨刀锯，于正典明刑，攻城杀贼，亦何所裨，徒成杀士之名，自取忌才之实，此堪愤而又堪笑者也。

赴港以后，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也不时地说及他的“冤情”，如在“与田理荃大令”一信中他写道：“不佞三吴之鄙人耳，读书有志，学剑未成。少亦尝愿投笔从戎，请缨系虏，跃马塞上，荷戈行间；徒以有老母在，未敢以身许国也。不意庚辛间，戎马俯张，风尘瀕洞，江浙尽陷于贼，几无一片干净土，逃身海上，志图杀贼以自效。奇计未就，谤书已来，不得已避地粤中。”在晚年写成的《张园老民自传》中，他甚至说出具体细节来：

惟时贼于苏乡遍设伪官，立董事，皆土著人，暴敛横征，伪卡林立。老民固素识诸董事，密相结纳，说以反正，言曾帅善用兵，只以方剿上游，未遑兼顾。今安庆已复，援军旦夕必至，不可不自为计。因激以忠义，勉以功名，令诸董事入贼中说头目结内应，皆有成说，其黠者亦从而徘徊观望。老民密纵反间，使贼党互相猜贰，自翦羽翼，诸内应者多急欲见功，势颇可乘。而当事者遽以通贼疑老民，祸且不测，闻者气沮。

王韬的书信集《弢园尺牋》刊行于1876年。《弢园老民自传》更属晚年息影之作。其间对昔日不被人们嘉许的事实难免不进行一番修饰遮掩。对王韬来说，这是为了避祸消灾，自有其可愿可谅之处。但这一否认却引发了后人对王韬到底有无上书太平天国的“马拉松争论”。

最初将这一问题捅出来的是陈其元。他当过李鸿章的幕僚。在光绪初年所著的《庸闲斋笔记》一书里，他声称曾于薛焕幕中亲见“苏州诸生王畹”上太平天国之书，并说“王畹”已死于上海墨海书馆，不娶显戮，“三吴人有遗恨焉”。随后晚清及民国年间的《近世中国秘闻》（扞虱谈虎客著）、《太平天国诗文抄》（罗岂、沈祖其编）、《太平天国野史》（凌善清著）、《珊瑚集笔记》（范烟桥著）等均沿用《庸闲斋笔记》的说法，并以更加肯定的注释认定“王畹”就是王韬。

1935年北京大学教授谢兴尧将刚影印公布的故宫档案《苏福省儒士黄畹上奉天义刘肇钧禀》与《庸闲斋笔记》所记“王畹上忠王攻取上海策”对比考证，写出《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考》一文，肯定“黄畹”、“王畹”、王韬实为一人。谢兴尧从六个方面，即：“黄畹即王韬”、“文章相同”、“事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同竹庵松轩买舟至海上”。

王韬：《弢园尺牋》，卷六，“与醒逋”。

王韬：《弢园尺牋》，卷十，“与田理荃大令”。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实相合”、“文句相同”、“策计相同”、“畹得罪后之自悔”等论证了王韬的确给太平天国上过书。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发表了《黄畹考》一文，（解放后亦写过一篇新的《黄畹考》）也认为黄畹就是王韬。罗尔纲的根据是：一、王韬在考取新阳秀才时的注册名为王利宾，字兰卿，而黄畹上书时所用的表字正是兰卿；二、黄畹的“和洋论”与王韬一生对外主和不主战观点相同；三、黄畹上书中的攻清方策与王韬呈给清吏的平贼策相同；四、黄畹自述的身世和经历与王韬的身世和经历相合；五、黄畹的文笔与王韬的文笔相同，甚至有几处辞句完全一样；六、王韬自己对“投贼”一事有所忏悔。

但是，以王韬本人文字为主要根据看待此一问题的学者不同意“王韬上书说”。三十年代的吴静山在《上海研究资料》中说，“王韬未必敢冒天下的大险”去上书太平天国。今人吴元申和杨其民分别发表《王韬非黄畹考》与《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两篇考证文章，对谢兴尧、罗尔纲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王韬上书一说仍然很难成立。然而，吴、杨两文一出，立即就有新的文章与之商榷。1988年第三期《近代史研究》和1989年第四期《社会科学辑刊》分别发表王开玺的《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之我见》和李景光的《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两文，对吴、杨的否定性观点予以再否定，重申谢、罗两人的“王韬上书说”。目前，还未看到对王开玺和李景光观点的挑战文章。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否定性史料之前，王韬上书一事应成为定论。

《王韬事迹考略》.《上海研究资料》1984年重印本。

见于198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

第四章流亡年代

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冒险活动没给王韬带来“柳岸花明又一村”的人生奇迹，却把他推上了更为困顿不堪的命运之途。从1862年到1884年，他以“圣朝之弃物、盛世之罪人”身份，在香港和欧洲度过了23年的流亡生活。此一时间正当王韬34岁至56岁由中年而壮年的人生最宝贵年华。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当命运之神把他推上流亡之途的时候，也就是把王韬推向了世界，从而为中国现代化造就了一位不可或缺的引航员和吹鼓手。

一、遁迹香港

1862年10月5日，王韬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轮驶离黄浦江，南下香港。一路上，虽有随船同行的江南范春泉兄弟、萧山鲁获洲以及麦华佗委派的“密司恩开”等说话作陪，但王韬总觉得心情沉重。大清王朝没给王韬带来任何好处，甚至要以大辟重刑来惩治他，可如今一旦要离开它，逃入在西洋人统治之下的“化外之地”，王韬又感到若有所失。对父母之邦的依恋之情与对清朝政府的怨恨矛盾地混合在一起，牵拽着他的心绪。他以十分伤感的笔调在甲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庚信已无家。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

茫茫的大海，茫茫的前途，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灵魂，一种找不到人生依归的愁绪迷漫全诗。

“鲁纳”号航行两昼夜后抵福州。越日，抵厦门。10月11日午后抵香港。从此王韬变成了所谓的“化外之民”。在这块大清王朝管辖不及的“化外之地”上，他实现了思想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六十年代的香港，在英人经营下，工商业已有一定程度的繁荣。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对此曾有记载：

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

尺地寸金，价昂无埒。沿海一带多开设行铺，就山曲折之势分为三环：曰上环、中环、下环，后又增为四环，俗亦呼曰“裙带路”，皆取其形似也。粤人本以行贾居奇为尚，锥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贸易殊广……

上、中环市廛稠密，阔剖宏深；行道者趾错肩摩，甚嚣

尘上。下环则树木阴翳，绿荫缤纷，远近零星数家，有村落间意。“博胡林”一带，多西人避暑屋，景物幽邃，殊有萧寂之致。

不过这是王韬后来游历欧洲之后的倒叙文字。初到香港的王韬并没有如此平静的心情来欣赏英人的功绩。他下船伊始，情绪极坏，对什么都觉得难以忍耐。“人民椎鲁，语言侏儻”；环境恶劣，“炎方景物种种伤吾意，气候不常迥非中土侔，视天常低视日近若炙，冬或著绤盛夏或披裘，鱼龙怒腾欲雨气腥臊，一黑千里颺起摇陵邱，飞虫细蚋经冬犹不死，炎飚毒雾白昼鸣鸱鸮”；衣食住行更是样样窘迫，“所供饮食，尤难下箸，饭皆成颗，坚粒硬喉，鱼尚留鳞，锐芒螫舌，肉初沸以出汤，腥闻扑鼻，蔬旋洒而入馔，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咸之异嗜”；“瘦妻娇女啼哭思旧土，一家四人卧床无一廖，半椽矮屋月费钱半万，风逼炊烟入户难开眸，木中虬虱嚼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别上海作”。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第65页。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

王韬：《弢园尺牋》，卷六，“寄杨醒速”。

人若锥利，爬搔肌肤往往至血流”。苦不堪言，王韬似乎掉进了地狱之门。

最使王韬苦恼的是，生性好动、喜交朋友的他如今面临着既无新朋又失老友之孤独之境。他认为香港是“其俗素以操赢居奇为尚，而放于礼法，锥刀之徒逐利而至”的地方，因此，绝少“雅流在其间”，“地不足游，人不足语”而老朋友大多因王韬为清朝“通缉要犯”，害怕连累，不敢与之继续来往。他给朋友的书信有不少都落得“旧朋无一字之来”的有去无回的结果，他为此作诗自嘲亦嘲人说：

谁惜寥天囚独鹤，翻嫌多事遣双鱼。
论交四海轻刘备，乞食穷途泣伍胥。
元修契顺从来少，赵德符林亦未逢。
一字惧为他日累，此才转赖导邦容。
文字岂必关科第，风义原难望俗庸。

实际上，王韬此时自己也不愿以待罪之身与他人交游，他的诗中有“逢人怕问名”、“无求终岁闭门居”一类的句子。他将自己的名子“瀚”改为“韬”，表字“兰卿”改为“懒今”、“子潜”、“仲弢”等，将所居之处命名为“天南遁窟”、“弢园”等，似乎打算从此躲开多灾多难的尘世，韬光养晦、隐姓埋名地度过他的后半生。

英国领事为王韬提供了政治庇护，却没有提供他相应的生活资助。所以初到香港的他还没有条件做闭门修心养性的寓公。他必须走出门去寻找机会挣钱活口。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向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理雅各为英国的苏格兰人，1815年出生于一个信奉新教

的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加入英国伦敦布道会，1839年被该会派往马六甲（Malacca）担任英华书院（Anglo Chinese College）院长。1843年，英华书院迁入香港，理雅各也一并随往。理雅各受过专门的中文训练，有很高的汉语造诣，著有多本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其中《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孔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孟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Mencius）、《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等在欧洲汉学界有广泛的影响。1858年，理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

王韬：《弢园尺牋》，卷六，“寄穗垣寓公”。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与人书不答”。

据洪深《申报总编纂“长毛状元”王韬考证》（载于《文学》第二卷第六号，民国二十三年）说，王韬共有别字五、别号十，即：元晦、仲弢、子久、子潜、紫诠、甫里逸民、瀛洲钓客、淞滨逋客、沪北宾萌、华鬃居士、遁窟废民、天南遁叟、泰东诗渔，欧西词客、淞北逸民等。近代中国学人，其别字别号之多，殆以王韬为最。

十九世纪中叶，香港共有三大书院，即保罗书院、大英书院，英华书院。其中以英华书院办得最为出色，主要教授西国语言文字和普通科学知识。清季洋务派人士唐廷枢等亦卒业于此。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香港时也与该院院长理雅各关系甚密。

雅各在英国在港大商人查顿 (William Jardine) 和颠地 (Lancelot Dent) 资助下计划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成英文, 取名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建设计划, 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在王韬未赴香港之前, 理雅各的合作者有英国传教士湛约瀚 (John Chalmers)、留美学生黄胜等, 完成了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翻译, 名之为《中国经典》第一卷和第二卷。

王韬的到港使正在苦于“助译乏人”的理雅各非常高兴。理雅各曾到过上海墨海书馆, 对王韬的学问和助译圣经一事有所了解。所以, 早在王韬藏匿于上海英国领事馆时, 理雅各就曾与麦华忙联系, 邀请王韬来英华书院助译中国经典。王韬刚到香港, 他就派人前来联络, “特为位置”, “优礼有加”。王韬在诗文中多次谈及理雅各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对他的“知遇之恩”, 如《南行》一诗写道:

鲁连成蹈海, 仓卒登邮舶……
夜深篷背雨, 并作眼泪滴……
绝岛峙海中, 新是西人辟。
问舍有逢迎, 甫集惊魂魄。
主人意良厚, 怜我在屈厄。
译馆汇群书, 乌焉命仇核。

在后来一封致理雅各的信中他更是情绪激动地写道:“(韬)逃死南陲, 得逢执事, 授餐适馆, 礼意优崇, 惮羁旅之人弗至失所。感激之私, 沦肌侠髓。”

王韬经学功底深厚, 一般的传教士汉学家远不能望其项背。而且, 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有十多年的与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经验, 工作起来也比一般的内地文人驾轻路熟, 得心应手。这两点加上王韬对理雅各的感恩意识, 使《中国经典》的翻译进度大大加快。经过两人近三年的努力工作, 至 1865 年 7 月, 《尚书》译述宣告完竣, 定名为《中国经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随后, 《诗经》译本《中国经典》第四卷于 1871 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五卷于 1872 年相继发行。

将中国上古经典翻译成现代英文是一项十分困难艰巨的工作。这些经典成书时间早, 文词古奥晦涩, 所述历史事实既简赅不详, 又真伪参半, 加上后人注疏汗牛充栋, 观点千变万化, 莫衷一是。非学贯中西、大才大识者几乎无从下手。理雅各和王韬翻译的成功, 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学术功力和治学才华。王韬的工作尤其艰苦。他负责所有译著的“前期基础工程”, 每译一经, 他必须事先广搜博集, 详加考订。然后集历代各家注疏之长。并犀入自己的研究心得, 写成笔记, 以供翻译之用。他的治学原则是兼采诸家, 不宗一派, 对理雅各弄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 还需讨论讲解。在整个翻译过程中, 王韬单研究性的笔记就有《皇清经解校刊记》24 卷、《国朝经籍志》8 卷、《毛诗集释》30 卷、《春秋左氏传集释》60 卷、《春秋朔闰日至考》3 卷、《春秋日食辨正》1 卷、《春秋朔至表》1 卷、《礼记集释》和《周易注释》

王韬:《蘅华馆诗录》, 卷三, “南行”。

王韬:《弢园尺牋》, 卷六, “与英国理雅各学士”。

等。每一部笔记都花费了王韬大量的精力，如《毛诗集释》“采择先哲之成言，纂集近儒之绪语，忻衷诸家，务求其是”，其工作起始于1862年5月，成于1863年3月，前后花去将近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王韬每日都是“凌晨辨色以兴，入夜尽漏而息”。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回忆说：“航海至粤，旅居香海，自此社门削迹，壹意治经。著有《毛诗集释》。”起早摸黑，屏绝一切交际，王韬全身心地投入了译经工作。

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十九世纪以前就有不少不畏艰难的西方传教士在这方面辛勤译述。然而，他们所译的最多也只是中国经典的只鳞片爪。而且，由于文字障碍，他们大多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精义理解不深。译文也多半鄙俚不通，谬见百出。象理雅各和王韬这样功力深厚，学贯中西的学者两人鼎力合作，积二十年之功，将中国古代经典系统地、准确而又通俗地译成西文，不能不说是史无前例。理雅各与王韬合作的译本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被视作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洋洋大观的多卷本《中国经典》于十九世纪在西方陆续出版引起了西方学术思想界的轰动。理氏也因此而获得一片赞誉。英国著名汉学家小翟理斯(Lionel Giles)称赞道：“五十余年来，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英国爱丁堡大学特颁予理雅各汉学奖和荣誉博士学位。1876年，英国牛津大学开设汉学讲座，理雅各又被特聘为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

应该看到的是，理雅各的不朽贡献和殊荣有一半应归之于王韬的助译。从《中国经典》的内容看，有的就是王韬所作笔记的直译。如王韬对古代历学很有造诣，著有《春秋朔闰日至考》三卷。赴英助译时又特作历学论文五篇，其中两篇被理雅各直接收入《中国经典》第五卷书首之序言中。另据《中国经典》第五卷序言内所载之参考书目(Books used in preparing the work)内有多种著作直接得自王韬原作。在原文注释和观点综述方面也几乎全部得自王韬。《礼记》和《诗经》译本中多次提到这一点。理雅各本人对王韬在译书过程中给予他的帮助也不止一次地予以极高评价。如在《中国经典》第三卷的前言里，他特别提到王韬对译书的杰出贡献，并对此表示感激不已。他写道：

译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川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矣。彼于1863年(此处时间不确，但原处英文如此。应为1862年)岁暮抵港，于精心所集之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取用、并以满怀热忱，进行工作，随处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

王韬：《弢园尺牍》，卷六，“与英国理雅各学士”。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此类笔记大多没有刊刻，《弢园著述总目》中有部分目录。手稿有一些已不知下落。其中《毛诗集释》、《礼记集释》、《周易集释》三部现藏于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

转见于朴庵：《王韬与理雅各》，《国风》创刊号，1934年。

日本汉学家、京都大学理学部教授新城新藏在其所著《春秋长历》一文中，对王韬的历学成果给予很高评价，并认为与他自己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该文见于新城新藏著，沈璋译，《东洋天文学的研究》(上海中华书局民国版)。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第71页。

Pau I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P.60.

特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劳之际，并为余带来乐趣也。在一封写于 1871 年致友人的信中他又写到：

我们已经印就 380 页（指《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然而开支太大。每月开支，包括我的中国助手王博士（Dr, Wang, 即王韬）20 元薪金，略有 105 元之数。出于经济考虑，有时我想不再继续雇用王，因为或许一个星期里没有他我也能对付过去，但一旦困难来临，他对我又是那样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现正在译述诗序，他的作用尤其重要。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才有价值。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与他匹敌的本地学者。

从理雅各的推重赞誉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韬在中国近代第一波“中学西被”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此功与他后来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伟大贡献交相辉映，奠定了王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原文见于 The Chinese Classics, III, viii。此处译文采自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第 48 页。
Helen H.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P.43. (London, 1905)

二、旅行欧洲

王韬青年时代就喜欢读“域外书”，常作“汗漫游”之想。他自己曾回忆说：“余年未壮，即喜读域外诸书，而兴宗蠹乘风破浪之想，每遇言山水清嘉、风俗奇异，辄为神往；惟以老母在堂，不敢作汗漫游。”1867年，他终于获得了一次“泰西汗漫游”的机会。

1867年初，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因事回国，临行前约王韬“往游泰西，佐辑群书”。年底复来信正式相邀。王韬此时母亲已故，没有后顾之忧，遂欣然接受邀请，于同年12月15日搭乘普鲁士轮船离开香港，前往欧洲。

王韬此行横越数万里，“历行数十国”，压抑多年的游兴大为满足。其路线是：自香港南下，经新加坡、槟榔屿、锡兰，入红海亚丁湾，至苏伊士运河。然后改乘火车至开罗。再由开罗换车至亚历山大港，易船过地中海，经意大利港口墨西拿，到法国马赛港上岸。陆行经巴黎至戛雷海口，换乘轮船过英吉利海峡至伦敦。再由伦敦乘火车到理雅各家乡苏格兰杜拉村。路途中，王韬在略通华言的“法国医生备德”和“普国船主坚吴”陪同下，每至一地总喜欢上岸“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观其兵力之强弱”。并将所见所闻及其观感笔录下来，以备开启国人眼界之用。后来他把这些笔记编辑成《漫游随录》刊行于世。正是从这部游记中，我们才得以知道王韬旅行欧洲的情况以及他的思想变化。

王韬此次海外之行的第一个踏足之地是新加坡。因有当地上海籍华侨友人宋佛俭的招待和导游，王韬得以环游一周，并深入市区考察华侨在新加坡生活与工作情形。王韬对清朝政府视海外华人为异邦之民而不闻不问的政策提出了异议。他写道：

新加坡古名“息力”，华人之贸易往来者，不下十余万。多有自明代来此购田园、长子孙者。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亦足见我中朝帝德之长涵、皇威之远播矣。闻前时斌京卿椿持节过此，曾有顶帽补服前来谒见者，其念念不忘名器之尊、故土之乐，有可知已。使我朝能以一介之使式临其地，宣扬恩惠，凭藉声灵，俾其心悦诚服，归而向我，乐为我用，岂非于海外树一屏藩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注意到海外华侨问题，承认大清王朝的“弃民”仍有爱国爱乡之情，建议设立外交代表予以联络保护，足见王韬考虑问题之敏锐与深刻，也说明他不亏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后来在办《循环日报》时，多次发表相关文章，要求清政府“选公使、派领事”，其思想主张产生的最早触点大概亦在于此。

作为弱国之民，王韬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沿途亚非弱小国家的蚕食鲸吞十分敏感，旅行日记中颇多这方面的文字。如舟过苏门答腊和锡兰时他分别记道：

东南洋诸小国，列于职方，岁时朝贡，以备共球。自明中叶至今，尽为欧洲列国所分踞，视为东来要道，蚕食鲸吞，几无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予偶与备德言之，亦为歎嘘不置。为言此间如新加坡等处亦有藩王，即古之君子其国者；为英官所节制，仅拥虚位、食廩禄而已。”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第65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第71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第74页。

锡兰在南印度东，南洋中一大岛也……为我佛如来降生之地，遗迹尚存……有城堡，有炮台，设兵居守。有一总督驻扎其地，有议会以治理政事，向为强国，民户甚繁。葡萄牙、荷兰迭据其地，英人逐而有之。向来各部设立一主，为民间所公举，后废。目睹世界性的自西而东的弱肉强食景象，王韬不能不感到心惊肉跳。他的贫弱的祖国也同样面临着被列强蚕食鲸吞的威胁，而他的同胞国人却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自香港启程后 40 多日，王韬到达法国马赛。随后前往法国首都巴黎。在法国他盘桓达十日之久。法国文明使他觉得事事新鲜，“眼界顿开”。他的笔记里充满了对新奇事物的生动描述。略举数例，以见王韬当时初临欧洲之境时的兴奋情形及其注意所在：

越两日，抵马塞里，法国海口大市集也。至此始知海外闾阖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街衢宽广，车流水，马飞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上……环游市廛一周，觉货物殷阗，人民众庶，商贾骄蓄。

法京巴黎，为欧洲一大都会。其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俪……道路坦洁，凡遇石块煤漆稍有不平，石匠随时修补。车声辘辘，彻夜不绝……大商巨铺，格局堂皇。酒楼食肆，亦复栉比。客至呼肴，咄嗟立办。市廛之中，大道广衢，四通八达。每相距若干里，必有隙

地间之，围以铁栏，广约百亩，尽栽树木，樾荫扶疏……盖藉以疏通清淑之气，俾居人少疾病焉。余观影戏，时不期而集者千数百人，余座颇近，观最明晰。所有山水人物、楼台屋宇，弹指即现，生新灵动，不可思议。其中有各国京城，园亭绮丽，花木娟妍，以及沿海景象，苍茫毕肖……已之者，真下畜环行欧洲一周矣。

王韬是个有心人。他特别留心考察法国的文化与科学状况，他先后参观了拿破仑用“历战所得大炮”熔铸的铁炮展览馆、卢浮宫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兵器博物馆、1867 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会场和巴黎女子学校。这些不曾遇见过的文教与科学设施给王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引得他不断地在游记中发出赞叹。如他在参观了卢浮宫博物馆后这样写道：“法京博物院非止一所，其尤著者曰‘鲁哇’，栋宇巍峨，崇饰精丽，他院均未能及。其中无物不备，分门区种，各以类从，汇置一屋，不相肴杂，广搜博采，务求其全，精粗毕贯，巨细靡遗。凡所陈列，均非凡近耳目所逮，洵可谓天下之大观矣……一曰生物……一曰植物……一曰宝玩……一曰名画……一曰制造……其他各物，更仆难悉，往游者无不兴观止之叹。余以海角羁人而得睹其盛，不可谓非幸已。”

游观法国后，王韬乘火车由巴黎至戛雷（亦加莱）海口，换乘轮船至英国多佛尔，再换车至伦敦。在伦敦，王韬因等待理雅各来接，小有盘桓，“由是每日出游，遍历各处。尝观典于大学，品瑰奇于名院，审察火机之妙用，推求格致之精微。各处督理主者，无不一一指授。间有所问，导者辄译余意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第 74—76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82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84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85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89—91 页。

以对，应答如响，随有辩论，主者叹为明慧渊博。”直至理雅各到达，王韬才随他一同前往其家乡、苏格兰中部克拉克罗南夏(Clack-mannanshire)郡的杜拉(Dollar)。

杜拉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镇。“其地万山环合，苍翠万状，冈阜蜿蜒，树木丛茂”，是理想的潜心做学问的地方。历史上杜拉也确以风景优美和时出学术闻人而著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王韬在此的主要工作仍是从事《中国经典》的翻译。经过他与理雅各两人的合作努力，《春秋左氏传》、《易经》、《礼记》等书的翻译工作相继完竣。

与在香港时期“闭门译述”、“遁迹韬晦”不同，在杜拉译书时，王韬不时“偕二三朋侪”，到各地去旅游，扩充见闻，“车辙所至，辄穷其胜”。在英两年多时间，他先后游历了伦敦、爱丁堡(Edinburgh)、利思(Leith)、阿贝丁(Aberdeen)、敦提(Dundee)、格拉斯哥(Glasgow)等处，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眼界为之大开。

首先，英国的市政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给王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王韬在各地旅行时发现，英国城市虽然楼房林立，商号鳞次栉比，“车马往来，络绎如织，肩摩毂击，镇日不停”，但绝无脏乱之象。宽广的街道中间走车，两旁行人，间有木柱标志，井井有条。“每日清晨，有水车洒扫沙尘，纤垢不留，杂污务尽。地中亦设长渠，以消污水”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极为方便，“自来水火”胜过中土担水燃烛千百倍，“各街地中皆范铅铁为筒，长短曲折，远近流通，互相接引。各家壁中咸有泉管，有塞以司启闭，用时喷流如注，不患不足；无穿凿埂汲之劳，亦无泛滥缺乏之虑。每夕灯火，不专假膏烛；亦以铁筒贯于各家壁内，收取煤气，由筒而管，吐达于室。以人引之即燃，朗耀光明，彻霄达曙，较灯烛之光十倍”。通讯设施则有密布全国的公共电信局网络。王韬曾入观伦敦电信总局，“是局楼阁崇宏，栋宇高敞，左为邮部，右为电房，室各数百椽……堂中字盘纵横排列，电线千条，头绪纷错。司收发者千余人……其利甚溥，其效甚捷。凡属商民荟萃之区，书柬纷驰，即路遥时逼，顷刻可达，济急传音，人咸称便”。其次，英国的“机器制造之妙”和“格致之精”使王韬大力惊叹。王韬在埃及和法国乘坐火车时就已经对西方机器妙用叹赏不已，认为远非中土之人力或畜力所能比拟。在英国各地旅行，他更多地感受到机器之妙。旅行离不开舟车，因而他有对机车的赞叹：“泰西利捷之制，莫如舟车，虽都中往来，无不赖轮车之迅便。其制略如巨柜，左右启门以通出入，中可安坐数十人，下置四轮或六轮不等。行时数车联络，连以铁钩，前车置火箱。火发机动，轮转如飞，数车互相牵率以行”；入住旅馆，他发现了电梯起降，惊喜万分：“寓在敖司佛街(OxfordStreet亦牛津大街)，楼宇七层，华敞异常，客之行李皆置小屋中，用机器旋转而上”；走访印刷厂，他观察到现代大批量机器印刷：“男女工作者约一千五百余人，各有所司”，“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97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07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01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09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08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90页。

机器行事。其浇字盖用化学新法，事半功倍，一日中可成数千百字”；考察造船厂，则有“力几万钧”的汽锤和轧钢机，“击物无所不糜，所碾铁皮均齐划一，出之甚速”；参观纺织厂，则发现“自缉丝、编线、灌染、排比、舒架、经纬成匹之后平熨、量卷，无一非机器为助，人但在旁收纵转易而已。力不费而功倍捷，诚功夺天工矣”。其余足之所履、目之所接，无一处没有机器，“水火二气之用，至此几神妙不可思议矣”。

机器制造之妙置根于格致诸学之精，王韬看出了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体悟到英国文化与教育具有普及性及崇尚实用的特点。他写道：

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

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行动之迟速，日月合璧，日月交食，彗星、行星何时伏见，以及风云雷雨何所由来。由地理知万物之所由生，山水起伏，邦国大小。由电学知天地间何物生电，何物可以防电。由

火学知金木之类何以生火，何以无火，何以防火。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固而创气球，造气钟，上可凌空。

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由光学知日月五星本有光耀，及他杂光之力，因而创灯戏，变光彩，辩何物之光最明。由化学、重学辨五金之气，识珍宝之苗，分析各物质。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

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

英人是重文学（这里指教育）。童稚之年，入塾受业。至壮而经营四方；故呈贱工粗役，率多知书识字。

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

再次，王韬在居住和旅行英国期间深感英国的典章制度“迥异中土”，时时流露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向往之情。他自海道进入英国时，行李由英国海关“遣入送来”，因而觉得不象中国海关那样令人“殊觉不便”。进一步考察之下，他发现英国海关不是中国海关那样的“病商”机构，而是一个“惠商”机构，“盖税馆自有运物公司经理其事，不烦客虑也。所携茶叶、烟卷以馈遗友朋者，概不征税，箱筐亦不启视，其待远人也可谓宽矣。英例，缉查严于入口。而宽于出口，且出口并无税饷，其加惠于商贾也如此。故纳税虽繁重，而人无怨焉。”在探索英国人善于制造和喜欢格致之学的原因时，他注意到并十分欣赏英国鼓励和保护发明创造的专利制度：“英人心思慧巧，于制造一切器物，务探奥窍，穷极精微，多有因此而致奇富者。此固见其用心之精，亦由国家有以鼓舞而裁成之，而官隐为之助也，按英俗，凡人创造一物不欲他人摹仿，即至保制公司，言明某物，纳金令保，年限由五六年至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27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47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33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16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07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08页。

二十年。他人如有摹仿者，例所弗许。违例，准其控官而罚款焉。……故一物既成，其利几以亿兆计。否则几经研求，以发其秘，他人坐享其成，无所控诉，谁甘虚费财力以创造一物乎？未卒业而有惓心者，亦可报闻。如器有实用，而官不以为然，及禁人私摹，而官反用之者，皆可讼诸刑司。人有一得之技，虽朝廷不能以势相抑，故人勇于从事也。”在这里王韬已经从经济活动深及到官与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而且，可贵的是，他居然毫不掩饰地表示对英国那种个人知识产权重于官权、官亦可被民“讼诸刑司”的社会的向往。

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尤其让王韬不胜羡慕，旅行伦敦时他专门前往英国国会参观：“有集议院，垣墙高峻，栋宇宽宏……国中遇有大政重务，宰辅公侯、荐绅士庶，群集而建议于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实重地也。”

至爱丁堡，他走访当地法院，“入而观其审事鞫狱”，叹服其审判公平、公正和公开，认为有“与众咸同”的中国古风。至贝德福（Bedford），他往观监狱，观察到“居舍既洁净，食物亦精美”，“狱囚按时操作，无有懈怠，织成毯，彩色陆离，异常华焕，且有牧师宣讲，悉心化导，绝无鞭鞑之苦”。

王韬在英国的旅居和漫游是一种文化的双向交流。他不仅目睹、接触和学习到许多西方新奇之物，而且以其东方文化人的身份，在西方积极地传播了中国文化。王韬生性倜傥，雄才好辩，每至一地，辄喜演讲。他曾在理雅备的陪同下应邀前往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去做关于中英关系的学术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介绍了中国孔子的仁爱之道，叙述了中英两国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历史，呼吁英国有识之士丢弃敌对中国的态度，从今以后“益敦辑睦，共乐邕熙”。王韬的这次讲演获得了牛津大学师生的喝采，“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在爱丁堡大学，他也曾就儒家文化问题“宣讲凡两夕”，“来听者男女毕集”。宣讲过程中，王韬为使英国听众能具体把握中国文化，特意为他们高声吟诵白居易《琵琶行》和李华《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宛转，高抗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此一役也，苏京士女无不知有孔孟之道者。”

作为一位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王韬在赴各地的演讲过程中特别提到，中国虽然以仁义为本，愿意与西方各国往来贸易，但绝不是无原则地向外一切都开放。在一次商人公会上，他把中英关系中正常贸易与非正常贸易区别开来，呼吁加强正常贸易而反对不正常贸易。他说，丝茶贸易既有利于中土，也有利于外邦，因此应该设法扩大；而鸦片贸易则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对英国正当商人亦有所损害，所以应坚决“予以除之”。王韬义正辞严、见解深刻的演讲当即得到与会商人的强烈回应，“中有劳爱先生者，独侃侃而言曰：‘嗣后，当纠二三同志设一公会，必先禁印度栽种罂粟而后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115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111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 128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 128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97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 145 页。

可。’” 劳爱是英国下议院议员，后来在英国国会和民间发起废止鸦片贸易的社会活动。

王韬还注意向英国人民介绍中国朝野的最新动态，消除他们对东方古国的陈见。一次，爱丁堡某报纸煞有介事披露“曾国藩与某当轴书”，内有“一论轮车铁路之断不能开；二论西人不能擅入内地；三论西商购买丝茶不能自人内地成交；四论西人船舶不能在内河行驶；五论西国驻京公使面圣须俟今上圣龄二十岁以外……西人如有不从，则必出于战”。这些论点与中国洋务派掌门人曾国藩的平日言行不合，显然是一些别有用心英国侵略狂编造出来的蛊惑人心之辞，旨在煽动英国民间反华情绪。王韬其时适在爱丁堡，出面予以澄清。他对当地民众说：“此非曾中堂所致贵国之书，不过或有人曾见此书，因而传录之耳。其是否真伪，要不可知。但以事理揆之，曾中堂必不有此言。今星使东来，方讲修睦，传闻之语，置之勿论可也。”于是，“浮议始息”。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王韬的欧洲之行是一件极富历史意义的大事。在此之前，中国虽有一二沿海商人去过欧洲，但大都属“落魄商贾”，不知诗书，对中国思想界几乎不曾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的文化人，包括林则徐、魏源等思想精英，对“域外”的西方事物的了解还都处在隔雾看花的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大多数人是通过传教士只鳞半爪的报告来认识中国的，因此对他们来说，遥远的东方依然是一片不可捉摸的神秘之地。许多莫名的厌恶和仇恨正是在互不了解的误会之中产生的。王韬的欧洲之行为结束东西方这种相互隔阂、相互仇恨的可悲局面，为中国人了解世界并使世界了解中国开启了先河。

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一角度说，王韬的欧洲之行是中国文化知识精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对欧洲的实地考察。王韬是1867年出发前往欧洲的，在此前一年，中国有总理衙门的满人斌椿父子随同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前往欧洲游历。但斌椿为官派，且在英国官方色彩相当浓厚的赫德督率之下，活动不自由，所言所行极其谨慎。又由于游历国家太多，且前后只有五个多月的时间，斌椿一行对所经之国也只能作走马观花式的浮泛了解。王韬则不然，他是通过民间渠道赴欧洲的，不仅无所谓“官纪”束缚，而且在英国居住游历达两年半之久，其见闻自然比斌椿一行要广泛而深入，斌椿的游历笔记《乘槎笔记》大多是对西洋事物的表面现象的勾勒，而王韬的笔记《漫游随录》则能透过现象触及到事物的根本。前面曾述及，王韬在描述西方制造之精时笔锋进而触及西方的文化科学教育以及经济与政治制度。斌椿是不可能达到这一深度的。再如，对西方民情风俗的考察，也是斌椿一行力不能及的。王韬《漫游随录》中有不少对英国婚姻恋爱、乡村民风的记载：

遇一男一女，晨去暮返，亦必同车。彼此相谗，疑其必系夫妇，询之，则曰，非也，乃相悦而未成婚者，约同游一月后，始告诸亲而合焉。

每莅访友人之舍，悉皆倒屣相近，逢迎恐后。名媛幼妇，即于初见之顷，亦不相避。食则并席，出则同车，觥筹相酬，履舄交错，不以为嫌也。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秉德怀贞，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48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29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00页。

知书守礼，其谨严自好，固又毫不可以犯于也。

有金亚尔乡，民秀而良，秋冬农事之暇；多喜读书讲理。近日众人各募资创建书院，度藏典籍，有志之士均可入院借观。所藏分内、外二室。外室者准其携取出外，书名于册，按期交纳。

偕德臣观团丁于海滨演炮。其法以废船置海中，上张旗帜……而后击之，观其中否。其炮度之高下，铅丸之大小，药料之重轻，皆有一定准则。月凡四举，伊犁绅士董其事，而兵官来教之习演。此民间于晏安之际，武备不弛，先事讲求之一道也。伊犁虽弹丸黑子，而海防之谨严犹如此，他可知矣。赋椿的《乘搓笔记》对此就只能付之厥如了。

在王韬赴欧之后，清朝还派遣过一个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团前往欧洲游历，其效果与斌椿、赫德一行大同小异。清政府直到 1875 年才正式委派郭嵩焘为中国驻欧公使、陈兰彬为中国驻美国兼驻西班牙、秘鲁大使，其时离王韬赴欧已有 8 年之久。郭、陈二人均尊王韬为中国的“欧洲通”，临行前特赴香港拜见王韬，了解海外情形。

从世界了解中国这一角度说，王韬的欧洲之行更是一项历史壮举。中国秀才旅居欧洲翻译中国经典，并在欧洲大学讲坛上宣讲儒家文化，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更富意义的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活的载体，王韬本人也以其可见可感的形象和举止向西方社会传递了中国文化的信息。在王韬旅行欧洲的那个年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许多西方人从没见过中国人是什么模样。王韬在英国乡间行走时，居然会出现“男妇聚观者塞途，随其后者辄数百人，啧啧叹异，巡丁恐其惊远客也，辄随地弹压”的情形。甚至有一次在阿贝丁的街道上，王韬被人误认为是“Chinese Lady”，是另一位同行华人华侨商人詹五的“Wife”。这种状况是无法让西方人正确看待中国文化和理解中国人的。王韬在欧洲各处的长期居住和旅行为民间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比如，他在马赛时，有一次“偶入一馆沽饮”，馆内女侍未见过中国人，“咸来围观问讯”。当她们获知是从中国来的文人时，极感兴奋，对王韬“衣服丽都”也“啧啧称羨，几欲解而观之”。在伦敦，有一照相师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坚邀王韬摄影留念，王韬慨然允诺，“既成，悬之阁中”。伦敦还有一位叫华禄的“牧师之巨擘”欲询中华之近事，“以扩见闻而增识力”。王韬在理雅各和刚巧在英国度假的慕维廉陪同下“往宴其家”，为他全面介绍中国文化和民情风俗。王韬曾多次到伦敦附近的“玻璃巨室”（Crystal Palace）去参观，与沿途某小站上的卖酒女郎相熟悉，该女郎每逢王韬到来，“必琐琐问华事”，王韬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之解答。王韬也从女郎父亲那里了解到火车在英国诞生和发展的曲折历史。

在旅英的后半段时间里，王韬在英国已经是小有知名度的人物了。社会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 126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 135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 130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 133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82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98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 152 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 116 页。

团体、民间集会不时邀请他莅临演讲。平时英人索题中国字、请吟中国诗之事更是常有发生。甚至当地报纸也将其事迹行踪刊入新闻。所有这些显然都大大有利于西方人士对中国人及其文化的了解。王韬对此曾不无自豪他说：“黄霁亭太史于余将作欧洲之游，特书‘吾道其西’四字为赠，虽不敢当，抑庶几焉”。

王韬在英国共度过两年零四个月，长时间地孤身在外做客，不免产生一些“殊方花月离人泪，异国衣冠独客身”的愁绪。他思家心切，无法安心再在英国居住下去。刚好此时理雅各接到香港英华书院来信，“促其言旋重主讲席”。于是王韬便与理雅各联袂在1870年1月5日起程离开杜拉，转道伦敦、巴黎回返香港。在伦敦，他为进一步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将所携一万一千卷中国书籍赠给大英博物馆。伦敦文化界对王韬

此举“无不同声嘉叹”。在巴黎，他拜访了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儒连博士(Std, nislal Lulien)，与他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切磋翻译技巧。王韬对儒连的印象极深，后来在他准备撰写有关西北史地和法国历史著作时，还特地致信儒连，邀请合作，可惜其时儒连已经去世了。王韬对此甚觉遗憾，特作《法国儒莲传》一篇以为纪念。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46页。

王韬《弢园尺牘》，卷八，“代上丁中丞书”内有“曾观书于英京太学，及其归也，以所携书万一千卷置之博物院中，大学诸儒无不同声嘉叹”之记。但据BE-tweenTxaditiondndMODernltv—书作者PauIA.Cohen教授说，他曾去信大英博物馆查询；结果证实大英博物馆的捐赠档案里只记有“从王韬处得到203本共712卷中国书，价值65.10镑。”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87页说他与儒连见面于他赴英途中。但据王韬：《弢园尺牘》，卷七，“与法国儒连学士”、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法国儒莲传》等考证，两人见面时间应是1870年王韬返程之时。PauIA.Cohen教授注意到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析平根据《漫游随录》所记，在其著作《王韬评传》中仍认为两人见面于王韬赴英途中，似有不确。

三、“天下观”的重新构筑

美国汉学大师费正盾(John K. Fairbank)在论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世界的总体认识时曾说：“在对外关系方面，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围非中国人的关系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中国这个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于中国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早期的历史学家就提出了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据认为，地理距离越大的外围蛮夷与皇帝的关系也就越淡，但不管怎样，他们仍得臣属于皇帝，和中国皇帝只能保持藩属关系。这种观点虽然不时受到重创，但一直延续了下来”。验之中国士大夫有关中外关系的言论，这位洋汉学家的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宋代文人石介在《中国论》中曾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差不多与王韬同时的清代士大夫王炳燮在《毋自欺室文集》中也说道：“夫大地以中原为正中，阴阳之和会，最得五行之全，自古神圣皆成此地，此外四裔皆荒昧……大地自古及今皆以中夏数千里为正位，试观天星分野独应中国，即其明验矣。”王韬早年继承的正是这种同心圆式的“天下观”。

自“佣书西舍”起，在西方传教士的多年持续不断地影响下，王韬唯我独尊的天下观逐渐得到修正，不再把西方各国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夷狄之邦”，认为他们亦有可学之处。但他还没有认识到世界是由许多民族国家组成的多元结构。欧洲之行让王韬亲眼目睹了世界格局的真实面貌，促使他彻底抛弃孤陋不堪的一元天下观，而重新构筑符合实际的多元世界观。

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优于一切其他文化、中国文化是一切其他文化源泉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假设之上的。可王韬在旅行欧洲期间的所见所闻不仅没有证明这种假设，却反而说明西方文化同样有其卓越的成就，其诗书礼乐、道德人心自有其不依附于中国文化的“别一世宙”。他在《漫游随录》中记录道：

英国风俗醇厚，物产善庶。豪富之家，费广用奢；而贫寒之户，勤工力作。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惰之民。尤可羨者，人知逊让，心多惠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异域客民旅居其地者，从无受欺被诈，恒见亲爱，绝少猜嫌。无论中土，外邦之风俗尚有如此者，吾见亦罕矣。

都中（指伦敦）藏书之库林立，咸许人入而览观。有典籍院，中贮四海各邦之书，卷帙浩繁，简编新洁，异册名篇，分储于架阁。玉轴牙签，锦函锦帙，望之如城……都中人士，无论贫官，入而披览诵读者，日有数百人。

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石介：《徂菜石先生文集》，卷十。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三。见台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4辑，第127—128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07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13页。

埃丁作为北方一大都会，居民二十余万……远人之至其地者，无不竞相延接，雅意殷勤。关无讥察之烦，吏无诘诃之扰，从无以异服异言而疑其为充为愚者。入其境，市不二价，路不拾遗，是足以见其宽大之政、升平之治矣。在这样的西国实情面前，那种视西方各国为“化外之邦”，认为西方人“大羊成性”、只知“图利”、“尚力”、“尚机诈”的观念不攻自破。

王韬甚至注意到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中国文化，他说，泰西文教学用结合，远非中国空疏之学所能比拟。如英国大学考试“所考非止一材一艺已也，历算、兵法、天文、地理、书画、音乐，又有专习各国之语言文字者。如此，庶非囿于一隅者可比。故英国学问之士，俱有实际；其所习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事实是促使思想转化的最有力的杠杆。王韬头脑中残余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在此之上的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在现实对照下急速崩解。一个新的世界观在它的废墟上被构筑起来。王韬重新构筑的世界观是一个多元结构的认识世界的体系。它承认西方各国是超越中国皇权之外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承认西方文化是不依附于儒家文化的文明存在。东方与西方，虽然有“以政统教”和“以教统政”的区别，但两者都“必归本于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在人类社会走向大同的过程中，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承认西方也有圣人，承认世界为多元结构，这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种“观念革命”。在一元的世界观念下，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Interclass Relation），中国对外关系被匡限在上对下的家长式的模式里，不是大张挞伐，就是册封赐恩。多元的世界观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是上对下惩罚与赐恩或下对上的反叛与归顺的关系，而是对手之间的竞争关系。王韬喜欢把十九世纪的国际格局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其潜台词显然是：在名分上，如今的世界各国也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一样已没有内外高下、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竞争对手；国际间不存在超国家、超物质的义礼束缚，准能率先富强，谁就有资格立足于世界。

承认国际多元竞争、把肚界格局比作春秋战国之局，还意味着对传统“尚德不尚力”和“尊王贬霸”学说的修正。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家尽管在许多实际做法上并不排斥“力”的运用，但价值观上总觉得“德”与“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德”是高一级的根本的东西，“力”则是低一级的非根本的东西；柔性的“德”可以克刚性的“力”，刚性的“力”则不能克柔性的“德”。孟子曾把“力”分为有德之力的“王道”和无德之力的“霸道”，认为只有“王道”才能战胜“霸道”，行之久远。孟子的观点抑制了后代思想家对物质性的“力”的推崇与追求。王韬以春秋战国比喻现实世界，而春秋战国的最终结局是并没有什么“德”的秦消灭了群雄，一统字内，这自然隐含着对“力”的承认。

王韬从没公开否定过孟子“尊王贬霸”的观点，在谴责和警告西方侵略中国之时，他甚至以孟子的学说为武器，声称无德之暴力必然不能长久。但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25页。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98页。

是，在更多场合，特别是在谈及中国自强御侮主题时，王韬最为强调的是“力”。他宣称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力”的竞争。义理不过“徒为具文”。1874年，在中日为琉球归属问题争持不下之际，王韬直言不讳地指出所谓国际公理的不可靠性。他写道：

呜呼！海外万国，星罗棋布，各谋其私，大制小，强陵弱，夺人之国，伐人之君，无处无之，虽有公法，徒为具文。

今日之事，非可以口舌争，亦岂能以笔墨战。我中国亦惟有内求诸己矣。夫中国非小弱也，乃至今日，狡焉逞者，何国蔑有，时挟其所长以凌侮我，而恫喝我，跋扈飞扬，已非一日……志者于此，蒿目时艰，眷怀大局，未尝不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卧薪尝胆之不暇；是惟有奋发有力，亟图自强计。

峰回路转，水到渠成，从承认西方各国同为平等的独立国家实体、西方文化同为有价值的文明存在，到推崇多元竞争中的“力”，王韬新型的世界观最后自然而然地归结到变法自强思想上来。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琉事不足辨”。

四、对世界史志的研究

象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王韬对历史研究具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王韬与前者所不同的是：前者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古代历史方面，且具有强烈的地域中心主义倾向和华尊夷卑心态，其研究历史的动机往往在于宣扬中国昔日的圣治武功，从而在夷势陡张的近代形势下平衡一点心理上的偏歪；王韬则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西方历史特别是当代西方历史之上，有意识地割断了文化中心主义和地域中心主义与研究对象的连接韧带，其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期望用西方历史比出中国的差距，借西方社会的突飞猛进来刺激中国人发奋振作，变法图强。

王韬对西方历史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上海时期，他就留心西方历史的发展情形。后来的欧洲之行又大大开拓了他的眼界。泰西各国的“飙车电驭，逐日而驰，火舰风轮，冲波直上，奇技异巧，格致气机，殆不可以俚指数”的生气勃勃景象令他惊叹不已。可反观中国，则依然是封闭保守的落后现状。因此，他深感有必要把外国的政治、历史、疆域、科学技术、风俗等介绍到中国来，以开阔国人的认识天地。

据王韬所留下的文字材料统计，王韬以西方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不下九种，有《美利坚志》、《俄志》、《法兰西志》、《西古史》、《西事凡》、《西学原始考》、《四溟补乘》、《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弢园著述总目》收录了后五种的目录与内容提要。从《弢园著述总目》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充满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历史的“发功点”在于现实。王韬在《四溟补乘》内容简介中写道：

近日泰西通商，各处谈海外掌故者，如慕维廉之《地理全志》，玛吉士之《地理备考》，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生司马之《海国图志》；最后出者为日本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丰顺丁雨生尚书亦有

《地球图说》之作，乃从美国本译出，惜译者未得其人，尚俟采辑，始得成朽。是书搜罗宏富，详于近而略于远，于近四十年来所有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更革诸大端，无不一一备载；凡有关于中外交涉者，尤再三致意焉。

王韬尺牍中也有反映《四溟补乘》内容和王韬写作动机的文字，《复盛杏荪观察》一函说：“凡欲稔知洋务音，一展卷间即可了如指掌，此韬生平精力所萃，或谓为投时之利器，谈今之要帙。”

在上述历史著作中，王韬最为看重，认为必传于后世、而也确实传下来的是《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两书。

《普法战纪》是王韬为回应时事而撰述的当代国际战争史。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作为强国的法国几乎是在数月之间彻底崩溃，一蹶不振；而原先在国际舞台上默默无闻的普鲁士却所向披靡，直入法国都城之下。此一战争结果震动世界，也使王韬且惊且惑。不久前，他还在法国都城巴黎观光，惊叹法国“宫室之雄丽，隆市之殷闾，人民之富庶，兵甲之强盛”，转眼之间便山河破碎，面目全非。为了探讨此一强弱变化的内在原因，他把所有在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六。

香港所能收集到的相关资料集中起来进行研究。《普法战纪》正是他的这一研究成果。

王韬倾注了大量精力在《普法战纪》的撰写上。在精通外语的朋友张芝轩、陈霭廷两人的大力帮助下，他每日“午夜一灯，迅笔瞑写”。写成一篇，辄先送往香港《华字日报》连载。战争未及结束，他的文稿已经“筐箱为满”。战争结束后，他将这些文稿汇集补充，编纂成十四卷本的《普法战纪》著作。1886年，他又在十四卷本的基础上，补入初编时遗漏的英国邮报和不曾注意到的普、法军队随营记录、各国撰述及评论以及他自己的见闻与述评，扩为二十卷本。

《普法战纪》不仅仅是对战争进程的描述。它涉及普、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民情各个方面。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如巴黎公社、马塞曲、议会君主制、气球侦察、360度转炮、行军地图等，无所不有。更为重要的是，王韬在著作中以夹叙夹议的笔法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了画龙点睛地评点，使人读后深受启迪，获益良多。比如，他在讲及法国拿破仑第三“师丹之败”时分析说，法国的失败和普鲁士的胜利是两国制度优劣、民心向背的反映：普鲁士由于实行“议会君主制”，人民可以通过议院获得进言间政机会，君民无上下之隔，有同仇敌汽之心，所以能够所向皆捷。而法国此时废除共和制而采帝制，法国人民不满拿破仑第三的专制统治，人心涣散，所以落得兵败被掳毫不奇怪。

《法国志略》是王韬积多年之功而完成的。它最初为十四卷本，书名为《法国图说》，是在江苏巡抚丁日昌所编译的《地球图说》基础上“增辑史事，哀益近闻”之后而成的。王韬在《法国图说》初本序言中叙述他从事编纂该书的经过说，同治九年（1870年）春天，丁日昌将《地球图说》邮寄香港，请王韬审订。王韬觉得“其书自米利亚人（即美国人）原本译出，识小略大，多所遗漏，遣词命句未极雅驯”，因而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为之“甄削繁要，区分体例，增损改置，条条件分”。经过王韬手订过的著作面目顿新，“其问改析原书者六卷，首为法兰西总志三卷，次为法京巴黎志一卷，又次为法兰西郡邑志二卷。此外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益以广述八卷：首为法英婚盟和战记二卷，次为拿破仑第三用兵记二卷，次为普法战纪三卷，又次为琐载一卷。”《法国图说》正式定名为《法国志略》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大略在王韬访问过日本以后，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间。因为，《法国志略》所增补的内容有不少得自日本史家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和冈千仞的《法兰西志》。这些书是他在访日活动中才接触到的。到1890年，法国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王韬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也更加丰富，除了日本学者的最新翻译著作，江南制造局编刊的《西国近事汇编》、英美传教士的私人著述、在华中外文报纸均有不少关于法国历史与现实的叙述。于是他又将《法国志略》扩增为二十四卷本的《重订法国志略》。这是目前国内所最常见的一种版本。

《法国志略》所涉及的西方事物比《普法战纪》更广泛，所作考察更系统全面，分析也更深入细致。如王韬在这部著作中将西方各国的政体分为“君

《普法战纪》初版于1873年，为14卷本。第二、第三版分别刊于1886年和1895年，均为20卷本，内容基本上无出入。另日本军部1878年曾予以翻印；1887年日本大阪又曾再版。

王韬：《弢园丈录外编》，卷八，“法国图说序”。

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三种，然后仔细比较它们的优劣，他认为“归立法之权于国会、统行政之权于君相”的君民共主政体是最理想的政体，可使国家“上下权限划一”，人民“得以人尽其分”；而一人独专于上的君主专制政体则是天下最恶之政体，其必然造成君民相隔，国力涣散。没有对欧洲各国历史的广泛研究和深入思考，这样的比较和最后论断是做不出来的。

王韬之所以不惜花费那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编撰外国史志著作，完全出自于他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动机。从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明代中叶中西初次相遇算起，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已经与西方打了近三百年的交道；若从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布道算起，中国与西方已经有六、七十年的交往；即便是从五口正式通商算起，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亦有三十年的历史。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对西方各国的真实情况却知之甚少。以法国而言，中国虽然与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过四年仗，但直到1870年“天津教案”案发之时，中国的封建大吏们甚至还弄不清法国到底处在地球的哪一块地方。开明如丁日昌者，这时也才开始从美国传教士的著作中翻阅有关法国的“图说”。至于一般的士农工商，对法国就更觉隔膜了。因为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与外部世界的实际接触，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渠道只能凭借间接的书本知识，而自明代以来中国有关西方的文字材料又是那样的稀少和支离破碎。王韬曾经描述这种状况说：

海外舆图，详者实罕。汉、唐以来，声教渐讫，然自葱岭之北，身毒而西，珥笔所及，即多茫昧。有明中叶，欧境始通，于是《职方外纪》、《坤舆全图》相继并兴，颇称征实。此外非无纂辑，而非琐屑小言，即荒诞不可致诘耳。逮夫近代，光气大开，琛賁远来，梯航毕集，名硕留心于掌故，西儒喜述其见闻；因是徐君松龛辑《瀛环志略》，魏君默深著《海国图志》，而西洋玛吉士则有《地理考》，英国慕维廉则有《地理全志》、《英志》，合众稗治文则有《联邦志略》……然间尝得其书而遍读之矣，大批玛氏三子所作，则失之俚，去华存实，质而不文，其甚者述今稽古，俱乏新知，隶事分门，如出一辙，记一国市半篇可了，阅千载可数事仅传，国都之外，莫著名城，邦君以降，罔闻人物；表政治则不系废兴，志疆域则不详沿革，系谱糕则不溯渊源；疏略如斯，不无缺憾。在《重订法国志略》序言中他又借用日本学者的话描述道：

日人木原元礼曰：“古正史立外国传叙事多孟琅，详内而略外，殊方异族不屑悉心为之考核。方令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挚持之事，则又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余（王韬自称）谓木原节夫斥昔日史官之陋，其说诚是也。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俏也。”

所以王韬希望以编纂刊行西方历史著作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从而打破中国官民“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第拘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代上丁中丞书”。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光绪十五年己丑，弢园老民校刊本）。

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封闭状态。这是王韬矢志于撰述外国历史的第一个社会动机。

其次，王韬期望通过对外国史志的介绍，以针贬中国现实，刺激国人发奋进取，改革图强。这一点从《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的内容选择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两书都具有“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的特点，主要笔墨被放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历史上，涉及到欧洲各国的内阁、国会、刑律、邮政、商务、税务、国债、专利、银行、学校、文化学术、宗教、兵制、路政、水利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正是当时对中国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更耐人寻味的是，王韬在行文之中还常常有意将西方之事与中国之事进行比较，借西方之史，言中国之弊，褒贬抑扬，直抒己见，尽情发挥。比如，在述及法国大革命时他指出，在大革命中法国人民敢于明目张胆地“弑君”，其祸之由来在于法王“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此一现象实际上也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病症，因而王韬提醒“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又如，他在述及资产阶级刑律制度时写道：“西律之最善者，在于设立证人。两造是非必待证人以决之；又必众议咸同，案情至于万无可疑，然后定讞。中国上古所云：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西国颇有此风，故从无仇家诬陷，以至冤不能明。徒流而外，无劓墨贯耳刚足诸刑，但有监禁而已，罪止及身，父子兄弟从不相及，即至叛逆大恶，其人但加显戮而已，妻孥不问也。亲戚邻里绝无株连波及之累，犯罪者没则已焉，无所谓身后之刑，故于中国之夷三族及开棺戮尸，皆相戒以为残忍。此则犹有古昔之遗风、圣王之盛德欤！”直接了当地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说出西方在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政治领域优于中国，标志着对保守主义传统的大胆挑战。它下面的逻辑结论是：西方不仅在器物方面优于中国，而且在制度方面也优于中国；器物的进步必须与制度的进步同步发展，中国要想学习西方，就不能仅学其器物，而是要同时学习借鉴器物与制度两个层面。保守主义的“体用观”在这里也遭到否定。

王韬还试图通过对西方国家强弱盛衰变化原因的探讨，鼓舞起国人追赶强国，最终战胜强国的信心。王韬认为，法国是欧洲的至强之邦；而普鲁士与法国相比则是“大小强弱迥不相侔”。但后者一旦发奋图强，政治上改行“议会君主制”，消除上下之隔阂；经济上注重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军事上革新战略，改良武器，便迅速由弱转强，“其所至辄捷，几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中国也属弱国，可比当年的普鲁士要地广材众。至弱之普鲁士尚能打败至强之法国，条件远比普鲁士有利的中国自然也有战胜西方强国的可能性。王韬断言，只要中国变法进取，用人得当，就一定能象普鲁士那样，脱离贫弱，跻入世界强盛民族之林。他在《普法战纪》代序的最后一段写道：“中国之兴，沛然天下莫之能御。普之强，云乎哉！因序《普法战纪》，纵论之如此。有心人当不河汉斯言。”

第三，王韬期望通过对欧洲历史的编撰，创造一种新的揉合中西史学风

王韬：《弢园尺牋》，卷八，“代上丁中丞书”。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波旁氏纪”。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三，“前加颁的氏纪”。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七，“志刑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

格的史学体例。王韬认为，中西史学都有他们自己的缺陷，“欧西各国，素无史职，记载阙如，近代始有私史，其搜罗佚事，网举旧闻，大半出自教士之手，其书又不谙体例，详略失当”，往往“惟记国俗、輿地、物产而又事实未备”；中国史书则“原以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天地变异，而国势民情略焉不讲”，不若“西史则间及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其原始，以觐人材之进步，制作之源流焉，此亦记载之所不可废也”。因此，他力图以史学领域的实际编撰活动，来改变东西方史学各“失之一偏”的现状。他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的确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它揉合了中西史学的体例和风格，既避开中国传统的“皇家史学”的旧辙，也纠正了西方教士所编史学著作纲目不清、杂乱零碎的弊病。在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写“民史”的理论产生前，王韬的史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君史”朝“民史”的方向拉近了一大步。

《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新纪元。《普法战纪》是近代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以当代欧洲历史事件为具体研究对象的著作。它第一次以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某一历史事件放到世界范围中去考察，找到了国际战争胜败所致的内外之源；它第一次指出不但欧洲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牵动的整体，而且欧洲局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法国志略》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有关西方国家的国别史著作。它第一次将西方大国的名号、统系、职官、国用、税务、国债、银行、商务、国会、人口、礼俗、学校、学术、教会、兵制、路政、邮政、刑律、水利等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第一次在欧洲各国政体之间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比较出“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的优劣；第一次把正统历史的触角下及到民间发明创造和间巷琐事……所有这些“第一”加起来，意味着王韬已经开始与中国传统史学分道扬镳。一种新型史学正在形成之中。

《普法战纪》与《法国志略》在文字风格上也别具风韵。它一反古代文坛追求骈俪和华美词藻的陈腐之风，行文用字带有朴实、清新、明快的特点，这反映了王韬一以贯之的文艺思想，他曾说：“著书在通时适用而已，文词其未也。晚近文人，动矜奥博，而宣尼辞达之旨亡。著书之意亦晦。”

王韬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特别是《普法战纪》一书，使王韬名声轰动遐迩，“其书虽未付手民，而钞本流传南北殆遍”。文武大员对之赞不绝口，曾国藩称王韬为“未易之才”；李鸿章“许以识议阔远，目之为佳士”；丁日昌“则谓具有史笔，能兼才、识、学三者”。书成刊行之后，文人学士更是争欲一览，趋之若鹜。直到90年代，《普法战纪》以及《法国志略》对中国社会的轰动效应仍然经久不衰。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和《史学书目提要》中对王韬的史学著作加以大力推荐。唐才常在《湘学报》史学专栏中，更将《法国志略》与黄遵宪的优秀史著《日本国志》一起作为必读之书介绍给广大读者。戊戌改良运动的发动者们，试图以王氏史书对国势、政体、民情、科学技术等时代焦点问题的强烈关怀，来引发广大国人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从而促进中国改革运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与郑陶斋观察”。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

动的早日到来。

王韬的史著在海外也引起极大回响，其中以《普法战纪》在日本引起的轰动最为明显。当时，日本正值开放之初，日本知识分子们急于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情况，可国内一时又缺乏这方面的著作。于是，王韬的《普法战纪》便被日本学界视为瑰宝而加以推崇介绍。明治政府军部也认为所述欧事条理分明，识见宏远，有必要让日本朝野研读了解，便在1878年全文翻印了《普法战纪》颁行全国。此后，加上从香港和上海流入的中国版《普法战纪》及日本军部的第二次翻版，日本社会形成一个不小的“《普法战纪》热”。王韬或王紫诠在日本军学两界几乎变为无人不晓的名字。日本学者冈千仍叙述道：“《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诠王先生，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力当世伟入矣”。其他许多与冈千仍同时代的日本学者也都曾在其著作中提及王韬或他的著作《普法战纪》。如果说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化有过什么积极的正面贡献的话，那么最大的恐怕非王韬的《普法战纪》莫属。它在引导日本学界研究西方，启迪日本民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见粟本锄云：《匏庵遗稿》。

王韬：《扶桑游记》，“冈千仞跋”。

五、包含新内容的循环历史观

大概是由于农业社会太偏重自然直观、大注意自然界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喜欢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圆周，认为天下所有事情都是盛衰相依的，都是“日中则浸、月盈则亏”的，都处于圆环中的某一变化着的位置之上。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虽然关于变化的思想异常丰富，但进化或进步的概念实属少见，实际上，古代思想家既然把遥远的人类之初或“三代”确定为理想社会的起点，那么人类社会的“变”也就只能是“越变越坏”。

古代循环史观的奠基者是《易经》，《易经》中有“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衰相继”、“刚柔相克”等天道循环概念。宋儒邵雍对《易经》循环观念加以发挥，他依据有秩序的时间变化概念，以一年里年、月、日、时四种数字为基数创立了“运会说”。这种“运会说”假定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世、运、会、元之间推行运作，交替循环，从而构成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

王韬来自于传统，因而免不了受到古代循环史观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有大量的这一方面的内容。略举数例如下：

闲尝笑邵康节（即邵雍）元会运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则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

未有物极而不反者也。呜呼！不以大德宰之，元气安能久长也哉。曩者欧洲诸邦，两国用兵，仅以万计，国中兵额亦仅数万，后则出师渐至数万，额兵渐至数十万，然拿破伦之战称为古今所仅见者，诸国之兵亦只有十五六万而已，以视今日，殆不及十之一也。故以今日大势拱之，人但见其事事讲求，物物精审，似若雄视一切，不可限量，而不知智巧愈极，机诈愈深，情伪相感，利害相攻，祸患之来，气机已召，人皆谓其强之至者，吾正谓其衰始；即彼自以为远胜千古者，而残杀之惨，吾正谓其远不古若，盖徒讲武备，尚兵力，刻鹄奋厉，以相倾轧而慑制，则必有一蹶者矣……天道循环断不或爽。然而，细心研究王韬的“循环说”或“运会说”便可发现，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带有强烈宿命论色彩的历史哲学了。它扬弃了其中保守的宿命论内核，而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

首先，王韬循环说的重点是“变”，而非注定的未来结果。他宣称“天道循环、运会迭乘”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属性，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它的发生。因此，所谓“循环”一词，不过是被王韬借来强调顺应历史潮流而变法图强的古老哲学语言而已。他曾经这样写道：“然而强弱之势已形见者，何哉？则时为之也，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由是观之，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樱。明者知者知其然矣。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卷十一；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九，第5—6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后序”。

子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特别对封建顽固派利用古老的“循环说”主张静守天道、反对变革的一孔之见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这些人机械地理解强弱变化之道，盲目地根据中国古代夷狄一入中国就“渐至萎靡不振”的历史“故事”，大喊大嚷“至弱驭至强，至柔服至刚，道之至也，何必用彼以变我”，是“未明天道之所当然，人事之所以然也”。他说，柔克刚、弱克强是通过主体的“善变”实现的，而不是静坐等来的，“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无他，在一变而已”。从王韬的这些言论可以明显地看出，王韬的思考中心，他的真正命意所在，不是“天道”本身，而是变法图强。

其次，王韬的循环说尤其注重“人”的作用。传统的循环观把世界格局或历史发展看成是上天注定的和不可更改的；它把天道、天命放在十分崇高而又神秘莫测的地位，不相信人可以把握它、利用它、改变它，以为人在天道推移的过程中不过是听天由命的陪衬物而已。这无疑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体影响历史进程的活动空间。王韬的循环说与此不同，它高扬人的力量和精神，宣称人在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可以把握运会、左右历史的发展状况。他写道：

国家之兴，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是不徒在土字之广，甲兵之强，士民之众也，在乎得人而已，昔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夏少康以一成一旅之师，朝诸侯而有天下；秦始则以关中一隅之地而灭六国……普之于法，其始大小迥不相侔。普中欧洲而立国，西有法而东有俄，皆强邻也；曩者为法所制，几于半步不可复西。一旦发奋为雄，摧陷剔攘，飀驰电扫，鸿功骏烈，前无往古，后无来今。呜呼！岂不伟哉……而揆其所以致此者，则由于有傅思麦以为之相，世子郡王以为之将，毛奇以为之谋主，乐尚书以为之转运，士颠密士、福坚士、田蛮雕、飞窝得以为之折冲行阵……臣民戮力，士卒效命，以兴此小邦普。谓非得人之效哉？是故，有国家者得人则兴，失人则亡，得人则弱可以为强，小可以为大。王韬对普法战争胜负原因的分析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循环说所强调的重点。在《普法战纪》中他还更明确断称法国的失败不是由于天命注定，而是由于人谋不臧，“未可遂以天命而自诿也”。他甚至有关评论中说出人事亦天道的的话，他说：“人才关于国运岂偶然哉，普王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用能激发义愤，恢复旧业，斯亦天道循环、理无或爽也”。显然，在王韬的循环观里，天命、天道都变成了人事可以左右的“从动者”；天道循环变成了人事的循环；人的努力变成了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力量。邵雍的命定运会说已经被王韬改造成具有进化论因素的新循环说。

第三，王韬从来不受循环一词本身的束缚，而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应时制宜，因地制宜，随机“活用”。当他站在被欺侮的弱国立场上谴责强国暴力侵略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盛极而衰，此其变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魄，此理之常，法奈何不悟哉！……法通中国已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

王韬：《普法战纪》，卷八，第十八页（光绪十二年丙午，弢园王氏本）。

王韬：《普法战纪》，卷二，第二十七页。

三百余年，于泰西诸国为独先，名流硕彦接踵东来，无非借天算格致以阴行其主教……流弊至今，亦缓通商而急传教，中外龃龉之端率由此起……法不自知而尚欲强行之于人国，不亦慎乎！

恃强以凌弱，虽享有不同，时有久暂，而其卒底于灭亡者固亘古如一辙也。当他面对国人自强信心不足的问题时，他的循环说似乎稍有调整。他写道：

中国有时而弱，然弱亦足久存，中回来常无衰，然衰要有终极……一旦圣君应运而兴，贤臣相辅为理，励精图治，上邀天眷，下顺輿情，刚强者亦将失其强，而尊卑以明矣，势无眩而不平，道无往而不复，观诸上古之迹，验诸近令之事，当不河汉斯言。而当他批判保守分子冥顽不灵、呼吁实行改革的时候，他又改变强调重点，写出下面这样的话：

天心变则人事不得不变，读《明夷待访录》一书，古人若先有以见及之者。穷则变，变则通，自强之道在是，非青中国而夷狄之也。统地球之南朔东西将合而为一，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吾恐不待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而后吾言乃验。呜呼，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而强，足与诸西国抗……所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变之道也。如果说第一段文字是用循环说道出了民族主义内容的话，那么第二段文字反映了乐观主义，第三段文字则引出了进化论的内核。指涉不同的三段文字共处于王韬著作之中，正说明循环说只是被王韬当作一种实用工具，用来服务于提出各种理论或主张。他是一个十分注重实际功利的思想家，从来没有被理论上的教条框限在固定的范围之内。

第四，王韬循环说的终极社会具有鲜明的近代内容。传统形态的循环理论的终极理想社会不外是“三王之治”或“天下大同”。按照儒家思想家的描绘，在这种终极理想社会里，选贤兴能、道不拾遗、人无私产等等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论是“三王之治”，还是“天下大同”，其社会的基本特征却仍然是农业社会的自然主义和地域主义。王韬的循环说则不同，其终极理想虽仍借用“三代”或“大同”来概括，但它是实现了“万国相通”和“工商为本”的社会。他写道：

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我中国既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令者，势也……天开泰西诸国之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做我之所无，……此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擢，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此皆一变之机也。

从社会形态上看，这已不是小国寡民式的原始农业社会，而是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社会。王韬已经把循环说的旧内容掏空，塞进了新鲜的近代内容。这种被赋予了崭新内容的循环说对推动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法国图说》序”。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中国自有常尊”。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答包苻洲明经”。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疑会产生积极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历史规律与人的创造一直是一对令人困惑的矛盾。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经写道：“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王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虽然还没有达到马克思那种历史哲学的高度，但也确实包含着对历史条件与社会主体、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相互关系的辩证思考。王韬的运会、世运、循环等概念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趋势或历史进程概念。王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在十九世纪“万国相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挑战，这是“运会”对中国人的挑战。在此“运会”面前，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是可以通过人的奋斗予以改变的。中国人只要抓住机会，自强更新，励精图治，就一定能变弱力强，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王韬的循环说，夏良才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王韬的循环论是有特定含义的，这就是指世道盛衰的交织更迭，其终局不是周而复始，而是‘齐强弱、无大小，归于大同’。王韬的循环论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变’字，并且强调在世道盛衰的变化中，‘事在人为’的巨大作用……由此可知，王韬的循环论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变法论。”此话去雾破障，极有见地，只是还要补充一句：“事在人为”的“变法论”又实实在在地是进化论，它是以承认“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自然原则为基本前提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1975年，人民出版社）。

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等人著作时，就常常将原文中的“社会发展”或“文化进程”译为“世运”、“教化世运”或“运会”。参见张荣华：《严复的“运会”说与文化观》，《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六、办报实践与新闻理论

王韬办报得自于西方报业的启发。在旅行欧洲和研究西方人文历史的过程中，王韬逐步认识到西方国家制造之精、制度之美、民风之好是与西方社会的舆论公开、信息开放、报刊传播媒体的发达互为因果的。他在评估泰西报纸的社会作用时写道：“日报之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因此，他认为学西方不仅要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典章制度，还要着手象西方那样为富强活动开拓出一个信息灵通、舆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这样，富强活动才能成为举国关心和不可阻遏的成功之业。有鉴于此，他于1874年2月4日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

王韬选择办报作为自己的第一职业还有其特殊的个人背景。对他来说，办报虽然是一行新鲜职业，但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事情。早在上海时期，他就接触到印刷和出版事务。墨海书馆本身就是一个印书局，属英国《字林西报》的附属机构。他的雇主麦都思还是中国境内早期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的创办人。王韬在墨海书馆的工作，除了佐译圣经以外，就是负责出版文字的校对和发送《遐迩贯珍》。香港的英华书院也是一个学校兼印书局的二合一机构，理雅各本人也兼有伦敦布道会出版局监督的头衔。王韬在与理雅各共事的近十年的时间里，对出版编辑工作自然十分熟悉。他自己在1864年前后兼任《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的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更直接地为他办报积累了经验。此后他前往欧洲作汗漫之游，游历中特别留心泰西日报的发行情况，对英国报纸主笔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也印象深刻。他还专门前往爱丁堡一家印刷厂参观印刷设备和流程。他记载说：“印书馆屋宇堂皇，规模宏敞……其中男女作工者，约一千五百人，各有所司，勤于厥职。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行事。其浇字盖用化学新法，事半功倍，一日中可成数千百字。”

自欧洲回到香港后，王韬几乎处于半失业状态。理雅各抵港后不久便又因事返回欧洲，王韬彻底失去生活来源。为此，他曾一度打算加入曾国藩的幕僚队伍“糊口”，但旋因曾国藩死去而未果。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1872年前后，他担任了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同一时期的《申报》有这样一段文字涉及王韬与《华字日报》：“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不第供夫乾臞志夫虞初而已也。”¹¹1873年，王韬又干脆联合黄胜等人，集股一万墨西哥银元买下伦敦布道会印书局的印刷设备，成立了自己的中华印务总局。所有这些个人的新闻和出版方面的经历与经验，为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提供了条件。

《循环日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其创办伊始就表现出不同一般的个性特征。第一，它是日报，除每个星期天以外，它坚持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二十一，第二十九页。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1966), p.4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8页（198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按日出版。1875 年到 1876 年间王韬还精选日报上发表的重要记事消息、政论，汇编成每月一期的月刊，附日报发行；第二，它是由中国人完全自办自营的独立报纸，它的“总司理”为陈蔼廷（即陈言），“正主笔”为王韬，均由中国股东“同人所共举”产生。其他协助王韬办报者也均为中国人，如中国最早留美归国学生黄胜，留英学习法律的伍廷芳、何启，王韬的女婿钱征，广东秀才洪士伟，报纸翻译、后为香港富商的胡礼垣等。《循环日报》在开张布告中写道，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独立发表见解的前提。他说，自中西通商后，香港、上海相继仿行报纸，但“主笔之上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循环日报》编撰人员“中国籍”和兼通中西学、汇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的“兼容性”特点，是《循环日报》得以成功的一个条件。第三，也是《循环日报》最根本的特征，是《循环日报》的政论色彩。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曾指出：“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为集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与甚。”美国的近代史专家保罗·科恩教授亦指出：“在近代中国史的初期阶段，报纸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示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纸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确切他说，《循环日报》的政论刊登在第二版的“中外新闻”栏内，而且往往每期不止一篇。如 1874 年 7 月 9 日（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的版面上就登载了《论铁甲战舰》、《论人不可恃智力》和《论吴淞口宜修筑炮台》等三篇论文。据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研究，单根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及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明治文库所藏的不完全的《循环日报》和《申报》所转载的文章统计，《循环日报》从 1874 年 5 月 12 日（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 1885 年 12 月 10 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就发表了政论文章约 890 篇。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王韬的手笔。为了撰写这些政论，王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上面了。他在致郑藻如的信里叙述当时马不停蹄地“握管连写”的情形说：“自撰日报以来，境比丝纷，事同渭集，终日握管，手为之疲，几千万言倚马……虽笔墨之间，不求刻画，而才尽之叹因之。”

《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

参阅本书附录《王韬友朋简表》。

《本局布告》，《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

《倡设日报小引》，《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154 页。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p.78.

《东洋史研究》第 43 卷，第 3 号，昭和 59 年（1984 年）12 月，译文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0 辑。

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上郑玉轩观察”。

《循环日报》的政论特色是与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的指导原则相关联的。出自王韬之手的《本馆日报略论》曾明确地表示,《循环日报》不仅要“将国内外要事消息汇于一纸,而且要毫不隐讳地表述报社的看法和主张,“借彼事端发挥胸臆,以明义理之不诬,报应之不爽”。也就是说,王韬及其同仁的办报宗旨一方面是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闭塞状态;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阐述见解,引导舆论,大力推进富强和改革活动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从西里喜行所列《循环日报》政论目录和国内学者夏良才先生在香港所见到的《循环日报》胶片的题目看,王韬揉议论于消息之中、积极针贬现实、干预生活的办报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如“富强要策”(1874年2月5日)、“法辟议院”(1874年2月10日)、“日本设立议院”(1874年4月17日)、“纪星使往核古巴华佣事”(1874年7月11日)、“论台湾实为中国重镇”(1874年7月16日)、“论欧洲近事”(1878年3月13日)等论文都是与社会焦点问题息息相关的“夹叙夹议”。王韬自己后来在与日本报人的交往中谈及他的办报情形说:“年来我亦持清议,眷言家国怀殷忧,论事往往樱众怒,世人欲杀狂奴囚。”借事生议,痛击黑暗,臧否人物,倡导改革舆论,以致顽固守旧之士觉得如芒刺在背,必欲囚之、杀之而后快,于此可见《循环日报》政论鞭辟现实之深。把办报的宗旨从营利赚钱拓展到开通民智、把报纸的功能从单纯提供新闻消息拓展到议事论政,是中国近代新闻史的革命,它意味着中国近代报纸社会价值的提升,也标志着王韬近代舆论意识的发育成熟。

《循环日报》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它有一群学贯中西而又不受大清律令约束的编撰人员、能够云别人之未能云、言别人之未敢言的特点,使它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其发行量处于同一时期各报发行量之首。它的发行处星罗棋布,遍及四方,“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计有:广州省城数处,沙面、河南各一处,澳门二处,国内还有佛山、东莞、虎门、厦门、福州、牛庄等处;海外的有京都、横滨、安南、星加坡、边能埠、旧金山、新金山、雪梨埠、庇鲁埠等处。此外,凡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及日本的长崎、神户,均由“招商局代理”。

《循环日报》的文章还广泛地被《申报》等中文报纸所转载。这些都说明,王韬主持下的《循环日报》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执掌了中国报纸草创时期的牛耳。

从《循环日报》的特点,我们可以肯定他说,《循环日报》实实在在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变法自强的“喉舌报”。它之所以得到正在成长起来的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其原因亦在于此。但是,王韬却为它起了一个令人猜不透的名字:“循环”,引得后代史学家为此推测不已,莫宗一是。如戈公振认为“循环”就是指“革命”,意指“太平天国的革命虽然失败,但可惜报纸传播其种子,以致循环不已”;方汉奇认为王韬所谓的“循环”含义不是革命,而是他心目中恒古不变的“三王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

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王韬:《扶桑游记》,第215页。

《本局布告》,《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3页(1986年,三联书店)。

的学术政治思想。科恩则认为王韬选择“循环”一词作为报名反映了他的循环史观，同时也可能隐含着王韬的信念，即中国一定会重新变成她原初那样的伟大国家。笔者认为，分析“循环”的确切含义应与考察王韬的多元世界观和“运会”观及王韬个人曲折复杂的经历结合起来，予以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解。“循环”在这里至少有三重含义：一，天运循环，盛衰相继，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或长衰不盛的民族，中国目前虽然处在“衰”的阶段，但“衰”即“盛”之渐，只要把握机会，应天运而尽人事，亟图改革，就一定会由“衰”致“盛”；同样道理，西方各国目前虽然处于“盛”的阶段，但“盛”也能趋于“衰”，所以切不可恃强而凌弱，一意孤行。否则，天必将有以报之。从这一角度讲，“循环”是变法图强的代名词，也隐含着反对和谴责西方侵略的意思；二，世界发展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呈现一种循环状态。目前存在的诸国林立的“分”是由原初的混然一体的“合”演变而来的，未来也必然走向天下大同的“合”。所以，王韬的“循环”有世界大同、天下一体的含义，暗示《循环日报》的内容将不局限于中国一隅，而是面向整个世界。西方人将《循环日报》译为“The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恐怕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的。再者，王韬自认为是中国“学贯中西第一人”的世界性报人，所以，以“循环”命名也预示着他要吧静止封闭的中国放到全球性的世界范围去考察，汇中外于一纸；三，“循环”也是王韬对个人经历的最高概括和对未来命运的期待。王韬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蹇。从科举不第、弱冠失恃、佣笔西舍，到投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而遁迹海外，再到漫游欧洲、鼓吹西学以致封疆大吏不时垂询，“稍副时名”，这些在王韬看来或许也是一个祸福相依的循环练，“天之所以厄之者，其即所以成之者”。他似乎意识到世间事物有互补性，一个人虽然不能成为大官，却仍然可以做大事；此业无成就，彼业却未必；今生不获知于“并世之人”，千载之后却可能备受景仰。因为，世间的事情本来就是正反相成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尚处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封闭多于开放的时期，知洋务、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大多数中国人还囿于成见旧习，“见有谈时务者，则曰大言不惭，见有谈外事者，则曰夺于外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韬把西方社会沟通信息与政见的重要手段报纸引入中国，并把它的宗旨放在抨击时弊、扫除传统成见和倡导改革舆论的社会价值上面，的确反映了王韬作为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伟大卓越之处。王韬宣告了中国思想家倡导改革的古典方式的式微和近代方式的诞生。在他之前，中国改革思想家一般都是以著书立说或书信往来传递他们的改革要求，因而影响面狭窄，往往撞不开巨大而沉重的黑暗闸门。自王韬之后，新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再囿于传统思想家著书立说和书信往来（包括上书皇帝）那种对改革的呼唤方式，而把创办报纸、诉诸公众舆论作为提出政治诉求的更有力的“施压杠杆”。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章炳麟，无一不把倡导变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9页（198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p. 77.

Roswell B.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1966), p. 42.

《本局日报通启》，《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革与办报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讲，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进过程中，王韬无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历史地位。其披荆斩棘、开拓未来之功永远彪炳史册。

王韬不仅是一位近代报纸的创办者，而且还是一位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因此有必要在介绍他的办报实践之外，进而考察分析他的新闻理论。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专文讨论报刊理论的“开风气之先者”。他在《循环日报》上先后发表《西国日报之盛》、《倡设日报小引》、《日报有裨于时政论》、《论日报渐行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书日本新报后》等一系列文章，对报刊的社会地位、社会职能等问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新闻思想的先河。

王韬认为，报纸是民情民心的一种反映手段。一个看重民心民情的社会必然要重视报纸；反过来讲，一个不重视报纸社会地位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漠视民心民情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既不符合传统的儒家圣人之治，也与现代西方政治理论背道而驰。他说：“西国最重日报，有时清议所主，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士，位至卿相。国家有大战事，囊笔从戎，随营记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英美两国每日印至二十万纸，分布遐迩。”他建议中国统治者要向西方统治者学习，放下身段，主动让报社及其主笔参加“朝纲国政”的制定，形成国家政治由“宰臣与主笔之士”会商而后定的机制。王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拂民心民情。

王韬甚至把报纸的地位放在国家之上，期望实现一种报纸主导政策制定的局面。他写道：“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蓬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

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从这段文字我们已可以看到“记者乃无冕之王”意识的最初萌芽。

普通民众亦应重视报纸的社会地位，把它看成是可以左右国家事务的工具。王韬批判了旧日文人轻视报纸、看重仕途、以为只有后者才叫经世致用的传统观念。当保守分子质问他：日报是泰西各国的时髦货，中国自尧舜以来从未见过，你“既读圣贤书，服周孔之礼”，应该“专志于帖括，以期策名筮仕，何以志不及此，‘徒日操不律，东涂西抹，傅采遗闻，不知上进，既无以鲜好名之讥，而或兼蹈位卑言高之罪也’”。王韬回答说，儒者束发受书，固然是为了“致君泽民”，但既然“不获如志”，就没有必要在科举的道路上“悠悠忽忽以至日暮途穷”，变成一个皓首无成而又身似寒蝉的废物。办报则可以使平生见解得以抒发，进而可影响国家政治，实现经世致用之初衷，从而不辜负“天地生我、君师成我、父母育我”之德。透过王韬辩证而

王韬：《弢园尺牘》，卷九，“代上黎召民观察”。

《西国日报之盛》，《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

又曲折的言词，其价值观的转变已殷然可见。在此时的王韬看来，报纸及其报人的社会地位决不在“科举”或“官”之下。

王韬议论最多的是报纸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报纸至少有三重作用，即“通上下”、“通内外”和“辅教化之不足”。

（一）“通上下”。

王韬认为，中西政治有一根本区别就是上下之情通与不通。他说：“英国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而中国却是“堂帘高深，舆论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欠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帑抚恤，官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其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那么通与不通之间转换的枢纽何在呢？王韬指出在于办报与不办报：“日报之设创自泰西各国，固所以广见闻，通上下，俾利弊的然无或壅蔽，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又说：“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邮传也。”王韬强烈呼吁中国统治者开放言禁，允许民间自由办报和议论国家政事。他在《循环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明确主张各省省会均应设立报馆，开辟民风栏，让人民发表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国家也应利用报纸把“大兴作、大政治先期告民”，使人民能够了解国家政治的运作。王韬断言，一旦中国上下一心，联结一体，中国将无敌于天下。

（二）通内外。

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长期的“内外不通”给近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一方面，中国人由于不了解外部世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盲目地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降低了对外来新知识、新事物的研究和学习兴趣，影响了中国古老文明的更新繁荣；另一方面，长期隔绝所形成的文化隔膜也给中西关系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造成中西之间诸多本可避免的误会、猜忌、仇恨和战争对抗。王韬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负面作用，他写道：“韬也不才，揣摩洋务已二十年……于近今中国交涉之端，微窥其利弊所在，而叹隔阂之为患大也。”他认为报纸能够破除中西之间的文化之隔，减少中外交往中的误会和仇恨。

王韬指出，报纸首先可以将天下之大事汇于一纸，使国人改变过去那种耳塞目盲，同于一隅的状况，因为，“地球之大，生齿繁矣，疆域广矣，其问良歹殊情，安危异势，缓急异宜，动静之微，得失之机，虽有远见者亦不能驰域外之观”，但报纸则可以“博采群言，兼收并蓄”，将“敌国之机宜，

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倡设日报小引》，《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与唐景星司马”。

制造之工能，舟车之来往，及山川风土祸福灾祥，无不朗若列眉”。国人一纸在手，便可知彼之长，明己之短，从而丢弃夜郎自大、尊己轻人思想，采取正确的向西方学习的态度。

不仅如此，报纸还可改变中国外交因内外不通而引起的动辄蒙辱局面。王韬指出，报纸将外情通之于内之后，清朝官员将不会再象过去那样昧于世界大势，办理外交时“颓预不灵”、“拘虚胶固”以至受辱。同时，报纸还可“译中事为西文”，将中情布达于外，俾西方之人了解中国，以免个别侵略狂播弄是非，颠倒黑白，煽动反华侵华舆论。他在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一封长信中纵论报纸在“内情外情相通”方面的作用说：“（西国）国政军情，洪纤毕载，苟得而遍览之，其情自可了如指掌。中外互市，各口大小官吏）咸当留心于西事，舍日报一途，将何以入门！则译西事为汉文日报者，所以通外情于内也。西人日报不独风行于欧上，而亦遍设于中国，其东游之商士，无不自以为洞悉中国情形，故其谈华事尤多。顾同一西人日报也，在欧洲者其言公而直，在东土者其言私而曲。夫彼非甚爱我中国，以无成见也，此非甚仇我中国，以有先入之言为主，而轻蔑疑忌之心积渐使然也。甚且交搆其间，颠倒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俾中外因是失欢。然则将若何治之？曰：莫若直书中外相涉之事，自我而达之于其国中，则译华事为西文日报者，所以正内情于外也。”在另一封致唐廷枢的信中，他更具体地提出，应将中国的官牒公布于中国在外国设立的外文日报之中，以使外邦人士了解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命意所在。以减少对外人的误会和猜忌。在近代中外关系上，有些“变故”的确不是中国或某一西方政府的既定政策造成的，而是一些办理外交事务的中外官员的个人因素造成的。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例，中国方面的叶铭琛不了解外情，盲目自大，刚愎自用与战争的爆发有相当关系；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Willianl Bruce）有意借事生风，播弄是非，煽动英国朝野仇华好战情绪亦有关系。王韬在那个时代能够看到这一点，提出大力办报以消除中外隔阂进而消除误会、仇恨、战争，确有高瞻远瞩，独具慧眼之处。这是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传统保守主义的主战派或爱国论者无法企及的认识境界。

（三）辅教化之不足。

王韬的“教化”基本上接近于现在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十分广泛而且模糊的特殊名词。王韬有时用它来指涉教育、教诲，有时用来指涉风俗环境、道德感染，有时又用来指涉精神的培养和提倡……似乎凡是精神层次的东西都与“教化”有关。

王韬充分认识到“教化”这一“形而上者”对国民精神素质的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在他看来又是与报纸的作用连在一起的。他说：“若夫闾阎细事，或得诸目睹，或得诸传闻，采而录之，亦足使阅者生惩动之思。”又说：“夫以省会之繁众，州郡之辽远，一己之耳目，安能家考而户问之。其出于风闻，得其大概者，不过借彼事端发挥胸臆，以明义理之不诬，报应之不爽，俾众

《本局日报通启》，《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韬：《弢园尺牋》，卷八，“上下中丞”。

王韬：《弢园尺牋》，卷九，“与唐景星司马”。

《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

“教化”对人的精神素质有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古代儒家思想家早已意识到的文化问题，但他们的立论根据是建立在四书五经基础上的慎独思诚哲学和修心养性的教育理论。王韬撑破传统说教的外壳，把教化概念扩展到公众舆论，竭力推重大众传播媒体对民德民智的塑造作用，标志着中国教化概念的“升级换代”。至此，近代文化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

除了对报纸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地论述以外，王韬还对报纸的文字风格和编辑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反对有些早期受雇于外人报纸的华人编辑“故弄玄虚”和“隐晦曲折”的文风，主张朴素的文以纪实的通俗风格，认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惮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反对报纸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认为“采访失实，记载多夸”是办报之大忌，有害无利，提倡报道务求详实，“始终持之以慎”。对报社主笔和编辑等“秉笔之人”，王韬力主要“慎加进选”，凡“识小而遗大”或“挟私汗人，自快其忿”者，均应“摈之而不齿”。

总而言之，王韬是一位走出了传统，跨进了近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报人。在办报过程中，他创立了近代舆论意识十分强烈的新闻理论。这种理论是他变法图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文化现象。他所提出的新闻问题和理论几乎全是中国人在这领域的第一次探索。从王韬开始，中国的新闻学才算正式诞生。

王韬的新闻理论及其实践获得了中外新闻史家的极高评价。林语堂把王韬比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洪深认为王韬是一位水平高超的编辑作家，即使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新闻界也很难找出比王韬更有水平的人。白瑞华称王韬为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领袖，其在报业的地位足与后来梁启超在杂志业的地位相颉抗。验之于王韬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功绩，这些评价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肯之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1934, Chicago), p.11.

洪深：“《申报》总编纂‘长毛状元’王韬考证”，载于《文学》第二卷，第六号（民国二十三年）。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1966), p.86.

七、扶桑之游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在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里，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流传过去的。日本人的地位自然在中国人之下。这种尊己卑人的文化心态阻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以至于直到鸦片战争后，开明如徐继畲、魏源者，甚至都弄不清日本的地域概况。《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对日本地理的介绍不仅大而化之，而且错误极多。早期中国驻日外交官、后来的维新派主将之一黄遵宪对此批评道：

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事，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析相闻，

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洲，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然而，自 1868 年明治维新推翻盲目闭关排外的封建幕府统治以后，日本迅速地步向现代化。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引导下，日本政府推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改革，使日本从一个封闭落后的饱受西方欺侮的国家一跃而为亚洲唯一的富强之邦。一个“不若我甚”的弹丸岛国竟然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令西方大国刮目相看、尊之以礼，这不能不引起有心救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震惊和关注。五、六十年代活动于苏、沪之间的大学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道：“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为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墓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

王韬身处香港，自然更直接更全面地感受到日本的“勃兴”。他说：

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

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契短而无所馁也。

在这种惊奇加羡慕的复杂心情驱使下，王韬一直渴望能得到一次机会前往日本进行实地考察，以探索其由弱变强的根源。这样的机会终于被他盼到了。1879 年日本学界多人联名邀请他访问日本。

七十年代末，王韬已经“颇负中外时名”。在日本，由于《普法战纪》和《循环日报》的流传，王韬或王紫诠之名已传遍日本朝野。急于想了解西方世界的日本学界，更是把曾经漫游欧洲的王韬奉为学贯中西的“西学泰斗”或“巨儒”，必欲一睹风采而后快。日本近代文学大师、天皇府宫内侍读重野安绎记述他在明治初年对王韬的敬重之情形时写道：“余观先生所著书，

黄遵宪：《日本国志》，121 页（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印）。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下”。

羨其文藻，爰慕其襟度通饒，不规规乎绳墨，欲一相见请教。”重野之言反映了日本学界对王韬倾慕和敬重有加的普遍情形。

酝酿邀请王韬赴日游历的发起人是王韬的同行、日本《报知新闻》的主编粟本锄云。粟本锄云原为“纵览歧黄书”的中医郎中，初仕于幕府时期。后因倾心西学西术而“获罪被废”。明治维新后，被派往法国考察政治，归国后创办《报知新闻》，鼓吹西学。粟本锄云的儿子贞次郎为日本外交官，曾陪同岩仓具视大使出使欧洲，返程时于上海“购得数部新刊之书，内有《普法战纪》”。粟本锄云因而得以先睹为快，并将其推荐给日本军部印行。粟本对《普法战纪》、特别是对其中王韬所作的有关变法图强的议论十分佩服，认为“此书不独行阵之事、交战之迹写活了，其中所杂议论也不陈腐，能脱汉人常见之俗套，实为无与伦比之珍籍。”更有进者，粟本锄云非常同情王韬怀才不遇的个人经历，以为与他本人在幕末时代因提倡西学而遭忌的经历相仿。这一点更增加了他邀请王韬赴日的热情。

关于粟本锄云出面倡议联络、众多日本学者响应附合以邀王韬的情形，《扶桑游记》序跋中有生动的叙述。日本学者中村正直在序中写道：

余于重野成斋几上始见《普法战纪》。时成斋语余曰：“闻此人有东游之意；果然，则吾挤之幸也。”察其意，若讷讷不能已者。其后粟本匏庵过余而论文，酒半，睨余曰：“吾既与佐田白茅诸子游梅园，盟于暗香疏影之下，约其招王弢园，子亦不得不与此盟矣！”

盖成斋与匏庵之景慕先生，出于诚意如此。其他如冈天爵、龟谷省轩、寺田士弧等，皆先于先生之未东游，而感召牵引，亦与有力焉。

另一日本学者龟谷省轩也记述说：

戊寅之春，余与粟本匏庵、佐田白茅探梅于龟井户，归途饮于柳岛。匏庵曰：“吾闻有弢园王先生者，今寓粤东，学博而材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纪》，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白茅曰：“善矣！”余友寺田士弧曾至南海，与先生善，乃有东游之约。士弧与重野成斋、冈鹿门诸人，谋欲邀之。余告以匏庵言，于是成斋始于匏庵交。

匏庵每置酒会友，未尝不津津乎王先生也。己卯之夏，先生遂航海而至。

在众多日本学人的联名坚邀之下，1879年春，王韬顺利成行。船过上海，王韬旋里稍作安排，“闰三月初八日（4月28日），自吴门归，摒挡行李作东瀛之游”。船发之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品川忠道、文士竹添渐卿、正在上海的中国道台徐润、盛宣怀、《申报》主笔钱征均来饯行，行色颇壮。

十一日（5月1日），船抵长崎。此后凡128日，王韬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其中以在东京所居之时间为最长，略有百日之多。王韬每至一地，都受到热烈地欢迎，王韬叙述当时的情景说：“抵江都之首日，即大会于长酩亭上，集者计二人……由此壶觞之会，文字

王韬：《扶桑游记》，“重野安绎序”。

粟本锄云：《匏庵遗稿》。

王韬：《扶桑游记》，“中村正直序”。

王韬：《扶桑游记》“龟谷省轩跋”。

王韬：《扶桑游记》，第128页。

之饮，殆无虚日。”中村正直也记载了王韬之行在日本引起的轰动：“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夫清国之人游吾邦者，自古多矣，然率皆估客，而限于长崎一方，近来韦布之士来东京，间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闻，既至而倾动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抑先生博学宏才，通当世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游囊所挂，宜其人人影附而响从也。”

王韬访日也受到中国驻日官员和旅日华人的热情接待。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及王韬昔日沪上好友张斯桂、维新派参赞黄遵宪、驻长崎领事余璘、新、驻神户领事阮锡恩，驻横滨领事范锡朋、《清史稿》编撰者吴瀚涛、《普法战纪》助译者张宗良、书法家卫铸生、商人朱季方等从各方面为王韬在日本的起居旅行提供方便。在与这些海外同胞的接触中，王韬觉得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识见宏远”。如张斯桂对西学颇有研究，“锐意西学，欲刻海宁李王叔天算诸书。其作《万国公法序》指陈欧洲形势，了然如掌上螺纹”。黄遵宪曾读书同文馆，熟悉国际事务，写有《日本国史》，主张学习西方。王韬在东京时几乎与他无日不见。王韬后来在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作序时回忆说：

旅居江户，遂得识君子于节署。嗣后联诗别墅，画壁旗亭，停车探忍冈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游履追陪，殆无虚日。君与余相交虽新，而相知有素，三日不见，则折筒来招。每酒酣耳热，谈天下事，长沙太息，无此精详，同甫激昂，逊此沈痛。

王韬在日本的主要活动可从两方面来叙述：

（一）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

考察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变化是王韬赴日的基本目的所在。在日本旅行的128天里，王韬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他曾走防日本文部省，了解日本政府文教方针和日本教育的概况；至大藏省和工部省谘询日本发展经济与奖掖科技发明的政策措施；访问日本国会议员，探讨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后的利弊得失。广泛的考察加深了王韬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和对西学的认识，也丰富了他的思想，拓宽了他的改革思路。

王韬特别留心了解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发生的急剧变化。他首先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社会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他记载说：“日本昔仿周制，藩侯三百，棋布星罗，类皆各擅一方，以治其民，生杀由己，惟岁时贡献于幕府而已。”而幕府首脑将军本身亦为最大封建主，霸占着许多名山大川和领地。但维新之后，“诸侯皆纳土地，归政柄于工朝。乃改藩城为郡县，辖以镇台，城垣亦概从废撤。”面对如此急剧的社会变化，王韬不禁

王韬：《扶桑游记》，“自序”。

王韬：《扶桑游记》，“中村正直序”。

王韬：《扶桑游记》，第197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九，“《日本杂事诗》序”。

王韬：《扶桑游记》，第282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282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282页。

感慨万千：“呜呼！仅十许年耳，而沧桑更易，人事变迁，可胜叹哉！”

日本社会形态变化以后，原有的等级制度也分崩离析。资本主义的机会均等和能力竞争原则代替原来的血缘世袭原则溶入了社会生活。王韬观察到这一阶级结构的变化。他指出：

华族者，列于藩侯，世代有爵位于朝，似春秋时世禄之家。日本凡分三等：日华族，日土族，日民族，以此别贵贱，区门第。维新以来废封建，三百藩侯各归土地于王朝；官人之法亦一变，草野怀才之士，皆得自奋于朝廷，向之世家多闲退矣。

有一前来向王韬求教的日本青年浅野代原为“旧封四十一万石，地亘山海；寻常出门，舆马拥前后，骏从千百人，旌旗如云”的华族，维新后，气象顿减，“萧散不异寒士”。从日本华族世家的衰落，王韬似乎也体悟到一点“运会”或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

日本的社会经济在明治维新以后也摆脱了单一的农业模式，出现了许多新兴行业，资本主义的主产方式在这些新兴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王韬曾在日本友人藤田鸣鹤的陪同下，参观一个“新燧社”。王韬发现这是一家赢利极厚的被推为“日本国中巨擘”的大火柴厂，它“屋宇广深，工作八百余人”；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于旧方式，“一切悉用西法”；生产的产品不仅可满足日本国内需要，而且参预国际竞争，“远售于香港、上海、年中不知凡几”。政府对火柴厂亦采取扶持政策，“界以凤纹赏牌，用彰激励”，厂主也被派往法国和瑞士考察，“购新法器具而归，故事半功倍也”。叙述中流露出对资本主义的无限向往之情。

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传统的儒学及建立其上的旧价值观在明治维新以后遭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西学感到兴趣。王韬观察到这种文化的裂变和转轨。他发现日本各地的孔庙和孔子神象越来越少，前往参拜的人也日趋稀落：以儒学为主的“中土书籍”无人问津，甚至有珍本秘籍散见于坊间街尾。与儒学不断式微的情况相反，西学在日本社会长驱直入，取得了文化统治地位。日本每个城市都设有推广西学新知的近代博物馆、“书籍馆”。它们大多都是在原来的孔庙基础上改造扩建的，收有各种各样从西方引进的或日人新近发明的“奇巧瑰异之物”以及大量的“泰西书籍”。每日来博物馆或书籍馆参观就读的人十分踊跃。如在明代遗臣朱舜水所建造的“神田圣庙”基址上改建的神田书籍馆“日至三百余人”。

对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文化方面的急速变化，王韬抱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意识的改革呼唤者，王韬对日本明治时期儒家文化的式微和西方文化的胜利进军感到兴奋，为之欢呼喝彩，以为可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借鉴。这是他每到一地总要参观博物馆、书籍馆的“内因”；他在东京购买日本新书“不下百数种”也是出于这一原因。但是，作为孔子

王韬：《扶桑游记》，第 282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198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294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265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250 页。

王韬：《弢园尺牘》，卷十一，“与日本寺田望南”。

之邦的“孔学中人”，王韬又对此情此景表示无限的伤感和挽惜。变化节奏太快，令他惴惴不安，害怕社会就此脱序，这种挽惜和忧虑是王韬不时给“全盘西化”泼冷水的心理机制。他在与冈本监辅讨论“西化”问题时说：“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另一次与西尾鹿峰的讨论中，王韬认为取舍“中西诸法”的标准不是“中”与“西”，而是“善”与“不善”：“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什么是“道”呢？王韬的回答是永恒存在的“人情”，而“人情”的最根本属性是讲究实用，应时变通：天有四时寒暑，人则“冬裘夏葛以应之”。王韬以东西方劳动者工资差别及其家庭负担不同为例，严肃批评了当时日本社会所流行的盲目崇洋媚外的“脱亚入欧论”，指出一切模仿都应合情而合用。他写道，今日礼拜为休息日的设定，是渐渍西法之一端。西人七日安息，行此已数千年，群以为便，然贸易场中亦有不甚守者。至于贫民工作谋生，以一日之劳供一日之食，若安息日无事可为，一家子女何从糊口？即以六日所入积为一日之用，亦或有所不能。故安息日可行于富贵者，藉以养身心，恣游览，其贫贱者不能行则听，亦王道不外人情也。若如西国教士之语，以此日为事天，而甚于禁食；夫天何日不当事，岂独此日哉？苟一日事天，而六日违天，何益之有？故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王韬提出的“应时应地变通论”，为东方后起国家学习西方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这反映了他作为中国学贯中西的文化领袖所具有的远见卓识。但换个角度说，他的“道不外人情论”的确也带有一缕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这又反映了在他的思想深处保守主义的东西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盘。

（二）游观各地广交友朋。

王韬素有“山水之癖”，这早在1847年他第一次赴江宁会试时就有所表现。以后在上海、香港、欧洲等地居住期间均不时出外游历。此次来日本，他更无具体的著译工作要做，因而把不少时间放在游历名胜之上。他先后访问过神户的千岛瀑、大版的造市局、西京的天满宫、华顶山、东京及其附近的墨川、忍冈、浅草寺、飞鸟山、日光山等。每游一地，王韬总有诗文记载其胜。《扶桑游记》中有许多内容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

给王韬印象最深的属日光山之游。日光山距东京370里，“其地为故大将军德川家康庙貌所在，其子孙以霸天下之力，役众诸侯以经营之，土木丹青之盛。穷工极美，甲于天下”。在重野安绎、冈千仞等八位日本友人的陪同下，王韬于1879年8月1日至8月8日游观了日光山。他一方面被日光山的秀丽风景所陶醉；另一方面也为日光山的人文历史变化而唏嘘不已。他在游记中写道：“（日光山大谷川口）其泉出于中禅寺，而未流则为绢川，自上奔注于下，喷雪溅珠，澎湃之声，铿訇震耳，觉心神为之顿爽……松柏葱郁，宫殿峥嵘，即德川氏诸庙也。向者幕府盛时，四方诣山住宿者，侯伯有二十六院，幕府诸官有八十坊，连甍对宇，栉比蝉联，结构之雄，世所罕俦。

王韬：《扶桑游记》第248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231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232页。

关于王韬思想中的保守成份请参阅本书第五章，第五节。

王韬：《扶桑游记》，第279页。

大政维新一时无诣山者。因是，院坊僧侣无所得食……俯仰今昔，不禁盛衰之感。”

在游历各地的过程中，王韬结识了一大批日本人士。与他时相过从的日本人士大多数是官方色彩较淡的“日本文士”。这些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中国文化的倾慕者，如增田贡精通中国古典史籍，著有《清史揽要》一书；本多正纳熟悉中国稗史小说，著有《清史逸话》。第二类为西学倡导同路人，如《报知新闻》主笔粟本锄云在幕末因主张学习西方而遭贬，维新后提倡西学不遗余力：《报知新闻》社长藤田茂吉“尝读洋书能通泰西事情。平日尤留意于东西交际之事，议论所及揽领提纲，灼然能见其大”；东京图书馆馆长冈千仞（号鹿门）著有《美国志》、《法国志》、《英国志》，“于泰西情形，了然若指诸掌”；中村正直原通儒学，“后通洋学，学业大进”，摄理师范学校事，治校期间意欲编译西国史以行于世；本监辅著有《万国史略》，“有志于泰西掌故”，熟知西学情伪；藤田鸣鹤“通泰西文字语言，其视欧洲情形，了然如掌上螺纹”。

王韬始终保持自然本色与日本友人自由交往，他出语直率，行事豪放不羁，绝无做作之态。他住在重野安绎家时，“室广数笏，矮屋打头，床蓐枕几不尽具”，可他起居欣然，“若意安之者”，“时杂以谐谑”，以至重野安绎一家不时“相共赝然大笑”？

与日本朝野的亲密交往以及后者对他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与敬重，颇使在国内遭受冷遇的王韬激动不已。有一次当重野安绎向他说：“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默深所著《海国图志》等书，仆亦尝一再读之，其忧国之心深矣。然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他听后无限感慨他说：“呜呼！苔岑之契、金石之交，乃得之于海外，此真意想所不到者也。”作为报答，他对日本友人的“文字之请”也是有求必应。他曾应邀为《报知新闻》书写多幅大幅草书；为日本学者的著作作序题跋几十篇。逢有日本文人兴社集会，他也每每到场助兴，发表演讲。更重要的是，日本朝野对他的热情接待，使王韬觉得同文同种的日本毕竟比其他西方国家亲切。他说：“东国之贵官文士待予殷拳若是，亦可见两邦之亲睦矣。”这种心理是他日后主张“联日抗俄”的导因之一。

王韬：《扶桑游记》，第 286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207 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九，“《清史逸话》序”。

王韬：《扶桑游记》第 214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207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201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218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248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245 页。

王韬：《扶桑游记》“重野安绎序”。

王韬：《扶桑游记》第 202 页。

仅据《弢园文录外编》统计，王韬为日人所作序与跋就有 17 篇之多。

王韬：《扶桑游记》第 179 页。

值得一提的是，王韬在日本还时常有“买醉红楼”之举。这引起一些日本人士对他“略有微言”。他为此辨解说：“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资财如上直，以朋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矫行饰节，以求悦于庸流，吾弗为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

他的解释获得了冈千仞的认同。冈千仞写道：

盖先生慨欧人耽耽虎视，亲航欧洲，熟彼情形，将出其所以施之当世，而未有所遇。于是遁迹海岛，俯仰感慨，举其郁郁不得于内者，托之声色豪华。信陵之于醇酒妇人，岂其所真溺爱？，其心独苦也！余与先生，固悲其命穷矣。

客观他说，王韬在日本“沉醉花丛”虽有其外在的社会原因，但那毕竟是王韬的“瑕疵之处”。因为它既不能使国家的现状得到丝毫改善，也不能使统治者从此之后有所警醒。它的惟一结果是，占去王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他对日本作更深一层的考察。

王韬在日本共旅行居住了 128 天。到 1879 年 8 月，他倦游思归，拟返香港。归国起程之前，日本友人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寺田士弧、冈千仞等在东京中村海楼酒家设宴为他饯行。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也被邀请参加。是日之会，“至者不下百人”，“冠裳踰济，可与葵邱践土之会后先争盛”。主客共推王韬坐首席“执牛耳”，位次在星使何如璋及张斯桂之上。蒙此推重，王韬自然又不免心潮起伏。他欣然提笔，作诗留别：

我之来兮春光非，我之去兮秋风起。
秋风起兮游子归，万重山兮千重水。
离情渺渺愁凄凄，相思不识何时已。
临行把酒劝重游，子其祝我倘无死。
子酌我兮金叵罗，我赠子兮玉版纸。
上写今日离别辞，中有泪痕流不止。
……
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我始。
敢云提唱开宗风，结社清华争倒展。
某年月日我去来，大书特书补青史。

日本友人亦即席唱和，或用诗称赞王韬学贯东西，或铺叙离情别意，或倡议中日两国永远唇齿相依，和睦相处。有一首本多正訥作的诗情感极其真挚。它写道：

王韬：《扶桑游记》第 246 页。

王韬：《扶桑游记》“冈千仞跋”。

王韬：《扶桑游记》，第 301 页。

王韬：《扶桑游记》，第 301 页。

骊歌高唱遽相离，难系佳宾万里思。
经世原因唇齿势，论心宁问旧新知。
吴山越水还家梦，春雨秋风过客诗。
临别殷勤何所语，天涯早计再逢时。

同年 8 月 22 日，王韬正式告别起程。日本友人及中国驻日使馆官员几十人赴东京火车站送行。佐田白茅、冈千仞、重野安绎、寺田士弧等七位日本友人依依不舍，一直陪送到横滨改乘轮船方止步。临别之际，王韬“感友人之情深、叹别恨之难销”，不禁泪水滂沱。

王韬的访日活动开启了近代中日两国文化界友好交往的大门。此后中日两国文人学士互访活动日趋活跃。不幸的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有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玷污了王韬所开写的中日友谊篇章。这是力主中日世代友好的王韬所始料不及的“大不幸”。

第五章冲击封建政治的勇士

十九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是王韬一生中生活最不安定的时期，也是王韬政治思想从传统向近代的急速转折时期，由于流亡生活所带来的与封建政权及其文化的彻底脱钩和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日益接近，王韬的政治思想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对所处社会现实的一般性不满，而进展到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绝望。此一时期他的政治言论所体现出来的对封建制度的批判精神与勇气、对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与对改革开放的由衷认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响往与提倡，表明王韬政治思想已经达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高度。

一、社会批判者

有无社会批判思想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与现存社会或制度亲疏距离的重要指标。换言之，一个知识分子有无改造社会的进取愿望往往取决于他首先是否具有对旧社会、旧制度或旧事物的批判勇气和精神。王韬对现存社会腐败现象与制度的批判在深度与广度上大大超过了前辈和同辈思想家。

王韬的社会批判思想发轫于上海时期。其时，他科场失意，家境穷困，“佣书西舍，贱等赁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从他此时所留下的文字看，他至少已对清朝的科举制度和清朝官员文恬武嬉、专事搜刮民脂民膏提出了谴责。比如，他的诗文中有一首《我生》诗这样写道：

我生早知有此日，祸福倚伏如相因。
寇灾即由吏治始，积弱生玩多因循。
朝廷粉饰讳兵事，保疆一切等具文……
往谈经济何慷慨，迎合主旨原非真。
眼看四郡成白骨，偷活局外置弗闻。

这是对清王朝不筹国政、不顾民生、因循苟且的强烈控诉。

然而，上海时期王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功名不就和怀才不遇经历的愤激之词与情感发泄，牢骚多而理性少，缺乏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也正因为此，王韬在愤激之余，行动上仍摆脱不了对封建制度和清朝官吏“一步三回首”的眷念之情。1858年，他上书当道，说自己是“不甘冯驩之无能，有类毛遂之自荐”，期冀对方不计资格拔摧他于平民布衣之中。

1859年，他又重温故技，赶赴昆山应清朝的江南年考。这些举动表明王韬还在时时期望通过上书他所不满意的清朝官员和参加他所厌恶的科举考试以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分取封建宴席上一杯残羹。他对旧社会、旧制度、旧阶级还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

王韬对社会现实的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严格来说是从他流亡香港之后开始的。一方面由于清廷的通缉彻底打破了他对大清王朝的幻想，阻断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眷恋；另一方面由于他更广泛地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刷，世界观和认识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变化。香港时期王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无论从触及的广度、深度讲，还是从态度的坚定、言词的激烈讲，都远远高于他在上海时期所能达到的水平。

成熟时期王韬的社会批判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揭露清朝官场“上下交征利”的腐败恶象。

王韬直言不讳地指出，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得了大病的社会。它不仅外表百孔千疮，到处溃烂，而且内部气血不足，亏虚严重。他诊断道：“脂膏日削，厥病日尪。国家自军兴以来，括天下之财赋以填巨壑，民生益蹙，国计益敝……此犹饮鸩汤以疗渴，进猪苓以养生，暂犹不可行者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我生”。

王韬：《弢园尺牍》，卷三，“岁暮干人书”。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96页。

也。邪炽髓竭，变而为尪，及今不治，其证将殆。”王韬在这张诊断书里虽没敢断然宣布大清王朝得了不治之症和必然要寿终正寝，却也毫不客气地暗示了“及今不治”，清王朝就有可能走入它的墓地。

不只是封建国家肆无忌惮地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各类贪官污吏也想尽办法对人民敲榨勒索。王韬对后者尤为痛恨，鞭挞不遗余力。在他看来，清朝官场是中国社会最肮脏的地方，是一个升迁、调补、荐举“皆孔方兄为之斡旋、阿堵物为之居间”的“利世界”。他无比愤怒地写道：“便辟侧媚，结纳逢迎，误以为能；趋承奔走，攀附簧缘，误以为勤；于是避瘠趋肥，舍难就易……视廨字为传舍，利膏血为钓饵，请托公行，货贿昼入，谄谀成风，钻刺得志。势炎可灸，廉耻丧尽，未有如今日者也……今日之财，上不在国，下不在民，而一归诸墨吏。官为言利之门，衙署中有市道焉。苞直肆行，筐篋弗饬，其显焉者也，不足为病也。巧取豪夺，穷搜极访，婪索万端，不饱其囊囊不厌其欲壑而弗止。彼此交证无非牟利也，宾朋相接无非谈利也。内自部员，外自上宪，利不至则官不显，上下蒙蔽，刑不加，罚弗及，肆然无忌，而日取盈焉。问有为民者乎？无有也。惟知有利而已矣！”

官与官之间既然是“货贿昼入”，利来利往，那就免不了官对民剥膏吸髓。因为，“大吏之利取之于小吏，小吏之利必然取之于民间”。王韬以江南收僧为例，揭露清朝各级官吏“朘民脂膏”的情景说：

昔者江左之敝，坏于官者一，坏于吏者三。其最大者曰漕政。一邑之粮，握其权者为漕总，其余以次递分其羨，至于官者十之六七而已，至于京师者十之四五而已。一郡之吾役，大邑数千，小邑亦数百。魁其曹者曰管班，出入裘马，僭侈无度，非骏诸民，何以为生？

在封建官府和贪官污吏的双重压榨下，人民生活犹如雪上加霜，自然免不了“各怀一心”，与封建政权离心又离德。王韬看到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心思乱是中国社会农民起义“此剿则彼炽”的根因，“盖今日之盗，即昔日之民也”；“今日之民，即可为后日之盗也”，是封建国家及其官吏的倒行逆施才把温和的小民变成了敢于挺而走险犯上作乱的“盗贼”。

（二）抨击清朝官吏的颞预不灵和保守僵化。

在王韬看来，清王朝不仅患了“脂膏日削”的“尪”症，而且患了血脉不通、麻木不仁的“痼”疾。这个“痼”疾的特征是上下因循苟且，保守僵化，万事墨守成规。王韬揭示道：“拘牵义例，厥病日痼，今天下内事动持干部议，外事一由于吏手，即有新法美意可以施诸实用者，偶不合于成例，辄为部议所格。老成持重者为精能，沓冗畏事者为历练，而英敏不羁畸异不群之士概无由进……其用人也，一循以资格，不问其才否。持身自固，蒙蔽日深。”在这里，王韬显然已经看到政治僵化必然带来官僚阶层的不求进取和人才的全面危机，而后者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缺乏生气和难以前进的主要原因。

政治僵化、血脉不通、陋现成例泛滥不仅消磨了官僚阶层的锐气，阻塞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王韬：《弢园尺牋》，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了人才的进路，而且影响了行政效率，便利了“蠹吏”从中弄权受贿，营私舞弊。王韬剖析说：“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狱琐碎；文法之密，逾于网罗；辞牒之多，繁于沙砾。动援成法，辄引旧章，令人几无所措其手足。各直省享报之案，虚诩缘饰，百无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纷坛，互相牵制。不知此特便于吏肯舞文弄法，索贿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待不能为治，且足以坏政体，而于经国治民毫无裨补。”

鉴于律例繁文和“蠹吏”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危害，王韬一生从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厌恶和痛恨。他几乎是带着一种“准革命”的心态来呼喊废除一切繁文律例及依其为生的胥吏的：

繁文缚节，亦指不胜屈，要不过徒乱人意耳。故吾尝曰：吏胥所据之部例，士子所习之时文，皆可尽付之祝融虐焰中而后大快也。

然则废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当若何？曰：今天下之所谓吏者，必尽行裁撤而后。内自京师，外至直省，大自六部，小至州县，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悉一扫而空之……凡昔日之拘文牵义，以一字为重轻，借片言为轩輊，得以上下其手者，悉付之于一炬而后大快。

但王韬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要法治的自然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他所要反对的是律例泛滥和晋吏横行所引起的政治壅塞不通和麻木僵化。透过矫在过正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呼唤的是一种有效率的纯净的简明政治。他在《变法中》一文中曾明白地说：“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这里的“减”、“省”、“开诚布公”等显然都不是虚无主义的概念。

王韬十分推崇中国汉代初年君与民关系简朴而又政通人和的局面。他说，当年汉高祖刘邦入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言直接简单，而其效果则是“感于人心已至于泐肌肤，沦骨髓”。所以治天下不在于律例之多寡，而在于是否与民同休戚。王韬建议清朝统治者不妨对现存的一切律例和繁文缚节来一次全面的审查。凡属过时无用或阻碍行政效率者一概废除之；其有效可行者张榜公布天下，使全国官民咸有所遵循。王韬断言，一旦清朝统治者如此而行，国家政治就会步入稳定而有效率的蓬勃发展的光明大道。

（三）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如果说中国官场的黑暗腐败和守旧僵化是中国社会贫穷落后、内忧外患迭起的灾难之源，那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官场这种令人哀叹的局面呢？王韬的卓越之处在于，他透过官场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可克服的弊端。他在这一方面所发表的议论是他的社会批判思想的最辉煌之处。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内容，我们才说王韬在香港时期的社会批判思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想既超过了他在上海时期所达到的水平，也超越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思想家社会批判的框架。

王韬认为，中国官场一切恶象丑态都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君权太隆，民权太卑。君太隆民太卑则无疑会造成上下之情不能相通的“隔阂之局”。这就使处于君与民之间的官僚有一个欺下瞒上的“结构空间”。此一空间是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温床。他在《重民下》一文中分析说：

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輿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帑抚恤，官府徒视为惧文，吏晋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惟知耗民财，殫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扬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

吏治败坏，“疴病”、“痼病”日深，原来是和秦王朝建立以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原因，前者是后者的自然结果。王韬在这里的深刻分析，锋芒所向已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身。

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二个特点是官僚权力结构呈自上而下的垂直隶属形态。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员“听上不听下”，上一层官员是下一层官员的“家长”；下一层官员则又是小民百姓的“父母”；官员的升迁不是由政绩或民意来决定，而是由上司的好恶来决定。这一点正是贪官污吏敢于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作威作福和昏官庸官能够消遥自在、如鱼得水的前提。王韬指出，今日中国“其君子则多狃于因循，其小人则渐趋于浇薄”，“寡廉鲜耻，各怀一心”，这并不是“运会之使然”，也不是由于人们“天良之尽泯也”，而是由于民意太贱，“在下者”太不受重视。而“在上者”又往往“只以情面为瞻徇，请托为引援”，于是便免不了官场“钻营奔竞，夤缘攀附，苞苴公行”。王韬诘责道：“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

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君臣关系过分紧张，不合人性，两方相互猜忌，相互防范。君主专制制度既然是建立在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原则之上的政治制度，它就无法避免君臣之间的权力攘夺和阴谋斗争。处在权力顶峰的君主时时刻刻提防着臣下的篡权，因而设计出许多旨在“削平反侧”、“防患未然”的政策、策略和措施来监视和防范群僚百官。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这方面的恐惧特重，其防范措施也尤为严密。如清朝官制规定，官员不得在本籍为官；在他乡为官，一地亦不得超过三年等等。明显得很，这一规定的实质就是阻止“官”与“民”相通，割裂“官”与“地”的联系，以防止形成对家天下的可能性威胁。王韬的批判之笔触及这一君主专制制度的“制度性弊端”，指出中国官场因循苟且、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等正与此一“制度性弊端”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他说，当今之世无好官良吏久矣，究其原因，则为“久任专任之法坏也”。三年一易，经年一调，甚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停捐纳”。

至仕若转环，不数月而去任，必然造成“吏无固志，视靡字为传舍，量肥瘠为戚愉，循资计日以冀迁改。其所设施，因循苟简，曾无终岁之计，而所有一切因革利弊，曾不稔知，旋已调任。令方行而遽寝，政未成而旋罢。下则无复法守，而胥吏得并缘为奸。不特此也，疏通太甚则吏不习民……即使其任职在位，隐有五日京兆之心，身家念重，其余则不复措意，上下苟且，惟日望于禄秩之崇卑厚薄，而不计民生之休戚利害”。因此，王韬提倡一切反朴归真，去除君臣相互猜忌的封建君主专制，恢复上古时代君与臣之间的互信互助。君王对文武百官既用之，则必信之，既任之，则必专司责成，有职有权，“勿格于部议”、“勿别遣参赞帮办大员”。王韬认为，只有这样，良相良将良吏才能脱颖而出，有所施展；中国也才能有奋发腾飞的一天。

二、民本学说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它滥觞于商周，《尚书》中有“民为邦本”一句。成熟于春秋战国，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话。秦王朝建立后，虽然君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但民本思想也一直象一股地下水汨汨流淌了数千年，不时冲涌出来与封建专制主义斗上一番。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唐甄等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观点，把古代民本思想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韬继承了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民本学说，并把它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溶合起来，使它成为一种富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武器。

王韬民本学说的内涵极其丰富多彩，概括起来可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承认“民”决定国家治乱。

君与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本来是一个统一体的相互依持的两个方面。清朝统治者不了解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把自己看成是决定国家政治的当然主宰者，对被统治者予取与求，随心所欲。王韬断然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自以为是不明事理的“本末颠倒”；被统治者据为己有的国家，其主体或根本应该是“民”，而非“君”或“官”；“民”是决定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王韬以农民起义为例子进一步论证道：“今之弄兵者，非异民也，即前日之民子若孙也。奚为昔顺而今逆，民盖久有以疑我矣，积疑则乱生。”所谓“积疑”，就是不相信，就是有二心，它是清朝皇帝和各级官吏长期躁瞞民意敲榨民脂在人民心理上留下的伤痕。这种伤痕一遇风吹草动，就会崩开演变成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血与火的对抗。天下大乱于是骤然而至。王韬在这里对统治阶级“只知有君，不知有民”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二）强调“民”决定民族的强弱。

当西方侵略者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之后，中国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已经看到坚船利炮在民族对抗中的作用，发起了以购买和制造武器为主要活动的洋务运动。王韬早年也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是，与一般洋务派不同，王韬特别强调“民”在决定民族强弱方面的作用：“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民是国家的元气所在，“国之大患，莫若民情壅于上闻。

比之一人之身，元气不通，则耳目失其聪明，手足限于行动。国之有民，亦犹人身之有元气也”。

王韬认识到，民族对抗既是军事实力的对抗，也是民心民志的对抗。中国每每在中外战争中败北，不仅仅是武器和战略不如对方，更重要的是中国兵民缺少同仇敌忾之气。他批驳那些只重视武器的洋务派议论说：“论者徒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粤逆崖略”。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上”。

《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本局日报通启》。

夸张其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为足见其强；工作之众盛，煤铁之充足，商贾之转输负贩及于远近，为足见其富，遂以为立国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末而非其富强之本也。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罔邦宁，虽久不变。”中国统治者平时不与民众共其利害，不懂得“民可顺而不可逆”的道理，“但知计一己之肥瘠而已，与民间之休戚痒痒无相关也”；战争之际怎么能指望长期受其压迫剥削的百姓与之同仇敌忾呢？“国家之安危无预草野之休戚，朝廷之荣辱无关氓庶之忧喜”，中国焉能不败？

（三）呼吁以“重民”政策取代“轻民”政策。在承认“民”决定国家治乱和民族盛衰的前提下，王韬提倡以“重民”政策取代清朝昔日的“轻民”政策，他提醒清朝统治者说，民心如水，其可载舟，亦可覆舟，“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对民“欺”、“虐”、“犯”者，必将不得善终。

如何做到“重民”呢？王韬认为首先要通民情，达民隐，撤君主专制制度“堂帘之高远”，使“君民之分亲”；君主的代表各级官吏要不断与民沟通，“煦其疾痛”，与民同其利害、共其忧乐；其次，举政行事一切以民意为依据，开放言路，尊重百姓“皆得而言之”的问政之权，“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再次，与民开诚布公，实行政事公开，“国有大政宣示中外，布告遐迩，使民间咸得预闻”。地方官亦由百姓“乡举里选”，“复古者采取舆评之法，的见众人之真好恶，而用舍黜陟之权寓于此”。王韬在这里把传统的民本思想一步步地朝向近代民权思想拉近。

王韬在提倡采取“重民”政策时特别提到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问题，认为清朝统治者视海外华人为与自己无关的“天外之民”的心态，是其昔日“轻民”政策的自然延伸。它同样带来“民心尽失”、“藩篱尽失”的恶果。他以数百万南洋华侨为例，指出海外侨民虽然长期居外不归，但情感上无疑是眷怀故土、热爱父母之邦的。因此，清朝统治者理应爱护和保护他们。王韬呼吁清朝政府赶快于各邦设立领事，既保“远方之黎庶”，又收“中土之人心”。把民本思想推及海外赤子，王韬恐怕为中国近代第一人。

（四）主张“富民”先于“富国”。

富强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问题。十九世纪70年代以后清朝统治阶级似乎已意识到这一点。但到底是先富民还是先富国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韬认为，国家治乱与民心静与动有关，而民心的静与动又与老百姓的经济状况好坏一脉相承。民富则静，民贫则动，静则安，动则乱，一旦动乱，富国强兵也就化为乌有。他提醒清朝统治者，不要以为“民富”就意味着“国贫”，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民之富藏于公，家之丰通于国”；“民生既足，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光绪己丑铅印本），卷三，“拟上当事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保远民”。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国势自张”，国家元气自然充沛。再者，天下绝没有一厢情愿的爱国热情。国与民只有“共利”，才能使民与国共患难，同生死，使民勇于公战之心“油然而生于其中”。“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

为达到真正的“富民”，王韬提出了具体的“为生民辟财源”的办法，这就是发展民间工商业，“如造轮船，制机器，设银肆，开煤铁五金诸矿，出洋行贾，轮船行驶于内河，许民间设立公司，听其自力，而官常保助之，毋遏抑之。诚如是也，有不国治民安，上下相通，内外交悦，以臻于无为之化者，未之有也”。

王韬提出的富民办法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办法，刚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入近代社会的中国民众自然会有不知所措之处。于是王韬又提出要“教民”，使民能够掌握近代社会自谋生计的先进手段而致富。他说：“中国之利茭，西人无不欲攘为己有，其用心实精而胜；而我中国于自有之材且不及念，诚可谓不善谋利者矣。木棉我所自出，丝斤我所本有，所少者火机之纺器织具耳，而可购求制造也。先去数万金以购之来，试行有效，然后精心仿制，用以教民。十家一具，纺线织布；一具可兼百人之工，则一家可享数十家之利。西国田具，如犁耙播刈诸器，力省工倍，可以之教农，以尽地力。货舶轮船运载及远，可以之教商，以通有无。”“富民”以至“教民”概念在民本学说中的出现，表明王韬的民本思想已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气息。它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本思想并不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对立物，而是它的补充和完善，其宗旨是将封建君主专制对民众的压迫与剥削限制在一定的“度”里，从而维持住君主专制制度的长盛不衰。因此，它根本上是与近代民主思想相抵触的。王韬以民本思想为武器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也只能说明王韬还没有跳出传统思想家的固有框架。笔者认为，此一观点从头至尾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民主与民本思想一般说来不是截然分开的，更不是对立的。民本思想在新环境下可以升级换代，成为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清末资产阶级民权运动者就常常以古代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黄宗羲为中国的卢梭。陈天华在《狮子吼》一文中借“文明种”之口说：“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是孟子以后第一个人。他的学问，他的品行，比卢梭还要高几倍，他就是黄黎洲先生。他著的书有一种名叫《明夷待访录》，内有《原君》、《原臣》二篇，虽不及《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已包括在内。”章太炎也说过，黄大冲发民贵之义，与晚近五洲诸大国或立民主，或崇宪政是一个意思。

这些都说明民主与民本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暴政虐民、强调民众作用等方面确有相通相合之处，而绝不是相互排斥和抵拒。

其次，王韬的民本思想中固然有一些传统形态的内容，如建议统治者“待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王韬：《弢园尺牋》，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陈天华：《狮子吼》，《陈天华集》，第127页（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章太炎：《书（原君篇）后》，《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0日）。

民如父兄之遇子弟”，这的确是古老的“推恩政治”的余绪，有家长主义的尾巴。但不能否认王韬民本思想中大部分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分。他的关于“富民”问题的议论实际上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经济自由平等的愿望；许民间自立公司，官不得干预之，只能保助之，兴学教民致富等议论也是传统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提不出来的。只有经过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和政治文化洗礼之后的思想家才能提出这样的思想结论。

再次，王韬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是相互串透、相互重叠的。王韬早年就熟读儒家经典，尤其佩服黄宗羲的《明夷待记录》，因此，对古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一类的议论是十分熟悉的。但也仅此而已。在这些大而化之的条目下，他还没有构筑具体的内容。后来，他接触到西方之学，在其民主圣火的烛照下，才恍然大悟中国古代典籍有如此之多的可资利用的材料。于是，他根据他所掌握的近代西方民主理论，回过头来对传统经典或记忆中的民本学说进行爬搜、概括、总结。所以说，在王韬思想中，民本与民主，传统与现代是相互串透、相互重叠的，无法将其截然划为两段。王韬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摧残民心、压制民意的时候，总是同时参照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及实践和西方民主思想及实践的。如集中反映王韬民本思想的《重民上》、《重民中》、《重民下》三文，其思路都是“泰西各国如何”“古代中国如何”“所以现在应该如何”。《重民下》有一段这样写道：

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之间互相联络之效也。

《重民中》也写道：

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此外，首有以厚其生，次有以恒其业……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要令富民出其货，贫民殫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则古者与民共治天下之意也。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西合璧，谁能说它们都是传统形态的民本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呢？

值得注意的是，王韬是中国最早主张在中国推行英国式民主政治的先进思想家，而此一主张最早就出现在《重民下》一文之中。由此可见，王韬当年是将两者视为一体的。后代评论者硬要将民本与民主视作相互对立的東西，无疑是曲解了王韬。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演进，犹如一条波水相连而又不断汇聚支流的长河，其间任何一段都有前一段思想的继承因素，也有刚刚注入了新的因素。王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另一方面又吸纳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他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创造了颇具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的新民本思想。这种新民本思想虽然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后者无疑是从前者继承发展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王韬“重民”、“富民”、“教民”诸说的提出，后来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的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民权兴则国权立”诸说和孙中山中西合璧的三民主义便会成为无源之水。

三、强烈的危机意识

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由于中国周边民族的贫弱落后以及儒家士农社会标榜的“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柔能克刚”等信条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中国人往往缺少危机意识，似乎中国从来就不曾遭遇过真正的挑战。汉朝的贾谊本着爱国爱民的热忱，披肝沥胆地写了一篇言及天下危象的《陈政事疏》，立刻落得被贬遭逐的下场。封建君主从不喜欢臣民谈论什么天下危象凶兆。他们喜闻乐见的是歌颂升平的阿谀文章。绝大多数朝臣和地方大吏也习惯于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是在文治武功、太平一统的浪漫神话中度过的。

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最大危机。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纷纷前来东方，以武力为后盾逼迫中国统治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太平一统的局面遇到了超强的外部力量的严峻挑战。

对中国统治阶级来讲，《南京条约》的签订无疑是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面对这一羞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最先从古代的神话中醒来，开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思想家的危机和改革意识是极其有限度的。他们还没有明确体认到中国遇到了全面的生存危机。“经世派”似乎只承认中国在兵备火器方面“略不如夷”。从整个价值观上讲，“经世派”依然没有甩脱“华尊夷卑”的基本格局。

从全国范围来看，作为整体的封建统治阶级更没有从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惊醒。大多数地主阶级分子仍然沉溺在古老华夏文明和清朝圣治武功所构筑的梦幻之中。在他们眼里，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人物“师夷长技”的呐喊不过是徒张夷势、自我贬损的丧气话，是危言耸听的大惊小怪。“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图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谏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之一姚莹曾痛心地说，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没有使中国当道头脑清醒，反而大触“诸公之忌”，“举世讳言之”。一句话，鸦片战争之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是在统治阶级“身处险境而又讳言危机”之中不死不活地走过来的。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再次打破了中国官场的四平八稳和中国社会的升平虚象，无情翻开了大清王朝不堪一击的“内囊”。冯桂芬率先看到这一点，提出了“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观点，从而向国人传递了危机已经来临的警号。但是，历史留给中国统治阶级天朝上国的意识太强烈，以至他们成了釜底游鱼还在编织着如何吃掉打渔人的故事。冯桂芬的危机呐喊只是在中国统治阶级自我陶醉的麻痹神经里楔进了一根芒刺而已。根治它还需要后人坚持不懈地努力。

王韬：《弢园立录外编》，卷九，《瀛环志略》“跋”。

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第52页（198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王韬目睹中国社会“幻梦多于现实”的精神病状，愤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冥顽不灵，矢志在冯桂芬的基础上彻底割除中国统治者的自尊自大和自我陶醉的病灶。从六十年代开始，他以比冯桂芬更加激烈的语言、更加广泛的视角、更加有效的报纸手段，把中国已经面临全面性生存危机的警钟敲得更响。

王韬首先直言不讳地指出，儒家天下概念和等级思想所规定的万邦来朝的历史格局已经分崩离析，大清王朝的文治武功也荡然无存。中外关系正从中国唯我独尊的单向主导局面走向华夷鼎力相搏的竞争局面，此一局面是中国几千年不曾遇到过的最大变局。他慷慨激昂地呐喊道：

天开泰西诸国之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

四大洲中，以欧洲为至雄，用兵之强也，财赋之富也，物产之饶也，工作之巧也，心思智虑之精，谋划经营之远也，近且日盛一日，薄海内外，莫与抗衡。（其于亚非诸国）皆剪灭其社稷，驱逐其君长，并兼其土地。役使其人民。前时中国史册所称入贡为某某国者，今无一二焉，令人思之，儿不寒而栗……越南为法据，缅甸，暹罗为英据，阿富汗现已覆亡，波斯仅成孤立，则亚洲全土，欧人几有其半而犹未已也，宁不为之寒心！

王韬对变局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审视“华”与“夷”实力之后得出的。在王韬认识到的变局中，其竞争态势不是汉与匈奴或唐与回纥那种“大华”、“强华”与“小夷”、“弱夷”的对峙，而是春秋战国式的列国相争，其问不仅不存在名分上的尊卑之别，而且优强之势不在中国一边而在俄、英、法、普诸西方之国一边。俄国可比之于秦；英、法、普三国可当之于齐、楚、晋；中国只能当之于赵、卫、陈、蔡等，是一“至弱之国”。因为，中国虽为地球精美之区，但若问“所为西国之长技者，则一切无有”。他以极其忧虑的口气写道：

今就地球大势观之，而知东南之不及西北也，西北之人久至东南，而东南之人不能一至西北，试观盈地球中，皆欧洲人也。地球中灵秀沃腴之壤，不过数处，而以中国为巨擘，地球之人，无不欣羨焉。独惜中国迩来安于自域也，因循苟且，粉饰夸张，蒙蔽拘虚，刚愎傲狠，于欧洲之形势茫乎且未之知也。然则，亚洲之局，不甚可危哉！

王韬在这里要告诉人们的潜台词是：今日之“华”已非昔日之“华”；今日之“夷”也非昔日之“夷”。“华”与“夷”的优劣强弱之势已经彻底倒转过来。处在劣势中的中国倘若继续执迷不悟，老大自居，不求振作，最终难免会落得亡国灭种的命运。

危机和挑战是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指出，文明是在外来的挑战中成长的。这就是说，任何民族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欧洲今日不轻用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亚洲半属欧人”。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亚洲半属欧人”。

参见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第一部分《文明的起源》，第三部分《文明的生长》（1986年，

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摆脱生存危机或外来挑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视危机和迎接挑战。在王韬生活的年代，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愚顽之士不仅没有考虑到如何有效处置危机和积极应付挑战，甚至不承认中国已经遇到了危机和挑战。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有改革现状的必要。王韬对中国生存危机一针见血、不容回避的揭示和持之不断地呐喊，无疑是对这些长梦不醒的愚顽之士的当头棒喝。

王韬不是一个消极悲观的危机信号的撞钟人。他告诫国人危机来临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国人亟思变革，从而扭转亡国灭种的可能命运。可以说，他的危机意识是和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属于汤因比称道的那种积极的有效的挑战一应战模式。在王韬看来，西方列强踏波东来，会聚于中国，此正“天欲福中国，而非祸中国，正欲强中国，而非弱中国”，其祸福强弱转变之机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改革与否，“善为用者，可以转祸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改革思想是王韬危机意识的联体儿，在所有的谈论中国生存危机的文章中，王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谈及中国的改革。比如，在前面所引述的关于“古今变局”的文字之后，他写道：

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做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不变者，人事也。在《答强弱论》一文中，他也是将危机与改革相提并论的：

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渐灭，可不惧哉……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处今之世，以弱对强，当因时因地制宜，以权达变，以变求富求强，以富强保民族之生存。王韬的危机意识以其不可阻遏的逻辑力量顺理成章地过渡到改革思想上来。

与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先进中国人的思想进路一样，王韬的改革思想也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下产生的。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王韬改革思想自有它的特异或超越之处。第一，王韬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对西学更加广泛地了解、对西方事物更加直接地实地考查基础之上的，它的参照系更清晰具体，时代内容更丰富精确，很少出现前代思想家对西方事物盲人摸象式的主观曲解和天真臆测。第二，王韬把他的改革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和运会学说联系起来，这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哲学化、理论化。王韬写道：“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以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泰西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变局，运会之转机。怀奇抱智之士，无不思翻然为自强计，集各国之人才以供一国之用，正在今日。”理论之中包裹着哲人乐观自信的胸怀。第三，王韬改革思想的重心在“内因”，而且尤其偏重政治层面。他曾指出，国家之患，不患在外侮之凭凌，而患在“内治之委靡”。“内治之委靡”一日不去，即使具备了现代化的枪炮船舰，也不能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境。因此，他提倡一种“大变而非小变，真变而非貌变”的内在改革。“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皮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这是把眼光集中于军事与外交领域的林、魏一代思想家及同代之洋务派思想家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王韬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异数”。他所具备的思想条件是同一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无法同时具备的。其时，中国人中或有对西方事物了解得比王韬更多的人，如某些浪迹他邦的生意人、早期留学生等，也有比王韬更精通儒家经典的饱学之士，但能把中学与西学协调揉合在一起，左右逢源地阐述发扬的，恐怕非王韬莫属。历史的偶然性让王韬这个饱读儒家经典的落第秀才过了数十年的“域外”流亡生活，这是王韬个人的不幸；然而却造就了中国第一个学贯中西、思想深刻的思想家，这又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大幸。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当轴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

四、改革政治的方案

台湾学人姚海奇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王韬的政治思想》中曾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王韬的改革思想“始终停留于器物阶段”，原文写道：

（王韬）于实际政治中，却未曾体察出君主政治之弊，以及民主政治之善，故于变法图强主张中，境界始终停留于器物阶段，而少言及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不同之优劣长短。此点与当世知识分子观点，实相吻合，故于船坚炮利之器物，寄望过高，而未曾思及变法及政治发展过程之环节。苟仅局变，而非全变，而将引发出更繁多、更紊乱之问题与弊端。

显然，姚海奇先生把王韬归入到只主张“皮毛之变”的洋务派思想家一类，叹其思想进路功亏一篑。

笔者认为，姚海奇先生的观点似有偏颇之处。王韬不仅不是一个只关注器物变革的人，而且是一个对“仅关注器物之变”持否定态度的激烈批判者。

王韬是中国最早倡寻洋务活动而又最早对洋务活动只重器物层变革提出批判的思想家。愤于洋务运动的小脚走路和舍本逐末，他多次对洋务运动的所谓“骏骥乎富强之效”进行讥讽，认为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附肉于骨，剪彩为花，其血脉终不能流通，色泽终不能焕发”的表面文章，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内部状况。他在论著中写下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文字，试举数例，以见王韬政治思想之原貌：

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鹵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

事至今日，奚言哉？由其外观之，设海防，重边备，讲火器，制轮船，似乎富强之效可著，骏骥乎可弛域外之观。然而军政之未修也，吏治之未肃也，士习之未端也，民心之未靖也，因循苟且，粉饰弥缝，一切皆如昔日。如是虽袭西法之皮毛，而犹如附肉于骨……令欲与泰西并驾齐驱，则莫如以自治为先。

自强之道，自治为先。今日之弊，在上下之交不通，官民之分不亲，外内之权不专，中外之情不审，于是乎一切之事，昏然如隔九重帘幕。今当一反其道而行之，然后可选举人才，简择牧令，搜罗遗逸，广储材艺，而与民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国有大政，宣示中外，布告遐迹，使民间咸得预闻。从上可见，王韬已经清楚地看到“徒变器物”并不能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富强之境；只有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变革，挽回民心，才能真正使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

怎样进行政治变革以挽回民心呢？王韬认为首先要“去弊”，即消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一切以现实需要和民意为依据。

王韬的“去弊”主张可概括为三项内容：

第一，精简官僚队伍，裁撤冗吏，惩治贪官。

在王韬的价值天平上，冗官俗吏只是与“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尼道士和草菅人命以害人为生的庸医等量齐观的“游民”而已。对社会而言，

姚海奇：《王韬的政治思想》，第59页（1981年，台湾）。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书日人隔靴论后”。

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二，“上郑玉轩观察”。

这种游民纯粹是有害无利的毒疮。他揭示说：

闲员未秩，各位枝官，无益于民心，徒足以耗国家度支……一省之中，既有巡抚而复有总督，有时意见龃龉，而事权不能归一，往往至于误国愤事。

佐官为治者吏也，舞文坏法，半由于吏，以吏无责成而品望又卑贱，其惟利是视宜也。今之为吏者，大抵皆狡黠齷齪，足以持官短长。官或一岁数易，吏则累世相传，官多深居简出，吏日周旋于民间，其足以欺蔽官者，势所必然。

官吏贵精不贵多，冗官吏滥不仅必然造成磨擦内耗，降低行政效率以至“误国愤事”，而且在人浮于事、人多薪低的情形下，无公可干而又胆大包天、精力过剩的“官场游民”极易将其精力倾泄在时非法利益的疯狂追求和钻营奔竞之上。这势必带来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冗官与贪官的合二为一。因此，王韬建议对清朝各级官府实行一次甄别筛选的普查，凡属冗员，不论是官是吏，为文为武，“悉从而汰之”；凡属贪员，则“必严其典章，纠其贿赂，戍边不赦，籍没不贷，即其家资以充军需”；而对经过筛选合格留任的官员则应该重其权，增其薪，使其安心放手办事，“专司责成”。王韬认为如此正反相合，官员必将“顾恤名节，相尚以廉，而治道可兴”。

第二，改革储才和用人制度。

王韬认为自己是清朝储才和用人制度的牺牲品，因而对此一制度的厌恶尤为强烈，改造它的愿望也特别急迫。他说，清朝的主要储才和用人途径科举制度是“败坏人才，所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的毁人机器，活生生的富有创造思想的人一旦经过这一机器的作业，就会变成一个“毫无心思智慧”、“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的“废人”。这样的“废人”虽然符合最高统治者希冀臣民都是驯服二民的愿望，对国家、民族而言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王韬指出，世变亟矣，在万国相通的世界格局下民族的竞争就是一种人才的竞争，昔日驯服的工具已经明显不能使中国立于氏治久安的不败之地。因此，为今之计，“莫如废时文而尚实学”，即废除八股制义取士而提倡经济、法律、格致、天算、制器、兵法等有实用之学。此外，另辟“荐举人仕”之途，凡才识兼备，或“身怀某一技艺不论其有无通过科举考试者”，只要地方“乡举里选”，国家便当“不次擢用”。

捐纳是清朝用人制度中比科举更腐败、更不得人心的一项弊政。据统计，1840年在道、府、州、县四个层级的地方官中有29%的人是靠捐纳得到官职的；1871年这一数字猛增到51%。数以千计的捐官将清朝官场变成了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土”。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中”。

一个靠官职剥削的“权力黑市”。敲榨勒索，贪赃在法，贿赂公行，一切丑恶现象均随之而生。王韬也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揭示道：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儿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其用倚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垣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取盈于民，尚忍言哉！

捐纳之初，既以利进，入仕之后，便难免赤裸裸地以“膏血”为目的，寡廉少耻，不择手段。而这无疑又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扩大官与民的相互不信任。民无路可走，便群起劫官犯上。因此，王韬大声疾呼：“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

第三，停止妄费，与民休息。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平民百姓落入了贫困不堪的悲惨境地。但是，以“朘民”、“食民”为能事的中国统治阶级，从君主到各级官员绝大多数仍改不了他们根深蒂固的贪婪本性和奢侈作风。为了满足欲望，他们编出各种苛捐杂费的项目来，加紧对劳动者的搜刮。王韬认为此种“剥民政策”乃饮鸩止渴之举。他告诫清朝统治音赶快把注意力从追求多征捐费和奢侈生活转移到关心国事民疾和节制开支上来，放弃竭泽而渔、不计后果的短视国策。他上书清朝当道大员说，自战乱之后，民间创巨痛深，连昔日富庶之地江南也“户牖衰减，殷富散亡，已万不如前”，因此，清朝政府不应再在已经不堪负担的人民头上横征暴敛，而应与民休息，“招集流亡，抚恤灾困，俾各归其所。给之牛种，课之耕作，无主不垦之地，许以其所出半归于官。减赋损捐，勿再多取令其重困。其他裁冗去烦，革奢崇俭，开源节流，次第举行”，务使“农不惰于田，妇不嬉于室，商不重征，贾不再榷，各勤其业……上益下富，藏富于民”。

王韬特别提醒封建君主率先体察国难民艰，崇尚节俭，革除官中的“妄费”。他写道：“从来奢侈起于逸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欲节俭，必自君躬始。每岁织造中有可减者减之，有可罢者罢之，不必辄循常例。宫中所需，宜有定数；内务府宜岁支以若干，而不必求之外省……其他修造之有可省者，工程之不必兴者，一例勿行，自然费不至于浩繁。”王韬在这里差一点就要要求中国的封建君主象英国的国王一样“预算公定，布告天下”了。后来，他研究了英国和法国的税制，终于说出了税收“藉以养民而便民”，君主亦“不得擅自支取”的话。通过全面的“去弊”，王韬到底要把中国政治改革到什么方向去呢？王韬没有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但他的思想倾向性却又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既是王韬批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停捐纳”。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停捐纳”。

王韬：《弢园尺牋》，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第15页（光绪十五年弢园老民校刊本）。

判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参照系，也是他倾心向往、不断呼唤的理想目标。

王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始于他“浪迹香江”之后，而真正静下心来比较研究，进而把它介绍给国人则始于1870年他自欧洲旅行归来之后。1870年到1871年《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书的翻译使他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有了比较全面而清晰的了解。此后，王韬基本上没有改变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在许多后来写成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文字里，王韬希望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研究对比中西方历史的过程中，王韬首先对民主制度优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肯定无疑。他在研究了法国国会之后评论说：“逸史氏王韬曰：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是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亦乱旧章也。偶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拿破仑一朝即可援为殷鉴。夫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虐殃民，贪暴失众。盖上下两院议员悉由公举，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輿情，不洽于群论，则众人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涉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中国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尝不如是，每读欧史至此，辄不禁喟然高望于黄农虞夏之世，而窃叹其去古犹未远也。”

相比之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简直成了剿杀民意、祸国殃民的恶魔。王韬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此一制度——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的厌恶。在前面“社会批判者”一节里，我们已引述过他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谴责文字，这里再举数例他对西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文字，以见其思想之一贯和全面：

西国当百余年前，国皆世传，至君尊民卑，上下否隔，国势愈离，人心愈散。

波旁也，阿良也，拿破仑也，斯三族皆王族也，而百姓鲜爱戴之忱，大臣无拥立之志，天之所弃，谁能兴之。

英昔日之政，王揽事权，国多变乱。

王韬强烈谴责封建帝王的“威福自擅”、“政令由己”和“传柞于子”，指出它们全是“大拂民情”的倒行逆施，必将招致内忧外患交相迭乘的衰乱局面。这是对东西方统治者的共同警告。

王韬是一位眼光犀利的思想家。他不仅比较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的优劣，而且观察到西方民主制度中君主立宪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差别。他这样叙述道：

泰西之国有三：一日君主之国，一日民主之国，一日君民共主之国。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第28页。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九，第20页。

王韬：《普法战纪》，卷二十，第29页。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九，第15页。

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此君民主也。

三者相比，王韬最推崇的政体是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政体。因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但十九世纪的中国已经找不到毫无私心的尧舜之人，所以实际上君主制是导向衰乱之制；“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只有君主立宪制，“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王韬虽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赞不绝口，但从来也不主张在中国切实推行。从上面所引录的史料看，王韬确实没有明确提出要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但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指向是明白无误的。在王韬的价值观和语词里，“三代”是人类社会美好之最的代名词。每逢王韬对某一事物推崇备至而又无法形容时，他才用“三代”一言以蔽之。王韬在这里的真实用意显然不是为了推崇“三代”而推崇之，“三代”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完美。王韬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所比事物的赞美推重，同时借“三代”的神圣招牌，消减保守分子的抵抗排拒心理。所以，王韬把君主立宪政体誉之为“有三代遗意”，而又不断地呼吁要返朴归真，重返三代，也就是主张在中国推行这一制度。王韬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聊文人，他的文章往往都具有直接的强烈的实用功利色彩。很难想象王韬在大声赞美、极力推崇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又不主张在中国实行之。

事实上，王韬还是写过一些指意非常明确的文字，直接了当地主张要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如他在《与方铭山观察》一信中借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日趋紧张、中俄大战迫在眉睫的危机，强烈呼吁立即变革中国政治，推行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西国之法”。他写道：

欧洲诸邦，土地不如中国，人民不如中国，然而能横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君民共治。我中国民人为四大洲最，乃独欺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争不亲，一手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诚如西国之法，行之于天下，天下之民其孰不起而环卫我中国……今我朝廷诚能与众民共政事，同忧乐，并治天下，开诚布公，相见以天……撤堂帘之高远，忘殿陛之尊严，除无谓之忌讳……将见众民激励一生，其气磅礴于罔外，复何有乎俄人。我中国自强之道，亦不外乎是耳。

御侮、自强、推行君主立宪政治，三者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王韬最强调的重点是后者。在他看来，没有后者的实现，前两者目标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之月，画中之饼。

关于王韬的政治理念，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史学界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即认为王韬反对共和制度。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王韬虽然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最为佩服，但并未反对共和制度。在大多数情形下，他并没有严格区分两者，而是将君主立宪制度与共和制度同视为西方民主政治，并同时以之作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参照系。前引王韬有关西方国会的赞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王韬：《弢园尺牘》，卷十二，“与方铭山观察”。

美之词就是王韬在介绍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之后所下的结论。王韬对西方共和政体的称赞还有多处，兹再举一例，以佐证笔者观点之不误：

总之，凡事绅（即议员）主之，官成之，统领统之而已（即共和政体）。下情得以上达，不至间阎之疾苦，民庶之休戚壅于上闻也。而国中所有秀良之民，贤能之士，怀才负德，具一材一艺者，多由公举，无所谓湮没不彰者矣……举办一切，上下同心，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碑也。人谓西国之强由于兵力，吾谓西国之强由于民心，众志成城，亿兆之众若一人。 —

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4年2月10日）的《循环日报》上，王韬还专门写过一篇题为《法辟议院》的文章，盛赞法国的民主政治，说“统领麦马韩大辟议院，筹论国事，爵臣绅士咸集”，群策群力，使法国危而复安，乱而复治”。他由此断言民主制度可以兴邦救国，而君主专制制度只能弱国、亡国，“盖一人端拱于上，而百执事趋承于下，万机之理，为务之纷，非一人耳目心思所能周也”。

当然，王韬文字中也的确存在一些对共和制度感到怀疑或困惑的说法，但那些往往是对某一具体事件或现象、如红色恐怖、“共和党误信自由作事残忍”、国会党争等而发的愤激之言，它顶多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对共和制度的担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说明王韬政治思想的深刻性：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在肯定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也看到它的相应的弊端。因此，这不能作为王韬反对共和制度的证据。王韬要反的是忽视民意、没有人性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都是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型武器。王韬考虑问题固然有时欠缺严谨，但还没有傻到以反对民主共和制度来击垮自己的理论根据的地步。

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五、不谐调的变调

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相比，王韬在构筑思想宫殿之时有两点不利之处。第一，王韬思想成熟于国门刚刚开放之际，其时，传统势力异常强大，西学新知只不过是传统菜畦边上的幼芽嫩草。王韬在这种情形下谈论他的改革就象一位兵士在前有重敌后少友军的战地上冲锋。敌人的强大迫使他做出某种策略性的妥协让步；第二，王韬受传统旧学的薰染远比马建忠、严复等人严重，而又没有后者那种经过西方科学文化、思维方法等专门而系统地训练的经历。他是从现象观察入手来谈论西学和中国现实问题的。他的大多数文字是为某一具体事件而写就的议论和上书，极少考虑各篇文字的一贯性和逻辑关系。这两点因素造成王韬思想体系上存在不少断裂和矛盾之处。它们是王韬改革思想主旋律中的不谐调的变调。这些变调虽然不可能掩盖主旋律的雄壮音响，但却无疑有碍主旋律的完美。

（一）道德与功利的矛盾价值取向

道德与功利是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一对互相联结的部分，它们既有相统一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就一个正在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民族而言，追求功利与保持固有道德有着直接的冲突。因为，保持固有道德与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相联系，追求功利与追求社会进步相联系，它伴随着许多社会振荡和精神失衡。因此，是重和谐、重稳定、使社会进步服从于现存伦理道德标准，还是重进取、重革新、承认新的社会进步对原有道德尺度的突破，的确是一项很煎熬人的选择。

王韬象中国近代的大多数的思想家一样，在道德伦理、秩序和功利、社会进步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他震慑于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蚕食鲸吞，渴望以急功近利的宫国强兵运动挽衰弱国势于既倒，可又不愿意看见儒家传统在现代化的行进中分崩离析；他强烈地终身不渝地为中国的富强摇旗呐喊，可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儒家“原道”的奔走呼号。正如他虽身为清王朝的“罪人”却依旧迷恋着回归大清王朝一样，他的思想虽然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最激进的最具有现实功利主义倾向的思想，其背后也不谐调地拖着一条传统道德主义的辫子。

王韬的伦理道德观念包含在他的“道”的范畴里。“道”在王韬论著和书信中是经常出现的字眼，但指涉的意思并不相同。如王韬曾说过：

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

盖天道变于上，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

惟见微知著之士，上稽天道，下悉民情，按诸中外古今之事，乃足以语之。

这里的“道”或“天道”与王韬文章里出现的“运会”、“天心”等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是与“人事”一词相对而言的。它是王韬变法自强理论的基础，是可变的。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六合将混为一”。

王韬的“道”或“天道”在指涉道德人伦或孔子之道的时候便变成了一个绝对不可变更的万古长青的东西。下面几段文字就可说明：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盖以伦圣，而非以圣圣也。于此可见，道不外乎人伦，苟舍人伦以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

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

我中国之所恃者，道而已矣。天不变，道不变。

孔子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人伦之道本质上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农业家庭自然经济是共生的很难分开的联体儿。王韬既然要祈求孔子之道的万古长青，便不可能不妨碍他对封建政治和经济的批判；不可能不妨碍他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追求；不可能不妨碍他对西方之学的及时鉴取。大多数现代文化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孔子之道是不能衍生出国家的民主与富强的，过分地强调形而上的“道”，必然要把形而下的“器”推入到“道”的阴影里去。于是，科学不成为科学，而成为无足轻重的下流末技，成为皇权政治的婢女，成为“道”的辅助工具。

王韬是以倡导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和学习西学而著名于时的。但西方资本主义是一个包括器物、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统一综合体。王韬一旦把孔子之道视之为人类的永恒之道，就必然要排拒西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相应的意识形态。果然，他在他的论著里直言不讳他说：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

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

道德是人类优于一般动物的标记。有人类就要有道德，人类不亡，道德不尽。这一点王韬算是说对了。但是，道德是不断发展，不断变更，不断完善的。每一个时代对道德都有不同的要求。传统道德中固然有其合理的成份，但从整体上说它是与近代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需要人们对它进行改造和转换。如果把封建时代的道德神圣化、永恒化，使它成为以后所有中国人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那就大错特错了。王韬道德观的局限性正在于此。

（二）鼓吹“西学源于中国说”与倡导学习西学的矛盾。

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和周边民族文化上的归向，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抱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或名之为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在近代条件下不是拒绝承认“非中国”的一切美好事物，就是把一切“非中国”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西人重日轻华”。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与周弢甫徵君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杞优生易言跋”。

的美好事物强制性地附会为中国固有之物。“西学源于中国说”就是后者的典型表现。

王韬也没能彻底摆脱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群体性格。他在 19 世纪 60 到 70 年代就提出了“西学源于中国”的说法。他曾这样写道：

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当尧之世，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测天，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时……当时畴人子弟，岂无授其学于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犹称为东来法。乃欧洲人必曰东来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从震旦得来。欧人之律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则正授自中原。即以乐器言之，七音之循环迭变，还相为宫，而欧人所制风琴，其管短长合度，正与中国古乐器无殊。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之轮舟，鼓轮激水，其行如飞；此非欧洲火轮战舰之滥觞乎！指南车法则创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归，霹雳炮则已见于宋虞允文采石之战，固在乎法朗机之先。电气则由试琥珀法而出者也。时辰钟则明扬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测天仪器，何一非由璇玑玉衡而来哉？……其他同者，或亦由东至西渐被而然者也。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不因此而益信哉！

各民族的科学文化确有相互影响、相互传播的可能性。但是在交通和通讯比较落后的古代社会，科学文化大多呈现地域性发展状态却是事实。近代西方科学文化是近代西方“慧智之士”在他们自己的文化科学传统的基础上，经过艰苦地思考、探索、实验之后总结出来的知识成果，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工艺技术风马牛不相及。王韬硬将两者扯在一起，且断言西学是中学东被的结果，纯粹是出于文人的主观想象，没有任何历史事实根据。

然而，王韬提倡“西学源于中国说”与封建顽固派宣扬天朝上国的无限荣光的目不同。后者旨在维持现状，阻止改革。如同光之际的顽固派人物方浚颐曾说：“往者杨么之四轮激水船，王彦威之飞虎战舰，韩世忠之飞轮八楫，虞允文之蒙冲海鳅，其制初不在西人下。即我朝前代善用机括以造器者，亦不乏人，见于著录，如婺源之江永，其名尤显。然则西法实出于中国，而流传至彼。彼之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为富强之计。而我内地奸民遂与之勾结煽惑，陈书当道，几欲用夷变夏。夫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宇，奠安黎庶；虽武乡侯之木牛流马，亦仅能行于蜀汉鼎足三分。而所谓天锡勇智，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也。”王韬把西学称之为中国固有之物则是为了减小顽固派对西学的排拒心态，唤起国人从事改革的信心。所以，他把“西学中原说”也归在主张变法的文章《变法上》之中。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铜龙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住；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待炮人，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盖同一舟也，帆船与轮船迟速异焉矣；同一车也，驾马与鼓轮远近殊焉矣；同一军械也，弓矢刀矛之与火器胜败分焉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学”。

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一。（光绪四年自刻本）

同一火器也，旧法与新制收效各别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与机器难易各判焉矣。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

象中国近代另一位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家薛福成在为专门介绍西学新知的《格致汇编》（傅兰雅主编）写序时还大谈“西学中源”以求西学广泛传播一样，王韬在这里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西学找到一个合乎中国“法统”（Legitimacy）的存在理由，从而鼓励国人大胆地去接触这个新生事物。

尽管如此，王韬这一强制性的附会说法仍然是害大利小。它给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首先，“西学源于中国说”在价值基础上必然预先承认中国之学高于西方之学、中学是西学的鼻祖、西学是中学的衍生物。这种承认无疑会助长、加强封建顽固派夜郎自大的保守心态，增加中国历史前进的阻力；其次，“西学源于中国说”在逻辑上将会彻底否定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既然中国传统经典里早已包含了这些“西学”，人们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千里遥遥地从西方引进呢？恢复古代社会和古代之学足矣；再次，“西学源于中国说”把西方之学限制在“古已有之”的范围内，这势必会框限中国改革者的眼界。因为，虽然有些西学可以在中国古代寻出“蛛丝马迹”来，但大部分西学是任何想象丰富的国人也无法从经典中附会出来的。对这部分内容，“西学中源”论者就只好舍而不论。也就是说，西学中的大部分内容由于在中国古代找不到“先例”而被从西学中剥离出去。中国学习西方的广度和深度大打折扣。

（三）宗法制主张与改革封建政治的矛盾。

宗法制度在中国有古老的历史，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演变而来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政治的工具。各级统治者利用宗族血缘关系，强制宗族成员“尊祖敬宗”、“唯上是从”。否则便以违反家法族规的罪名治罪。例如，统治阶级经常用“不孝”、“不悌”、“不敬祖”、“败坏族誉家风”等罪名来惩罚那些敢于反抗的反叛分子。因此，在宗法制度下，普通宗族成员无异是一群物质上被束缚于土地、精神上带着族权枷锁的驯顺之民。这有利于封建统治者渴望的所谓国泰民安、尊卑有序的政治局面的实现。

然而，晚清以来，宗法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在经济逐渐资本主义化的沿海地区宗法制度几乎荡然无存。与此相应，“敬宗法祖”、“唯上是从”等宗法观念也日趋稀薄。当此局面，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一方面惊呼世风日下、民心不古；一方面期望以恢复和加强宗法制度来挽救世道人心，以避免天下大乱。于是有龚自珍“农宗”主张的出现。龚氏认为封建社会“乱象”横生的根源是农民破产。因此，运用古代封建宗法制度来安定近代农民的生计、稳住“礼乐刑法”的基础便是最有效的安邦治国的办法。王韬正是秉承龚自珍的农宗思想，提出了他的“强宗法”主张的。

王韬认为，天下之治乱的关键在于“民心之得失”，“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而欲得民心，必须“重民”；“重民”又必须“有以维持而联络之”。用什么来联络呢？最好方法便是“讲行古者宗法，以强宗维弱宗，小宗附大宗，各相为辅”。他说：

古者官有世族，族大人众，与国同休戚，共患难。世族皆有甲士，足以入卫公家。春秋之

时，国富而兵强，率恃乎此。康叔之封于卫也，分以殷民七族；唐叔之封于晋也，分以殷民六族……此皆所谓强宗豪族足以辅国而立邦者也。其在民间，亦多聚族而居，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行守望相助之法，猝有内忧外患，足以联络声势，藉为捍卫。自后世宗法不讲，散处都邑，虽行团练，而其心不一。

王韬在这里把“宗法不讲”当成国家散失民心的原因、把“讲宗法”当成国富强兵的手段，其目的除了前面叙述的“重民”考虑外，显然还有为统治阶级出谋画策的意味。他在随后的文字里说得更明确：

治民之要，在抚字以结其心，勇敢以作其气，忠孝节义以厉其心志，轻摇薄赋以养其身家，务使安其居，乐其业，可静而不可动，而忠君爱国之心自然生于其中。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王韬居然还保持着一般乡村地主文人的观点，人类思想进步的艰难性于此可见一斑。

王韬提倡讲求宗法，但宗法已坏，想要恢复亦非易事。王韬似乎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并没有过于强烈地要求全面恢复宗法制度。他建议只要维持住闽粤两省常见的“一姓为一乡”现状，佐以屯田团练之法便差强人意，“乡落之间，悉寓堡砦，习攻战，明守御，兵农交辅，耕作相资。俊秀者使登仕版，壮强者倍给禀饩，有事皆可以备征募，供调遣，在城者足以佐防兵，在乡者足以助团兵，在畿辅者亦以此法为宗兵。如是而根本不强，枝叶不盛者，未之有也”。在边疆地区，则可将聚居于京城省垣的旗民迁徙于此，实行比较规范的宗法制度，使大小各宗各执其业，相辅相助。王韬坚信一旦统治者照此而行，民富国强“不难致矣”。

对宗法制度的全面批判是王韬的后一代人——新型学堂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开始的。王韬那一代人还没有觉悟到宗法与封建专制制度、小农经济和等级观念等相互间的关系。因此，王韬提倡宗法自有其历史的可原可谅之处。但是，宗法制和宗法观念毕竟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是中国民主自由思想长期得不到发扬光大的罪恶之源。王韬‘提倡它无疑与他自己批判封建专制、呼吁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和倡导个性解放南辕北辙。王韬没有察觉到这一矛盾，这表现了他的思想欠缺一以贯之的精神和严密的逻辑性。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第六章工商社会的吹鼓手

十九世纪末，新生的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从而昭示了中国社会极有希望的光辉前景。然而，封建统治势力并没有停止过对新经济因素的限制与摧残。王韬蒿目时艰，以工商阶级代言人的姿态，对封建势力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嘲讽与批驳，对刚刚出现的工商经济因素给予大胆热情的讴歌。他的正反两方面的言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开拓出一片不曾有过的新天地，宣告了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呱呱坠地。

一、“商为国本说”

一位与王韬同时代的封建文化人居然如此说道，商不生财只耗财，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出自这样的文化氛围，早年的王韬也被旧的、传统的东西捆住了思想。如前所述，他在上海时期依然对蒸蒸日上的西方工商业文明不以为然，说“商足而国富”的“泰西之政”不合中国之道，电器秘机凿破其天，不合太古之风；中国所重，当在礼义廉耻而非奇技淫巧。甚至到他寄居香港之初，他还在到处游说“天下之大利在农桑”，“重农桑而抑末作”。

然而，王韬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没革抱住这些早年的陈腐观点不放，当他旅英三载，发现富强之邦如英国者竟是立足于“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商贾之迹儿遍天下”基础之上以后，很快意识到古老的以农为本和重义轻利观念已经根本不能适应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里自强更新。于是，他抛弃“故我”，以全新的姿态呼唤和赞颂工商文明。他热情地写到：

自兴割木之制以来，所造船舶，未有若英国之盛者也。民间贸易转输，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国富兵强，率由乎此。

贸易之道广矣，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精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

“商”从“末”的地狱一下于跃升到“国本”的天堂，从备受诅咒变为备受顶礼膜拜，表明王韬的价值观已经与传统封建士大夫价值观脱离开来。在此时的王韬眼里，固守重本抑末、重义轻利观念的封建士人简直是一群夏虫不可语冰的“迂拘之士”。他们坐井观天，自以为是，沉溺在自己制造的小国寡民的空洞幻想里不能自拔，看不到世界正走向“万国相通”和“工商相争”的新格局，看不到中国在自然经济那层恬静面纱后面的虚弱之象。王韬断言，在新的内外形势下，封建守旧派人物所推崇的“不施不惠、种瓜自食”、“自守其拙、自得其乐”的义利本末观不仅不能维持住中国社会的安定太平和人们的精神平衡，而将会把中国引向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苦难深渊。

王韬进而对封建守旧派所谓“重本重义”的实质予以无情揭露和嘲讽。他指出，守旧派表面上“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视“利”如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但实际上却是专以“剥农为能事”、惟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的逐利之徒，“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其整日大言不惭，狂呼农本商末、义重利轻，口口声声“道德人心”、“小民生计”，只是为了保住他们的租税源泉。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农民不过是养在后院可以随时挤压榨取的奶牛而已。王韬甚至有意识地撰写了一篇名为《窃妻》的小

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洋务运动》，第一册，第297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113页。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抚李宫保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英重通商”。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说，对封建士人不轻言利的虚伪性进行冷嘲热讽。小说描写广州西南乡有甲乙两兄弟，甲为读书人，乙为行贾。甲贫乙富，乙常常周济甲之不足。不料，甲最后竟利欲薰心，不仅拐走了乙的钱财，还骗走了乙的爱妻。嬉笑怒骂之中，王韬要告诉人们的显然是，一贯标榜重义轻利的封建士人大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其道德劣于商贾远矣。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应该彻底颠倒过来。后来，他在许多政论性文章里直言不讳地提到，要将虚伪不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所谓“士”象禁绝游手好闲有害无利的游民一样驱除尽净，而对在工商贸易领域有所建树的商人、舟师等则不妨象英国实行的那样“荣以头衔”，予以奖赏。

“重商”是王韬在深入地观察和思考、并认真地估量其得失代价之后才提出的思想结论。王韬指出，“重商”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益处。第一，商可以使那些娴于技术的工匠和游手好闲之徒自食其力，有事可做，既减少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镇定民志”，又可培植社会元气，达到藏富于民的效果。“民富”是国家繁荣兴旺的基础，“民之富藏于公，家之丰通于国”，民与国相辅相济，一旦内外有事，便会立于不败之地；第二，“商”可直接为国家带来财富。工商税收的范围更广、量更大，因而比单一的农业税更有潜力向国家提供财政来源。西方国家的财政实践对此已经“屡验不爽”；第三，“商”可强兵，不仅现代化武器的制造和供应离不开“商”，而且就其财力来说，“商力富”才能“兵力裕”。没有财源，强兵只能永远是一句空话。英国兵马雄强，正是由于英国商税丰富、商兵相辅所致；第四，商可抵制西方的经济掠夺，挽回利权。中国若仿效西方，外则通商于泰西各国，内则以轮船火车运输贸易，“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中国将“自握利权”，日见其富，西商之利则将因为中国的商业竞争而日分日薄。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王韬还注意到通商在外交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在“万国相通”的时代，弱国穷国凭借闭关绝市或军事抗争是很难有效保证民族不受欺辱的，而通商则能保国于无形。他说：“昔年美国之攻日本，索求通商埔头，当时亦仅美利坚一国耳，而日本则以为当与泰西诸国通商，不必以一国为限，而美国遂不得独专其利。英人之始通商于我中国也，诸国继之……卒至互相牵制。故通商可以御侮。”他甚至向他的越南籍朋友建议，越南与其正面军事抵抗法国的侵略，“莫如与欧洲诸国通商，缔好互立盟约”，认为这是“越南今日之要务”。

“重商”既然有这么多益处，王韬力主中国全面开放通商。他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一信中理直气壮地把“广贸易以重货财”当作救世方策中的第一良方，并建议当道者端正对商的态度，关注商情的变化，研究为商之道；在有关“商”的政策和策略上，要撤得开，搞得活，既大力发展国内商业活动，也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既允许外商进来，也鼓励华商“越乎境外”，“售与彼邦”。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轫时期，除了前面讲到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造成中国人对工商行为的苦恼与困惑外，还有一种似是而

王韬：《遁窟谰言》，卷十一（上海大文书局，民国十二年本）。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越南通商御侮说”。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非的观念阻碍了中国人主动地对外开放通商，这就是把对外通商视作等于变卖祖宗财产的短视之见。在此见解影响之下，中国对外通商往往是在被打受辱或彻底战败之后作为投降让步条件的迫不得已之举。在此之前，中国人一般是不愿意主动开放通商的。为了某一商业开放问题，中国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与外人周旋，甚至不惜一战。王韬对这一现状十分忧虑和不满。他开导中国统治者说，中国外交老是围绕通商问题较短论长是不明事理的庸人自扰，没有“争其所当争”。中外既已立约通商，则允许外人至内地贸易亦为“例之所当然”。在通商问题上深闭固拒，徒增国际社会从旁“姗笑”，以为中国“识见甚隘，襟怀不广”。中国外交的着眼点应该在争取治外法权的废除和关税自主权的获得；同时发展自己的工商业，增加商业竞争力和出口能力，与外人商战，“机器既设，货出必多……彼之利藪且为我所夺矣，何虑之有”？“西人以有利而来，安知不以无利而去”？王韬似乎坚信中国只有如此才能走出动辄受辱的外交困境，以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王韬对中国人经商能力与中国发展商业的前途抱有乐观主义看法。他以十分自信的口气劝导时人说，中国自对外立约开放通商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不相同”，初时，外国商人拥厚货，居奇货，垄断市场，俯视一切。华商只能唯命是从、仰其鼻息。今则不同，华商逐渐兴起，在江海陆地到处与洋商争衡，而且华商之利日赢日厚，洋商之利日分日薄。就香港一地而言，外商“岁有数家闭歇者，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以至“昔日洋行渐改为华房”，崛起了一个颇有经济实力并能影响香港政治的华人资产阶级。因此，王韬满怀希望地断言：“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博。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在彼者，呢布为大宗，我自能仿效；在我者，丝茶为巨项，我亦可捆载以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十九世纪中后期，既是中国面临西方进一步侵略的存亡绝续之秋，也是中国在西方文明刺激下刚刚步入现代化的转折关头。当此之际，固有的伦理教条和保守观念继续以顽强的力量从后面拖住中国前进的脚步；新生的源于狭隘民族情感的仇外心理也迎头筑起了一道中国走向世界的屏障。迂腐不堪的保守主义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几乎将中国现代化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此理性不足、庸见俗论甚嚣尘上的社会环境下，王韬高张“商为国本”的旗帜，对“商”予以不遗余力地赞颂，将“商”的兴旺发达视之为富国强兵、保国御侮的前提条件，的确独具慧眼和胆量。它体现了王韬经济思想的深刻性。

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系来看，据胡寄窗先生的研究，宋明以来中国在重农抑商思想的巨石下面，也曾多少出现过一些呼喊重视商业的细流。如清初思想家王源曾说：“本宜重，末亦不可轻”；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也曾把“末富”看作是较易摆脱封建束缚的致富途径。但是，这些思想最终都没有彻底突破农本商末的窠臼。王韬重商思想则不同，它不仅彻底超出传统本末规范的极限，把本末和士农工商的秩序颠倒过来，而且把“商”推至无以复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除额外权利”。

王韬：《弢园尺牘》，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参阅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西人渐忌华商”。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加的“国本”的高位。因此，王韬的重商主张在性质上已经不是农业社会开明思想家欲语还羞的吟哦小唱，而是资本主义时代新型思想家对商业的热情洋溢的礼赞。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韬超越了前人，也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重商思想的先河。

二、“全面兴利说”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在形式上是军事侵略和政治干预，实质上则是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对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的挑战。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或价值的追逐，包括原料基地的强夺、商品市场的开拓、资本的输赢赢利，是西方人热情涌向东方、迷恋东方的动因所在。刚刚落入东西方冲突中的中国官僚士大夫们，甚至连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思想家在内，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把中国遭受侵略的原因不是归之为夷性犬羊、就是归之为中国兵备未修。在这种认识笼罩下，十九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反侵略活动，如“反入城斗争”、驱教运动、大修沿海沿江军事设施、建立和培训洋枪队、火器营等等。然而，这些活动并没有将中国从被侵略的被动地位里拯救出来。其中有些活动如驱教和“反入城斗争”甚至将中国引向了耻辱和灾难。

王韬与上述官僚士大夫不同，他在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干涉的背后看到了它的经济因素。他指出，欧罗巴一洲虽然幅员不广，人民不多，但其洲内人才荟萃，学艺精通，机器精良，舟车发达，其国计以工商为本，重视富强之术，重视贸易之道；漂洋过海地征逐利润被欧人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人人乐以效命。与欧洲情形相反，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民智巧，但当道者不懂经国治邦之道，“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藪，而亟为之兴利”，“迂拘之士又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以致经济调弊，国穷民贫，其情形正如一个得了“疴”疾的重病人，脂膏日削，内亏严重，弱不禁风。

在此东西方经济力量相差悬殊的背景下，中西文明相交的结果，自然是人为利剑，我为腐肉，砍杀由人，我自忍受。

据此基本认识，王韬主张，中国自救之道“不必言攘剔，不必兴挾伐”，首要之图在于发展中国自己的工商业，用他自己的经济概念来讲，便叫作“首在兴利”。

“兴利”是王韬经济改革思想中的中心议题。他多次在论著中和献议里鼓吹“兴利”意义。他说，兴利已不是中国统治者可以讨价还价的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国际资本主义潮流下中国人必须做出的无可回避的选择。

“利”本来是一块极富诱惑力的甜食。在中国政府看不住国门的情况下，如果不允许、不提倡中国人主动去开发利用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利”，那么，一直在门外觊觎此“利”的贪心之徒就永远怀有冲入大门的冲动，中国也就一天得不到太平。王韬以建造铁路为例说，英国继垄断了中国水路运输之后，其“轮车铁路公司”又秘密地“绘图贴说”，企图攫取由云南经重庆至汉口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英国至所以还“掩而未发”，是因为“英国驻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骤，故未代为之请”，但他们专心致志于铁路掠夺则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上海吴淞之事已可援也”。因此，审时度势，与其留着大利引狼入室，“不若我中国之自为”。换个角度讲，中国一旦“兴利”，外来者在激烈的工商竞争面前就会“无利而沮”，自然而然地减低侵入中国的热情。再者，中国全面兴利之后，民富国强，外来者即使有心掠夺也存有顾忌。昔日西方列强动辄欺侮中国的局面将会得到改变。因为，外交是国力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建铁路”。

的竞争，“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分之请也。”王韬“兴利”的“利”到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他在《兴利》一文中罗列道：

利之最先者曰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铁之利。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盖矿中有煤则必有铁……今我自开铁矿，则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二可铸造枪炮，建制铁甲战舰火轮兵船，三可分行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而亦可售之于西人，以夺其利。一曰掘煤之利……英人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中国既有煤铁，则彼贸易亦必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亦无如我何，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一日开五金之利……其次日织绸之利。此外则一日造轮船之利；一日兴筑轮车铁路之利。

参照王韬所留下的其他文字材料，他所关注的“兴利”活动，几乎覆盖近代工商业的一切领域，诸如矿山、制造、交通、通讯、银行、加工、兵器等各种行业，无所不包。在许多文章中，他以极大的耐心，向刚刚从恶梦中醒来可还没来得及看清世界的国人仔细讲述这些近代行业在国外的状况和它们可能对中国国计民生带来的影响。《循环日报》中常常出现名为《建铁路》、《设电线》一类的文章。

王韬所倡导的兴利活动中的新兴行业，其基本特征从生产力角度讲属机器大生产。他坚信引入机器是中国工业振兴的前提。从生产关系角度讲，这些新兴行业应以商办私营为主，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商人而不在国家，国家的义务只是保护和监督企业权利不受侵犯，他明白无误他说：“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一句话，新行业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

王韬甚至把他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和商办主张贯彻到古老的农业生产中去。他说，世人关于机器生产将会破坏农业的俗见是杞人忧天。机器推广于耕织，不仅不“足以病农工”，而且将带来“事半功倍、地利得尽、人得广”的大好处，“富国之机权輿于此”。他特别提到在开辟荒地的过程中应广泛“济之以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力”，同时，允许和鼓励“富有货财者”出面“商办”农业，以分其利，快其速。机器生产和“商办”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内容，王韬在这里已经触摸到它的边缘。相对于前代和同代思想家，王韬的历史识见何其远大卓越。

王韬的“兴利”主张具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视角。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严格说来属于“政治学”，经济者，经邦济国者也。也就是说它是从国家政治出发、而又以国家政治为归宿来看待所有经济问题或现象的。在传统经济思想家看来，农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把人口维系在土地上面，从而为封建国家造成一种上下相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是传统经济思想追求的最大目标。所以，当工商业以一种骚动不安的进取姿态向农村进军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总是提心吊胆，害怕这一封建统治赖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治中”。

以存在的条件趋于丧失。鸦片战争以前的思想家龚自珍倡导“农宗”，期望以比较固定的土地继承制度来安定农业经济，其思想出发点就与这种担心有关。

与上述传统形态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王韬的经济思想更接近“商品经济学”。是建立在对“利”的充分肯定和全面估价的基础之上的。一事当前，王韬最为看重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利”，而非政治或道德上的“义”。以他对开采煤铁的呼吁为例，他几乎完全是从“利”的角度去论述问题的。他说，第一，统治阶级认为开矿徒滋骚扰是不明事理，矿务之好坏与人心无关，而与技术和工具有关。清朝统治者反对开采，无异于使自然之利密而不宣。这是因噎废食；第二，中国煤铁一贯依赖从外国进口是自界利权与外人，中国若自开煤铁诸矿可免却进口，减少利益外流，甚至可以借此增加出口，独收其利；第三，可以增加国家财政税收；第四，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兴起，如火车、铁路、轮船、机器制造等都可就此次第举行；第五，机器一旦实行、交通一旦改善，农业生产亦可升级，事半功倍，地利可尽得。广大的农业剩余人口也可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工矿、铁路、机器等“在在皆需人以为料理”。近代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最大限度或“最大化”地追求利益或效用。从王韬对经济活动的利益算计中，似乎透出一丝近代经济学利益分析或效用分析的光辉。

王韬“全面兴利”主张对“利”的关注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接近于偏执。王韬对鸦片问题的看法最能说明这一点。王韬认为，鸦片问题实质上是工商战争问题，西方人耿耿专注于鸦片贸易，“不过嗜我利而已”。因此，与其因禁烟“徒爱惜损国体之虚名，而不顾敝国本之实祸，岁糜数千万以益西人”，莫如“自我栽种以收其利”，以己之重利对抗彼之重利。他断言，只要中国土鸦片日多，烟价日减，西人贩烟之利日微，“其来必不禁自止”。王韬在这里的目的显然还是抵抗西方鸦片的侵入，还是意图宣扬一种重视工商活动、重视经济之利本身效用的商业精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依然标志着王韬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一贯性。但是，理性与非理性有时只有一步之遥，王韬把对“利”的强调推至不可思议的程度，无论如何不能被当时以至后来的中国人所接受。当代西方有一种迷信利益万能、商业竞争万能的激进主义的禁毒主张者，认为只有以毒品制造和买卖合法化才能最终抵制毒品的泛滥。王韬的主张与他们的倡议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相同的错误在于，认识上都走进了极端主义、绝对主义的死胡同。

“兴利”一词并不是王韬的创造。在中国传统经济理论里它曾被多次重复运用。但是，运用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把出发点放在国家政治或社会安定之外，还把它的内容限定在国家税收领域。所以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兴利”，而是“理财”。王韬“兴利”主张则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财”框限，其强调的重心在生产领域，因而具有崭新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内核。在王韬看来，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国家把眼睛死盯在如何征收和增加捐税是舍本逐末，它不可能带来国家的真正富强。他批评说：“今所谓开源节流者，皆于厘税二事，殷殷致意，是不过取之于民而已。愚以为取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王韬：《弢园尺牘》，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据此认识，他对清政府一味增加税收、尤其是卖官鬻爵的所谓“兴利”做法深为不满。他指出，以官爵来卖钱不仅不能“生利”，反而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殃祸人民；只有把注意力放在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领域才是明智和有效的富国富民之道：“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务……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细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利权之所以日落也。”

清朝统治者明码标价地卖官鬻爵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而深远的，舍其政治上的危害不谈，单就经济方面而言，它的危害就是灾难性的。它导致了中国社会资金的不合理流向，许多社会闲散富余资金被搜罗到封建官府手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本来就很薄弱的资本积累在卖官鬻爵所宣导的“官本位”意识作用下始终是不成气候的“辙中之鱼”。王韬从经济角度对这一有害无利的做法提出批判，指出它削弱民间资财，从而从根本上阻碍民族的进步与富强，表明他具有非常犀利的、不同于传统理财观的经济眼光。

王韬的“全面兴利”主张与早期洋务派的主张有貌似之处。在对封建顽固派作斗争方面，王韬与洋务派同属一条战线。但是，必须给予留心的是，王韬“兴利”主张强调的重点与洋务派所强调的不同。大多数洋务派看重的是“强”，是军事工业的振兴；部分洋务派人士虽然也注意到“富”的重要性，但其着眼点是封建国家的“富”，是官营企业的“富”。王韬的“全面兴利”主张不仅一开始就提出“富在强先”，而且强调“民富”优于“国富”，“民生”优于“国势”；前者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锁钥。他曾写道：“至于富强之术，宜师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也。稔悉中外情势者，可不亟为之计哉？”“欲富国音，莫如足民。”“民生既足，国势自张，而后一切乃可以有为。”他甚至说出兴利的基本意义和目的就是要把原来属于民的潜在之“利”变成实在之“利”而还之于民：“天施地生，山蕴川怀，此自然之利也；制造操作，佐以机器，此人工之利也；舟车致远，贩有易无，此商贾之利也……此非与泰西诸国争其利也，亦欲使我固有之利仍归诸于民耳。”从强调“强”变到强调“富”，从强调“国富”变到强调“民富”，再进到承认兴利富民是经济活动的意义所在，着重点的转移变化，带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从洋务思想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转进抬升。在这转进抬升过程中，王韬不亏是一位先人物。他牵引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方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是部分洋务派人士所提出的“国富”主张，也是在王韬经济思想的启发下产生的。以洋务派的“头羊”、创办“求富”企业最多的李鸿章为例，他在十九世纪70年代曾有不少关于先富后强的议论，但细读他的议论，我们便不难看出这几乎全是王韬经济思想的变调。在他的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停捐纳”。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合力防俄”。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书信和奏折里有时甚至会一字不差地出现王韬的文字。例如，在他给清廷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有这样一段话：“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这段话显然是王韬致李鸿章的幕僚丁日昌信中的原文。可以断言，李鸿章肯定看过丁日昌转呈上来的许多王韬的建议。王韬书信中所提到的开煤铁矿、兴织纫、创轮车、筑电线等兴利主张实是李鸿章后来“求富”主张及其实践的源头活水。

王韬不仅在总体方向上为洋务派提供新思路，而且在企业实践方面予以具体指导，洋务派官僚常常为企业事务向王韬请教方略。比如，唐廷枢在办理开平煤矿时就曾询求王韬的意见。王韬告诫他道：

自北运南，必藉轮船。窃以为宜先贩之天津、牛庄、烟台三处，费省而价廉。至山路崎岖，尤须一律砥平，或筑铁道，庶几转输可速，近矿之处，河道可通，必当浚深，使轮船得以直达。中土所以胜于西国者，以值廉而力勤。今局中百事周备，惟少学习驾驶一门，如能干浙、闽、粤三口设学塾，今年力壮健，材质明敏者，入而肄业，苟有能充舵师舟长之任者，试之船事以尽其能。至岁给俸薪亦宜有定则……如是则一切度支必少于西人，出寡而入多，行之十年，定有成效可观。

王韬在这里已经触及运输成本、劳动力价格、职业技术教育、工资水平等问题，这些都是现代经济学在产品成本计算方面必须涉及的范畴。王韬“兴利”思想对洋务派思想的超越于此亦可窥见一斑。

王韬在强调“利”、“富在强先”、“民富”优于“国富”、“兴利”优于“理财”以及成本计算的同时，还注意到企业的组织形式问题。王韬认为仿行西方的股分公司形式是开办近代工矿企业的最好形式，他说：“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而不使官吏得掣其时，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殫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此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王韬要求将创办工矿交通企业“大利”都公之于民，并且由民间自办公司独立经营，实际上就是希望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取代封建主义的官办经济，结束皇权与官权垄断社会一切的局面；其二，他提出“富民出其货，贫民殫其力”的见解，表明王韬不仅渴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活动，而且承认资本生殖原则，承认资本家有“剥削”的权利和贫民有出卖劳动力并得到报酬的权利。这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在资本主义初期反复论证的主题。对它们的承认标志着王韬已经打破“以德为本”、“为富不仁”等陈腐观念的束缚，实现了经济思想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飞跃。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第50页。

王韬：《弢园尺牋》，卷八，“上丁中丞”。

王韬：《弢园尺牋》，卷十一，“与唐景星观察”。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三、“国佐工商说”

“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不成文法律和习惯信条。工商业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处在被限制、被贬损、被砍削的可怜境地。鸦片战争以后，在外来的压力下，中国工商业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仍是国民经济中被人看不起的配角。与历代统治者比较起来，晚清统治者对工商业的予取予求、肆意敲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王韬对封建国家轻视工商、敲剥工商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奋，其之所以落到民贫国弱、不堪一击的地步，全是由于统治者“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藪，而亟为之兴利”所致。他曾以华人未出国门时困苦不堪，而一旦出国谋生反而富裕“出乎上人之上”的现象为例，指责中国封建统治者“于簿书钱谷刑戮鞠讯”之外，从来不知道引导人民“运其心思之灵”兴利求富。他说，西方国家每每称赞中国百姓“赋性灵敏，勤于作事，能耐劳苦”，苟国家有意扶持倡导，未尝不是经营事业的好手。无奈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对“民之所欲”和“民之所恶”皆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对“民之生计若何”更是“贸然不暇计”，狃于积习，“无有为之倡率”，以至作为天下最有营生潜力的中国百姓竭其手足之力、心灵之巧竟不能“自足以赡其身家”。仓虞实才能知礼节，衣食足才能知荣辱，吃不饱穿不暖的百姓自然与国家离心又离德，内忧外患于是交相迭乘。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一信中，王韬用更明确的语言，采对比的手法，以英国政府保商、助商态度反衬中国统治者轻商、剥商做法，谴责后者是倒行逆施。他写道：“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力，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对“商”的“遏抑剥损”的结果，不但使“商”备受折腾，难以兴盛，连清王朝自身也无利可得，元气大伤。王韬在左右开弓地痛击统治者。

清朝敲剥工商的典型政策为厘金制度。厘金征收始于1853年。原是清政府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军费而实行的临时措施。可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不仅没有撤除，反而将它常规化扩展到全国。从此，厘金成为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一根绳索。厘金制度对中国工商业的危害复因《天津条约》和《烟台条约》关于外国商品只交2.5%子口税、免交一切内地税的规定而加剧。中国工商业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许多民族工商业者因不堪外商竞争而宣告破产。

对厘金制度给中国工商业所带来的危害性，统治阶级不是不知道。咸同年间的当权大臣曾国藩、李鸿章都看到了厘金对工商业的冲击。但他们认为农业是“本”、工商只是“末”，因此，即使冲击之也无伤大体。曾国藩曾说：“病农之钱不可取”、“病商之钱可取”。李鸿章也说过：“自古加赋则为苛虐，征商未为弊政”；“与其病农，莫如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王韬：《弢园尺牋》，卷七。

曾国藩：《劝戒州县四条》，《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第50页。

李鸿章：《复郑惕庵少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45页；《复朱久香学使》，朋僚

王韬对清政府盘剥工商的厘金制度及其自我辩护态度十分痛恨。在他看来，清朝的厘税之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恶政。它“ 榨尽锱铢，搜无遗蕴 ”，将民间工商者压迫在“ 无利 ”或“ 微利 ”的可悲境地，打击了民间投资工商业的愿望，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而通过厘金制度征收得来的资金又根本没有用在正当事业上。它们不是被皇室官府挥霍浪费掉了，就是落入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与经济发展毫无关系，王韬为此建议统治者，与其“ 关卡林立，厘厂税厂征权烦苛，商民交病，行旅怨咨 ”，不如干脆将其全行裁撤，以鼓励天下转运贸迁。针对清朝统治者对财政亏空的忧虑，他提议可加重农业丁税极加重征收鸦片及进口烟酒之说来平衡补偿，他写道：

今之理财者，徒见厘金一废则一省度支将无从出。不知细于彼者赢于此，鸦片之税可以加重，而洋酒吕宋烟皆可榷税，以入维正之供。古者本有丁税，现悉摊入田亩，然而善理财者，丁税之制尚可循古法以复之，惟毋使之扰民而已，安知非补直之一道也哉？

验之于中国当时人口过剩、鸦片泛滥、洋烟洋酒进口量增大的国情，王韬撤厘征丁、加重鸦片、烟酒进口之税的主张显然比曾、李“ 病农不如病商 ”的主张透出更多的睿智和理性之光，也表明在身份上王韬的确与曾、李等洋务派人物有一定背离。他是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代言人，而后者则仍然是地主阶级和封建经济的护卫者。

王韬进而主张对传统的国家与工商业的关系予以重新调整。新的国家与工商业的关系原则上应该是“ 佐 ”与“ 被佐 ”的关系，即国家不应该仅仅是工商业的征税机构，还应该是工商业的服务机构。

国家如何才能做到佐助工商而不“ 为工商病 ”呢？王韬认为，国家应该首先在指导方针上重视工商，理直气壮地做工商社会的倡导者，勇开“ 言利之门 ”。针对民间对工商的误解和疑惑，国家应有责任“ 教导之 ”；针对民间经营工商的热情，国家有责任“ 鼓舞之 ”，以形成一种户上行而下自效”的有利工商发展的社会环境。王韬相信，聪明智巧能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守着金山叹穷的局面一旦“ 有大力者以开其端，潜移默化 ”，就一定得到彻底改变。其次，国家应在资金方面率先投入，主动联络富户创办实业，积极为民间“ 谋生聚之道 ”、“ 辟生财之源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王韬在倡导“ 官办不如商办 ”的同时，又提出馆商相为表里 ”之说。他这样写道：

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曰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盖承充之商非巨富重资者不能为，而地方大吏往往于两三年间升转迁移，法令每多更张。商人虑其掣肘时，不乐于一试。今欲矿务畅行，莫如酌仿轮船招商之例，而小为变通，招商局中集众非一，虽封疆方面皆预其间，而隐为之规画，于是各富商无不踊跃，咸尽其心力，所以其事易集。苟矿务亦能仿此

函稿，卷六，第 37 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以行，衙署差役自不敢妄行婪索，地方官吏亦无陋规名目私馈苞直。

显然，王韬这里的“官商相为表里”与洋务派所提倡的“官督商办”侧重点的不同。洋务派着重的是“官”，即“官权”、“官利”、“官控”王韬强调的是“商”，即借官方以“扶商”、“佐商”，“凡事皆商操其权”，商为主办者，官为佐者。

王韬进一步发现，近代国家机器的职能本来是多方面的，国家有责任利用其权威保护工商活动。中国是一官权过重的社会。在此社会里，工商业者不仅创业费尽周折，而且在开业之后常遭兵匪、土棍、恶吏的破坏和敲榨。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工商业者一遇危险，便会从此裹足不前。他特别提到国家机器的核心组织军队，认为军队不应该只是抵抗外敌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还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护卫。他说：“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中国与泰西列国通商，不当但恃商力，必如西国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商办则以殷实干练之人估价承充”，初开之时，军队以外，其他国家机构也应该把辅助、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作为责无旁贷的“公务”。如中国的驻外公使和领事，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王韬为此写道：

泰西诸国往来，首重通商，于是简公使设领事以联络之。公使总其大，领事治其繁……保卫商贾，护持贸易……保商贾兴贸易者，固使臣领事也。

遣使驻都，设立领事于贸易之地。民间往来内河，尽许用轮船。有出洋贩运于诸国者，华官皆为之保卫，或为先路之导。

把国家军队的职能从镇压内部反抗和抵御外部入侵扩展至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把驻外使节的职能从宣扬国威和通彼此之情扩展至翼护中国对外贸易，王韬为中国近代第一人。此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接过王韬传下来的火种，把这种主张足足呼喊了半个世纪。

为了提高中国工商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王韬进一步提出在国家机构中应增设专门的商务机构商部。他指出，西方各国不怕中国讲兵习武，却特别害怕中国振兴商务，与之商战。所以，当中国专意发展工商业之时，西方诸国政府和商人势必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展开竞争和实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定要有相应的专门实权机构从宏观上给以指导和扶持。他把成立专门指导机构提高到能否实现自强更新的高度：“今日中国欲制西人而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欲商务之旺，莫如设立商务局始。”后来他在主持上海格致书院时，又在学生有关设立商部的文章上加批“第一要着”、“确有见地”等推赞之词，并在一位学生作文的结尾处进一步发挥，提出在各省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大守书”。

中国史学界存在两种说法，一说王韬是“官督商办”主张的积极倡导者、是洋务派思想家；一说王韬是时而主张“官办”、时而主张“商办”的思想矛盾者。从本节的分析可见，这两种说法都是颇为偏面的。王韬的真实用意是“商办而官佐”。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使才”。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洋务在用其所长”。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

设立官商相辅的总商局，以与国家商部共同为中国工商服务。他这样写道：“治国以富强为先，而富强必自振顿商务始。中国之患，正在官商隔阂，多所掣肘，英人设立东方贸易公司，即为入贾中国之基。中国而减欲富强也，必先在各直省创立商务总局，以达商情而裕商力，以中国人民之众，若能通力合作，亦复何事不可为哉？”王韬最初提出设立商部的时间比清王朝真正设立商务部要早 10 年左右，这一点也说明了王韬思想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前导性特征。王韬是时代的弄潮儿，他总是乐意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呐喊开路。

国家不仅有责任通过国家机器扶助、保护工商业，而且有责任为工商业的发展建立良好的社会服务设施，诸如银行、专利局、保险公司等。王韬在研究西方经济发展进程时特别留心于这一类问题，并多次在论著和书信中介绍它们的效用，敦促中国统治者积极模仿兴办，他曾这样写道：

西国之例，凡工匠有出新意制器者，器成上禀，公局给以文凭，许其自行制造出售，独其专利，他人不得仿造。须数十年后乃弛此禁，其法良善也。

西方贸易之利，首在航海，顾风波之险，有时不可测料，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以为之调剂，于百中取二三，无事则公司得权微利，有失则商人有所藉手，不至于大损，此其法诚至善也。中国既设轮船招商局……则招商保险二者要当相辅以并行……不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中馁，今惟赖西人保险，则徒寄人篱下，权自彼操……今当轴者业经奏准轮船招商遍行各处，保险公司例可二三年间创行，以中国之人保中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乃得尽归于我。况夫轮船之所至，想不至徒囿于中国一隅也，将来以中国之货物运行于外洋，则保险之设，亦由中国而外洋，随地立局，与轮船公司相为左右。

十九世纪 70 与 80 年代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草创时期。此时，清朝封建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金融、专利和保险等社会服务性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更谈不上实际创办这些事业。处此局面，中国货币持有者或怀艺抱技之士要么视工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要么借外国保险公司、专利公司或银行为庇护伞。这两种情形都加重了中屡社会本来就已经很不合理的资金和技术流向。中国闲散货币不是变成了死财富，就是变成了洋资本；民间技艺不是在秘不外传中香火断绝、不知所终，就是被外人利用过去招财进宝。民族工商业发展在资本和技术两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王韬敏锐地看到这一点，竭力鼓吹近代银行、保险和专利事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催促清朝统治者大力兴办，确实是切中了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大肯綮。遗憾的是，颞顶不灵的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将王韬的这些主张落实到经济实践中去，致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始终处在有气无力不死不活的病态。这是王韬的悲哀，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尽管如此，王韬的主张依然闪烁着不可磨灭的思想之光。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年），华国盛文王韬尾批。（光绪丙申袖海山房石印本）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博物大观》。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大守书”。

四、新财税观的萌芽

凡是有政府的地方就有税。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税和政府都是连体儿。

但是，对税的实质的理解，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却有天壤之别。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观念流行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学家从没有怀疑过皇帝及其官府有征税和用税的权利。税一旦入了国库，它就完完全全的是皇帝的囊中之物了。纳税人再也用不着去为它操心。

资产阶级在西欧兴起以后，税为皇帝或国王私物的观念遭到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基于“天赋人权”的学说，不再把土地及其附属财产当作国王的所有物，而当成自己天生的应得之物。在他们看来，税本来是不必产生的，只是因为人类必须要组成社会共同生活，或换句话说，人类必须要选出官吏或建立公共设施来管理公务、服务自己才不得不创造出税的。所以税的所有者是纳税人，而不是收税人。当纳税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的工作感到不满意时有权撤换管理者或拒不交税。法国三级会议正是在这种观念导引下拒不服从法王路易十六要求他们增交税款的旨令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税权在民”的观念被法律化，写进了国家宪法。征税之权从此被收入国会，纳税人有权监督国会任何有关财政税收的议案。

从传统封建社会走来、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了几十年、并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有过深入研究的王韬对东西方有关税收的实践与观念都不陌生。经过长时间的反思比较，他逐渐摒弃封建形态的“税者王有”的税观，而接受资本主义“税者民有”的新税观。

早在赴欧旅行之前，王韬就已经对清王朝的财税措施严重不满。在寻找太平天国爆发原因的思考中，他发现“苛税”是这场原本为土客械斗的地方之乱演变为烧遍大半个中国、绵延十数十年之久的燎原大火的罪恶之源。他写道：

今之弄兵者一卜异民也，即前日之民子若孙也。奚为昔顺而今逆，民盖久有以疑我矣，积疑则生乱。朝廷加恩之诏，蠲赋之条，官吏率奉行不力，或已免仍征，或既纳始告，民遂疑我以虚文……加税增赋，劝捐抽厘，搜无遗利，民遂疑我以重敛。

然而，此时的王韬还没有触及对税的实质的思考，他只是认为封建政府征税大多太滥超过了人民可以负担的程度而已。“税者王有”的观念还没有从他的潜意识中剔除出去。正因为如此，他提出的拯救衰世的方策依然是传统的轻谣薄赋、减税衅民一套。他在上给李鸿章的治吴善后之策中论证最多最力的是“抚恤灾困”、“减赋损捐”、“商不重征”、“贾不再榷”一类。

旅欧归来之后，特别是在研究了欧洲近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之后，王韬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财政税收制度和税观；而这种财税制度和说观与中国古老的税制和税观相比显然具有无法估量的优越性。他写道：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粤逆崖略”。

王韬：《弢园尺牋》，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法国政治，其权不归统领而归国会……议事之期，刊发上年度支出入之数，遍示绅民，傅共核算，稍有虚滥，人共驳诘。夫出入币项，至于巨万，而较尽锚蛛，不爽毫发，殊非易事。条列通告，固所以示公也。众人皆知以通国之财，治通国之事。在上无所沾润，官有侵吞不公者，民可申报，察明斥革。

欧洲国用具有一定，每岁出入之数，预经核算，所入若干，则所出亦若干，无赢亦无继。若遇国家意外不测之事，或兵戎战伐，或水旱凶灾，则贷诸民间以应急需，是为国债。然必由上下议院酌定然后施行。

王韬承认，西方各国之税在绝对数量上绝不亚于中国征税之数，有所谓房税、车税、马税、犬税，甚至御赐功号皆有税。可尽管如此，民间从不怨其苛敛。究其原因，就是由于纳税人对税有所有权。国家官吏只是一个身份简单的管理者，“不过司出纳、掌簿录而已”。象中国官场司空见惯的“朘民为生”、“蒙蔽”、“侵冒”、“剥蚀”、“婪索”、“乾没”诸弊，在西方各国从无出现。官方每行一事，必须将“所费逐款开示，昭然在目而无疑”方可。甚至皇帝御费也“俱归国会管理”，“国王亦不得擅自支取，岁中所用，必有限度”。

王韬曾以英国财政为具体事例揭示资产阶级财税制度的优越性说：“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为入，一切善堂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宫库，藉以养民而便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这段话道出了资产阶级两个重要的财税原则：一是量出为入；二是民税民用。前者要求国家一切税收必须经国会辩论决定，造出预算，然后再根据预算来征收。无特殊重大变故，任何人不得随便征税；后者要求必须将纳税人所上交的税款无条件地服务于纳税人，任何将税款挪作他用的行为均属非法。王韬以推崇的笔调、通俗的语言将这两个带有强烈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财税原则介绍给国人，其“倒打”中国税政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果然，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语带讥讽地写道：“国君所用，岁有常经，不敢玉食万方也。所居宫室，概从朴素，不尚纷华，从未有别馆离宫迤迤数十里也。国君止立一后，自后以外，不置妃嫔，从未有后宫佳丽三千之众也。”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以同样的笔法写道，英国财政每年将工商税收的很大部分用来资助工商业的发展，而中国情形却是重征商税，抑损商人，从无资助商人之事。英、中两相比较，“其间相去何如哉”？平日最神圣的中国皇帝及其官府由于征税用税无度无法，在这里变成了被痛击的把子。

综上所述，王韬不亏是一位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创立者、开路者。他所提出的“商为国本”、“兴利富国”、“国佐工商”和财税服务于民等经济观点在中国近代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指导现实和开拓未来的双重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反审传统经济实践与观念、大讲工商的潮流经王韬点拨之后一发不可遏止。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第 25 页。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第 10 页。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第 15 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但是，王韬毕竟没有系统接触过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也缺乏理论和思想方面的职业训练。他是从现象观察入手来谈论近代经济问题的。因此，与中国后来曾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王韬经济思想又存在许多浅泛和散乱之处。比如，以提倡借用外资兴办中国工商业而言，王韬曾说：“或者谓所言数者（指兴办富强事业）非糜国币千万金不易猝办，顾一时安得集此巨款。则告贷西国之举，亦可聊出一筹。国债之行，泰西常事耳，何足为耻？”这就远不如后来的严复对同一问题所论证得周密完整。严复说：借款兴业不存在利源外溢之事，“计学家言曰，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则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赋，人工禀其庸钱，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是三者，中国于前二则得其全，于后一则分其半。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乎？”显然，严复本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要比王韬仅以“泰西各国如此”的现象归纳法要更加有力。王韬在这里表现了他的经济学理论功底的不足。当然，这不是王韬的过错，但至少是他经济思想的一大缺陷。

王韬：《弢园尺牍》，卷九，“代上黎召民观察”。

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论》”，《严复集》，第一册，第15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七章近代外交思想的开拓者

王韬一生并没有做过外交官，但他一直以“熟谙外交”、“揣摩洋务二十年”自居。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就不断地发表文章和上书当局阐述自己的外交主张和设想，呼吁清朝统治者在外交领域来一次全面革新。因此，对外交事务及其改革的关注是王韬变法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办理外交的大官僚如吴煦、徐有壬、丁日昌、何如璋、李鸿章等都曾为外交事务征询过王韬意见。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驻英公使郭嵩焘及其助手马建忠也都曾与王韬讨论过外交事务。可以这样说，王韬不是外交官，但他对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卓越贡献远非一名普通清朝外交官所能企及。他是中国近代新型外交思想的开拓者。他的外交思想及其策略主张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尽管他对时局的判断和主张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失误。

一、外交观念的革命

王韬新型外交思想的产生与王韬“华夷观”的倒转有密切关系。促使王韬放弃传统“华夷观”的最重要因素是他的欧洲之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实地考察彻底扫荡了他头脑中华尊夷卑观念的残余。在全面地冷静地比较了“华”与“夷”的长短优劣之后，他断然宣称：不是夷不如华，而是“华不如夷多矣”。他说，论法度典章，泰西各国，政教修明，财用充足，兵力雄强，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忧”。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权，于簿书钱谷刑戮鞠讯外，已无他事矣。其民之生计若何，困苦若何，为抚字，为鞠谋，贸贸然不暇计也”；论器物技巧，“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缕指数”；论人心教化，彼“雍容敬礼，守教怜人”，“崇真尚简”，“心齐志固”；而反观中国，“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矫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

在万事不如人的现实情形下，王韬认为中国统治者及士人坚持“内华外夷说”、空喊“华尊夷卑”，纯属自欺欺人，“大谬不然”。他进而总结出一条判断“华”与“夷”的标准：“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而受之于礼之有无也。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照王韬的这一标准推理，所谓“华”与“夷”的区别本来是不存在的。如果封建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偏要在中西之间划一界线的话，处在被人轻视的“夷”的地位的，不是“泰西各国”，而恰恰是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的中国本身。“华”与“夷”的地位被王韬彻底颠倒过来。

伴随着对华夷认识的转变，王韬提出了许多新的外交观念。这些观念构筑起一座近代外交思想的殿堂。

王韬外交思想主要有下述四重新观念构成：

（一）尚通。

“通”是王韬思想成熟时期的基本哲学观，也是王韬认识、评判、谋划外交事务的原则之一。王韬认为，世界的终极目标是“混同”，“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而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足迹深入中国穷乡僻壤，正是天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华夷”。

合一混同之契机。当此合一契机初显之际，中外均应该循共同之目标，不拘成格，不分内外，互通互融。只有中外消息通，情意达，误会、猜忌、仇恨才可能泯灭，对抗、战争才可能最终避免。

本此原则，王韬主张中国正确的外交方针应当是主动地对外开放，积极地走向世界，包括既允许外人来华通商，也鼓励华人贸易西洋：既允许外国公使“驻馆”中国，也提倡中国遣使他邦。他反对清朝保守派“划疆自守”的消极被动的外交方针，认为他们在世界渐趋混同的形势下慷慨激昂地空喊“严夷夏之大防”，不仅滑稽可笑，与事无补，而且贻害无穷。他写道：“说者谓中朝制度迎越寻常，前代漠馱姑勿具论，即如我国家康、雍、乾三朝，圣德兵威，警惕殊俗，式廓版图，讫乎化外……三代以下不逮焉。今诚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则闭关谢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国……子之所云，适足以贻笑于豪杰之十而自玷耳。不知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又说：“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始终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

王韬对中外相通的结局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坚信东西方接触面的扩大和交流渠道的增多对中国突破外交窘境益处甚多，如他在论及遣使出洋一事时说：“中国公使之遣，则恭承简命，职重公尊，专以固好修睦，筹画军国重务。苟我国中有中外交涉之事，其中曲直是非所在，可以与彼国大臣面为敷陈，否则亦可陛见国王布宣壹是。而所刊日报之中，如其议论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为驳斥，俾通国之人见之而晓然，此所以达外情于中朝，而即所以布中情于远地也。如是则既不至隔阂，又何事于纷争。故遣使驻扎各都，于国事要非无裨也。”

王韬大力鼓吹“中外情相通”，一方面具有批判封建顽固派夜郎自大、打破传统外交“唯格绝严防是尚”模式的意义；另一面也驳诘了那些骨子里仍存在“华尊夷卑”观念的洋务派或“师夷派”，否定了他们洋务旨在“制夷”的单向外交观。论敌的众多与强大迫使王韬采用“重炮轰击”，因而论理之中难免矫在过正之处。根据王韬的上述观点，“中情”与“外情”相通几乎成了挽救中国免受列强欺侮的法力无边的魔杖。这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近代外交理论来讲，“通”所包含的互相接触、互相开放、互相对话的确是消除国际纷争的不二法门。王韬在思考中触及这一近代外交原则，正表现了他外交思想的深度和先驱性。

（二）贵和。

“贵和”本来是以“仁”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要素，所谓“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士大夫长期信奉的处世哲学。然而，在实际的对外关系中，中国统治者及士大夫从来就没把“非我族类”的“夷”当作“贵和”的对象。在中国统治者及士大夫的眼中，“夷”乃是不知礼义、不懂诗书的“化外之民”，因而绝不可以理喻之，只能以力服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崇尚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设官泰西下。遣使”。

一种“贵战”的外交思想。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正统典籍中，凡是对外主战者总是被当成民族英雄大加尊崇，凡是对外主和者都被当成畏葸无能的民族败类大加贬斥。

王韬勇敢地与这种“贵战”的外交思想相决裂。他站在现实与理性的制高点上，大胆地喊出了异于正统、异于俗论的清新之声，即中国对外政策理应“贵和”；“和”是保存中国、振兴中国的最佳选择。他说，我中朝在今日非用兵之时，中国为今之计，对外莫若暂与之和，而专顾富国强兵之术，“蓄力待时，审机应变”。因为，“天下事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苟反其道而行之者，未有不败者也”。

王韬对封建士大夫那种不顾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死、动辄“据典言战”异常痛恨。他批驳道，汤犹事葛，文王犹事昆夷，唐太宗开国英主，而屈尊于突厥，宋真宗擅渊之捷，而犹许以酬市，何足为病？“王者保国安民，其道应如是也”。古之强主对蛮夷尚且如此，况今日华夷强弱倒置，焉能舍和趋战！他把封建士大夫所谓“宁可覆国家，不可言和”的浮浅气矜之论斥为“妄人之论”、“亡国之论”，“其为害烈矣”。

中国近代是强权环伺，险象丛生的时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当此局面，中国是以“动辄言战”，还是以“慎兵保和”来应付时代的挑战，确实是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一方面由于秉承传统士大夫对“夷狄”的鄙夷不屑，一方面出自于对鸦片战争以来外人横行霸道的新仇恨，强烈要求对外采取强硬路线，以战对敌，振奋国威。从《南京条约》签订之日起，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停止过对战斗的呼唤。然而，无情的历史实际是，每一次“振奋国威”的结果不外是中国屈辱求和，或赔款、或割地、或允许开埠，一切“干求”，概行允诺。王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毫不掩饰地提出“慎和”的外交主张，无疑对国人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贵和并非投降主义。“和”不是消极被动的或战败后迫不得已的“和”，更不是“见夷即让”或“见夷即奔”。而是主动积极的富有进取意义的“自强以御侮”。王韬论证说，天下事不徒恃战，不徒恃和，恃我有以待之，“惟先尽其在我者，而后徐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则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洋，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船，而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羨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辨证的语言中透出近代外交思想的睿智之光。

（三）重势。

与“贵和”观念相关联，“重势”也是王韬外交思想中的重要概念。王韬所讲的“势”包含“内势”与“外势”，即中国国情国力与敌国力量及国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言和”。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上”。

际局势两方面。王韬认为，不论主战主和，处理对外交涉问题的首要前提便是“审势”；对“内外势”的清楚了解是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说：“夫今日待之之道当如何，一曰审势，一曰察情，一曰观衅。所谓审势者，不独审彼势而亦以审我势。今者彼强我弱，彼勇我怯，彼盛我衰，彼富我贫，亦已形见。如不欲与和，则必出于战。夫既与之为难，则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预操夫必胜之术而后可。然果能之乎？亦惟曰不甘受侮，期与之战而已矣。然能幸其一胜也，而不能幸其再胜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恃也，则战之不可行也审矣。”根据王韬的看法，清王朝外交至所以每况愈下，不可收拾，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昧于内外大势，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他曾为此感叹说：“呜呼！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而下禁重有感焉。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亦既三十余年矣，而内外诸当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其于利害之所系，昏然如隔十重帘幕。”

那么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大势到底如何呢？王韬认为从总体上看是“彼强我弱，彼勇我怯，彼盛我衰，彼富我贫”。在这样的大势下中国之所以还保持着主权，不是由于“中朝之礼义可以优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慑之”，而是由于“泰西各国之互相牵制也”。因此，中国眼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借和平之机，发展经济，改良政治，宫国强兵，以积聚自己抵抗外来侵略的力量。

内外大势为“已然”之事，那么中国在此“势”下就只能束手待毙吗？非也。王韬的“势”并不是一个一尘不变的宿命因素，而是一个随时间和人事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可变项”。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不不变者也。天下机会之来，岂有终极，忍之于今日，而报之于他时，天道循环，断无或爽。“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招，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所未行者，轮车铁路耳，则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变之机也。”王韬相信，只要中国统治者顺人心，尽人事，亟图变法自强，就能促使中外之势发生变化。一旦中国易弱为强，易贫为富，中国外交便能“有恃而无恐”，改变“和辱战更辱”的现状。

囿于国际知识的不足和理论的欠缺，王韬对“重势”的论述是相当不严密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论据有挂一漏万之嫌，而且表现在论证缺乏理论力量。尽管如此，王韬在近代中国主战之声甚嚣尘上之际提出外交“重势”观念仍具有可贵的方向性意义。它把制定对外方针的基础从主观空泛的儒家信条和所谓“士民义愤”拨转到物质性的“内外大势”上来。此一外交视角的转变正标志着中国外交思想向务实主义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四）崇简。

“崇简”是西方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文化观念和行事原则。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薰染的王韬也接受了这一观念，并把它推行到外交评判、外交设计等外交认识领域中去，从而使他的外交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自1840年以来，清朝统治者把中国外交引入了令人困惑的死胡同。一方面，最高统治者顾全中国君主的“天子颜面”，维持住“天下共主，万邦

王韬：《弢园尺牘》，卷四，“上徐君青中丞第二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上”。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设领事”。

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卷十二，“拟上当事书”；卷一，“变法上”。

来朝”的政治假象，尽量将中外条约密而不宣，推行自欺欺人的“糊涂外交”，并利用民众和官员对条约内容的不了解，暗中鼓励“辑民攘夷”；另一方面，肩有“折冲”之任的清朝官员颀颀不灵，企图以色厉内之虚声恫吓和繁杂不清的搪塞、推倭、拖拉来阻止西方各国的“一切干请”。王韬对清朝这种昏头昏脑加虚与委蛇的外交策略和外交作风深恶痛绝。他写道：“中国之事，事事为西人窥见其隐，洞烛其微，儿于无遁情，无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饰夸张以相掩蔽，亦徒贻笑端，适足以自玷耳”。那种故意的“县则倭之于府，府则倭之于道，道则倭之于督抚，督抚则倭之于总理衙门”、“迟之以岁月，稽之以文移，卑词以款之，多方以炫之，繁文褥节以牢笼之，虚声恫喝以羁縻之”的外交策略只能使“办理愈迟，头绪愈棼，言词愈繁，而事愈决裂”。到头来，应该“允如所请”的固已许矣，而“囊之所谓不可队者，即已无不如命以行矣”。

王韬提倡用一种“简明外交”来改变清朝模棱迟缓、游移趋避而“祸即从此而生”的外交现状。他说，与泰西各国交际，则尤当以简为尚，周旋揖让，无徒事乎虚仪，开诚布公，讲信修睦，遇有中外交涉大事，勿加束缚驰骤，勿苛以繁文褥节，勿拘泥乎成例。“今日所以待之者，惟有画一以示之信，宽大以示之礼，或是或否，以行我之权，无诈无虞，以布我之诚，与之行事，必简必速，不亢不卑，师其长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学以通其意。”王韬强烈呼吁清朝统治者彻底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作为君主，亟应毫无掩饰地将“中外所立和约”“钱版颁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皆知晓，有章可稽；作为办理外交的大臣，应平等待人，时常接见外国使臣，“惮得从容以毕其辞”。王韬断言，一旦中国奉行简明务实的外交原则，中外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端将会自然消解。中国也就不会再为这些争端付出惨重的代价。

王韬提出的外交新观念是对传统外交观念的全面背叛。传统形态的中国外交思想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是务虚性，即建立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儒家天下概念基础上的传统外交看重的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战略意义，而是空泛的政治象征意义。郑和下西洋也好，朝贡册封也好，不外都是为了宣示中国皇帝的恩威和炫耀中华礼仪的威严；第二是单维性，即传统外交思想是从内华外夷的“中国中心说”和儒家的等级理论出发的，它片面地要求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君民象中国的臣民一样称臣纳贡，而从不对对方为平等对手考虑其主张要求。在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士大夫们看来，外交不是双向的，更不是互利的活动，而只是中国向“不若我甚”的“夷狄”的恩赐或惩罚。因此，外人除听命服从外，绝无任何发言权；第三是僵硬性。中国统治阶级既然看重政治象征意义和坚持“一意孤行”的原则，就免不了使其外交缺乏弹性。在传统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中，对儒家教条、原则的呼唤大大多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中国外交家来说，在“以夷变夏”这条罪名的警戒下，可供选择的外交途径似乎只有两条，要么大张挞伐，令对方慑服称臣；要么赠送美女玉帛，安抚羁縻。其他中间式、平等式、互助互利式、不

参阅拙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辑民攘夷政策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办理洋务在得人”。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办理洋务在得人”。

王韬：《弢园尺牋》，卷七，“代上了观察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战不和式、有损有得式或损少得多式往往不在考虑之列。王韬提出的“尚通”、“崇简”、“贵和”、“重势”等外交观念对上述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显然是一个否定。它把中国外交思想推进到以务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外交思想的殿堂。

二、不同凡俗的教案观

在世界文明史上，宗教冲突并非罕见之事，但象中国境内发生的这种长时间、大规模、连同胞信徒一块打的“闹教”活动恐怕是少有的。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改变了前辈传教士谦恭谨慎的态度和单枪匹马的传教方式，紧跟着侵略军的刺刀成批地耀武扬威地闯入中国。这就激起了中国士大夫和民众的深恶痛绝。饱受患难的人们把侵略者加在他们身上的屈辱转换成复仇的怒火发泄在西方传教士身上。于是，一场又一场的“闹教”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

对于“闹教”，近代中国文化人，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大多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文化本位意识和民族情感使中国人极其容易把这一活动当成爱国主义加以支持和歌颂。王韬对此大不以为然。他以哲人的气魄和勇敢将“闹教”置于理性的聚光灯下予以重新审视，提出了异于流俗的观点。

王韬首先不同意民间把西方宗教贬之为“邪教”、把传教士贬之为“不良之徒”的俗见。早在离沪赴港前后，他就但承西方基督教自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西方传教士多为“劝人为善之人”。作于此时的《瀛蠕杂志》和《瓮牖余谈》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或有言耶稣并无其人，大抵由于西士之凿空无稽。是亦谬矣。夫西域远处海隅，敦庞初变，悍厉成风，而耶稣一人独能使之迁善改过，以范围而约束之。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呜呼！谓非彼士之杰出者哉？

（当教士初至美洲大陆时）屡以道劝化土人，土人顽硬，加以横逆……思易一法以劝化之：将土人散居各处者，驱而纳诸一省，使教士入而宣道。教士见土人之父兄习于性成，终难理喻，惟其年幼子弟习染未深，尚可化导，爰设学堂，招集顽童，教以文字，使知真理，并教以技艺。后顽童气质渐化，知识渐开，亦能建屋种田。其父兄见而悦之，亦有为其子弟所化者。至今是省土人皆化顽为良，骎骎日上。字里行间没有丝毫一般中国士大夫所具有的那种鄙夷不屑口气。

70年代以后，王韬因面对教案日益频繁的现实而更加注意对西方宗教的研究和传教士品质的思考。他曾在《循环日报》上发表题为《传教》的连载文章专门讨论传教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他虽然对基督教中的一支天主教略有微词，但总的说来对基督教的态度是非常理性和平和的，如他在谈及西方传教士品格时写道：

西国奉教之士，其来也由于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国俊髦，于西国书籍既通而又肄习中国之语言文字，其学问之深旨，亦卓然可称为专门名家：其性情品着有时亦复蔼然可亲，纯然有异。

在另外几篇文章里，他甚至承认西方宗教“外则与吾儒相敌，而内则隐

王韬：《瀛蠕杂志》，卷六，第196页。

王韬：《新辟西半球记》，《瓮牖余谈》，卷四，第106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传教下”。

与吾道相消息”。他特别提到基督教中的卜斯迭尼宗(卫斯理宗),说它“不拜上帝,不事百神,但尽乎生人分内所当为,实事求是,以期心之所安而已。”所以“其立说合乎中国圣贤所云”,不必视之太卑。

王韬对西方宗教这种理性平和态度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1893年,他的格致书院的一位学生在命题作文中写道:“夫西人至中国传教者,大半游手无籍之辈,国家防其肇事,资遣他往,藉传教之名,以来中国。英国著名教士有名吧者,主大教院,而不用本教中人,谓教中人皆贼,若容之进屋内,物无不被窃者。故此等无赖,大部远出至中国,彼教谓耶稣为牧羊人,而某教士则谓其教徒为牧狼人。波尝谓此种教士至一国必肇祸端,以狼招狼,无善处之理也。故中国办教案当持平,不当妄杀妄赔,以致民心不服也,此说得之英人某君,盖教案出时,余与之详论者也。呜呼,教士之不端,可想而知矣。以不端之人与不端之人为党,故中国之无赖,藉归教为名,横行乡里,积怒成仇,卒肇大祸。推其由来,夫谁之咎?而中国君上,岁费千百万,使西人贫者易为富,弱者易而为强,为西人计则得矣,而中之自计亦何拙也?”

王韬毫不客气地在这段文字的上方加批说:“此乃中国哥老会教匪,与洋教西教不同。立言须有区别”。“此事恐不尽然。西国传教之士前来中土者,具有学识,亦由其国精选”。“吧教士之说于何见之。本当删去……以教士为不端,抑何言之过甚也。西国传教由西国资其费用,与中国何涉。岁费千百万,窃未之闻”。

基于对西方宗教与传教士的基本认识,王韬认为把民教相斗的原因完全归之于西方传教士是片面和狭隘的。他说,所谓教案的爆发有多重原因,而最主要的则是“愚民之无知”。它第一表现在中国大多数士民不了解西方宗教的性质,尊己卑人,胡乱猜测西方传教士都是恶徒,专干骗诱妇女、虐杀儿童、挖睛炼银、采生制药一类的勾当,扬州、天津等教案都是由于民众误传传教士虐杀儿童引起的;第二表现在不了解西方宗教的流派区分,稍有不平事,辄演化为对所有西方传教士的全面宣战。焚烧屠杀,殃及无辜,“粤东兵事未兴,而佛山镇民已毁教堂两所,此皆英、美两国人所设,与法人无预,愚民何知,但抒其积愤而已”;第三表现在人教之人不了解入教旨在追求道德之完善,却反把人教当作欺侮同胞的护身符,横行乡间,藐视官长,甚至“动辄低孔孟为不足师,程朱为不足道”。王韬进而宣称“愚民之无知”是中国统治者多年来虐民、愚民的结果。以第三种表现为例,如果不是清王朝失去民心,“则彼虽百方以摇之,恶得有可攻之衅哉?国之有贫民,犹家有病儿也;其有怨氓顽奴泉徒,犹家有荡子也。有病儿而不之药,有荡子而不之检,使穿箭之盗,一朝诱焉以贼其亲,咎将谁当?”

王韬丝毫没有为西方侵略者开脱罪责的意思。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百姓“疾憾西人,盖亦有故”,“自通商以来,索口岸,索酬饷,辄以兵力从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地球图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纪卜斯迭尼教”。

叶瀚:“整顿中国教务策”,见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年)。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年),叶瀚文王韬批注。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拟上当事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传教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书日人隔靴论后”。

据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连檣北上，谓将入告，以至国步多艰，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愤者耶！”传教士与西方侵略者一道进入中国，在布道活动中又不注意尊重中国的孔子教义，遇有民教相涉之事，又从而“傲慢侈肆，借事生风”，这就免不了使中国士民将对侵略者的仇恨全部转移到与之接触最多的传教士身上。王韬为此提醒西方传教士要以基督的博爱精神在中国布道，他借用基督教中的一个流派“卜斯迭尼宗”的观点说：“教本所以教善也，人各有心，不能相强，而必欲尽驱之使进于天主、耶稣教之中，亦未免非怨道矣。设使一旦因教事而媾嫌启衅，俾血肉膏原野，黔黎隳涂炭，耶稣在天之灵，其能安乎！”既然教案发生的原因是双方面的，既然儒学与基督教又有相通之处，王韬建议民教双方都不应再固执己见，逞强好斗，而应采取相互宽容态度，“勿欺勿强”，“敦睦和好”。他甚至依据大同思想期望出现一种中国之道与基督教义合二为一的局面。他写道：

呜呼！自教术多端，同中立异，斗净坚固，于一教中自相胡越，其有能并包殊族，混其轱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也。故圣王在上，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今中国各教皆备，虽其教旨各殊，而奉天治人则一也，安知昔之以远而离者，今不以近而合乎？将来必有人焉，削繁核要，除伪归真，汰华崇实，去非即是，而总其大成者。

西国人无不知有天主、耶稣，遂无不知有孔子。其传天主、耶稣之道于东南者，即自传孔子之道于西北也。将见不数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为一家。王韬教案观的深刻之处，不在于仅仅指出了教案起因的荒诞性和区分出民教谁是谁非，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历史代价的新观念。王韬指出，外交必须讲究代价计算，所以，退一万步讲，即使教案的一切罪责全在西方侵略者和传教士身上，即使西方传教士依然我行我素，不改昔日粗鲁的布道作风，中国士民以焚烧教堂、屠戮传教士和教民及他们的家属方式来处理近代中西关系也依然是不明智之举，是徒自招损的“愚人之勇”。他分析说，国际交涉之道最看重的是“势”或实力。弱者与强者之间地位悬殊，弱者没有资格也不能与强者“以暴易暴”。所谓平等无欺唯理是尚的万国公法不过是强者的工具。弱者是无力运用的。所以中国若想不受欺侮，唯有反身自求，亟讲富强之道。“盖先尽其在我，而后人无不眼。我固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则人自然就我范围，而莫或敢肆。实至名归，其道然也。试观万国公法一书，乃泰西之所以联与国，结邻邦，俾众咸遵其约束者，然俄邀诸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而英不赴，俄卒无如之何。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

王韬注意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好发展时机。从国际上说，普、法忙于在欧洲的争夺；英、俄在中亚相互虎视眈眈；美国正把目光盯在西部。这种局面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使列强特别愿意在中国问题上稍作让步。英国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分别向本国政府建议，以比较温和的“合作政策”代替战争政策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以争取中国官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纪卜斯迭尼教”。

三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各国教门说”。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地球图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民的好感，稳定住既得利益。从中国国内政治来讲，洋务运动已在全国各地拉开序幕。怀揣资财的买办、商人、官绅面对着工商新潮流也正跃跃欲试。

但是，60至7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数百起“闹教”活动不仅将中国士民官绅的注意力牵引到教案之上，各级官府为处理善后问题疲于奔命，而且改变了某些西方外交官对中国的看法，以为非采用暴力高压政策不足以震慑住中国官民，维持往既得的条约权利。“天津教案”后英、美抛弃阿礼国、蒲安臣倡导的“合作政策”，改派强硬派外交官来华，中国外交形势急转直下。一边是头脑简单、徒知泄愤的“蚩蚩愚民”，一边是如狼似虎、恶面相向的西方外交官；一边是民贫国穷，一边是国富兵强，中国外交焉能不受窘辱。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前后，中国国内比较保守的清流派官员和地方士绅力主乘普法战争之际支持民众驱逐西方传教士。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因不赞成这样做而备受指责，精神压力很大。王韬担心洋务派真的支撑不住而采取保守派的意见，立即写信给丁日昌指点迷津。他说，所谓“乘势逐之”的做法是不知中外大势的糊涂之举。法国虽然遭到削弱，但西方各国在教案问题上“荣辱休戚无不相同，猝有变故，无不相卫，虽彼此之间或有隐怀嫉忌，而其外未尝不阳为协和；其内欧洲而外中国，由来已久，固非中国之所能左右之也。昔人有言，以夷攻夷，以夷间夷，以夷制夷，其策未尝不善，而断不能行之于今，苟欲以是施于中土，未有不啻枘者。何则？今昔之时不同，而中外之地殊也”。所以，办理教案仍应秉持“和为贵”的精神，“处置之间，当无偏倚，无二三，无迟吓；愆疏慢以肃官常，戮顽梗以警乱首，优恤死难者家，以示怀远。俾互市诸国，咸仰我皇度之公，而未由伺间以为难”。根据“天津教案”后各国军舰齐集大沽炮台联合示威的情形来看，王韬的这一见解确有明智之处。

清朝保守派官员及封建士大夫主张支持民众打教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民心可用，民力可恃”。王韬对此进行了驳斥，他在另一封致郑玉轩观察的信中指出，所谓的民心民力是空想出来的，并没有现实的基础：“今日之民心涣散极矣，国家之安危无预草野之休戚，朝廷之荣辱无关氓庶之忧喜；一有事故，流言传说尽人人殊，而其心亦复人人不同。此民之不足恃也。”

头脑清醒、洞观天下大势的王韬对愚民闹教所造成的中外对立局面一直忧心忡忡。他希望他的同胞国人能够听一听他的“自强方能御侮”的劝告。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教案依然连续不断，屠戮、赔款、抵命的规模愈闹愈大。1893年，年老多病、以为将归道山的王韬不甘心看着这样的局面在他身后继续下去，特请李鸿章为他的格致书院的学生出命题作文“如何整顿中国教务”一道，后来他将这些作文连同他的批语刊印发表，作唤醒国人的最后一次努力。可这一次又让他失望了。引发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巨野教案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义和团在他死后相继发生，中国又为教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至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不得不为此老问题实行艰苦的第二次启蒙运动。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兴起以后，闹教才最终宣告式微。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英待中国意见不同”。关于合作政策的详细情况请参阅 MaryClabaughWright, *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Sm*, Chapter3, P.21—43。

王韬：《弢园尺牋》，卷八，“上丁中丞”。

王韬：《弢园尺牋》，卷十二，“上郑玉轩观察”。

三、联合英、日抗衡俄国的策略

与前辈论外交者大而化之地论述“夷情”和“驭夷之策”不同，王韬将“夷”的笼统概念分成单个的不同国家。不加区分的单色调的“夷”在他的外交理论里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英、法、普、俄、美、日本等具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区别对待的外交策略。

王韬认为，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外交目的和策略。俄国是一个还未完全摆脱农奴制阴影的君主制国家，其国虽贫，扩张领土的野心却很大。他剖析说。浅见之士，“狃于所闻，徒知其主好勤远略，其民生齿不繁，地虽大而荒凉特甚，国虽强而市项不丰，今又与土媾兵，以致屡遭败衄，遂以为俄之凭陵小国，黠武穷兵，适足自毙，固不足为患于天下也。不知俄之君臣谋所以致一统之盛，而大无外之规，盖匪伊朝夕矣。其意不得志于欧洲，则必求逞于亚洲，二者将有一遂。”以天下大势观之，“图亚洲易，图欧洲难”，俄国在欧洲的扩张受阻后，必然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亚洲，而中国首当其冲。所以，俄国是中国最大的威胁。

英国是一个工商民族，“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矣。与中国通商将四十年，英商足迹所至，几遍中土，国中工艺所出，销流于中国者甚伙，正头鸦片，尤为大宗，是英国通商在今日几于有进而无退。设使一旦有事，则于贸易大局殊有窒碍”。所以，英国为自己着想，希望中国保持和平之局，“断不肯无端以启衅”。对于俄国在亚洲的咄咄逼人之势，英国急欲寻找伙伴谋求抵制之道。英、俄之外，美国为一民主之国，且国力仅能自保，在中国不敢有土地之想，惟图共沾商业利益。法国自普法战争之后，元气未苏，暂时在亚洲难有作为。普鲁士虽然打败了法国，但注意力仍在欧洲，时刻提防法国的报复。日本为一亚洲之国，自学习西法以来，逐渐富强，虽然它时有欺凌中国之举，但与俄国这只“虎狼”比起来，不过是“狡兔”而已。它本身亦为西人欺侮之对象，特别是北方受到俄国的极大压迫。鉴于这样的国际局势，王韬指出中国外交的基本策略应该是联日结英拒俄。他这样写道：

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而俄尤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中外合力防俄……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

王韬把近代世界格局比之为战国之局，其中俄罗斯“犹战国时之秦也”。它“地跨三洲，控弦百万，正无难投鞭断流，移山平陆，气变风云，力翻读读，虎视六合，鹰瞵八荒”，是欧、亚各国的共同威胁；英、法、普、土耳其、印度等国只能当之于齐楚以下之中小之国。对中小之国来讲，抗俄是共同的事业，也是“自为而非为外国也”。其情形正如当日“六国之约纵连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俄人志在并兼”。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英重通商”。

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宜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弢园尺牘续钞》，卷一，“呈郑玉轩观察”。

以摈秦”。诸国倘不明此理，相互攻伐，必蹈“六国之所以亡”的故辙。

当然，王韬并没有离开他的对外主和的基调。他说，所谓“抗者”、“制者”，“亦非无端开衅于俄也，原在有备无患，画疆自守，以持其不变之局而已”。换言之，中国联日结英以制俄的限度应控制在保持各国疆界不变和固有世界均势不变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去有意触怒俄国，寻衅开战。

王韬提出联日结英抗俄的策略主要得之于他对当时国际局势的仔细观察和冷静分析，但也不能排除有他个人特殊的情感因素在内。对王韬来说，英、日两国在情感距离上的确要比俄国来得亲近。他自20岁起就一直与英、美传教士共事，与英国外交官亦多有周旋。他本人又长期生活于英国治下的香港。所以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外交主张对他影响很大。而当时的英、美人士大多数都持有亲日反俄的外交观点。如阿礼国、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等人在外交报告和公开出版物中都呼吁扶持日本，制衡俄国。王韬为香港新闻界名人，对他们以及英国政府的外交倾向不会不知道。

对王韬外交观点影响最大的要属他的日本朋友。日本本来就是中国的近邻，在人种、文化、风俗民情等方面与中国十分相近。在王韬生活的那个时代，儒家著作依然是日本文人拜读的经典。日本在近代所受到的西方侵略也与中国相仿，这一点更容易使近代中国人把日本人引为同类。对王韬来说，他的《普法战纪》和《循环日报》在日本引起了反响。1879年他又亲赴日本访问。日本朝野对他优礼有加。回国后，日本人士依然对他恭而敬之，请他写序作跋者有之；斧正诗文作品者有之；讨教国策方针者有之。甚至日本“比睿”军舰路过香港，司令官、也是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也特地上岸拜访他求教。凡此等等都使王韬觉得日本人比欧洲人亲切。因此，他情感上本来就倾向于中日联合。而当时大批日本人士竭力鼓吹中日联合，共兴亚洲的主张更加强了这一倾向。

王韬所接触的日籍人士中，鼓吹中日联合最力的要属冈鹿门和曾根俊虎。冈鹿门是王韬的最好日籍朋友，结识于东京。冈鹿门曾多次游说日本当道，提醒他们要把俄国当作主要敌人，而不必事事与中国为难。他的一位朋友西吉甫留学俄国，他特作论文一篇相送，详细剖析日、中、俄三国关系。他说：“秦之所以能并者，则在取巴蜀而据其资者矣。俄往年攻土耳其，为英、法所扼，无功而止，于是其意谓与其争欧，不如争亚。盖争欧难，而争亚易。我既东向并亚细亚诸国，而后拊背搯吭以薄英、法，则其志可逞也。其经略亚细亚东北，遣使论日本北疆，略堪察加、佐甲廉，其成算可知也。近闻自佐甲廉至俾得堡七千里间，通马车道。又以美洲所辖之地，鬻于合众，而以所得数百万金，充开拓东北之费。乘此势骎骎以南，则安知异日不以东北全力薄英、法，济其大欲，如秦统一六国乎……日之多事，将自此始。”在与王韬的书信往来中，他也多次论述他的主张。王韬在《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一文中回忆道：“鹿门之志，常欲中、日和睦，联英以拒俄。夫就亚洲地势以观，中之与日，固所谓唇齿相联，而辅车相依也。鹿门往时酒酣耳热，辄纵谈天下大计，沥沥成议，几欲击碎唾壶，而蒿目时艰，枪怀

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等文。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合力防俄”。

参见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二，“与日本源桂阁侯”及“与日本佐川怪所”两函。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近事，每愤其志之不得伸。”

僧根俊虎原为日本海军的一位军官。90年代以后参预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为孙中山所熟识。在90年代以前，他是一位泛亚主义者，积极倡导中日合作，拯救亚洲。他曾多次到中国的上海、山东、台湾等地进行外交活动。1880年，他在东京与王韬的另外两个日籍朋友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等共同创立了一个泛亚主义的组织兴亚会。兴亚会的成员很复杂，目的也不十分明确。其中有向往中国文化、或同情中国人民苦难遭遇、或真心支持中国改革、或虔诚相信中日合作可以挽救亚洲的日本友好人士，也有打着振兴亚洲旗号、旨在吞并朝鲜、中国、建立日本人统治的大亚洲的军国主义分子。僧根俊虎的观点是倾向于前者的。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他作为日本的军事观察员逗留沪上，与王韬时相过从。居沪期间，他写了一本《法越交兵纪》，反对法国侵犯越南，也谴责了日本政府对越南危机漠不关心，不理解中日合作的重要性。王韬与这些日本友人关系密切，耳濡目染，也受到泛亚主义主张的影响。《弢园尺牘》中有一封致冈鹿门的信，反映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

蒿目时艰，无可下手，强邻日迫，又有责言，既西顾之堪虞，益东瞻而兴涓。今日亚洲中惟中与日可为辅车之相依，唇齿之相庇耳。试展舆图而观之，东南洋诸岛国，今其存者无一也。五印度幅员袤广，悉并子英，其存者亦仅故府，拥虚名而已；阿富汗已为英所剪覆；波斯介于两大之间，将来非蚕食于英，即鲸吞于俄耳；异日越南必灭于法……亚洲诸国已残食至是，宁不大可危乎？闻贵国有志之士，近日创设兴亚会；此诚当务之急，而其深识远虑，所见之大，殊不可及。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皆与韬相识，而为是会长……其执兴亚会中牛耳者，为曾根俊虎，伊东蒙古，咸纳交于韬，通缟紵而结苔岑焉。

王韬提倡联日抗俄总体上说是符合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外交的要求的，但是，由于他的个人特殊原因，他放松了对日本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应有的防范心理，以为日本会毫无疑问地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当日本的实力和野心在70年代的侵台事件和吞并琉球事件中显现出来的时候，他甚至还坚持认为日本不足为中国患。他时而说日本“国小民贫，外强而中槁”；时而说日本内部矛盾重重，“悍族强宗，多有未服，设使外衅一开，内变必作”；时而说日本“水师不过七八千，陆兵不过三万，火轮战舰不过二十三艘，其地不足当中国二三省”；时而说日本再凶不过是“狐兔”，其战和与否权操自我。他似乎忘记了日本象俄国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凶恶的对手，也在“抗”和“制”的范围之内。

王韬的中日合作论和对日本国力的轻视态度间接地影响了中日关系的走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法越交兵纪》于1886年在东京印行。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有“《法越文兵纪》序”一篇。

王韬：《弢园尺牘》，卷十二，“与日本冈鹿门”。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一，“呈郑玉轩观察”。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一，“呈郑玉轩观察”。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一，“与方铭山观察”。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一，“呈郑玉轩观察”。

向。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战败虽然是中国统治阶级几十年轻视日本、忽视防范日本的结果，但与王韬的提倡不能说毫无关系。因为，他虽然不是李鸿章，甚至连外交官的边也没沾上，但他却是一个能够影响李鸿章、影响清朝外交官的人物。他曾为他的主张向李鸿章的幕僚和属官了日昌、盛宣怀、黄遵宪、伍廷芳、马建忠、郑藻如、黎召民、方铭山等上书献策，希望他们劝导当道采行联日抗俄的策略。这些人或多或少地代他向李鸿章传递了信息。比如，1879到1880年，日本政府在事实上吞并琉球以后多次派外交代表来华交涉，希望以琉球南端两小岛留给中国为条件，换取日本在中国的通商权和最惠国待遇。1880年10月，总理衙门与日使议定了《琉球专条》，日本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但是由于部分大臣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批准这个专条。日本不甘心，又通过曾根俊虎找王韬进行最后努力。王韬在获悉此事后，立即写信给盛宣怀，认为日本“所请亦未为过奢也”。他说，“许割岛，许通商，其事虽微，而系于两国之交欢者，则固甚重；且自此可收日人为指臂腹心辅车髻齿之用。如或弗许，则猜嫌尚在，情谊永乖，中朝既不能威之以兵力，又不能结之以信心，徒尔观望徘徊，因循畏葸，矜夸虚矫之气中于国是，此草莽小臣所未解也。今苟曾根之说可行，而傅相肯力肩此重任，则韬固可亲往东流，说其政府，以期事之必成。”随后又写信给伍廷芳，请他设法让曾根俊虎见到李鸿章“以尽其说”。盛宣怀、伍廷芳把王韬的意见又转给了李鸿章。虽然李鸿章没有采纳此一意见，但这些意见无疑是他考虑问题时的“参数”之一。盛宣怀本人后来成为亲日派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

王韬鼓吹联日结英抗俄最力的时间为80年代最初几年。此后，随着日本侵略味口的增大，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的咄咄逼人之势，王韬逐渐改变了提法。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开始谴责日本当道的不明利害，提议中国亦应注意与俄国搞好外交关系。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弟近所关心者，日、俄两国之事耳。俄人虽与中朝订结盟约，眉睫之间，似可相安无事；然其狡焉启疆辟土之思，固未尝忘也……鄙意以为朝廷必当早简星使，往驻俄京，以通彼此之情，以固中西之好，故敦辑睦，守盟言，在此行也，固不可缓也……中、日龌龊，其势殆不可终日；前日兼并琉球，今又觊觎朝鲜，其意若专与中朝为难。日人好勇而狂，狡而多诈，轻诺而寡信，骄矜自大，无所不至，专媚西人而轻中国。虽与中国立有要约，亦复朝定而夕更，殊不足恃，若非有以惩创之，将不能永邻好，结近交，联唇齿之谊，收指臂之助也。我中朝一惟以大度包容之，适长其跋扈飞扬之志耳，形中国之弱，滋日人之横，岂亚洲之福哉！”

有一件事典型地反映了王韬对日本态度的转变。

有一日本半官方“士人”，在中法战争之际在上海向王韬慷慨陈词，主动表示愿意率“死党勇敢之士往夺法舰”，或“伺间以狙击法人”，并请王韬代向清朝当道游说，请求允准。王韬似乎看出了日人有意扩大中法战火以便乘伙打劫的醉翁之意，写了一封不冷不热的信予以拒绝。他这样写道：

足下与贵友，既有大志，易不纠集万人，暗袭在台之法兵，出不意，覆而歼之，然后往告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二，“与盛杏荪观察”。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五，“与伍秩庸观察”。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二，“与李小池太守”。

中朝，愿为效命。既立此功，朝廷自深信不疑，以后请饷请奖，无所不可；徒托空言无益也。盖自贵国攻台湾，取琉球，中朝在位者，疑贵国之心甚矣，非先以攻击法人示之，彼不信也。中朝大官，即欲用贵国有志之士，亦不敢居间也。足下谓贵国中所有死党不下万数千人，苟至中国，纵横海上，奋击法兵，事无不可行。以我策之，难矣……苟真有经济胆略，集此万人，佯投法营为援，而阴约官军，同时夹击，或从中粹起为变，亦可得志。徒在沪滨一隅，探缉见闻，逍遥局外，无益也。无益之事，弟不为，空言无补，弟不言……近日贵国所施诸中朝者何如，而欲使我中朝不疑，其能之乎？使彼此易地以观，贵国其能决然信乎？近来道路传言，谓台湾入犯，有贵国之明助法兵。中朝在位者多信之。

显然，王韬已经在怀疑日本人的中日合作之说了。此事如果发生在几年前，建功心切的他恐怕早就代为传言了。无情的历史事实教训了他，使他在看待外交问题时更加冷静。个人情感因素遭到摒绝。

四、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主张

法国自十七世纪就开始了越南的侵略活动，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前，法国在越南的主要侵略活动还只限于传教和通商方面。此后，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占领的要求日益强烈。1862年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占了越南南部的三个省。1874年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在承认越南独立和法国代管越南外交的条款下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1880年，正当中俄为伊犁交涉关系紧张之际，法国乘机出兵红河。随后几年，法国对越南北部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侵略活动。越南军民和刘永福的黑旗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面对着法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径，中国朝野有一大批主战之士。他们强烈地要求清廷出兵抗战，打退“跳梁之法夷”的嚣张气焰。

王韬秉持着他的“重和”、“重势”的外交理念，反对不计成败地与法国开战，而主张“慎兵保和”。当他听说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因主和遭到主战言官的攻击以至被慈禧太后驱赶下台的消息时，他写信给李鸿章的“门将”盛宣怀，对主战派“清谈抗法”表示严重不满。他写道：“或传京师诸公，意皆主战，独恭邪、傅相主和。夫以中原大局言之，隐忍苟安，则日益萎靡不振，而人才愈以下出；以朝廷言之，则以和为贵。苟可捧盘盂以从事，何必执鞭弭以周旋，兵锋一交，胜负之数岂能逆料，况法之于越南，犹日之于琉球，今既不能救琉球于前，而欲早助越南以与法竟，恐法人于此有辞也。顾以韬揣之，京师诸公，亦徒有其说耳，岂真能出于一战哉？”在《拟上当事书》一信中，他更加详细地分析了中法开战对中国的不利之处：

用兵之道，尤宜慎之又慎，必审我有以制之而有余，然后可一发也。今法人船坚炮利，将猛兵精，而我水师未练，兵轮未广，统领未得于才，驾驶未能得手，枪炮之施放未精，器械之攻导未备，如此岂能战而胜之。夫与法人战，当以水师兵轮为先。但我水师少而弱，所有轮船皆不能驶出大洋。倘若以此据守沿海，而我海疆延袤三千里，防不胜防。法舰飘忽不定，往返自如，大可到处袭击。法人本不以通商中土为急务，今年不胜，则明年再举，明年不胜，则后年可重至。而我劳师糜饷，所以御之者穷矣。总而言之，中国无一可以制法人之死命，而法人扰中国，可以从容肆应而有余，中法开战，中国有害而无一利。

根据王韬的看法，处置法国在越侵略活动的“最上之著”是“莫如示之以文，告之以辞，与之揆情据理，援例执法，开诚布公，孰思审处”，同时派遣重兵，“严守边境，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务为自强，以待机会之来。”；其次，“莫如置之不问”，因为徒有空言而无实际的开战，其结果必然是“至于无可如何，则仍出于和，将来割地酬饷，通商辟路，所以为和之约章者，如是而已”。加之越南本来为一无道之国，“国政殊不可问，官贪而民情，横征暴敛，民人几不聊生”，中国即使兵强马壮，劳师远袭地为其复国也只能是“能暂而不能常”，殊不值也。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二，“与盛杏荪观察”。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拟上当事书”（原文过长，此处为缩写）。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二，“与盛杏荪观察”。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二，“致马眉叔观察”；“上潘伟如中丞”。

王韬以中外大势来作为论述中国外交的支点并没有什么过错，但问题是，他并没有全面地看到中法两边的“势”。他在强调中国弱于法国的同时，忽视了中国在某些局部问题上亦有小范围的优势，如中越国土相联，供给线远比法国的短；中国在陆战兵源方面亦大大超过法国；洋务运动中新建的陆军也比鸦片战争时代的清朝八旗兵和绿营兵更具有战斗力和生气。对“外势”中的国际间矛盾斗争以及法国国内政潮屡起也考虑不够。后来的中法战争进程并没有出现象他所想象的那种“一边倒”局面，而是互有胜负，在陆路方面，中国还占据一定优势，取得了镇南关、凉山等战役的胜利。

当凉山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王韬非常兴奋，并意识到自己对时局的分析出了差错。他听说法人开始在上海进行诱和活动，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位朋友，承认“弟于中外交涉之事，每喜穷原而竟委，所言往往不幸而中。惟此日立约结盟，似嫌其大速”。在进一步地考察内外情势以后，他发现法国开战以来所遇到困难不在中国之下：“法今者，拿破伦旧党盘踞于国中，阿洲叛民，埃及争地，复骚扰于国外；飞扬跋扈，招忌召戎，恐不免于用兵。法，欧洲虎狼之国也，素为列邦之所憎嫉，兵衅一开，强邻乱党，必有起而乘之者。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一也。泰西列邦，皆以通商中土为利藪，英、普、美所系尤重。法人贾舰，虽沿海各埠无处不至，而通商之局未宏。一旦兵事突兴，必非列邦之所甚愿，居间调停，势所必然，法于此能勿从乎！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二也。”所以当清朝当道大员准备与法国妥协之际，他反而由主张“慎兵保和”转而主张“既出于战，必当持之以恒，举之以全力”。他在《拟上当事书》中写道：

道剥极而必复，势无平而不破，张弛之权，盛衰之变，正在今日……法人先发难端，甘为戎首；徘徊海上，几及一载。马江之役，法以诡道诱我，虽胜犹辱，其得侥幸出险，仅免聚而歼殄而已。基隆虽踞，淡水无功，波以全力注于台湾，而历日旷时，仍不得尺寸之地，则彼之兵力亦可知矣。甬江之战，无所胜负，彼攻此守，犹足支持。即彼言将犯祈津，扑旅顺，扰芝罘者，亦不过虚声恫喝之故智可，其实技无所施也，则彼之水师亦可知已。至于遏截海运，掳动商船，正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法人处今日之势，其进退维谷之情形，不显然哉？曩者，彼国屡次败盟构乱，特未尝一角耳。诚使我以镇定处之，忘在用兵，一战再战，虽挫不挠，则彼之虚实，早已灼然油见。胆壮气张，名正言顺，何难与之驰骋于疆场，纵横于洋海哉！

可惜清朝统治者没有胆量采纳王韬“战则持之以恒”的意见，法国一有谋和之端倪，他们便乘势下坡，草草收兵。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竟然签订了不利的外交条约。前方将士气得拔剑砍地。王韬闻讯亦只能“作贾长沙之痛哭流涕”。

中法战争时期中国朝野除了面临着战与和的选择外，还面临着如何对待刘永福的黑旗军问题。刘永福原是广西地区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大清工朝不可饶恕的“匪类”。因此，当法国侵略军进攻越南北部、与刘永福发生直接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四，“与刘嘉树大史”。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四，“与刘嘉树大史”。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言战”。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三。

冲突之时，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竟然主张对刘永福不闻不问，以便借法国侵略军之手，除却清王朝心头之患。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主张接济刘永福，但心态依然是“借刀杀人”的心态。如四川总督丁宝桢和云贵总督岑毓英在他们的奏章中都说“驱狼斗虎，似属一举两得”和“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一类的话。王韬坚决反对清朝所谓处置刘永福的方略。他在与清朝官员的书信中多次称赞刘永福的为人爱国之心，敦促清政府真心实意地支持刘永福。比如，他在《与潘镜如观察》一信中写道：

义（指刘永福）其为人大，质弱而貌奇。法难既作，人愤勃兴，出与之战，每战辄捷、计诱力攻，馘其泉帅，于是义声震于天下，义亦当今人杰矣哉！刘义以一羁旅孤臣，独张义帜，以攻法军，以区区三四千乌合之众，屡挫强敌，斩将搴旗，造奔逐北；使海内之人，闻风兴起，此西事以来所未有也。乃中朝贵臣，颇有不以为然者，或谓其侥幸邀功，或谓其贪婪无厌，或谓传言失实，徒涉夸张，致虑其难于安插。是刘义在今日固可胜而不可败，能进而不能退者也。弃雄才而委之于虎口，坐视其亡，诚一咄咄大怪事，此可为天下人才一大哭。

王韬进而具体建议说，清朝不仅要主动地提供黑旗军军火，还要派遣军事参谋人员佐其运筹帷幄，并招募“粤东西近地之民”加强刘永福的黑旗军。对法国指责清政府于和谈时期支持刘永福继续与法国为难之事，王韬力主不要理睬。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妨直接告诉法国人：“来则受之，不来更将助之保之”，以加强刘永福的声势。

把昔日大清王朝的“冤家”称之为不可多得的“雄才”，主张给予全面的支持和保护，这是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的。只有跳出了地主阶级狭隘立场的思想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才能有此眼光。王韬在中法战争中对刘永福黑旗军的态度说明他正是一位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理性在这里已经代替情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三卷，第12页；第23页。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四。

第八章 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

进入七十年代下半期，王韬因主办《循环日报》成功而声名大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也相对稳定，因而有条件潜心于著书立说。1876年他索性雇请广东番禺秀才洪士伟处理报社日常编务，自己一心从事写作、整理和刊印自己著作的工作。不久，《弢园尺牘》、《瓮牖余谈》、《瀛壖杂志》、《遁窟谰言》、《蘅华馆诗录》等王氏专著纷纷刊印行世。这些著作加上后来定居沪上所整理和创作的《弢园文录外编》、《淞滨琐话》、《淞隐漫录》等，构成了王韬著书立说的黄金时代。本章集中介绍他的笔记和小说，并剖析它们的思想内涵。

一、笔记类著作

王韬最主要的笔记类著作有两部，一为《瀛壖杂志》，一为《瓮牖余谈》。两者均为王韬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断断续续写成的笔记之汇编。王韬曾自述说：“偶有见闻，随笔记缀，岁月既积，篇帙遂多。”由于成书时间长和“随见随录”，两书都有内容广泛而又庞杂的特点。其不十分明显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稍偏重于上海，后者多关注于世界。1988 年，湖南岳麓书社将两书合集标点，铅印出版，恐怕也就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属“同类项”。纵观两书，其主要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国门初开，国人对与之交接的西方各国缺乏相应的了解。“得风气之先”的王韬目睹这一现状，有心将西方世界的真实情况介绍到中国来。他首先注意到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不仅与中国存在着差别，西方国家之间也是不尽相同的。英、法、美、俄政治与经济制度各有特点，进步与合理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以美国与俄国为例，前者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就要比后者的相对进步合理。王韬用“花旗善法”与“俄国弊政”两个带有强烈价值判断倾向的语词来表示他的好恶。他写道，美国立法之善，“海外诸邦皆所不逮”，它的大小统领由选举产生，不仅任期有限，而且薪水有定，“一国中大统领者，岁奉以银二万五千圆供给御用，与英国所设香港总督廉俸相若。其通国中所用，以一年计之，仅支银七千五百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元，此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之数也……更以旧金山一区（即加厘佛利亚州）论之：其幅员辽阔，即以香港百数十比之犹不及大。每岁一切所费，文自衙门官吏，武自兵船弃勇，举凡修葺废坠，无所不包，而仅支五十万元。旧金山为商贾所荟萃、货物所辐辏，华人往其地者，不下十数万。每年诸邦往来船舰，计一千二百余艘，可谓通商之大埠矣，而其出仅如此数，非节用爱民，能如是乎？”至于地方官制，美国几有中国三代之遗风，“盖花旗之法：每村设有四绅士、一书吏，绅士从不受精禄，书吏亦仅月受数金。其下有差役三人以供奔走……田税所纳甚微，自给地方官廉库外，仅以为修筑衢路、建立书塾之用而已。惟海关税则归诸官，余则悉以一省所出以供一省之用，民无所苦而君无所私。通国兵士饷需，悉以关税支销。无事之时，戍兵巡丁寥寥无几。村乡之人，至有老死不见官长者”。相比之下，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则是弊端丛生。农奴制度将农民的人身自由剥夺殆尽，“凡富宦家购买田地，则其地居民并鬻在内。故有地出售，人多争购。购得之人，或充当兵籍，或遇嫁娶事咸由新业主操其权，斯诚弊政也”。在这种制度下，家奴没有兴趣从事生产活动，因此，连俄君也知其谬，“拟革其例”。王韬对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抱欢迎态度，称赞此举为“诚有惠于民，足为善举者”。

十九世纪中期的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还是十分笼统的。“夷”、“洋人”、“泰西”等一类含糊不清的名词正说明了当时中国人对

王韬：《瀛壖杂志》“自序”。

王韬：《瓮牖余谈》，卷四，第 96 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四，第 97 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四，第 111 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四，第 112 页。

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韬能够说出各个不同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与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性，并比较出它们的优劣，不能不说他的思想敏锐过人，独步一时。

（二）介绍和称颂“西儒实学”。

在《瓮牖余谈》和《瀛壖杂志》中，王韬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与西方各国的差距，以大量的篇幅介绍和赞颂了“西儒实学”。从亚里斯多德到培根，从古希腊文化学术到近代欧洲实证科学，几乎均有论列。

王韬最为景仰的是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大师培根和天文学家侯失勒。《瓮牖余谈》中有专篇分别予以介绍。在《英人培根》一文中，王韬对培根哲学思想和方法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

其为学也，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而务在自有发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于古人，而务极乎一己所独创。其言古来载籍乃糟粕耳，深信胶守则聪明为其所囿，于是澄思渺虑，独察事物以极其理，务期于世有实济、于人有益。盖明泰昌元年，培根初著《格物穷理新法》，前此无有人言之者。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

培根哲学的基本点是归纳、实验和实用，反对以演绎法为主的旧的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王韬在这里的介绍显然抓住了培根哲学思想的精髓。

培根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在欧洲科学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启了欧洲近代实验科学的先河。王韬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培根的《格物穷理新法》（今译《新工具》）是欧洲科学“二百五十年之《洪范》”，其后哈尔非（亦威廉·哈维 William Harvey）始为血络周流之学，医术为之一变。观象仪器，其制更精，其术益验。纽敦（亦牛顿）始为光学，客勒格力（亦伽利略）始造望远镜。哈力（亦哈雷）始考察彗星往返轨道。一句话，培根之前，专心于学者如磨旋之牛徒费力，行莫出跬步；自培根辟其机械、启其囊钥之后，欧洲诸学参悟而出，蒸蒸日上，无不勤察事物，讲求实学真理。

王韬自己有研究天历的嗜好，所以，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也特别为他所敬重。在《英人侯失勒》一文中，他对侯失勒的生平、著述、历史功绩等均有详细介绍。他说，侯失勒一生大小著作七十册，对天文学贡献卓著。所作《星气星丛大表》举世罕与之埒。而其为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更是值得后人永远景仰。王韬介绍道，侯失勒中年以后因天文研究成绩沛然而被英国国王赐予“功号”，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立志前往南非好望角，筑舍于大山之上，以“赤道仪及回光远镜”坚持观测天象达数年之久，所测结果皆“详绘图形”。回英后仍坚持实测，直至临死“未尝一日辍也”。

透过王韬饱醮倾羨之情的言词，不难看出王韬由衷地希望能将侯失勒式的科学实证精神引入“实学”不振的中国。

在《瓮牖余谈》和《瀛壖杂志》两部笔记中，王韬似乎对能够接触到的西方之学都感兴趣，书中关于西学的文字不胜枚举。单据《瓮牖余谈》一书

王韬：《瓮牖余谈》，卷二，第44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二，第45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二，第48页。

统计，涉及西学内容的篇章除前文提到的《花旗善法》、《俄国弊政》、《英人培根》、《英人侯失勒》以外，就有《日本宏光》、《法国奇女子传》、《英国才女法克斯》、《新金山》、《美利坚颈地》、《煤矿论》、《南洋海岛》、《花旗沃土》、《日本略记》、《嘉邦筑路》、《新辟西半球记》、《通商日本说》、《李文通探地记》、《英国兵数》、《英国海防》、《外国牙科》、《英国大轮船》、《西国印书考》、《犹太古历说》、《照船塔灯》、《给予文凭》、《西国造纸法》、《英国硝皮法》、《西历缘起说》、《造自来火法》等。从天文到地理，从理论到工艺技术，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几乎无不罗列备述。

对已经传入中国沿海城市而一时还未被大多数内地士民所深悉的西来之学，王韬也予以广泛介绍和大力推荐。他在《西儒实学》中对在华传教士的西学作品进行了分门别类地介绍，所罗列的作品计有：《谭天代数学》、《续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科新说》、《地理全志》、《英志》、《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格致入门》、《重学》、《博物通书》、《航海金针》、《植物学》、《万国公法》等。从这一长串的书单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王韬对西方之学密切关注的目光及其对民族的拳拳之心。一个只知道做八股文和吟花弄月的旧式文人是开不出这些书单来的。

王韬介绍的西学内容有些是当时的中国人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甚至在西方也属“前沿科学”。如他在《西国天船》中介绍说，西洋奇器中有天船一项，“其式短小如亭，可容十人。内置风柜，极其巧捷，有若浑天仪，用数人极力鼓之，便能飞腾至极高处。自有天风习习，欲往何处则扬帆，用量天尺量之，至其处乃收帆，听其坠下”。“现西人欲得是理，细加研究，意欲乘之渡海，自花旗至英京，约费数日之程。并期透彻明悟，不拘驶往何处，俱可如我之意，如舟揖然。窃思若果如此，遇攻战时不徒防敌目前来，亦当防敌从天下，此诚奇技妙法，直可以泄造化之微矣”。王韬把西方尚在试验中的器艺之术介绍到中国来，表明他对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亦十分关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前驱特征。

由于传统教育制度和取士制度的作祟，实验科学及其科学实证精神在中国一直萎靡不振。王韬一心期望把“西儒实学”引入中国，以改变中国实学不振、虚学泛滥的现状。所以他的介绍不是纯粹地介绍，而是一种犀有自己见解和强烈思想倾向的“劝导之词”。如他在介绍日本民族不甘落后、奋发向上的精神时写道，日本人“任豪侠、竞智巧，留心于经济有用之学，于西洋器艺造作制度，能窥其用心。多购轮船，不惜重值延请西匠，教以机括转掇、火水二力运用之妙。风气大开，灵慧渐辟，而不甘以因循苟且自域，是则可取者尔”。王韬在这里指出日本民族的“可取”，也就是希望中国能象日本一样，模仿西方，追赶西方。后来他在《漫游随录》中讲出了更明确的话：“所望者中外辑和，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

（三）介绍开埠后上海的新变化。

五口开放通商以后，上海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其市政建设、

王韬：《瓮牖余谈》，卷五，第119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五，第130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四，第98页。

社会风俗甚至阶级关系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为近代第一批进入上海的文化人，王韬较早观察到这一变化。《瓮牖余谈》和《瀛壖杂志》在这方面也留下了相当多的记录。

王韬介绍说，西人开埠上海后非常注意市政建设和文化建设：“于街市中设立灯·火，远近疏密相间”；“设有印书局数处，以铁制车床印书”；“设有博物院，其中珍异书籍、鸟兽虫鱼无不备”；“于近事，日必刊刻，传播遐迩，谓之新闻纸”。其他随西人之来而传入上海的还有“义学”、“自来水”、“煤气局”、“照相馆”、“跑马场”、“影戏”等等。王韬在介绍这些市政文化建设时所写的语气是且敬且羨的，他认为这些新事物给上海带来了新气象，也使中国被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有利于中国人在比较中看到自己的差距，“翻然反省”，发奋图强。

西方资本主义侵入所带来的城市变化不只是正面的，还有负面的，象“租界”造成的国中之国、洋人的横行不法、鸦片与妓女的泛滥等都是传统中国社会不曾有的“新恶象”。王韬也真实记录了这一方面的变化。如《瀛壖杂志》在揭露上海鸦片与妓女日盛一日的情况时写道：

片芥之毒，靡人不嗜。虽有一二守礼之儒，亦难救正。沪城青楼之盛，不数扬州。二分明月，十里珠帘。舞树歌台，连瓷接栋。每重城向夕，虹桥左侧曲巷中，灯火辉耀，笙歌腾沸，无不争妍取怜，弄姿逞媚。门外细车骄溢，飞尘散香。裙屐少年，洋舶大贾，辄坠鞭留宴。

王韬对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所带来的“正负变化，’的态度是爱憎分明、取舍适中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此，即使今天断然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似乎也难以“谤议其后”。但是，王韬对上海滩上的下面一种变化——商品意识勃发、传统等级观念荡然无存——不以为然，恐怕就难免让人看到他思想深处保守主义的尾巴了。请看他是怎样面对上海滩上来势汹涌的商业大潮的：

近来风俗日趋华靡，衣服僭侈，上下无别，而沪为尤甚。洋泾浜负贩之子，猝有厚获，即御狐貉，炫耀过市，真所谓“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也。……衙署隶役不著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酒食游戏征逐，恬不为怪。此风不知何时可革！

沪上习尚奢华，仪文放废，而洋泾尤不可问，礼法之士至于不欲见闻。古淞梅花主人著有《洋泾七念勾》，痛快淋漓，道尽近来积习，真令读之者可以永息此念矣！具录如下：“生计营求，术学陶朱雅谊留。真货公平售，价弗欺童叟。嚟！虚伪日相投，鬼谋白昼。较尽锱铢，情面无亲旧。因此把交号洋泾一念勾。丝缎绫绸，锦绣章身尽上流。品重衣宜美，下贱人难比。嚟！什隶偶盈余，全忘法守。艳服华冠，绅宦同行走。因此把服御洋泾一念勾。”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第 207 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第 197 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第 208 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第 201 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一，第 15 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一，第 16 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一，第 16 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第 187 页。

显然，王韬还没有适应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等级制度崩溃与社会观念更新的现实。他的思想多少还裹带着传统儒家文化的阴影。

但是，不管王韬如何厌恶阶级关系的“礼溃乐乱”，他毕竟还是接受了不可更改的事实，真实记录下了沿海通商都市阶级关系的变动状况。他发现近代中国至少又产生了三个新的阶层。一是口岸知识分子。王韬以极大的热情为这一阶层的人士画像·入其选者有李善兰、华蘅芳、龚澄、管小异、蒋敦复、应雨耕、张斯桂、冯桂芬、徐寿、徐建寅等。王韬断言他们都是独步一时的“西学长才”，在中国追求富强的事业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大商人。他们不是因“积粟为富”，而是因“财生财为富”，其“最豪者，一家海舶大小数十艘，驶至关东运贩油、酒、豆饼等货”，但他们投资的风险也大，“偶失于风波，家可立廛”。三是买办。这群人集中于“百货阗集”的通商口岸，中外贸易惟凭其一言，两边拿取佣金，“倾刻间，千金赤手可致”，成为暴发户。

（四）记录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奇异现象并予以科学解释。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诗文词章繁兴而科学技术不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遇到不曾见过的新事物、新现象时不是以科学的方法去验测和解释，而喜欢以想象去揣测和推论。这正是筮术迷信不断滋生和久炽不衰的社会文化土壤。王韬在笔记里对许多现象的古老解释提出了疑义，并以近代科学知识对之重新探讨。如在《汉口雨钱》一文中，他指出古今所传上天“雨钱豆、雨金、雨上、雨刀、雨铁、雨朱砂”等皆非冥冥上苍对人类之“浸祥之先见”，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流星陨石现象。他解释说：

天地间分布之物，散聚大小者不等，大则地球、日、月、恒星、大行星。中则定彗星及至小之行星，必用远镜始辨。此皆各有定道，周行不移。小则游气乱飞于空中，若近地球，则先凝于云际，轻热有光，谓之流星；渐结为石，为各色沙粉，墮于地面。

在另一篇文章《星陨说》中，他更详尽地解释了流星和陨石形成原理，驳斥各种附会之说：

流星陨石之异，古来史不绝书，未可以为灾祥也……考“星陨如雨”，载于《春秋》。说者以为即佛生之岁，固附会可笑；而星陨之理，究未有明言其指。其西士曾细加辨察，其质为火石、硫磺、铁、黄灰、白铅不等，其重自数斤至十万石皆有之，其行之捷，一秒可八十里。大抵流行空中则见为星，一陨于地遂成为石。西国格致家参考其故，有云月距地球最近，其中常有火山吐焰，或有融化之质喷出；偶落空际，坠下极速，地气吸之，故能至地。有云行星中有无数小体，由于大体分裂，有时本质自散复聚，环日而行；至地球轨道，为地力吸引，至天空而发光；其行甚捷，变为陨石流星诸异象。有云凡体在天空一秒可行三里，能吸空气之热，故易于发光；以寒暑表计之，约三万度，故初陨之石，气犹甚热。上海所见流星，大批行星中分裂小体耳，奚足为侵祥之先见哉！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第12页。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第12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三，第75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五，第124页。

王韬对流星陨石现象的解释显然比传统的具有巫术和迷信色彩的“天人感应说”来得进米千万倍。因为他是近代科学理论为依据的。在十九世纪中期就能如此清晰地、全面地论述流星和陨石形成原理，不能不说王韬在西学刚进入中国之际确曾独步一时。

（五）记录太平天国的兴衰。

《瓮牖余谈》中用了两卷的篇幅记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搏斗，所涉及太平天国领袖人物有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人。这一部分写成于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显有向清廷洗刷自己表明心迹的味道在内。所以行文之中“逆”、“贼”、“匪”等感情倾向明显的字眼层出不穷，但剔除这些有意识的污蔑，从笔记中还是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们英勇奋斗的真实情况的“清朝官员横征暴敛、文恬武嬉的情形在书中也有所揭露。王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弭贼必自治民始；治民必自衅民始。

（六）为贞女孝妇树碑立传。

《瀛壖杂志》和《瓮牖余谈》均有不少对所谓贞女、烈妇、孝女的叙述。前者记有贞女何佩姐，王蕙芳、烈妇印氏、贞孝妇赵氏等人的事迹；后者收有《孙女割股》、《记贺贞女事》、《书彭孝女事》、《孝媳割股》、《一门节烈》、《陆节妇事》等专篇。为贞孝妇女树碑立传集中反映了王韬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与他笔记中的其他内容形成强烈的反差，也与他后来提倡的女权思想有天壤之别。

王韬所欣赏、所选录的节孝妇女的“行状”几令今人不堪卒读。如《瀛壖杂志》描述贞孝妇赵氏守寡五十年事迹时这样写道：

贞孝妇赵氏，居城中鱼行桥。及笄，字于李大年。卜吉有期而夫亡，氏年仅二十一，矢志靡伦，誓以身殉。奔丧抱木，主成妇礼。侍奉翁姑，援立嗣息。无何，翁姑辞世。嗣息又殇。氏念夫家虽无可依，而母族犹不忍绝，爰以巴妇怀清之操，仍作婴儿孝养之思。中间侍父疾而割股，送母终而泣血，篝灯五夜以佐齏盐，畚撮三冬得安窀穸：此氏茹荼饮蘖之苦心也。

另一位孝妇钱氏甚至为尽孝而不惜以身相殉，王韬继续写道：

钱氏幼好读书，孝出至性，每见《烈女传》之孝义节烈者，未尝不慨然慕之，曰：“此当为巾幗之型坊也。虽不能至，不敢不勉。”于归后事长抚幼，竭诚孝爱。旋因姑患病，值夫以有事赴山东，调药量水，惟氏一人。昼夜侍奉，衣不解带，目不交睫。累月后，见姑病势日剧，氏泣涕不胜，

夜半焚香吁天，愿以身代，潜割臂肉，和药以进。既而姑病寻愈。氏恐姑知，言笑如平日。

家人见其衣袖沾血淋漓，穷加诘问，始告之。越一年，钱氏遽殒。戚属视殓，犹见疮痕。生时如服苦役，死时亦不得全其体肤，令人恐怖的贞孝事迹分明不是人类社会应该发生的故事。但王韬所用的口气却显然是赞叹备至的。他在介绍了贞孝妇赵氏“行状”之后以欣赏和推崇的笔调发挥说：

参阅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王韬：《瀛壖杂志》，卷四，第118页。

王韬：《瓮牖余谈》，卷二，第36页。

氏年七十，守节四十八年，诚有非寻常妇女所能及者矣。邑绅为之请于江苏学宪彭君，给以“孝竹贞松”之匾，亦足见阐扬之微旨矣。导迎之日，以儒学衔牌仪从适至其家。所可异者，导迎前一夕，氏忽见一人拱坐奥隅，笑颜可掬，氏初归李时，不及见夫面，不知拱坐者谁，亟呼夫侄辨之。则曰：“噫！是大年叔也！”相与感泣下拜，而形旋隐。然则国家旌典实足以感格幽明，举报节孝者观于此，而可勿倍慎哉？

妇女的解放才是社会的最后解放。王韬对此一真理的认识似乎是充满矛盾的。他一方面在笔记中提倡学习西方，推崇西方妇女人格独立、有学有艺、勇敢不让须眉的品质；另一方面又在同一笔记中大谈贞孝节妇，要把妇女继续捆绑在封建纲常伦理的铁链之下，如果说前者对旧封建礼教具有强烈的冲击作用的话，那么后者对这种冲击显然是一种抵消。

二、小说类作品

王韬的小说类作品有三部，即：《遁窟谏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三书在题材上虽同属“其事实则莫须有的说部之流”，但在接近现实生活的程度上还是远近有别的。

《遁窟谏言》成书于光绪元年（公历 1875 年），但王韬开始写作此书的年代则早在同治元年（公历 1862 年）。当时，王韬刚逃到香港，友朋断绝，闭门日多，无以遣怀。于是，“窃效干宝之搜神，戏学髯苏之说鬼，灯炮更阑，濡毫瞑写”。在这种情与境之下写出的小说，自然是孤愤之作，充满对现实社会的谴责之词，黄怀珍在《遁窟谏言》的序言中写道：“托于齐谐虞初者流，寄其慷慨激昂之致”；也就是说，王韬此时虽然对大清王朝十分不满，但他对前途似乎还没有失去希望。他的小说还属“经世致用”范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

《淞隐漫录》的创作开始于王韬回沪之后。最初是以单篇的形式发表在《申报》发行的《画报》上的。《画报》月出三期，自 1884 年下半年起，每期登载《淞隐漫录》一篇，配图一幅，直到 1887 年登完。随后，由点石斋结集成书刊行于世。王韬创作《淞隐漫录》之时，已被清王朝特赦回沪。目睹国家政治的腐朽肃败、洋务运动的浮光掠影，他感到无限的惆怅和失望。所以，《淞隐漫录》已不象《遁窟谏言》那样对未来抱有信心。它的笔触虽然还没有从现实社会生活脱开，但在距离上显然已经拉大。小说的恨须从中国的芸芸众生逐渐移向了遐陬绝娇，异域荒裔。运笔也更趋于婉转，哀和怨似乎被溶进了美人香草。

《淞滨琐话》写于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完在《画报》上连载，名为《淞隐续录》，后因《画报》停刊，创作遂止。直到光绪十九年（公历 1893 年）全书始成册刊行，共十二卷，五十九篇。《淞滨琐话》是王韬老年归山前自娱之作。此时，王韬年迈多病，穷困潦倒，在品尝了“人生诸苦恼”之后渐信道家无为之说。他在《淞滨琐话》的序言里自述道：“人自有生以来，浮湛阎浮提中，一苦恼众生耳。故曰：我之所患在乎有身。身自有生得来，而为诸苦丛射之鹄。人自乐有生。我自求无生。有生在世，其亦赘疣而已。余今年六十矣，虽齿发未衰，而躯壳已坏，祁寒盛暑，不复可耐。偶尔劳顿，体中便觉不快。略致思索，辄通夕不能成寐。见客问姓名，转顾即忘。把卷静坐，即尔昏然欲睡。思有所作，握管三四行后，意即不相缀属。以此而犹著书立说，其可得哉？倦游归来，却扫杜门，谢绝人事，应酬简寂，生平与品竹弹丝，棋枰曲谱，一无所好，日长多暇，所以把玩听夕，消遣岁月者，不过驱使烟墨，供我诙谐而已。”在这种身体和思想状态下写成的《淞滨琐话》，其现实色彩自然又比《淞隐漫录》淡薄许多。

然而，综览王韬全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其现实主义的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的。三部小说中的大部分篇章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通的。其中的人物如文人举子、妓女乞丐、贩夫走卒、僧尼侠盗、商贾艺人、官吏豪强、王孙公子等，虽经历不同，形象各异，但都是社会中活生生的常见人物。从王韬

王韬：《遁窟谏言》，“自序”。

参阅常宁文：《王韬文言小说研究》（油印本）。

王韬：《淞滨琐话》，“自序”。

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叙述我们也不难看出王韬创作时的现实主义动机。他曾经这样写道：“余岂真欲为稿项黄馘中人志在长林而思丰草哉……或谓身将隐，焉用文之；既已自甘于遁，又何必以文词自见哉？况使即以文词见，亦宜立言不朽，刻画金石，黼黻隆平以鸣国家之盛，独奈何沾沾自喜下为此齐谐志怪之书、虞初述异之记，智同狡兔，禅类野狐，不亦颠乎？不知用世与遁世无两途也，识大与识小无二致也，曼情诙谐可通谏净，庄周游戏并入文章，前人谈谐之作、琐异之编，其得入录而登四库者指不胜俦……则所以不遭摈斥者，亦缘旨寓劝惩、意关风化，以善恶为褒贬、以自淫为黜涉，惮愚顽易于观感、妇稚得以奋兴。”

具体他说，王韬小说的内容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抨击封建官场的黑暗。

晚清官场呈现出一种世纪末的腐败堕落。昏官庸吏不顾国计民生，唯以搜刮民脂民膏为能事。王韬从社会下层走来，中年以后又与清朝地方官多有周旋，深知封建官吏的贪狠暴戾和下层平民百姓的凄凉哀怨。所以，他把描写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作为他的小说的最重要内容。

书生卜元，考中进士之日，便开始收取地方官贿赂，囊橐顿充，以巨金寄妻子扩建房舍。昏庸的皇帝有眼无珠，对这种“起步便歪”的官员不仅不立加斥革，反大加赏识，先是授之翰林，继则外放他做江苏学政。随后，卜氏一路青云直上，从学政升军务督办，升都察院副都御史、都御史，一直升到内阁大学士。他把持朝政，卖官鬻爵，公报私仇，欺压良善，无恶不作。请看王韬对他的描述：

卜元颐指气使，堂上一言，阶下雷动。而地方官之奔走于门者，自司道以下碌碌如犬马，各省大吏，皆畏其势，争献苞苴。金帛珠玉玩器堆列数屋。阴念妾侍尚虚，适有某观察愿拜门下，献美姬四人，卜并纳之。某方伯颇贪黷。卜授意台官，欲加弹劾。方伯惧，馈女乐十六人，皆绝代丽妹，振袖倾鬟，擅长歌舞。喜而受之，竟免劾。旧居停郭姓女，国色也，未娶时，颇属意，曾遣媒致聘。郭嫌其贫不允，竟婚某姓。至是遣人强委五百金夺女归。女不从，自缢死。微贱时，曾借邻翁粟。息甚巨，日久不能还。翁索之急，无赖甘十郎怜其窘，慨借二金。令翁让息归其母。翁畏甘收金而去。卜乃曠邑令诬翁为盗，下于狱，而以千金报甘。恩怨分明，志盈气畅。某银台廉介不阿，以他事中伤之。黜退回籍时，同年戚某已授某廉访，往往有腹诽语。卜微有所闻，授意旨于门下某给谏劾去之。刑部某，卜假子也，承迎意旨，定戚罪充边远军。货郎赵文荣捐部曹，淹滞不得补，以八千金拜膝下，立授某省观察。月余越升方伯。自是朝中侧目。

王韬犀利的笔触为人们描绘了一大长串象卜元这样的人物。“某观察大人”为升官而陷同乡僚属于罪，夺其女以上献某王爷（《淞滨琐话》，《蕊玉》）；某县令视人命如草芥，糊涂判案，良秀不分，以致良家女子被迫当堂自杀抗议（《遁窟谰言》，《汪女》）；傅相国发现科场有“割裂试卷”、张冠李戴的作弊情况后不去追查，反而软硬兼施地强迫应中而未中的秀才“不得入告”（《淞隐漫录》，《徐慧仙》）；某御史大人嫖妓求欢不成，恼羞成怒，竟诬陷妓女藏匪窝赃，硬将其打入牢狱（《淞滨琐话》，《夜来香》）；

王韬：《遁窟谰言》，“自序”。

王韬：《淞滨琐话》，《梦中梦》。

“专司刑名”的某桌司之恶吏孙月波为一登徒子，为夺友之妻而不惜玩弄刑律，下友于狱（《淞隐漫录》，《李韵兰》）；“某提督”喜好女色，“纠集部下数十夤夜毁门直入民家”抢夺民女，民女不堪其辱吞烟自尽（《淞隐漫录》，《返生草》）；“某统领”平贼之后以救民为名，硬将姿色较好之女难民强置后房（《淞隐漫录》，《鹃红女史》）……这是一幅封建官场的百丑图，其中的恶官、赃官、昏官以及他们的帮凶贪酷之吏，个个形象丑恶，狰狞毕露。在王韬看来，大清王朝官场之黑暗腐败绝不是局部现象，而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坏透”和不可救药。小说《因循岛》便是他以辛辣的笔调和象征性手法为大清王朝所作的一张素描。小说写得生动形象，精彩短小，不妨将其缩写如下，以见其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

曲沃项某，喜放生。尝经河上，见农人拽一黑猿，尾断足伤，购而释之。后项乘海舶遇难，漂至一岛。岛上荒凉不堪，草木不生。居民披发被肩，面黄肌瘦，悴容可掬，如久病者。项斗胆趋前询问，始知为因循岛简乡。一老叟邀项小作勾留，项喜而从之去。乡人皆至，窃窃私语，如睹奇观。少顷，门外有鸣金声，众人皆仓惶逃遁。叟即闭户，项问故，曰：此县令也。喜噬人。君初至，勿为所见，生于门隙窥之，见前后引随者皆兽面人身。舆中端坐一狼，衣冠颇整。骇绝，问叟。叟惨然曰：“此地本富厚，三年前不知何故，忽来狼怪数百群，分占各处。大者为省吏，次者为郡守，为邑宰。所用幕客差役，大半狼类。姑到时尚现人身，衣冠亦皆威肃。未数月渐露本相。专爱食人脂膏。本处数十乡，每日输三十人入署，以利锥刺足，供其呼吸。膏尽释回，虽不尽至于死，然因是病瘠可怜。更有轻填沟壑者。项讶曰：“岛主亦狼那？”曰：非也，主上仁慈。若辈能幻现人形，诡计深谋，递为所赚。”问：“朝臣何以不知？”曰：“立朝者皆声气相通，若辈又每岁隐赂多金，遂无人发其覆。况其在官之际，仍以好面目示人，岂知出示临民，别有变相耶？”项曰：“此类当途，尚复成何世界，仆不才，当为汝等诉之岛主，俾此辈尽杀乃止。”叟曰：“君虽心怀忠义，必不能行。况客乡之民，例难越诉。倘遇择肥而噬者，当有性命忧。项中心不安。次日，不别而行。方欲问途，忽数人来缚之去。迳诣一署，惊悚间，见两廊坐卧者，无非当路君，不觉气馁。未几，一官登堂，衣服苍古。幸是人身，冀可缓颊。顾瞥见项，若甚喜。略问所来。项备述前事。忽顾左右曰：“此人白晰而肥，精髓必美，当献之上司，必可记功邀宠。”项知非好意，再三恳释不从。即命以木笼囚项，卑之出。行二里许，众人哗传曰：“太守来。”遂纷纷避道。俄见仪仗森严，拥一贵官至。鼠目樟头，左右顾盼。见缚者问故，役禀白，谓欲送上宪轭。太守命异之前，熟视曰：“君项某耶？何故至此？”项亦甚惊，而不解何以相识。因漫应之。立出舆，挥众去，命脱系。呼两骑至，并辔而行。项不知所为，转洁邦族。太守曰：“仆侯冠也，受君大恩，俟入署再诉细情。少选已至。见前门标“清政府”三字。下骑同入。胥吏十余辈，肃迎于旁。见两旁隐隐有卧狼数头，心震惕不敢顾视。既入内，侯伏地拜。项答拜。因又问故。侯曰：“仆即河上老猿也。承君援救，此恩终不敢忘。后遇瘦柴生，将夺此岛，因余能幻化人形，招之同至。不期岛主信德，感及豚鱼。瘦柴生不忍相负，只谋方面，现居省要。余以从幕功授此职。今都院以下，大半同群。其尚有人心不肯附和者，则皆赋闲。仆亦久苦衣冠桎梏。俟有顺便，当送君回耳。”项始恍然。言次，即已传餐，见数狼来，各被官服，立化为人，与项通款曲。——由侯为之指示，则丞尉案吏及幕中宾僚也。揖让入席，笑语雍和。侯独入内，项与众共饮。酒半酣，两役舁一肥人过，裸无寸缕。众曰：“可送斋厨。”项惊问，皆笑不言。俄顷庖人进一饌，如鸡子羹。群以敬客曰：“此人膏，余等酷嗜之。惟主人不喜。先生之来，口福诚不浅哉。”项惊曰：“适肥人已宰之那？”曰：“然。吾等公膳，本有常供。此间因主人喜斋，故只日进一人。若大院中，则食人更多。项惨不能咽，逃席觅侯，始得果腹。项居署中，郁郁不得志。侯察其意，谓机缘未至，归计难谋。苛县厉令，余旧属也。彼处山川佳胜，足资眺瞩。当荐君暂入幕中，藉广眼界。

项喜，次日，持书去。一见要留，宾主颇洽。细察厉亦系狼妖，外示和平，而贪狡殊无人理。邑绅某横甚，强夺邻田数十顷。邻讼之，绅贿以重赂。厉竟不直邻，逐之去。邻上控，发县复讯，仍执前断。邻无如何，自缢绅门。绅夜至署，与厉密议，设计弥缝之。项不平，请曲直所在。厉笑曰：“先生不知那，绅于现居京要，得罪则仆不能保功名，况妻子耶？且民命能值几何，以势制之，彼亦无能为力。”项曰：“信如君言，则人情天理之谓何？国法王章，不几虚设耶？”曰：“先生休矣，今日为政之道，尚言情理耶？吾辈辛苦钻营，始得此一官一邑。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无德政。直者曲之；曲者直之。逢迎存于一心，酬应通乎百变。上以为可，虽民无爱日之遑，而朝有荐章之入矣。上以为不可，则民乐敦庞之化，朝无颂德之碑。国舍有甘棠，不及私门有幸草也。”正言间，省中有飞牒至，言郎大人将赴苛巡兵，著速备供张。厉忽忽别去，召丞尉商议。即让县署为行辕。次日，迁移一空，别居西舍。署中悬灯彩，饰窗帘，地铺氍毹，厚尺许。寝室则八宝之床，绣鸳之枕，锦云之帐，暖翠之衾。光彩陆离，不可逼视。至期探望者属道，迎者塞门。奔走往来，流汗相属。将晚郎至，炮声隆隆，骑声得得。仪仗数百人，甲冑殊整。其行牌有“粉饰太平”、“虚行故事”、“廉嗤杨震”、“懒学嵇康”等字。项私问小吏。吏曰：“此德政牌也。既见武士数十人，拥大吏至。状极狰狞。兵吏皆跪迎。郎置不顾，飞舆入署。须臾传呼进兵册。册上，仍付吏员持去。嗣兵官十余人入叩，有进金宝者，有呈玩具者，有乞怜贡媚者。一时许，厉跪请夜宴。即有吏出问有歌妓否。厉无以应，大窘。遽返西舍，饰爱妾幼女以进。郎喜面称其能。而厉之酬酢周旋，丑不可状。宴已，妾女伴寝。厉则意气扬扬，若甚得意。晨起，有军吏至，请阅操。内史斥曰：“大人未起，起亦须餐烟霞。汝何得尔？”是投所费不贤，而不闻有所整顿也。项大以为非，即别厉至候所。途中哗然，厉升某府缺。及见侯询之。侯曰：“此邦士宦，大抵皆然。书生眼小于椒，徒自气苦耳。”这真是封建官场的绝妙写照。晚清社会人吃人的恐怖现实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十九世纪的中国读者读后一定会感到毛骨悚然，并有所醒悟。他们所处的竟是一个豺狼当道的社会！有什么理由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呢？大清王朝的法统遭到强烈的怀疑与挑战。

王韬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揭露”这一层次上。他在竭力寻找一种惩罚和抑制黑暗腐败的有效之方。于是，手握扶弱锄暴之剑的大侠和主持人间正道的正义之神便出现在他的小说之中。一切人类的罪恶都将受到他们的审判和惩治。

王韬塑造的最成功的正义化身恐怕要算神与侠的合璧人物粉城公主。粉城公主别号桃花奴，原姓张，“本大鸟所产”。幼通剑术。其父做官时为奸臣所陷，合族被戮。粉城公主只身潜逃山林，聚集义士矢志为天下平民百姓杀尽贪官污吏。她派遣义士四下活动，暗中察访天下贪官污吏消息。有一任姓书生因偶然救了粉城公主派出打探消息的军师“飞天侯”之命而有幸在粉城公主处居住数日，目睹了她惩罚贪官污吏的场景。王韬是这样描写的：

既暮，红烛高烧，光耀内室。诸艳婢拥女人座。勇士几辈，侍立两行。无何，有一叟一少年，縲继至。匍匐阶下。叩首乞哀。女斥曰：“汝为大吏，贪续殃民，试思三尺法，可轻恕否？”叟立辩不贪。女笑曰：“某人补某守，汝得万金。某人补某令，汝得八白金。奏复某员，汝得五百金。即此数端，罪已莫遭。尚狡辩耶？”掷一纸，令自书供。叟顾少年捉刀。女笑曰：“目不识丁，乃为大帅耶？因汝曾筹款赈饥，姑贷一死。贪囊三十万，暂留于此。汝子当用衅剑。汝去后，须时记桃花奴。莫谓青萍不利也。”令左右送叟归，少年则斩首沥血，取脑涂仙剑。

王韬：《淞滨琐话》，《因循岛》。

王韬：《淞滨琐话》，《粉城公主》。

选择如此残酷的惩罚加在贪官父子身上，表现了王韬对官场恶象的深恶痛绝。他恨不得将他们全部贬在地狱的刀山火海之中饱受神明的永久惩罚。

（二）赞颂爱情。

爱情描写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永恒主题。随着封建理学在明清两代社会生活中的甚嚣尘上，社会对爱情自由的讴歌也日益强劲。思想进步的小说家们塑造了许许多多的追求自由恋爱的反叛性青年男女来批判和讽刺封建礼教的扼杀人性和虚伪不堪。在王韬小说中，以描写青年恋爱与婚姻为主题的作品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若从数量上说，这类作品更是三部小说集中的主体。

王韬所撰写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内容驳杂。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鬼魅和人的恋爱写出了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忠贞不渝的追求。作品中的男女主角大多都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情感和意愿去大胆地追求心爱的生活伴侣，并最终战胜艰难险阻获得幸福结局。如《莲贞仙子》中的书生钱万选在古寺中借屋读书时偶然遇上了花妖莲贞仙子，两人品茗谈诗，情投意合，遂结罗帐之好。不料有外方道士从罗浮来，对钱生说他所爱的意中人是一花妖，若不早与之绝交，定有性命之忧。钱生不顾道士之言，毅然择日迎亲。道士不甘心，于贺庆之日暗藏书符法器，准备将莲贞仙子一举诛杀。莲贞仙子为求得爱情的实现，胆气顿壮，以柔弱之身与道士顽强搏斗。代表邪恶势力的道士敌不过爱情的力量踉跄遁走。莲贞仙子与钱生终于结成美满姻缘。

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不同，王韬小说里有关人与花妖或狐魅爱恋的作品只是他的爱情小说的“副产品”。王氏爱情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围绕着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展开其故事情节的。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们勇敢地与封建的恋爱与婚姻形态绝裂，不再以门户、等级、职业、钱财等外在条件为恋爱和婚姻的基础。他们自由地相爱、自由地结合，与一切阻碍他们灵与肉追求的旧道德和恶势力英勇抗争，至死而无悔，来生犹追寻。如美丽聪明诗文兼秀的吴门大家之女华璘姑，爱上了隔壁书生陆眉史，与之私订“啮臂之盟”。可华璘姑之父嫌陆生没有功名，硬将华璘姑许给弱冠就中举的邻省狄某。华璘姑不从父命，以死相抗，自缢于梨花树下。此举感动鬼神，赐其回阳再生。陆生亦因得到神明指点，启棺果得心爱之人。华父终于敌不过情重血诚的一对，被迫让步，许其成婚。再如塾师之女冯香妍与杨生相互倾慕已久，可两家父母均不同意儿女们的选择，强迫他们中止爱情而另婚家长们认为的门当户对的对象。于是，杨生逃婚于前，香妍乔装男子私奔于后。经过两个相爱灵魂在茫茫人海中的千寻万找，杨生和香妍终于苦尽甘来，喜缔良缘。象华璘姑和陆眉史、冯香妍和杨生这样的与旧传统旧势力英勇抗争的叛逆式人物，可从王韬小说中举出一大长串来，如《鹃红女史》中的鹃红女史与朱秀才，《吴也仙》中的吴也仙与三径生，《钱意苏》中的惠荪与梁生，《梅无暇》中的梅雪与林彬，《剑气珠光传》中的白如虹与随照乘，《吴琼仙》中的琼仙与孙月洲，所有这些反叛传统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青年男女形象真切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国广大青年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也表达了王韬本人对封建

王韬：《淞隐漫录》，卷一。

王韬：《淞隐漫录》，卷一，《华璘姑》。

王韬：《淞隐漫录》，卷二，《冯香妍》。

礼教的憎恶和新型恋爱婚姻形态的憧憬。

王韬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超越时空的。只要有情，不仅可以和个人相爱，和古人相爱，和花妖狐魅龙女天仙相爱，而且可以跨洋越海与异邦之人缔结同心之好。《淞隐漫录》中有一篇《媚梨小传》就是描写英国才女媚梨与中国才子丰玉田曲折而又缠绵的爱情故事的。伦敦美女媚梨与英国男子约翰有一日之欢。后媚梨出嫁西门，约翰醋意大发，以无赖手段致使媚梨新婚丈夫不堪侮辱自杀。媚梨不胜其扰，乘船作东方汗漫之游。旅行途中结识中国才子丰玉田。两人由爱恋而成婚。婚后恩爱惜笃，定居于上海。不料，约翰不死心，追踪而至，并扬言必将媚梨和丰玉田两人“男女双双杀却”以泄愤。为了维护自己选择爱人的权利，媚梨挺生勇敢地与约翰决斗，最后以身殉情。约翰亦中弹同归于尽。这是一部描写东西方跨国婚恋的石破天惊之作。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刚刚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近代中国小说史上，如此完整细腻地描述中外婚恋，王韬实属第一人。

王韬爱情小说所包含的爱情观体现了一位思想开放的近代文化人对人性的新认识。在王韬看来，男女欢爱为人之天然之欲，“苟必为强制，大拂乎人情，鲜不为大好震”。男女之爱既不应阻遏，也不可伪装打扮，添加外在条件。她就是她，她就是情。一切以门第、功名、钱财为情爱之条件者都是“伪情之人”。在此主题思想指导下，小说中的痴男情女都被塑造成“唯情主义者”。为了爱情，他们可以抛弃一切，可以不计生死。生为情人，死为情鬼。宋明以来“存天理灭人欲”的唯理主义在这里遭到无情地揶揄和奚落。

（三）描绘理想寄托希望

抨击黑暗也好，声讨封建礼教也好，聊寄我兴也好，王韬似乎无论写什么都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参照物。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

象大多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中国政治局势的险恶，王韬的人格和心理状态是分裂的、矛盾重重的。反映在小说中便是理想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化。王韬小说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物都带有这种二元理想光辉的折射。

王韬青少年时代有强烈的经世思想倾向。他多次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和上书地方大吏，以求通显致用。但现实给池的教训是：此路不通，且充满难以预测的风险。所以中年以后，他出儒入道，由求功图业转为韬光守拙，由“有为”转为“无为”。可他又不具备完全丢弃前者的神仙之心。于是乎，他的作品便呈现一种入世穹出肚倾向杂然并陈的斑驳景象。最初，两种倾向旗鼓相当。随着人生磨难的增多，出世思想逐渐加强，到了晚年，出世思想几乎占据绝对优势。

王韬时常通过男主人公经过艰苦拼搏取得功名然唇喜得如意才女来寄托他的希望。《尹瑶仙》中的雒生倾慕富豪之女张满珠，但因家贫而受到张女之母的蔑视。雒生因此发愤读书，做八股文，终于一举告捷南宫，使张女之母刮目相看，允其成婚。于是钱财、美女、尊严同时并至。这是古训“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形象化注解和登峰造极的发挥，同样题材的作品还有《蒋丽娟》、《白素秋》、《皇甫更生》。人书中男主人公的经历大同小异。他们

王韬：《淞隐漫录》，卷二，《萧补烟》。

王韬：《淞隐漫录》，卷五。

《蒋丽娟》、《白素秋》见于《淞隐漫录》；《皇甫更生》见于《淞滨琐话》。

都是怀才不遇的秀才，布衣时地位低下，下为人们所看重，经过科场不断拼搏，终于一鸣惊人，顿改昔日寒酸之象。美女求婚者接踵而至，中限为穿，以至主人公一夫多妻仍不能满足需求。

王韬小说中还有一类作品与上一类作品的思路相近侧。作品主人公也是从寒士起家的，但作品的着力之处不在于美满姻缘，而在于树立一个有力的清官形象以去邪除暴。《王蟾香》中的章志芸考中状元以后先后被委以学政、御史、湖北臬司等职。他参劾不避权贵，剖冤断狱比于包拯，扶弱除强，活人不计其数。《华胥生》中的梁生十八岁“捷南宫授词林”，一日之间名动京师。皇帝特为其做媒，娶大学士之女为妻。完婚之日，皇帝特书“玉堂归娶”四字赐福。旋特授江苏督学使，任内“绝请托，杜苞直，一切干谒莫敢至其前。鉴空衡平，所拔多知名士。孤寒而负才具者，必厚资以膏火，以成其学。朝犹白屋，暮入青云，其造就人才之速如此，单族寒门，至呼梁生为慈父”。任满之日，又将宦囊中一万八千金散给“贫衿有缺资斧不能应秋闱者”，对莘莘学子可谓仁至义尽。

王韬在上述两种题材的作品中要告诉人们的似乎是：封建社会还没有进入绝世，还有亡羊补牢的希望。通过人的努力，美好的结局总有实现的一天。他在为困顿无告而又信心不足的人们制造继续活下去的精神食粮，也在为命运坎坷的自己营造一块可供栖息的沙漠绿洲。

然而，王韬似乎知道这些动人的故事不过是用来安慰别人和蒙骗自己的海市蜃楼，经不住残酷现实的轻微碰撞。小说《凌波女史》男主人公陆蓉士的经历再清楚不过他说明了这一主题。陆蓉士自幼苦读，弱冠即告捷南宫。随后官拜御史，并同时选取两位美女为妻。人生风光至此尽力陆氏占去。然而好景转瞬即逝。陆蓉士因奉旨密察地方利弊，遇事敢言，不避权贵，即刻遭当轴忌恨，被罗织入罪。当缇骑临门之际，他惊恐万状，呕血而死。多亏其妻为天仙下凡，藏有返生还魂的灵药，他得以重生。至此，他方领悟人生真谛，携两妻及新娶之两妾南下粤中，优游林下。当朋友劝他再出山为仕的时候，他回答说：“吾视宦途真一孽海也”。王韬反反复复地通过作品人物之口告诫人们，现实大黑暗了，已经无可救药。对待它的最好办法只有躲开它。他在《乐仲瞻》中写的一段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更能清楚表明他的这种思想倾向：

生谓女曰：“余视人世浮荣，如飘风之吹马耳，石火电光，镜花水月，一切皆幻。余今夙愿已偿，了无挂碍，拟欲入深山密林，寻前时道者，当必有所遇焉。卿其能从我乎？”

女曰：“是我心也。奴自死复生，真如一梦。遍尝世味，有同嚼蜡，敝展形骸，芥视富贵，固已久矣，岂待君一言而后决哉！”

王韬进而为读者模塑了一个充满道家无为精神的理想境界。他对现实社会的怀疑、失望和否定全被寄托在这一境界之中。三部小说集中均有这方面的篇章。写得比较完整典型的有《翠驼岛》（见于《遁窟谰言》）、《仙人岛》、《阅玉叔》、《海底奇境》、《红云别墅》、《消夏湾》、《白玉楼》

王韬：《淞隐漫录》，卷六。

王韬：《淞隐漫录》，卷八。

王韬：《淞隐漫录》，卷三。

(以上均见于《淞隐漫录》)、《仙井》、《乐国记游》(以上见于《淞滨琐话》)等。

王韬的理想境界是一个以自然无为为本色的仙人之国。在这个国度里,无日月历法,无四季变化,春天是唯一的季节。山清水秀,奇葩异卉遍地皆是。人们欲作则作,欲息则息,一切不紧不慢,听其自然。没有钱财物欲,男女老少均不知八股帖括为何物,尘世间占文化统治地位的四书五经也被人们“笑其谬误”。甚至其中所流行的文字也是三代之际言简意赅的峪蚪文。美丽多情的少女随处可遇,甘露花精酿成的延年益寿之酒山泉一样长流不断。山径小路两旁的树枝上挂满了芳香沁人的仙桃仙枣。

理想的美妙反衬了现实社会的恶浊和黑暗,从这个角度讲,王韬所描绘的理想对现实具有嘲讽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拉入虚无飘渺的道家世外桃源,并不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批判态度。它的客观社会效果是消极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王韬为人们描绘的理想之境中,出现了一些新鲜的“域外之物”。如《海底奇境》中出现了瑞士美女“兰娜”;《乐国纪游》中谈到基督教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和人类的“生命树”。所有这些给古老的文言小说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大大拓展了中国读者对未来理想想象的空间。

(四)表现风流

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曾指出,王韬小说有一大特点:“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验之王韬小说中大量描写风流韵事之作,此说确有切中肯綮之处。

王韬小说中描写妓女风流春秋的作品几乎占全部小说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局面恐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及王韬本人的经历不无关系。自五口开埠和香港成为殖民地以后,中国沿海城市的色情业随着洋人的足迹和鸦片的泛滥走向鼎盛。以上海为例,同光年间这里的烟馆、妓院超过千家。王韬自述说:“沪上为繁华渊藪。城外环马场一带,杰阁层楼,连甍接栋,莫不春藏杨柳之家,人闭批把之院。每至夕照将沉,晚妆甫罢,车流水,马游龙,以邀游乎申园西园之间。逮乎灯火星繁,笙歌雷沸,酒肴浓于雾沛,麝兰溢而香霏。当此时也,其乐何极。于中绮罗结队,粉黛成云,莫不尽态极妍,逞娇斗媚。皆目以为姿堪绝世,笑可倾城。盖倭指计之,其拔艳帜而饮芳名者,固不知其凡几矣。”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国落魄文人而又长期浪迹在外的王韬,极易陷进嫖客的队伍中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经历坎坷不被世人所理解的王韬在同样命运多舛的青楼女子身上找到了共鸣。反映在小说创作中便是烟花粉黛作品的大量出现。王韬的烟花粉黛作品可分为两小类。一类是比较记实的作品,主人公就是当时的妓女,姓名均为真实姓名,王韬本人亦时而出现于情节之中;另一类是比较写虚的作品,主人公虽为妓女,却被披上了一层仙女的外衣,是天宫派到凡间来了却风流姻缘的。前一类有《三丽人合传》(见于《遁窟谰言》)、《画船纪艳》、《金玉蟾》、《谈艳》、《东瀛艳谱》、《珠江花舫记》(见于《淞滨琐话》)、

王韬:《淞隐漫录》,卷八。

王韬:《淞滨琐话》,卷五。

王韬:《淞滨琐话》,卷七,《谈艳上》。

《申江十美》、《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丁月卿校书小传》（见于《淞隐漫录》等；后一类有《玉蟾香》、《李韵兰》、《陆月舫》、《秦傅娘》（见于《淞隐漫录》）、《白琼仙》、《严寿珠》、《水仙子》、《朱素芳》（见于《淞滨琐话》）等。

王韬的烟花粉黛小说仍属于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男主人公多风流潇洒，女主人公多美丽多情。两方一经交杯换盏，便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虽经千折百难，终不负初始之心。

王韬的烟花粉黛小说不同于《海上花列传》及清末民初的狭邪小说。王氏小说的重心在“情”而不在“色”。它避开嫖客与妓女之间下流淫秽细节的描写，着重揭示人物的情感世界。

不可讳言，王韬的小说中也有不少令人生厌的糟粕之作。由于他多以欣赏态度与浪漫笔法描写妓女的生活与精神活动，妓女们真实的苦难与忧伤未免被人为地冲淡。有些参揉王韬本人传奇经历的风月之作，也缺乏思想的广度与深度。如《谈艳》、《东瀛艳谱》、《珠江花舫记》、《二十四花史》等，它们几乎完全沦为老年王韬自娱心情和自我风流的游戏笔墨。至于少数大肆宣染妇女贞节观的作品，与他笔记中的“贞妇烈女行状”一样，更和他提倡的妇女解放爱情自由的主题不相一致。这说明王韬在女权问题上的认识还存在模糊和矛盾之处。他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第九章改革中国教育的呼唤

中国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因为以富强为目的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具有相应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的现代人的参与。而现代人则完全是教育的产物。王韬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逐渐发现他所倡导的富强运动遇到了人的问题，因而把他的注意力投注到教育改革的思考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独具慧眼的见解。这些见解或直接被呈送给清朝的方面大员，或公开发表于报刊之上，从而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方向标。

一、人才观的变化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有悠久的重视人或人才的传统。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里就有“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古老训条。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基本上都承认人才多寡与国家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对人才的呼唤和关怀的热情一点也不比现代社会眼光犀利的思想家在这一方面来得逊色。所谓“民族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这一流行当今世界的时髦口号，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哲人熟而能详。

王韬秉承了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人才的传统，终其一生，他几乎没间断过对人才重要性的呼喊。从他所留下的文章和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方面的文字。略举数例如下：

地之兴废何常哉？系于人而已，得其人则兴，而百事以治。

天下事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之手。

国之强弱何由哉？为土地有大小欣？为士卒有多寡欤？抑为器械有利钝欤？蓄积有虚实欤？余以为皆非也，非则何由，人材之盛衰为之也。今夫工师之宫室，伐木于山，相其大小短长，度才而用之，及其功成，崇台广树，万户千门，轮焉奂焉，莫不备极工巧，国之于人材亦然，量能而授事，度材而任职，百事由以举……亦在乎得人而任之而已。——

在王韬看来，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就看其人才的兴废程度：人才兴旺，贫弱之国可转为富强之国；人才凋敝，不仅贫弱之国求强求富永远办不到，富强之国亦可因此趋于贫弱和败亡，“天下之患，莫大乎浮慕富强之虚名，而根本之地未立，虽强立见其蹶耳。治国之要，曰举人才，曰固民心”。

王韬虽然把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人才的思想强调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人才概念的内含上他的人才观与旧人才观是南辕北辙的。他的人才观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属于或接近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范畴。

首先，传统的人才观标榜“君子不器”，人才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框限在大而化之的儒家学说里面。被公认的“人才”看上去无所不通，但实际上——行不通。他们似乎是一个模子倒下来的众多的砖坯，缺少个性，缺少特长，相互间既同构又同质，单调得令人生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做“官”。所以官是传统人才的衡量标准和共通职业。甲官与乙官，不论其属于吏、礼、兵、刑、户、工哪一部门，在传统人才观里只要被承认“有才”便可互相调来调去。王韬时常抨击的“今日治吏曹，明日治刑曹，未及熟其职事则又转而他”的怪现象与传统人才观并无矛盾之处。至于“官”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在传统人才观里不过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与贩夫走卒相差无几的工匠或山野术士罢了，不在正规人才之列。

王韬的人才观与上述人才观明显不同，他强调人才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是以承认人才的多样化、专门化为前提的。他认为以中国近代化为目标的富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创建东华医院序”。

王韬：《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见《万国公报》，第59期，1893年12月。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送黎侍郎回越南后序”。

强运动是一场为了消除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至政治差距的一次民族总动员。它不仅需要一个讲究办事效率、有眼光、有谋略的官僚阶层，而且更需要拥有不同专门知识的企业家、商人、科学家、报人、工程师、技术员、教育工作者及其他各种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才。他说：“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折冲行阵，则有将帅之才；教习火器，命中及远，则有战斗之才；统率艨艟，乘风破浪，则有驾驶之才；长于战具，巧思独绝，制胜出奇，精益求精，则有制造之才。”所有这些人才，虽然他们可能因知识构成的限制不能成为所谓“通才”或“君子”，但他们在某一领域的专门之才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富强活动助益匪浅。王韬因此呼吁社会要抛弃旧时代封建士人对人才求全责备的心态，充分考虑到人才的不同特性，区别对待，“用之必各当其才，而后才乃见”，“因材施教，靡有或遗”。

对专门人才的关注是王韬人才观念的重心所在。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长期呼喊人才之重要，其触点就是因为他对以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富强运动缺乏行家管理和操演的现状不满。他曾不无痛心地写道：

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置机器，造火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彪然其著，庞然其大，惜乎徒袭其皮毛，有其名而无其实。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

船坚、炮利、兵足，而不得其人，则有船与无船同，有炮与无炮同，兵足与不足同……欲务海战，必求其人。

今天下要务莫急于理财，诚所以培国本厚民生而立富强之基者也。顾理财尤以得人为先。当此时事日艰，强邻四逼……国家因此许民间肆习西学，仿效西法，枪炮船舰，开矿织布，咸思次第施行，而卒未全收夫实效者何也，是岂宜于泰西而不宜于中国哉？盖中国有泰西之法，而无泰西用法之人也。显然，王韬是把人才与求强求富的工商金融、军事国防、科学教育、工程技术等实际专门活动联系在一块考虑的。强调专门人才是王韬人才观的一大特点，表明他的人才观与传统形态的提倡“君子不器”的人才观已发生相当大的背离。

其次，在无孔不入的儒家文化的辐射下，传统人才观带有浓重的伦理至上的道德主义色彩，片面地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心灵至善。当然，传统人才学说中有“格物致理”一说，从表面上看它似乎绕开了道德主义这一关，走到了功利主义的边缘，但仔细品味之下，它仍然是一种“功近于虚”的冥想苦索，其目的依旧是为了修得“诚正治平”的道德正果。这与近代西方“功徵诸实”的自然科学与技术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价值观上，人的道德始终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不可须臾离的，而智与能则是次要的、从属的、第二位的。每当遇到“德”与“才”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古代哲人总是取“德”舍“才”。女子无“才”尚且可称为“德”，倘若无“德”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王韬：《弢园尺牘》卷十，“答余谦之大令”。

王韬：《救时刍议下》，见《万国公报》，第44期，1892年9月。

王韬：《论宜得人以理财》，见《万国公报》，第46期，1892年11月。

恐怕连人也都称不上。一个能够用伦理道德修身齐家的所谓“道德之士”，在古代中国可进而治国平天下；而一个“不孝”、“不悌”或“不慈”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治国平天下的。不能治平者也就是不能为“官”，从而也就被永远排斥在社会公认的“人才”之外。

王韬的人才观虽然也有几分道德主义的回光返照，但最被王韬看重的是实用功利。他说：“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輿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就一个人来说，其才能可能存在着与道德不相一致的情形，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拒绝承认和使用人才的借口。一个精于算学或矿学的专门家，或拥有任何“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人，虽然他可能在所谓的道德方面存在着某一缺陷，德行不及所谓的“君子”或“道德之士”，可绝不能否认他的实际学问和才能有益于国计民生。因此，也就不能把他排斥在人才之外。在中国近代，既然“民富国强”是社会建设的最大目标，一技一材的专家正是最适用的真才。

“以有用之心思，施之于有用之地，日事讲求富强之效”是王韬一贯坚持的人才标准。他多次对封建顽固派把道德放在功利之前的论点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攻击洋务运动“侈事功，夸富强，兴管商之风”是“不知兵甲修而后道德尊，师旅雄而后礼义盛”，是“夏虫不知冰”，是杞人忧天。王韬对自古至今中国社会的人才状况进行了反审。他发现，在道德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里，人才存在着一种“名”与“实”的分离。一方面，身居要职、有翰林、进士、举人等头衔者，位在人才之列，肩有治国理民的重任，但这些人除了怀抱“圣贤之典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和所谓道德修养以外，别无所有。“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輿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河瘤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这种所谓人才，说穿了是一种“非治国经野之道、非强兵富民之略”的“伪才”，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高级游民”。对中国现代化运动来说，这种“伪才”、“游民”越多，启动便越困难，发展便越缓慢。王韬因此直言不讳地呼吁将这些有害无利的“伪才”、“游民”驱除尽净；另一方面，中国本来数量就十分有限的工商活动急需的拥有真才实学或怀抱一技之长者却处在无职无权的、被人轻视的、甚至连自己生活都朝不保夕的可怜地位，空有报国之志而无报效之门。即使有一小部分勉强挤入了某些官员的幕僚队伍，或者象王韬本人那样与统治阶层中的某些要员保持着私交关系，但扮演的不过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帮闲”或“伙计”角色，与大局补益甚少。王韬不无自嘲地写道：“天下事大抵言之易，而行之难，所见能及之，而所行或不能赴之……事为创见之事，法为创行之法，而亟亟于进言者又只此草茅新进之人，即使一时能动当轴者之听，亦不过如异闻奇论，聊备一说而已，岂真欲采择而行之哉？坐令良法美意，日消磨于因循苟且之中。言之谆谆，听之藐藐，从未闻有起而整顿之也。”王韬在这里似乎已经看出人才的“名实分离”是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运动始终吼声如雷而又无法实际展开的原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王韬：《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万国公报》，第57期，1893年10月。

王韬：《弢园尺牋》，卷八，“上了中丞”。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洋务在用其所长”。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年），夏季超等第五名王韬“评语”。

第三，传统人才观荡漾着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基调，贬低排拒一切非中国的“异端”。凡是沾一点“夷”边的学问、知识、技能、人才，在传统人才观或价值观里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买办、通事、洋商、华侨资本家等，即使学问再大、本事再多、爱国之心再诚，也总是和“小人”、“汉奸”、“二臣”一类人物相差无几。郑观应、唐廷枢等一批具有一定近代工商知识和爱国思想的买办早年几乎全被当成“圣教之罪人”、“国家之蠹虫”而受尽同胞的冷嘲热骂。而精通外语知晓西学之士也绝对不能与饱读四书五经的国学之士相提并论。近代西学大家容闳、严复等幼学“旁行文”而遭乡论指责便是明证。甚至王韬本人早年也拒不承认西学和西学之士应有的社会价值。他在1859年写给周弢甫的信中曾说：“西人于学有实际，天文历算，愈出愈精……察地理，辨动植，治水利，讲医学，皆务析毫芒，穷其渊际，是以有识之士乐与之游……然识者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蠹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思想成熟时期的王韬则突破了中心主义或民族本位主义的藩篱。他把人才观与改革开放思想联系起来，以世界意识和多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才问题。他既承认中国之学、中学之才，也承认西方之学、西学之才。从他所推崇的人才来看，后者甚至是他强调的重点所在。1875年，他应邀向丁日昌荐举人才时所推荐的三个人都属“西学之士”，而非“国学之士”。他的推荐信是这样写的：

如陈蔼廷、张芝轩，皆其矫矫者也。张君明于欧洲情势，能见其大，著有馭外刍言……陈君之学，不名一家，弱冠即在英国衙署，律例尤所深知。近为西字日报，以华人而作西报，向所未有，非其西学稍有可观，西人安肯倾倒若是。伍君秩庸，不憚久远，学律英京，固一时有志之士也。

王韬生平自视甚高，被他看上眼的人物寥寥无几，他在这里用如此一赞三叹的语言推重这几个在传统人才观里不过是“以夷变夏”的“大蠹”，表明他衡量人才的标准已摆脱中国中心主义的偏见。

王韬有一句名言，即“东方有圣人焉，西方有圣人焉”。在这一前提下，王韬自然而然地把西方的有学之士也包罗在人才之列。在他的文章书信中，介绍、称赞西方才学之士的文字屡见不鲜。从历史上的哥伦布、培根、侯失勒（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到现实交际中的傅兰雅、伟烈亚力、合信，都是他赞美过的才识过人之士。王韬甚至认为，中国现代化急需大批实学人才，中国在国内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妨采取“取材于各国以为我用”的方针。他在《代上黎召民观察》一信中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不学西法、不聘西方人才指教或暂时管理，断难奏功。把传统士大夫视西学和西学之人为“不若我甚”的观点颠倒到它的对立面——非西学和西学之人“不足为功”，

王韬：《弢园尺牋》，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王韬：《弢园尺牋》，卷九，“上丰顺丁中丞”；又，王韬在1883年也曾向江西巡抚潘霨荐举过人才，此次所荐为祁翰荪，亦为“西学之才”，曾“远航瀛海，游历美洲，采异方之情俗，识泰西之方言”。《弢园尺牋续钞》，卷三，“上潘伟如中丞”。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王韬：《弢园尺牋》，卷九。

标志着王韬多元主义人才观的最终确立。

二、审判旧教育

人才是教育的生成品，教育是人才的摇篮，王韬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关系。因此，他的思路自然地重视人才进到重视教育。他说：“地之于草木，何地不生，国之于人才，何国蔑有，然则盛衰有不同者，无他，由乎养与不养焉耳”；“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来至”。这里所谓的“养”与“求才之道”就是指教育。

王韬是从文化的深层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巨大功用的。他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相信教育关系到兴学育才、关系到开启民智、关系到富国强兵，因而是国家命运的杠杆所在。中国只要教育发达，才智之民多，则民富国强指日可待。

然而，清朝的教育并没有造就出合格适用的真才，只培养了一批道貌岸然而又毫无实际知识的“伪才”和“伪君子”，因此，它无疑是中国经济贫穷落后、政治黑暗腐朽和军事羸弱不堪的祸源。王韬以中国三代时期的教育为参照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痛加挞伐。他说，与三代相比，中国封建教育弊端重重：第一，三代之时，学校教学内容甚为广备，是“德”、“行”、“艺”三者并重，全面发展，所培养的人才“德行足以为人之师，才能足以应当世之务”。而今之学校，教学内容狭窄呆板，四书五经、词章考据之外别无所学。士者图务虚文而薄实行，“其能通当世之务者百不一二”；第二，三代教育是“不惟其书惟其行，不惟其理惟其事”，“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莫非事也，盖使人从事于日用实务而至于其理”，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于是实才备出。今之学校，牵制章句，剖析文义，用力于末节，而不复顾其实际，“不惟其行惟其书，不惟其事惟其理”，教者、学者要么为帖括所拘，要么高谈性命、衍说仁义，细析毫芒，至于钱谷财赋，舆图天算，则茫然不晓；第三，三代之时，教者即官即吏，“教”与“治”、“学”与“仕”如出一辙，教学内容即为人仕为官之实际学问。礼乐刑法，钱谷算数莫不于学中俱备，学其所仕，而行其所学。今之学校，与实政脱节，仕学歧而为二，所学者章句，所业者文词，所志者科名，学者及其入仕为官，如不习操舟而泛于海，茫然四顾，束手无策；第四，上古之时，文武出于一途，学校将射御并于文艺，学者既能文，又能武，一有征战，人皆知兵。今之学校，教文不教武，致使文武分为两途。武人率不知文，儒者亦藐视武事，以为非我所宜知；第五，古者学问有专，古人专学一事，学成而仕，终身不变其任，所以事专而功易成。今之教学，泛泛而谈，散乱无纪，学成为官，亦用心不专，今日治兵，明日理刑，故事事无成。

三代或上古教育并非如此完美无缺，王韬在这里借“三代”这一易为中国士人接受的传统名词，并将近代西方教育的新因素、新精神犀入其中，不过是想借一种理想化的教育模式来抨击清朝教育的不合理和呼唤教育改革罢了。后者是王韬所要表述的关键。至于前面所用武器的名称是否确切、是否合于历史真实，王韬似乎无暇顾及。马克思曾说过，在历史上有过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时候，革命者

王韬：《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十三。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平贼议”。

王韬：《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十三。

常常请出古代亡灵来助战，借用古代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在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事物诞生，而不是为了模仿旧事物；是为了提高想象中某一任务的意义，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一任务。王韬在这里的真实用意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一样，在于寻找批判现实、变革现实的“革命精神”。

与“借古讽今”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韬也曾利用英法和日本等国的先进教育样板来反衬清朝教育的不合时宜。比如，他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这样推崇日本的教育：

（由巴黎博览会日本馆格致器具物质之盛以观之），日本幼孩自少学习西法，出窗平日父母之教训，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已与泰西不甚相悬，其教习之法仿照英国北省章程，最为讲究。男女皆分塾督教，房屋均高大通风，并令学徒请晓保养身体臧腑方法，虽伦敦巴黎无以加此。古时学塾墨守旧法，但读中国书，全不明格致要理，饱餐糟粕，以误终身。今皆读外国有用之书，测绘地图，认真不苟，论欧罗巴各国疆域甚详且尽。所列水师表，凡各口岸险要处所，有图有说，朗若列眉……谓通商泰西历年无多，而已能如此，国政人心效应如响，岂偶然哉？

与自然朴实的三代教育方枘圆凿，与清新实用的现代世界教育潮流亦背道而驰，清朝以务虚为特征的教育实在是应该寿终正寝了。王韬举出两个参照系的目的在于此昭然若揭。

王韬尤其痛恨与清朝教育联为一体的八股取士制度。在他所留下的文字中，这一方面的嬉笑怒骂连篇累牍。其文字所显示的时间跨度略在 50 年左右。也就是说，从 1847 年王韬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起至 1897 年他撒手尘寰前为止，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口诛笔伐。对同一问题花费如此之长的时间、如此之多的精力反复论驳，表明他对这一制度的深恶痛绝。

王韬认为，八股科举制度是明清以来教育退化、人才不出、国家不振的根源。他带着愤怒的情绪写道：

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迹，乃犹以之取士，日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日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

国家以时文取士，数百年来莫之敢废。士之习此者，多有青年就学，皓首无成者。至于莅官之后，身之所行，尽非少之所习，于是不得不委之于吏，上下其手，是非颠倒，官场之坏，由于士习之颓。

科举不仅不能培养人才，反而将自然生成的材质聪颖子弟斫析尽净，“夫天地生才，而国家非惟不能用，又从而摧残屈抑之，以自斫其元气。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日进士，重之日翰林，以为天下人才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03—605页（1975年，人民出版社）。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第37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平贼议”。

在是矣。不知……率天下之人才而出无用者，正坐此耳。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无不由此。”因为，学时文无论成与不成，最后的结果不外是变成“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动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的废人。相反，倘若人们一开始就摒弃科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则优者可治国安邦，服务于社会，差者亦可凭一技之长自谋生计，“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者”。

八股取士既然如此十恶不赦，统治者为什么还要视之如宝乐此不疲呢？王韬揭示说，封建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与天下人人有才不相容的。封建统治者既然把国家当成一姓的私产，便免不了时时刻刻提防别人的攘夺，而削弱、消除攘夺者的最好办法便是愚民政策。砍所智慧、扼杀灵性的科举制度正是一种高级愚民政策：“以时文取士，盖欲其废书不观，使之圃于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范围；往往有髫龄就学，皓首无成，而士之受其愚不少矣。呜呼，此徒以功名富贵鼓舞其心志，虽有奇才异能，非是莫由进身，其愚黔首之心，实无异乎祖龙之一炬也。”明清以来，科举考试专试时文，不论实际，人才智慧全被禁锢在四书五经的枷锁之中，这的确给中国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直至王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统治者依然抱住这一有害无利的制度不放，民间学子亦热心追逐而不悔，这便不能不引起志在振兴中国的王韬的极大愤慨。所以，他终身不厌其烦地攻击八股取士制度，并视之力中国社会落后、腐朽、黑暗及其他一切不如人意现象的“万恶之源”，甚至把它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举相提并论，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观点不无简单和偏颇之处。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才”。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士”。

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王韬把它归之为科举制度似乎过于简单；统治者开办科举考试的最初动机应该说是为了培养统治阶级的合格成员，虽然在实际过程中它阻碍了人才的培养。

三、建立新教育的构想

王韬竭力抨击八股取士制度不合人性和事理是为了废除它以及整个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而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全新教育体系。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一贯主张“事求其渐进，道无贵乎欲速”的渐进主义者，其改革的目标虽具有革命意义，可从具体的改革方案看，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循序渐进、不求其速的特征。

王韬认为，改革旧式教育最好采用“先增新、后废旧”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即先突破一点，楔进新因素，以求局部改变旧教育的面貌，然后逐渐扩张，最后将旧教育，包括旧内容、旧形式、旧方法全部废除。他把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步骤一分为三，建议第一步暂不停止科举考试，而是在科举内容上略加调整，除首场考题照旧外，“二场之经题宜以实学，三场之策题宜以时务”；同时在制科以外，加设专科，以通达政体、晓畅实务者充其选。王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寓变通于转移之中，实以渐挽其风气而裁成鼓励之”。第二步是废除时文考试，将教学和考试内容区分为才、学、识三途和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十科，不论何途何科出类拔革，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同时于武科废止弓石刀矛考试，而改以学、艺、力三科取士，“学之大者，首在地理兵法，明乎山川扼塞，熟于行阵进取，料敌审势，屯营设伏，无不具有方略……此所谓大将名将才也；艺者如建营垒，筑炮台，制造枪炮器械，及一切攻战守御之具，因敌而施，无不布置有方，深中要害，此所谓能将才也；力者在乎发炮鸣枪，命中及远，洞坚折锐，荡决无前，此所谓战将才也。”王韬还建议对那些捐纳出身的官吏和候补人员增加一次考试，考试内容为：沿海省份试以洋务西学，内地省份试以理财钱谷实务。王韬宣称，此举一来可淘汰一部分不肖、不才、不能者，二来可扩大实学西学的影响，有利于官场和士林学风的转变。

走完上面的两步，实用之学、实用之才虽然已经取得了立足之地，但这毕竟是旧房子上的“拆旧添新”，在体系或模式上总缺少重新构造的气韵。所以王韬建议还要走第三步，即在新的地基上建立全新的西方式近代学校。他推崇法国的教育制度说，法国教育有大学、国学、小学三级之分，而重点全在乎小学、国学，“通国市镇计有三万七千五百一十处，所设小学之数如之。设学经费半出于官，半出于民，入学肆习者，毋须自备束修，其地贫民无力延师者，子弟许在学中……小学国学中所习课程其目有五。一审查天主教中规仪道法；一考察律例；一明医理辨药性；一诵读诗书；一专攻艺术（指各种专门应用性技术一著者）此外，府州县镇中所有私设书塾不可胜数，皆以治杂学，习各技，各就所愿，群居讲肆……习兵法，开河道，造器物，博通古今，各国语言文字，历算，地理，史学，性道，图画，气机，无不涉猎其精粗，考究其本末。所以国中高材博识之士时不乏其人也。”在这里，王韬思想中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中国不求人才兴旺便罢，若求人才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下”。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下”。

王韬：《弢园尺牋》，卷八，“上丁中丞”。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七，“志学校”。

兴旺，亦只有模仿西方，普遍设立各类新式学校，他在为中国统治者设计的变法自强方案中更明确地写道：“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以为训习恰材之地”；“设立学校，以收教士之实效……当令士子日夜肆习其中，必学立艺成而后可出也。其一曰文学……其二曰艺学……文艺两端，皆选专门名家者为之导师，务归实用，不尚虚文”。旧式书院或私塾，教师知识结构简单而雷同，所授学问离不开四书五经和所谓道德人伦，教授者要么愚腐不堪，要么徒有文名，“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王韬所倡议的分门别类的教学内容、众多的专门名家、务求实用的学风以及国家提供的财力基础显然是传统教育不曾有过的新景象。他在竭力为西方式近代学校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开拓道路。

王韬为中国教育改革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方案，但他在1885年以前始终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机会来从事教育改革的实践。他不知疲倦地呐喊，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新式教育的胚芽在中国大地上破土而出。当他听说近代中国西学大师容闳在广东香山开办了一所新式小学的时候，立即著文给以热情地赞扬和鼓励。他写道：“乡设义学，教导有序，则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习文，资秉鲁钝者亦得工于艺，直可使野无遗贤，里无废人，其效之可观盖有如此者……将见义学之中岂无殊尤拔革之姿，足以破浪乘风，慨然抱宗教终军之志，驰驱异域，探求绝艺者。”对新式小学教育的期待、奖劝和欢呼之情于言词中殷然可见。

近代教育的一大特征是把教学内容分为众多不同的科，分科授课。王韬注意到这一教育发展趋势，所以，他在倡议大兴普通学校的同时，主张根据现实富强活动的急迫需要建立某些专门学校，“国家于工农兵商各有艺塾，专宗艺学”。他曾具体提及的专科学校有下述几种：

1. 外语学校。学习西方，与西方交际往来必须通彼此之情，而通彼此之情的首要前提便是掌握对方语言。王韬因此建议国家应于各口岸设立翻译学校，招士子及候补人员肆习外语，“果其所造精深，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王韬认为，中国只要能坚持办学十年，“则西国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舟车等专门名家之学皆可探其秘钥”。

2. 武备院。旧式长矛大刀以及与之相联的传统战略战术已不能适应近代形势下战争的节拍，有必要予以改变，这就急需大量的新型将帅之才和具有一定现代知识和技能的士兵。王韬主张设立新式武备院即现代陆军学校来满足新形势的要求。武备学校专讲战斗、领兵、御边、山川地形、地理舆图、堵防、兵法、谋略、枪炮技术等实用之学。

3. 水师院。中外相战，中国每失于海战，所以建立海军为中国当务之急。王韬提议应在中国各海口兴办水师院即海军学校来为中国未来海军提供合格的兵将。学校讲授船舰原理、航海术和海战兵法等。王韬相信只要中国真心肯学，未来的中国海军必有内卫中国海、进规西国海、与列强海军并驾齐驱之一日。

王韬：《弢园尺牋》，卷八，“上了中丞”。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徵设香山甫屏乡义学序”。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变法自强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4. 舵工馆。即船舶驾驶学校。王韬多次建议选择有经验的中国舵工水手入西方航海学校“精加习练”，等学有成就后返回中国教授生徒，以为扩充中国海军和拓展中国海外贸易培养航海人才。

5. 艺术院。即工程技术学校或制造学校，专门录取“奇巧艺能之士”学习光化电重诸学和制造船舰、枪炮及其他各种机器之工艺。艺术院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务使器能自制”。

专门学校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富强运动的人才来源。王韬为此特别强调国家应在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给以足够支持。学校应有能力配备各种科学书籍、杂志、地图、仪器设备，及聘雇西方专家授课。在校学生应有相应的生活补贴和奖学金。学生毕业后也应有相应的功名以资鼓励。王韬断言，只要在上者真心奖劝，中国必然出现“上以此求，下以此应”的人人自奋局面，到那时，“中国人心之巧，安见不如泰西，将见驾乎其上且不难”。对未来的乐观憧憬溢于言表。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提倡兴办近代教育的过程中，王韬还注意到传统教育从不予以考虑的妇女教育问题。他指出，西方各国教育成功的一大特点是男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如法国教育“不但盛于儒生而且教化下及乎女子，国中女塾公私并设，不节之流咸工笔墨而搁吟咏，琴歌画理，数学方言无不兼通，或有须眉而愧此中帼者”。中国也应模仿西方，给予妇女广泛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他这样写道：“西国重女教，立女书院，中国宜仿其意……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六经六学（“六经”指四书合为一经，加原五经并称之；“六学”指西学中几何学、化学、重学、热学、光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兵学、动植学、公法学等中的任意六项一书籍著者注）。女之才者，贱得为贵，妻妇得为夫师。”妇女接受教育是妇女解放以至整个社会解放的前提和标志。封建秀才出身、曾受封建纲常伦理熏陶多年的王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便提出让妇女平等接受教育不能不说难能可贵。

总结上面的叙述与分析可见，王韬的教育思想是一种与传统教育思想及实践相背叛的新型教育思想，它在很多方面已达到或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高度：第一，在教育目的上，传统教育旨在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入——官僚队伍，片面追求所谓的道德修养和心灵完善。明德、知礼、尊君被当作教育的金科玉律。王韬则认为教育应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为现代化运动中的各行各业培养合格的实用人才。换句话说，王韬是一位“职业教育说”和“教育救国论”的信奉者，他的这种信奉后来衍化为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家的共同信念；第二，在教育内容上，传统教育集中于读史诵经、吟诗作词、模拟帖括一类空泛无用的“虚学问”。王韬则把“艺”、“技”、“实学”放在首要位置；第三，在教育对象上，传统教育过于狭窄，虽然各州县皆有县学，但受教育者皆为身列庠序之士或诸生文童，因此，它实际上仍是一种“精英教育”。王韬则把教育对象下移，普及化，工农兵商、男女老少均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它是一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练水师”。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志学校”。

王韬：《救时刍议上》，见《万国公报》，第43期，1892年8月。

王韬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不仅在封建官僚阶梯上无一官半职，而且遭到通缉，身为“圣朝之罪人，盛世之遁叟”。他接触西方事物又较早，是中国最早游历西方世界的先进人物。这些因素很容易促使王韬在思想上背离传统而走得较远。但是，王韬毕竟早年接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对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词章帖括等均有考究。他是在固有知识架构下去理解、去接纳西方事物和西方思想的。这一方面的因素又常常拖住他背离传统的步履，使他每走一步都显得艰难沉重。前面提到，王韬建议采取稳扎稳打小步前进的渐进主义手段从事教育改革是出于减少阻抗力的考虑，这是从王韬对敌策略方面讲的。若从另一角度看，它何尝不是王韬向传统的妥协。这种妥协来自于他的知识层积和情感中潜意识的无形牵拽。美国学者李文森（J.R. Levenson）在剖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时曾提及，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转变过程中有一个理智与情感的分离，即在理智上他们毫无疑问地承认西方价值，但在情感上便免不了对儒家旧说缱绻不舍。王韬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缠中恐怕也有相似的情形。不管他理智上是如何憎恨传统，在情感的下意识中他时常回过头来欣赏一下传统的美妙。这是王韬教育改革思想中激进与渐进共生共存的深层原因。

第十章晚年的颓废与振作

日本归来之后，王韬几乎一直被病魔缠身，身体急剧地衰老。与此相应，他的精神状态也变得颓废不堪。国事的不幸和个人经历的坎坷使王韬提前步入了人生的晚年。但是，自 1885 年他被推为上海格致书院山长之日起，他的精神状态得到改变，颓废情绪受到抑制。此后，他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将提倡了多年的教育改革主张落实在教育的实践之中，从而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生和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功。他在遽归道山之前的再度振作与奋斗，为他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坎坷的一生画上了一个辉煌灿烂的句点。

一、叶落归根

王韬从日本回来后短暂留沪，随后仍回香港继续从事《循环日报》的编辑和旧著的整理出版工作。此时，中国先后发生了与日本的琉球之争、与俄国的伊犁之争和与法国的越南宗主权之争。清政府举措乖张，外交一误再误。王韬愤于国事之日非，发表了不少激昂慷慨的文字。但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清王朝依然我行我素，不思变革。爱国意识、忧患意识十分强烈的王韬不堪目睹此一局面，终于因忧成疾。他不无痛苦地写道：“泰西大小诸邦叩关互市，辄以兵力佐商力，所至各埠，设官置戍，嚙瞳相望，每挟其所长，从而凌侮我，来必应，请必遂，一旦龌龊，环而伺我者数十国，腹心时腋间遍布森列，几于国不可为国矣。嗟乎！此盖误于羁縻之说，而驾驭未得其宜也。近者日并琉球，俄据伊犁，我国家并持节往问，而时虞失和，势且炭发。老民外感于时势之艰难，内愤于措施之颠倒，旧疾陡发，诚使祈死得死，亦复何憾。”

王韬所说的“旧疾陡发”是指他少年时代就有的老毛病“咯血之症”的再度大爆发。其实，他此时所患之疾何止是咯血。从他与朋友的书信中可见，他还同时患有“眼疾”、“肝疾”、“风痹”诸症。如“与吴瀚涛大令”一信写道：“韬自入春以来，陡患风痹，湿热注于四肢，动履维艰。深恐手足拘挛，将成废人。登山临水，无望于此生矣。瞬经两月，缠绵未痊……以是枯瘠异常，几成老僧。”在给马建忠的信中也说：“韬年来孱躯多疾，精神困惫，迥非昔时；长夜无聊，辄不能寐，药炉茗碗，独遣良宵，几于一月二十九日病。”

身体的衰弱多病加剧了王韬归乡“耕读田亩”的愿望。他在前述致马建忠的信中求助于老朋友说：“韬久病思归，以正邱首。时欲于莫厘、邓尉之间，筑室三椽，拥书万卷，聊以毕此余生足矣。能成斯志，惟在阁下。乞于修书上傅相之时，为韬从容委曲以言之，不必登姓名于荐牍，惟求安游钓于故乡。从此高枕林泉，长卧邱壑，优游著述，歌咏诗书，皆出自君之所赐也。”

求归之心宠盖了一切，以致他对昔日孜孜以求的出山做官的正式邀请也无动于衷。1883年，苏州籍的江西巡抚潘蔚倾慕王韬洋务时名，坚邀王韬为其主持幕务。王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次建立功业的机会。他事后写信给他的朋友盛宣怀叙述他当时的心情说：“弟自读书饮酒之外，了无所好。明春决作归计，行将于吴山越水之间，卜筑三椽，为茧裘以终老。从此杜门却埽，息虑寡营，藉以自全其天，虽有苏张其舌，不复出雷池一步矣。潘伟如（潘蔚字）中丞之聘，弟已力却，诚以生平所挟持者，浅不足以献当道也。归来之后，蔬食菜羹，尽可优游以卒岁。”

然而，王韬是清朝通缉在案的逋逃之人，要想“首邱”亦得需要清王朝网开一面“格外施恩，才能实现。于是，他不得不拖着老病之躯奔波于港沪之间，游说清朝大吏设法取消清廷对他的通缉令。清朝大吏觉得在中法关系紧张的年头王韬居住香港更能为他们提供有关法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二，“与吴瀚涛大令”。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一，“与马眉叔观察”。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二，“复盛杏荪观察”。

有意延缓批准他的回国居住申请。他的《弢园尺牋》中有关于丁日昌等大吏命令他“仍居香海，如有见闻，据事直书，参以所知，少加断制”一类的记载。他后来也确实为清朝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和意见。

到 1884 年，王韬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胜任清吏布置给他的任务。在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人的斡旋下，经李鸿章默许，他终于叶落归根，“载全家于一舸由两粤而返三吴，卜筑三椽寓居春申浦上”，结束了长达 23 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活。

青壮出门，奋斗了一生，到头来只落得一副衰老多病之躯，刚刚回到故国家园的王韬免不了对生命的意义感到悲观绝望。他似乎看破了红尘，不再理会人世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而只求做一个“与故山猿鹤为侣，与世永隔”的山野之民。封建政治的黑暗残酷更加重了他的这种心理倾向。为了彻底消解清王朝的对他的“猜测之心”，表明他确确实实地是一位无心问政的人，他把悲观外化为生活上的颓废甚至荒唐。他自号“淞北逸民”，逢人便说自己“日惟扫地焚香，杜门谢迹”，“仰屋觅句，闭户著书，不欲问世上事”。然而，王韬毕竟是一位勇士。在他颓废、荒唐、怪诞的背后我们可以隐约地看见一个不死的魂灵。在他给朋友的书信中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老骥千里之心”。如写于此时的《与温颉园观察》一信写道：“练海军，造战舰，制火器，选兵士，设艺院，重肄习，储贤才，裕财赋，此八者，尤为当务之急。弟曾拟有条陈，纲举目张，欲献之当轴未果也。”国事民瘼、内政外交依然牵动着他的神经，使他沉默不得，欲隐不能。至 1885 年，他终于彻底抛弃对国家和社会的超然态度，毅然投身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以期在将归道山之前能为中国的未来培养出一代新人来。

王韬：《弢园尺牋》，卷十一，“再上何制军”。

王韬：《弢园尺牋续钞》，卷五，“呈邵彼村观察”。

王韬：《弢园尺牋续钞》，卷四，“与温颉园观察”。

二、投身教育实践

王韬一生倡导改革，可几乎没能得到参与改革实践的机会。唯一例外的是在教育方面，他不仅拥有一整套的教育改革构想，而且亲自参加了教育改革的实践。1885年，王韬接受唐廷枢、傅兰雅、丹文的联合邀请，应聘担任上海格致书院（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Reading Room）山长一职，开始了他的教育改革的实际尝试。

上海格致书院是王韬的老熟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儿子、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倡议发起，经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伟烈亚力、中国算学家徐寿、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筹备而建立起来的。格致书院虽采传统“书院”一词为名，可与旧式书院毫无相象之处。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专门研习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型学校，并且兼有科学协会、图书馆、博物馆等多种文教功能。它建有教授知识、演示仪器的讲堂，储藏各种中外书报杂志的藏书楼，陈列各种西方工艺、机械、实验器具、动植物标本、枪炮武器、农产品、电报机、摄影器材、汽轮机等“稀奇之物”的“知新堂”（后来改称博物馆），拥有当时中国境内最优秀的外籍自然科学教师。根据拟定的教学规划，格致书院教学采用分班分科讲授，教学内容只讲自然科学知识，不涉及基督教教义，也不讲儒家典籍。一句话，从内容到形式，格致书院在当时都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生事物。

格致书院的开办宗旨主要是为了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推动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学习西学的热情。创办人之一徐寿曾向李鸿章报告说：

窃维格致之学，大之可跻治平，小之可通艺术，是诚尽人所宜讲求，今日所当急务也……欲使人人通晓而不虞日久废弛，则必有会集讲论之所，招集深思好学之人，随会学习，讲求参考，以冀将来艺学振兴，储备人才施诸实用。卑职等筹议及此，拟于上海设立格致书院，使风气渐开，以收致用之效。

格致书院董事会发送西方的劝捐公启也说在中国上海设立格致书院“其意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显然，这一办学宗旨与王韬本人对中国新型教育的构想灵犀相通。两者因而一呼便应，一拍即合。

然而，王韬并不是自然科学的行家。他欣然接受此职完全是出于富强运动需要自然科学人才的社会利益的考虑。他后来回忆接受邀请时的心态说：

乙酉秋，唐景星观察偕丹文律师、傅兰雅西士延余为监院，不获辞……余虽略知西法，而格致之学仅涉藩篱，未足为肆业者师，况四方俊彦志乎西学者哉？窃谓近今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由格致为之根底，非格致无以发明其理，而宣泄其间奥，以是言之，格致顾不重哉，

西方某些中国史专家因此把王韬称为“改革呼唤者”（Advocate — rEformer）而非实际“改革者”（Reformer），参见 PauIA.COhen, BetweenTraditionandMOrernity, P.156。

《徐寿上李鸿章书》.见《申报》，第780号，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刊。

转见于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7页。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丙戌年序”。

不通自然科学，但为了振兴中国的需要，自己也只好勉从其难。勇于开路，舍我其谁的气概于此可见一斑。

在王韬之前，格致书院采取董事会集体负责的管理形式，先后担任董事的有麦华陀、福粥士（F. B. Forbes）、傅兰雅、伟烈亚力、丹文（W. V. Drymmond）、唐廷枢、王荣和、李凤苞、徐寿等。在这些董事主持期间，格致书院因资金短缺和学界风气闭塞进展不大。除了傅兰雅主持的《格致汇编》具有一定影响外，教学、研习、博物诸项基本上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状态。王韬接掌书院后，改革创新，力图振作，并把他的教育思想贯彻到教学和管理中去，使院务起色不少。王韬担任山长的12年，是格致书院办得最红火、最有生气的时期。

王韬对格致书院的实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招收生童，进行初等自然科学教育。

在王韬担任山长之前，格致书院有过招生教学的设想。1880年的《万国公报》和《申报》还登过它的招生广告。广告这样说：“招致生徒究心实学……学有二端，一为学西国语言文字者，本书院延有名师，朝夕课责，来学者每岁纳四十金，本书院供给饮食；一为讲求格致实学者，本书院于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皆有专家。来学者先纳三百金。”然而一直没有足够的学生前来报名上学。格致书院日常的教学活动不得不改为临时性不定期的西学演讲。王韬有心改变这种不景气现状，他一方面通过在报端发表文章，大力抨击旧式教育制度，鼓吹格致之学对国家富强以及个人生计的功效，开启民间风气；另一方面积极奔走联络，组织规划，终于在格致书院开办了一个比较正规的教学班（王韬称之为“学塾”，傅兰雅称之为“较高级程度的科学学习班”）。此班大略有21人。王韬为它亲自拟订的教学内容是：“自西国语言文字外，教以格致诸端”。格致书院学塾是王韬从事教育改革实践的第一次尝试。王韬把改革中国教育、促进西方式近代教育在中国成长的希望，把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强邦兴国的理想几乎都寄托在它的上面。因此，它花去王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它的诞生是王韬热情与心血的结晶。

王韬所倡办的学塾在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上都是一种创新。它不教授四书五经，单讲外语和自然科学，这与旧式书院授“文”不授“艺”、授“中”不授“西”的教学，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欲进还退的教育均大相径庭；它不传授宗教教义，这与传教士在沿海商埠办学旨在传教的方针亦属南辕北辙。它的授课形式采用班级制，教学分门别类进行，虽然其规模不大，且断断续续不甚成功，但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是中国人主办课堂教学的滥觞。

（二）四方张罗，为格致书院筹积经费和招募师资。

格致书院办得不景气的两大原因，是经费短缺和师资不足，前者更是问题的核心。格致书院没有常年固定收入，它的经费全来自于中外热心教育人士和慈善机构的捐献，因而十分有限。最初，它打算以开创风气为主要目标，实行免费教学和免费提供服务，但因经费难募，后来不得不改为收费招生。这在科举未废、科学与功名分为两途的社会条件下更使学徒裹足不前，招生量更为减少。而招生愈少，资金愈缺；资金愈缺，收费愈高，学生就愈不愿

转见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24页。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五，“与盛杏荪观察”。

前来报名就学，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因经费困难，所聘讲授者均为义务讲学，毫无报酬。时间一长，愿意前来讲课者亦复不多。王韬一接掌格致书院便立即遇到这一棘手问题。由于当时王韬已经颇负中外时名，与一些洋务派大员之间私人联系亦多，众董事往往推他于前台“劝捐劝教”。王韬当仁不让。为了格致书院能够继续周转下去，实学在中国不至于毁于垂成，他常常借着名气，仗着私谊，游说四方。他的尺牘中有不少信都是为了募集经费和召募教师而写的，如有一封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的信，就是当年他催讨经费和招募教师的写照。该信这样写道：

弟承乏格致书院，尸位素餐，自惭鸠拙……惟是经费不敷，待呼将伯……去岁阁下曾许岁助千金，以资膏火，想见阁下造就子弟，乐育人才，庇广厦者千间，溥慈云者九种，凡预闻者，无不合掌赞叹。今望者孔殷，而施者有待……（阁下）首重电学，苟习之有成，可备他日之用，则即出资相助，当亦非难，今我塾中所教导，似尚少电学一门。若自今日始，由大北公司霍洛师至塾教习，工夫既熟，即由各处电报局员挑选备用，此或可以仰副阁下用意之所在耳。期劝学之有成，知出言之必践。至于傅相之前，尚乞代为进词，庶使格致之学行之益远，或未必无裨于国是，而可藉以立富强之基也。

名重中外，年在 60 左右的王韬为劝捐求师竟如此屈着腰向一“暴发户”说话，其为绵延中国近代教育的香火而不辞艰辛忍辱负重的苦心跃然纸上。

（三）创立考课制度，促进士人研究现实问题。

王韬的教育思想是一种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强调学习西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早在 70 年代他就多次对此加以论述。入主格致书院后又写道：“夫有益于日用行常者，皆谓之实学……深愿院中肄业之上，由浅以入深，由粗以及精。出其绪余，可以措之于实用，庶几为不负乎所学。”为了贯彻自己一贯的教育主张，并借以扭转格致书院长期以来“来学者不多”的冷清局面，王韬改变书院原先单纯学习自然科学和课堂关门面授的做法，创立了一种把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探讨国内外实际问题揉合在一起的新知考课制度，即傅兰雅称之为“汉语论文竞赛项目”（Chinese Prize Essay Scharne）的制度。所谓考课原指旧式书院每年按季进行的诗赋时文考试。王韬以旧瓶装新酒，于 1886 年倡议格致书院每年亦举办四季考课（最初每年四次，后增加特课两次，每年共为六次一本書著者注），专门讨论西学新知识和现实新问题。参加者围绕某一拟定的题目展开自己的议论，写定后交王韬组织评阅，评品优秀者可得到一定奖金，其文章亦由格致书院负责刻印发表。格致书院考课制度的创立，极大地推进了西学在中国的渗透和学人对国事民瘼的关心。格致书院也因此由一个科技学校一变而为一个既研究西学西艺，又探讨中外时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重镇和思想策源地。

最能反映考课性质的是考课题目的设计。王韬自己并不命题，他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设计一个范围，而后请有影响的中外人士出面参加这一工作。据王尔敏先生所制《上海格致书院特课季课命题官绅名表》统计，从 1886 年（光绪十二年）到 1893 年（光绪十九年）参加命题的人共有 17 位，他们

王韬：《弢园尺牘续钞》，卷五，“与盛杏荪观察”。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己丑年序”。

是布政使邵友濂、宁绍台道薛福成、盐运使周馥、浙江按察使龚照瑗、登莱青道盛宣怀、浙江布政使许应镬、天津兵备道胡燏棻、北洋大臣李鸿章、宁绍台道吴引孙、南洋大臣曾国荃、格致书院董事傅兰雅、署两江总督沈秉成、苏淞太道聂缉槩、南洋大臣刘坤一、江海关税务司裴式模（M. B. Bredon）、登莱青道李正荣、招商局总办郑观应。显然，命题者大多为倾心洋务的主政大吏及具有时代眼光的中外有识之士。选他们来命题反映了王韬创办考课的良好用心。

从考课题目分析，它们大多是与西学和现实密切相关的“时代焦点”。王韬为题目划定的总方向是或询西学，或询时务，“务归实用”，“书院既以格致名，则所命之题自当课以西学为主，而旁及时事洋务”。从1886年至1893年，格致书院所出季课、特课题目共有77道，其中格致类或科学知识类有22道，富强治术类25道，人才类4道，教育类4道，国际局势类3道，边防类6道，语文类2道，社会救济类2道，其他类5道。题目类别的比例安排充分反映了考课对西学知识与富国强兵的重视。王尔敏先生为此评论道：“命题题旨所反映中国官绅对于当前问题所严肃考虑之重点，即实以求富强之想望最为热切。在官绅大吏命题之中，当已充分反映对于后学之期望，重大问题之提示，以至于时代思潮之传布与推广。王韬与傅兰雅之命题设计，不惟使在朝在野人士思虑有所沟通，而且对于后辈学者确实发生广泛多面问题之启发。”

下面略举数道命题，以窥王韬创立考课用意之一斑：

问“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即亚力斯多德），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即达尔文）、施本思（即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

考泰西于近百年间，各国皆设立上下议院，藉以通君民之情，其风气几同于皇古，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曰：众志成城。设使堂帘高远，则下情或不能上达，故说者谓中国亦宜设议院以达舆情采清议……其果有利益欤？或有谓行之既久，不无流弊，究未悉其间利害若何，能一一敷陈之欤？

外国之富，在讲求技艺，日新月异。所以制造多，商务盛，藉养穷民无算。未悉泰西技艺书院分几门，学几年，艺乃可成？我中土何以尚未设技艺书院？各省所设西学馆、制造局多且久矣，未识有精通技艺机器之华人能独出心裁造一新奇之物否？必如何振兴其事，斯不借异村异域？请剖析论之。

问中国近年丝、茶出口之货，核通商总册，较光绪初年有增无减，而丝、茶各商，日见耗折，其故何软？今议整顿之法，其策安在？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54—55页。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年春课王韬眉批”。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56—69页。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69页。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李鸿章己丑年北洋特课题”。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郑观应癸巳年冬季课题一”。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郑观应癸巳年冬季课题二”。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薛福成丁亥年秋季题”。

可以看出，这些题目都是围绕着实学和时务展开的，都是时代思考的焦点所在，与王韬重视实用功利的教育改革思想也若合符节。而考生在题目的引导下所作的回答也顺着王韬设计的思考方向，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和现实问题的要害。他们以西学，包括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工艺甚至西方哲学和政治学说为利器，大胆剖析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阐述改革旧经济、旧教育、以至旧典章制度的必要性，为中国走向富强寻找有效之方。王韬不无欢欣地写道：“有言天算者，有谈经济者，有论时事者，有辨教术者，有备详舆图者，有精求农事者，有维持商务者，至于开矿、冶铁、织纺、制造、屯田备边、裕利源、去积弊、述枪炮施放之巧妙、考中西医学之源流，巨细精粗，无乎不贯。诸生所对，皆能举其大端，集思广益，萃众长而备一得，咸有裨于国家大计。”

王韬创立考课制度得到学界的热切响应，“远近名流硕彦，闻风兴起，彬彬称盛”。“院中肄业士子，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无不争自濯磨，共相奋勉”。在考课带动下，格致书院名满东南，院务大进，“科学班的听众有明显的增多”。

王韬创立考课制度的深刻用意在于，他不仅仅局限于引导参加者研究西学、探讨时事，他有更宏远的目标，即推进中国现实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实践。他试图借助于应试学生自由发表见解与方面大员评阅考卷所造成的上下沟通机会，实现上策当道、加快改革的初衷。从现存的学生论文和洋务大员的批阅材料来看，王韬的愿望至少有一半得到实现。许多学生在回答问题过程中提出了极有价值的真知的见，而批阅官员的确也有不少表示愿意采纳实行的。如常熟县学生商霖在回答“中国近年丝茶出口有增无减而丝茶各商日见耗折其故何欤今议整顿之法其要安在”题目时指出，中国丝茶业日趋衰敝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中国丝茶业缺少机器和丝茶质量低下，而与一般俗论所认为的“关税厘金之重、外洋出产之饶”关系不大。他这样论述说：

关税厘金之重，诚为病商之一大端，然我谓与外人争丝茶之利不在乎减厘金，而在乎精物产；不在乎减中国之厘，而在乎轻外国之税。盖外洋于人口货之有益者，必减税以招待。其无益者，必重税以相拒。今洋人于中国丝茶入口，有较成本加至一半者，若不能请外国之轻税，纵尽弛中国关市之征，亦属无益。且洋人征税甚苛，亦因中国税重，无可再加耳。若我减税一分，彼反增税一分，亦无如彼何，是徒为他人藉手而已。今洋人于中国情形无不了如指掌，亦知丝茶完纳中国税厘，成本甚重，始肯出如许之价。如向值百金之货，洋商知中国免税一成，则彼必以九十两相奸……仍为洋商之利而已。若夫印度、锡兰、日本所产之丝茶日旺能夺我贸易者，正坐中国之丝茶未尽讲求耳……诚能将所出丝茶精益求精，驾乎日本、锡兰、意大利之上，则洋人喜用上品，不贪贱值，势必商贩争来，推之不去矣。因此，这位学生认为振兴中国丝茶业的根本出路是在增加投资，引入机器生产以提高质量。他进而提出了具体的整顿之法。他说：“整顿之法，其道约有数端。第一在讲制作。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王韬壬辰年序”。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王韬己丑年序”。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王韬辛卯年序”。

KnighBiggerstaff, "ShanghaiPolytechnicInstituteandReadingRoom :

AnAttemptOIntroduceWesternScienceandTchologytotheChinesePacificHistoricalReview (May1956) P.143.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年秋季超等第二名论文”。

如丝之饲桑剥蚕，虽必出于人工，而缫丝烘蚕，不妨仿照西法也。如用汽水薰泡，则色白而软，质尤光亮；用机器纺制，则丝细而匀。尤能受染，价值略增十之三四；如用烘房烘死蚕内之蛹，则不致齿破蚕头……价值倍增。至于茶，则种植采摘虽不废人工，而焙炒制作不妨添用机器，则火候足而颜色匀，不至因茶师少而制茶不多矣。其次在乎充商本。中国商务之衰，半由私利太重之故。同一公司、同一矿产，在洋人则欣为有利，在华人则哗为大亏，正坐中西利息悬殊耳。如国家开设银行，颁发钞票，鼓铸银币，则天下藏银尽出，官市流通，官利仅取数厘，私利亦不准一分以外，则丝茶之商虽借客本，亦不致受重利盘剥而倒矣……第三在化学……”从生产领域中的机器手段、自然科学运用、工艺流程到流通领域里的利率影响、资金走向、银行贷款对工商业的作用，分析得入木三分，切中肯綮。参加评卷的洋务派大员看后受到极大启发，宁绍台道薛福成于文末评点说：“洞见症结。论中国轻减税厘仍为洋人之利，议论透辟，足以破当世妄疑税厘太重之惑，前后各条，多切实可行”。“议论警辟，痛快之至，精当之至”。可以预料，薛福成在办理地方事务之时一定会参考这位考生的意见。

王韬在格致书院的十多年，正是中国社会新旧势力相持不下的年代。新思想、新观念的幼芽在旧思想、旧观念的汪洋大海之中大有遭到封杀的危险。王韬不愿看到中国思想界再次退入昔日萧条局面，期望以弟子们的改革议论扩大新思想、新观念声势，促进思想界的彻底觉醒。所以，他每年都将考课中的优秀论文，以及他和其他考官的评语、眉批一起编为《格致书院课艺》刻印发表。此举的意义已经超出教育的范围，而具有社会启蒙的深远意图。当时的上海外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正是用“中国启蒙的最有力的杠杆”(A most powerful lever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a)一语来赞颂王韬此举的。

从印行的《格致书院课艺》内容分析，王韬借课艺文字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开启风气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格致书院课艺》所收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针对现实，主张变法改革的议论，其思想之激烈、用词之尖锐在当时的中国堪称独步一时。如江苏长洲县考生许象枢在对比中西政治制度时写道：

(泰西)上议院下议院无国蔑有，诚以议院之有益治理，非浅少也……君主者，权操于上，议院不得擅施行，弊在独断。英国为君民共主之国，君可民否，君不得擅行，民可君否，民不得擅作……上情可以下逮，下情可以上达；我中国幅员之广，物产之饶，人民之众，甲于五大洲。然而地利不能尽，国用不能充，弊政不能革，刑罚不能简，民困不能苏，国威不能振，下有贤才不能这用，上有庸妄不能遽退，非中国之君不若泰西各国之君也，上下之情隔焉故也。

是故中国……设议院其有利于国家有不可俛指计者。又如江苏丹徒县学生吴佐清在揭露官督商办企业弊端时写道：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年秋季超等第二名论文”。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年秋季超等第二名批语”。

NorthChinaHeral, May27, 1892seealsoPauIA.COhen,

BetweenTraditionandModerity:WangTaoandreforminLateChingChina.P.183.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年冬季超等第一名论文”。

泰西虽官商一体，然商务则官第保护之、维持之，不侵其权也。中国之纺纱织布局，若云官办，则实招商集股；若云商办，则有总办、帮办、提调名目……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股商与总办分隔云泥，亦第君所日可据亦日可，君所日否据亦日否耳。自官为督责，则所用司事皆官场荐举之人，情面太多，必有屡满之患。商人沾染官气，则凡达官过境，下临布局，亦必多方酬应，献媚取怜，而局用浩繁矣。此官督商办之万万不可也。

王韬把大批类似上面这样激昂慷慨、横议时政的文章加上褒奖、推崇、赞许的评语、眉批抛向社会，这在严复、梁启超登台之前的中国无疑等于抛出一连串令人警醒的重磅炸弹，其震聋发聩摧人振奋的作用无法估价。在《格致书院课艺》被众多出版者争相转刻印行之中，王韬及其弟子们的改革变法思想激荡遐迩，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在主持格致书院期间，王韬除了于上述三个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之外，还与傅兰雅配合，邀请中外专家举办临时性的讲演。1895年以后又开办函授性质的成人夜校班，该班每星期六晚上上课，每期至少有三四十人参加。由傅兰雅所设计的课程看，它是一个应用型自然科学班，所学内容有数学、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王韬身为山长，对夜校的办学方针和具体管理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

总而言之，王韬所主持的格致书院既是“中国近代新制教育的滥觞”，又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更是近代新思潮的温床，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就教育而言，在格致书院引带下，宁波在薛福成任宁绍台道期间仿办了一所类似的书院。四川川东道在黎药斋主持期间亦兴办了一所外语兼科学学堂。1895年，康有为到上海开办强学会，还特意托人介绍，拜访王韬，参观格致书院，吸取其办学经验。就思想而言，在王韬独具苦心的“诱掖奖劝”和“针刺棒喝”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科学精神审视传统和现实，从而产生了对旧制度、旧传统、旧习惯的怀疑。这种怀疑是改变旧世界的动力。戊戌变法时期，许多出自格致书院的青年知识分子，如叶瀚、瞿昂来、钟天伟等都是冲杀在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第一线的骁将。他们为中国历史的向前跃进贡献了巨大的热力。

王韬晚年在格致书院的工作是他一生所从事的时间最长、用力最多的“实业”，凝聚着他教育改革思想的精义，载荷着他富国强兵的希望。他用实实在在的教育实践，为他的人才观和教育思想写下了最好最恰当的注脚。台湾史家姚海奇先生为此十分崇敬地赞道：“王韬在遽归道山之前夕，仍以其余生，投注于教育事业，提携后进，鼓舞士子，以富强思想，广播于士子心田，以时局时弊，求方于朝野仕绅。其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实令人感佩。其精神值得后辈士子，仰之再三。”验之于王韬的教育实践，此一评价毫无过誉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年秋季超等第二名论文”。

王尔敏：《格致书院志略》，第41页。

王尔敏：《格致书院志略》，第90页。

王尔敏：《格致书院志略》，第91页。

王韬：《论川东设立洋务学塾》，见《万国公报》，第47期，1892年10月。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722页（1982年，中华书局）。

姚海奇：《王韬的政治思想》，第26页。

之处。王韬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史上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先行者。

三、最后的呼唤

王韬第二次居沪时期正当列强蚕食鲸吞胃口增大、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危亡年代。中法战争炮火掀起的尘埃还未落定，英国便在1885年发动了侵略缅甸的战争，清朝在缅甸的宗主权被剥夺。1888年又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夺取了在西藏自由旅行和免税通商的特权。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作为新兴的亚洲资本主义强国开始染指朝鲜，1894年终于爆发了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丢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和边疆的大片土地。此后，俄、法、德在日本侵略行为的刺激下也伺机待发，蠢蠢欲动。中华民族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面。

但是，面对着亡国灭种命运的清王朝却依然缺乏变革的勇气，它期望以不痛不痒的“皮毛之变”求得暂时的安宁。王韬不能忍受这样的现实，他不顾年老多病，毅然再次拿起他的如椽之笔，写下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对富国强兵理想的最后呼唤，饱蘸着他对中华民族深厚的苦忠血诚。

王韬晚年的政论文章主要发表于《申报》和《万国公报》。《申报》是王韬的女婿钱征主持的报馆，王韬自己也一度担任过它的“编纂部主任”。《万国公报》为西方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其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林乐知、慕维廉、韦廉臣、艾约瑟等都是王韬比较熟悉的传教士朋友。因此，从人事讲，王韬与这两家报刊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再者，《申报》和《万国公报》在当时都是提倡变法改革的中文报纸，思想倾向与王韬的改革主张若合符节。所以王韬选择这两家报刊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均在情理之中。

王韬这一时期在《申报》与《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极多，仅据1892年至1893年的《万国公报》统计，就有《哥伦布赞》、《救时刍议上》、《救时刍议下》、《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论宜得人以理财》、《论川东设立洋务学塾》、《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阅德国什好船厂章程书后》、《论巡阅炮台》、《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论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欧亚金银宜各自为价论》、《论出使须求真才》、《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等十多篇。王韬是在与他自己的生命衰老周期比赛速度，他要把更多的声音、更多的光与热留在人间，传给后世。

在这些文章里，王韬除了继续鼓吹他早年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主张以外，还发展了或修正了某些早年不成熟的观点。其发展或修正之处略有下述几方面：

（一）考虑工商问题更深更细。

王韬在主办《循环日报》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大多具有“大而化之”的特点。其时，中国社会风气未开，不但王韬本人专门知识有限、对工商问题看得不够清晰透彻，而且广大读者也不可能理解过细过专的理论文章。中国此时最需要的是打破保守而又沉闷状态的呐喊，是冲击旧传统、旧观念的勇气，是粗犷雄劲的扫荡封建马厩的狂飚。所以，王韬泛而不专的文章刚好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

经过近二十年的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国的社会风气已逐渐开通，国人的认识水平得到提高；同时，洋务运动中所暴露的具体问题又亟待理论的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那种狂飚式、粗放式的议论已不能适应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也不可能再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因此，王韬把他的笔触沉得更深，

对工商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更加具体细致。与《循环日报》时期的文章喜谈兴办工商的意义或益处不同，此时的文章却大多涉及工商活动中的具体细节。下面略举两例，以窥一斑：

丝茶为出口大宗，磁器为著名要物。西人至名之为华器，以其得自中华也。然则贵重可知矣。今可揣西人之所尚，将丝织成文绮美绸，色式同于外洋所制而又胜之，以投其所好，不必由华商运往外洋，自有西商贩运，而外洋之绸匹不来矣。夫西商以华丝运出华口，入其本国，织成绸匹，又出其本口，入我华口，关税重叠，工价又重，尚能贸利，则华工以自有之丝，织绸匹，关税既少，工价又廉，货值必较贱。西人在中国者固乐就近取用，即运往外洋，较之洋绸工价较贱，且更坚致，西人在本国者无不乐用……磁器由日本来者不少，华人反有用日磁者，见异思迁，人情不免。日磁之料，虽逊于我，而外观之美，几能胜我。是当描画精细，工料坚实，使日本不能夺我自有之利，并夺我应得于西人之利。推之各色纸料、图绘、仪器、灯盏、各铁器等，一名一物，凡有益于日用者，无不绳度曲中，动合自然。

今国家兴大摇投，欲与民间贷债一千万，准以十年尝还，尔民其输将勿缓，民间果有应之者乎？乃外国银肆发出股票，民之趋者如鹜，名为贷债于外洋，其实取货于华民，华民之预股者多，而洋人反得以坐扣其息，呜呼，民至不信上官而信外洋，此真可为叹息痛哭流涕者也。

从上述文字可见，经过二十年的人生磨炼，王韬看问题变得更深入、更冷静、更细致了。“言之有物”、“论必征实”、“辨析必细”成为他这一时期有关工商文章的风格。（二）强调“推洋出新”。王韬对洋务活动中只知“引进西器，不知探求西法”推而出新的消极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最愚笨、最原始的学习西方的模式。中国在学习西方活动进行了二十年之后，应该把重心放在“自造”上面。这是中国能够臻于象日本那样的真正的富强之境的唯一有效途径。他写道：

铁甲兵轮水雷渔艇联珠枪炮棉花火药铅弹等有益于军需者，皆能自造，较之岁以数百万银钱托外洋定造者其得失损益为何如。且一旦与某国失和，他国即守局外之利，所购船舰概不得驾运而来。法之事其明征也。如能自造，然后百工有业者多，生之者众，利权可以节节收回，而富强可望……我国虽已设船政局、机器局、军火局，船舰枪炮可自制造，而凡其中所需精微细致各物无不取之外洋。他如惜舵帆缆、锅炉汽机、轮叶船皮年中时须修理者亦无不外洋购至。有自制之名而无自制之实，其利仍流于外耳，可为叹矣。尝按美国出产多于英国，而英国制造易于美国。英以美产，加以运费，制成物件，价反贱于美之所自造。同一物，同一价，英可获利而美则失利，未尝不叹英之工价廉而机器多也。中国工价更廉于英，倘能皆用机器，安见所制之物不足与英竞胜哉。而且，“自造”也非简单地依样画葫芦，而是在进口之器物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反驾乎原器物之上。王韬由此提出了“得其器”与“法其法”两组概念，指出“徒知购器于西人”只能称之为“得其器”，而引进方法，吸收消化，推洋出新才是正确地学习西方的态度，才能被称为“法其法”，“得其器”者制于人；“法其法”者制人。（三）力主严禁鸦片。60到70年代，王韬曾提议清王朝自种鸦片并开征重税来抵

王韬：《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见《万国公报》，第45期，1892年10月。

王韬：《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见《万国公报》，第59期，1893年10月。

王韬：《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见《万国公报》，第45期，1892年10月。

王韬：《救时刍议下》，见《万国公报》，第44期，1892年8月。

制洋鸦片的进口。80年代以后，他发现这种方法不仅不能禁住鸦片，反而诱使鸦片之灾难扩散开来。因此他修改了早年的观点，提倡绝对地严禁鸦片。他在《救时刍议上》一文中这样写道：

自道光以来，鸦片日盛。由外洋人口易白银出口者，岁不下四千万两。而各省不种嘉谷而种鸦片者，岁亦值银数千万两。国家收鸦片税银亦近千万两。呜呼！奇矣！海禁大开，辟埠通商，以洋货易华货，除鸦片，值相当。自道光至今五十年，鸦片银之流出外洋而不返者，截长补短，可十五万万两，此十五万万两者，皆十八省人民之脂血。而中国种鸦片者，以华病华，虽获利数倍。而食者病，种者亦病。前晋豫奇荒，赤地千里，人相食，其明证也。国家增其税银，使天下知鸦片能病人能贫人而不可食，所谓不禁之禁也。然天下食者如故。夫富强者，天下之急务，而禁鸦片者，富强之要著也。禁鸦片，禁食禁种禁洋运。食鸦片者有疲，有瘾者食则生，不食或死，禁之者，不问其生死，不问其贵贱，逾限而仍食者杀无赦。种鸦片者……洋运鸦片者……杀无赦。或曰鸦片洋药也，能治病。当禁有瘾，不当禁治病。或曰鸦片烟类也，各省颇种烟，何独禁鸦片。且我种者多，则彼来寡，是塞漏卮也……此数说皆非也。鸦片之为药，能治小病，不能治大病，其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则必禁。烟无瘾，鸦片有瘤，自种自瘾是自病也……若复耗银数十年，天下尚可问乎？

王韬早年不仅是一个鸦片“弛禁论”者，而且他本人对鸦片还时有所染。晚年的他能提出如此绝决的严禁主张，表明他不是谬执己见的固执老人。为了民族的长久利益，他既可改变自己的观点，也可将自己的行为宣判为“罪恶”。

王韬曾在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满怀期望地写道：“富国强兵，全在乎人之自为。以有用之心思，施之于有用之地，日事讲求富强之效，可操券而得之矣。我不禁日夕拭目以俟之”。然而，他所期望的清朝大吏终于没能将中国导入富强之境。甲午一役，中国跌进了更加耻辱的灾难之渊。此后，已经发落齿稀的王韬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维新主义知识分子身上。1894年，他在上海与当时仍属改良主义者的孙中山见了面，对孙中山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大加赞赏，并为其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时在李鸿章幕中供事的罗辛禄，请他介绍孙中山与李鸿章见面。1895年，王韬又在上海接见“公车上书”后名声正响的康有为，声援康有为组织上海“强学会”的努力，鼓励他把改革的主张变为改革的政治活动。与孙、康二人的见面，使王韬预感到中国改革运动的高潮即将全面铺开。在严寒萧条的冬天里生活了数十年的王韬终于嗅到了一丝春天的气息。

甲午战争之后，是中国政治领域风雷激荡的年代。王韬满心欢喜地注视着新一代改革者的政治实践，自己却再也没有精力直接投身其中了。他象一只用尽了气力和心血啼春的杜鹃鸟，当满山花红叶绿的时候，他只能带着临终前的喘息默默无声地凝视着自己的呼唤成果。风烛残年的王韬，身体急剧地衰老，一年之中几有大半年为“药罐在怀”。心力亦告衰竭，稍一动脑，

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

《万国公报》，第43期，1892年8月。

王韬：《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见《万国公报》，第57期，1893年10月。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3页（1981年，中华书局版）。

《郑观应致玉韬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常州博物馆藏未刊稿。

便觉头昏目眩，困顿不支。1897年，他终于怀着烈士暮年力不从心的遗憾在上海寓所里撒手尘寰，溘然逝去。时年70岁。一代思想伟人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后来者在他停止的足迹之后走出了一片更加灿烂辉煌的新天地。

附：容闳评传

第一章 学生时代

容闳（1828—1912年），这位与本书第一位传主王韬同年出身的中国人几乎比前者具有更丰富的历史意味。他的生命跨度复盖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个过程。他亲眼目睹或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革命、同光洋务、戊戌变法、义和团、清末宪政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等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或运动。他先后所接触的历史人物，从传教士到农民起义领袖，从清朝洋务大员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领袖，应有尽有，象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布朗（Rev. Samuel Robins Brown）、理雅各、罗孝全（I. J. Roberts）、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大（Timothy Richard）、洪仁汗、王韬、李善兰、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谢缙泰、孙中山等历史风云人物皆与容闳有过从关系。可以说，容闳就是一部活的中国近代史。

但是，由于容闳自幼就学习英文，汉语写作不甚娴熟，他所留下的文字材料只有一部英文写成的自传和一些请人代劳的条陈，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逊于王韬。他是实干家、活动家，“做的”要比“想的”和“提倡的”多得多。正因为此，我们把他归入这本思想家丛书的“附传”。

一、马礼逊学校的寄宿生

马礼逊学校是来华西人在中国所办学校中较早较完善的一所小学。校名中的“马礼逊”指的是英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on)。罗伯特·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中国传教，传教期间曾将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成中文发表，又编纂中西交流的必备工具书《华英字典》和创办英华书院。1834年，马氏卒于中国。次年，在华传教士为纪念马礼逊在传教事业上的革路蓝缕之功，便在澳门酝酿创立一所以马礼逊命名的小学。在校址和教师未确定之前，先设预备学堂，附于另一传教士郭实腊夫人所办的教会女校之内。

容闳生于1828年11月17日。他的家乡广东香山县南屏村离澳门仅半英里。当1835年预备学堂成立之际，容闳正值七岁上学年龄，他的父亲容丙炎从村邻那里获知洋学堂开办的消息，立即通过熟人将容闳送到澳门郭实腊夫人处。于是，未受过一天中文正规教育的容闳首先接受了西学的启蒙。

容闳的父亲是一个已经受到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商业贸易大潮冲击影响的农民。他把容闳送进“洋学堂”的目的是想将来容家能产生一个带来财富的“通事”、“买办”或“洋务委员”。容闳回忆他父亲当时的心态说：“是时中国为纯粹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容丙炎再也没有想到他这一送，竟然为中国产生一位不可多得的西学长才埋下了种子。

郭实腊夫人是一位“和霭仁厚，视之如母”而又“果毅明决”的基督徒教育家，对学童管束极严。她不让男女学童在一块玩耍。男生中年龄最小的容闳更被她“特别优待，命居女院中，不与男童杂处”。规定的教学量也很大，每日上午授课，下午集会，晚饭后还有晚课，至九点钟才休息。每周又有中英文考试若干次。一直自由自在的容闳一时不能适应此种禁闭式的繁重的学堂生活，在入学不久就策划了一次七人集体逃学事件。当七名男女学童划船接近香山南屏所在的彼德罗岛时，郭实腊夫人所派的小艇追上了他们。七人全被捉回学校接受惩罚。郭实腊夫人命容闳等七人“排列成行，巡行全校，且于晚课后，课堂中设一长桌，命七人立其上一小时”。容闳是策划者，立在中间，两旁各立三人，“头戴尖顶纸帽，胸前悬一方牌大书逃徒，不啻越狱之罪囚也”。郭实腊夫人意犹未尽，又有意“将果饼橙子等分给他生剥食”，使容闳等“馋涎欲流”，“难堪滋甚”。

郭实腊夫人所办的女学及所附属的马礼逊预备学校于1839年因经费困难和鸦片战争爆发在即被迫停办。容闳因而辍学归家。第二年，即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的1840年，他的父亲不幸逝世，家庭经济栋梁顿告断折。12岁的容闳和他的年岁稍长的哥哥、姐姐不得不谋求家庭生计。容闳回忆说：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一章，《幼稚时代》，第2页（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一般而言，徐、恽所译《西学东渐记》尚能准确简洁地反映容闳原作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的内容，故本书在多数情形下采用之，以方便中国读者查阅。但遇徐、恽所译不确或不通之处，则由著者从英文原本重新译出。

参见《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卷七，第307页。

方鸦片战争剧烈时，适予父逝世，身后萧条，家无担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齿稍长，能博微资。予兄业渔，予姊躬操井臼，予亦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每日清晨三时即起，至晚上六时始归，日获银币二角五分，悉以奉母。所得无多，仅仅小补……予母得予等臂助，尚能勉强度日。如是者五阅月，而严冬忽至，店铺咸停制糖果。予乃不得已而改业，与获者之后拾其落穗。

容闳在乡做小买卖和捡稻穗的时间不到一年。由于他会讲几句英语，被一位在澳门做事的邻居推荐到澳门一个传教士印刷厂当“折叠书页”的童工。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四个多月，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张，容闳在传教士医生、郭实腊夫妇的好友合信博士(Dr. Benjamin Hobson)的帮助下再次前往注册上学。

正式开办以后的马礼逊学校处于美国传教士布朗的主持之下。布朗是美国那鲁大学 1832 年的毕业生，得过神学博士学位。1839 年，他和夫人一同到澳门，接办马礼逊学校。就布朗的经历与学识而言，他无疑是当时开办英文学校的最恰当的人选。至 1841 年容闳入校，他已经招收到六名中国学童。

马礼逊学校的教学课程有初等数学、地理、英文、中文等。由于容闳先前曾在郭实腊夫人那里学过几年，有一定英文基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布朗先生因此非常喜欢他。一位与布朗先生有过接触的英国人曾这样写道：

有一位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带到学校来，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着上山打柴过日子。他的意思是让这孩子在学校里多呆些时候，学点儿英文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家庭里当仆人。未后，这位贫穷的妇人，因生计完全不能维持，所以要把小孩领回……一人听到这事，保证维持她的生活，以便小孩留在学校。他继续维持她的生活至 17 年之久。布朗先生在领导这个学校七个年头之后，回到美国去，把班中最好的三个学生带走，其中一人就是那聪慧矮小的学生容闳。

布朗回国在 1846 年。其时马礼逊学校已迁往香港。学校的规模已经由一个班变成了三个班，人数增加到 40 多人。当布朗宣布准备带几个学生赴美国继续读书时，只有容闳、黄胜、黄宽三人表示愿意随同前往。容闳记载当时的情形说：“1846 年冬，布朗先生回国。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略谓已与家属均身体羸弱，拟暂时离华，庶几迁地为良。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其后破日间，课余之暇，聚谈及此，每为之揪然不乐。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愿与赴美之数人耳，即黄胜、黄宽与于是也。当布朗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第予等虽有此意，然年幼无能自主。归白诸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悄译：《西学东渐记》，第一章，《幼稚时代》，第 4 页。

合信为马礼逊之婿，1839 年由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先后在澳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传教行医。与本书传主王韬亦时相过从。

H.N.Shore, The Flight of Lapwing (1881, London). 译文转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第 419 页。

母，母意颇不乐。予再四请行，乃勉强曰：“诺”。然已凄然泪下矣。”

与戊戌维新以后人们视出国留学为“时髦”之事不同，在国门刚刚打开的 19 世纪 40 年代，人们把出国留学当作万不得已的冒险之举。所以，容闳母亲为此伤心落泪是毫不奇怪的。值得后代中国人庆幸的是，年方十八岁的容闳没有因社会习惯的影响和母亲的劝阻而放弃自己的选择。他克服了偏见与感情的包围，勇敢地走向了世界。中国近代留学西方的历史在他的脚下掀开了第一页。

二、负笈他邦

1847年1月4日,容闳、黄宽、黄胜随布朗夫妇搭乘美国奥利芬洋行(The Olyphant Brothers Co.)的“亨特利思”号(Huntress)商船启程赴美。船由黄埔港出发,经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绕道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在途经大西洋上的圣赫勒那岛时,他们一行上岸走访拿破仑陵墓。容闳“抚今吊古,怅触于怀”,特地摘取坟前柳条一枝带回船中,准备赴美登岸时栽植留念。1847年4月12日,船抵美国纽约港。旅途共花去98天之久。

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纽约远不象后来那样繁华喧闹,没有“危楼摩天”和“华屋林立”。人口也只有25万至30万。所以容闳在纽约稍作停留便赴纽黑文(New Haven),然后到达布朗夫人的家乡东温若(East Windsor)。布朗夫人的父母巴脱拉脱(Rev. Shubael Bartlett)老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三位远道而来的中国青年。整个东温若也为小镇里来了扎着长辫的中国人而且喜且惊。当巴脱拉脱先生领着三位中国青年参加教堂祈祷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们。容闳回忆说:

巴脱拉脱为东温若教堂之牧师。予等入教堂瞻仰,即随众祈祷,人皆怪之。予座次牧师之左,门侧面可周瞩全堂,几无一人不注目予等者。盖此有中国童子,事属创见,宜其然也。予知当日众人神志既专注予等,于牧师之宣讲,必听而不闻矣。

容闳在东温若大约住了一星期,此后,赴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读书。孟松学校是美国当时最好的预备学校。因为,这时美国还没有正规的高级中学,整个新英格兰区的优秀学生都集中在这里为考入大学预备功课。孟松学校的校长自开创以来也一直由“名誉特著”的“品学兼优者”担任。容闳入学时孟松学校的校长为海门德(Rev. Charles Hammond)。海氏毕业于耶鲁大学,“夙好古典文学,尤嗜英国文学。他思想豁达,富有同情心,是新英格兰地区著名教育家和戒酒与新英格兰精神运动的倡议者,由于他的威望,孟松学校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兴盛空前。”

三位中国学生受到美国人士的礼遇。海门德对中国“素抱好感”,希望三位中国学生学成之后能回国有所作为。他把三位中国学生都安排在态度温和的瑞白克·勃朗小姐(Miss Rebekah Brown)的英文班里。勃朗小姐对容闳关怀备至,假期里时常请容闳住在她们家里,帮助他学习功课。以后,容闳就读耶鲁大学,她和她的丈夫麦克林博士(A. S. McClean)也多方为其张罗奔走。容闳回国后,一直与麦克林夫妇维持着通讯关系。

三位中国学生的监护人是布朗先生的母亲菲伯·布朗夫人(Poebe H. Brown)。这是一位和蔼可亲心地善良的基督徒,对中国学生照顾极其周到。每天都为中国学生烧饭做菜,而且“每餐必同食”。容闳曾以饱蘸情感的笔调写道:

于今回忆布朗母夫人之为人,实觉其可敬可爱。得未曾有。其道德品行,都不可及。凡知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三章,《初游时代》,第12页。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三章,《初游时代》,第13页。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27. (1909, New York).

姐之历史者，当能证予此言之不谬。计其一生艰苦备尝，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然卒能自拔于颠沛之中。尝自著一诗自况，立言幽闲沉静，怡然自足，如其为人。

三位中国学生也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顽强生命力。除了每天在居处和学校之间徒步往返三次刻苦读书外，他们还时常外出打工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居室里面的“洒扫拂拭及冬令炽炭于炉，劈柴生火诸琐事”亦一概自己动手。容闳尤其喜欢做这些家务活，认为可“藉以运动筋脉，流通血液，实健身之良法也”。容闳后来身体健壮，一直活到80岁，与此不能不说大有关系。

容闳在孟松学校学习了算术、文学、生理、心理和哲学等课程。成绩最好的课程是英国文学。这主要是受了校长海门德的影响。海门德对英国文学造诣很深，善于演说，上课时感染性极强。经他指点，容闳阅读了爱迪逊、戈德斯密士、狄更斯、史考特、麦考莱、和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作品。

在校第一年，容闳还没想到进入大学求学一事。这是由于香港教会人士给他们的经济资助只到1849年为止。到1848年秋天，三位中国学生中的黄胜因健康不佳退学回国，留下的容闳和黄宽才开始考虑下一步去留问题。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谈到学年结束后的计划撮后决定留在美国继续求学。可是学费和生活费问题随之而来。1849年以后的经济资助由谁承担呢？两人都找不到答案。他们去找海门德和布朗商量。后者答应将此一问题函报香港教会考虑。得到的香港方面的答复是：如果希望1849年以后继续深造并得到资助，只能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专科。黄宽接受了这一条件，于1849年底起程赴苏格兰学医科。容闳却愿意留在美国读书，没有听从香港方面的安排。

海门德和布朗又劝容闳申请孟松学校为资助贫困但成绩优秀的学生而设立的奖学金。但是，由于这项奖学金必须书写毕业后愿当传教士的誓约，容闳婉言谢绝了。他在校董约见他时慷慨陈词说：

根据如下理由，我决不能签此誓约：首先，签约将限制我全面发挥作用。我需要行动上的绝对自由以保证能够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取最大之福利。如果必要，当旧环境不利于我的造福中国的计划时，我一定会去创造一个新环境，其次，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布道未必为造福国家的唯一事业。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中国，一个人如果有基督精神的话，他为国效力的雄心壮志是不会受到束缚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精神，世界上没有一种誓约能够影响他的灵魂。第三，这种誓约会阻止我利用中国这样的国家所提供的条件和机会去为其效力。

布朗和海门德认为容闳是一个历史责任感极强的人，不会因贫困和眼前的利益而改变初衷，也没有劝说容闳接受孟松学校的条件。从人格角度量发，他们对容闳的做法还带有几分佩服。

1850年夏天，布朗到南方去看望他的姐姐，顺便在那里拜访了几位乔治亚州萨伐那城（Savannah）妇女协会的会员，对她们谈及容闳申请求学的情况。会员们同情容闳的境遇，答应资助学费。容闳接获消息后，立即前往纽黑文报考耶鲁大学。虽然容闳在美国一共只读过15个月的拉丁文，12个月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四章，《中学时代》第17页。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35—36 (1909. NewYbrk)。

的希腊文和 10 个月的数学，但由于他学习刻苦用功，考试一举中的。耶鲁大学从此有了第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籍学生。

容闳的大学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充满艰辛。他描述他在一年级时的情况说：

余之入耶鲁大学，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然在教室受课，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以故备形困难。盖一方面须筹画经费，使无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以冀不落人后也。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暑为游戏运动。坐是体魄日就羸弱，曾因精力不支，请假赴东温若休息一星期，乃能继续求学焉。

沉重的经济和学习负担使容闳的学习成绩不尽理想，数学差到几乎不及格的程度。一年级时他时常担心因数学成绩差而被留级。但由于他的英语作文经常在全校比赛中得一等奖，他的平均分数仍在中上水平。

从三年级开始，他的状况略有好转。经济上除了得到一些来自萨伐那妇女协会和纽约奥利芬公司的资助外，他在校内又谋得几个工作机会。高年级学生的一个俱乐部聘请他去做办事员，负责一切采买和伙食供应工作。用这种方式容闳获得了今后两年的食宿费用。又于学校内的“兄弟会图书馆”得到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可得薪金三十元。学习上也追赶上来，各门成绩都有提高。所有这些加上他的中国国籍，使容闳在四年级时已经变成全校人人皆知的人物了。容闳后来再赴美国时与学界中人物交游广泛与他此一时期人缘众多有直接关系。

1854 年夏天，容闳在学完了所有必修课程之后，获得了耶鲁大学学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西方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

三、引西学灌溉中国之志

在容闳的人生之旅中，八年的留美学习正值他的 18 岁至 26 岁。这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蒙胧走向清晰的塑造定型时代。在此期间，他不仅直接学习到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而且确立了对世界、对未来的基本看法。

当容闳头戴瓜皮小帽、拖着一根饱蘸着民族辛酸和血泪的长辫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海洋里徜徉之际，他不能不产生一种对自己民族命运的感叹。新英格兰工业区的雄壮、美国议会制度的完善与中国乡间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农民形象、阴森恐怖草菅人命的官府衙门在他的意识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他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他但承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迫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快快不乐。”他甚至为此反而埋怨自己受到西方高等教育，因为“既受教育，则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

然而他知道这只是自己的气话。所以，他又谴责自己“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不仅促使他痛恨中国的腐败落后，而且引发了他改造中国、启蒙国人的愿望。他立志要把既穷且弱的祖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富强之邦。

正是抱着这一愿望，1850 年容闳拒绝了孟松学校以立誓当一名传教士为条件的优厚奖学金，而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工作精神修完了所有大学课程；1854 年拒绝了香港教会赞助人要其以传教为职业的劝告，而坚持以自由之身归国服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消、阻止他的改造中国的愿望和努力。

容闳毕业之际，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后起直追、人才和劳动力普遍缺乏之时。以容闳的英语才能、广泛的社交圈子和耶鲁大学的金字招牌，是不难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的。可他没有这样做。他此时心里所想的就是如何挽救他的苦难的祖国。与他有过多年过从关系的吐依曲尔牧师 (Rev, Joseph H. Twichell) 披露到：

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以改变他的终生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了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一个美国公民。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道义上说，他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觉得在美国如在故乡。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象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而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以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考虑到他曾经所呆之地、他的变化和他将来的打算，他在他的人民中不可能不遇到歧视、怀疑和敌意。他的前景是恐怖暗淡的。回去的想法就是去异乡流浪的想法。他非常想留在美国。但是他说，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象上帝的声音一样在他的耳边萦绕回响。经文上说：“不论是淮，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定了教义，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得胜了。他象是从整个民族中被挑选出来去接受恩典似的，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自私自利。所以；虽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第 22 页。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第 22 页。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第 23 页。

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这段话虽然夸大了《圣经》的作用，但所反映的容闳一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不图个人安乐利益毅然归回祖国的情怀却是千真万确的。他的自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中国思想家中，能够提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主张且指明以出洋留学为主要途径，容闳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人。此时，虽然有一些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位差，接触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课题，但那大多都是在西洋坚船利炮威胁下产生的蒙陇而又急促的呐喊，其情形就如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突遇破门而入的外来强盗，呼救之外来不及冷静仔细地思考。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本书第一位传主王韬，此时无不如此。他们站在儒家文化的圈子之内，根据从外面吹进来的一点点皮毛的西学知识，高呼“礼失而求诸野”。但所谓的“在野之礼”是什么，他们准也说不清楚。所以，空有学习西方的热情却找不到一条有效的学习西方的途径是他们的群体特征。容闳的主张则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它有丰富的明确而具体的西学内容和学习西学的途径，而且，表现在它是一种在和平条件下，经过对西方社会的全面了解、对西方之学的深入把握和对东西方社会文化冷静比较之后而得到的理性思想的结晶。在“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主张的帷幔之后，映现着的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心态是虔诚的、自觉的、发自内心的。他如同一位远远地站在中国地域之外的冷峻而又超脱的巨人，对东西社会与文化的优劣高下观察得十分清楚。即使没有外力的打击他也会毫不迟疑地提出学习西方。而且，他的目标已经不是被动的由里向外的“学”，而是主动的由外向里的“灌输”，这一点是王韬等脱胎于传统旧学的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救国论”。它试图通过西式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和改铸国民精神，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此种主张在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看起来是一种远水救不了近渴的浪漫空想，但从历史的长远目光看却不失为一种掘根刨底的救世方策。中国的民族与民主问题的解决、经济现代化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努力。没有一代学识超群、观念开放的新人就不可能有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中国近代改革与革命一次次地归于失败与中国近代“新人”在国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太低有极大的关系。而“新人”的缺乏正是新式教育发展不充分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的“教育救国论”就是一种最没有空想成份、最现实主义、最根本的改造中国的方案。

An address by the Rev. Joseph H. Twichell,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Appendix, P. 256—258 (1909, New York).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第 23 页。

第二章 摸索与徘徊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与奋斗热情的容闳抛弃了个人在美国可能获得的辉煌前程，毅然掉过头来返回他的贫穷衰弱的祖国。他知道他的未来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但决没有料到他的思想会那样与中国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他要把他的“所学所思”奉献给苦难中的国人，却遭到人们不屑一顾的蔑视。他苦恼、彷徨、百思不得其解，但却不曾有过悲观主义的失望。经过坚持不懈地奋斗，他终于改变了人们对他以至于西学的态度。1863年，他被洋务派大员曾国藩授予“五品军功”，于是，在布满“长袍大褂”的大清工朝的官僚阶梯上破天荒地出现了“西装革履”。这一悄悄地转变预示“西学”将在中国正统学术的神圣殿堂里占据合法的一席之地。

一、归国谋职

容闳深知，推动西学东渐、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第一步便是回归祖国，直接投身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否则再好的理想也只能是大洋彼岸的空想。于是，1854年11月13日，容闳毅然登上纽约海萨公司帆船“尤利加”（Eureka）号启程归国。此次航行正值冬季，一路为逆风行船，船主亦为没有经验的脾气古怪之人，因此海上颠簸足足经历了154天。直至1855年3月15日，容闳才到达中国海面，看到他日夜思念的黄浦港。

在航行中，容闳曾把他回国后工作计划考虑了一遍又一遍，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能将中国导入富强之境。然而，船未停靠中国海岸他就意识到自己未免太天真乐观了。“尤利加”号驶近香港时，有一位中国领水来到船上。船氏因容闳是中国人请他担任翻译，询问附近有无危险的暗礁和沙滩。容闳竟然找不到恰当的中国词汇把“暗礁”和“沙滩”翻译出来，以至在场的中外人士“咸笑不可仰”，讥笑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会讲中国话。这件小事提醒容闳，中国可能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中国。双方都需要有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以后的遭遇不断他说明了这一点。

甚至他的母亲现在与他也有一定的距离。当他带着一颗思念已久的炽热之心急切地奔赴南屏家乡的时候，他的母亲望着跪在膝下的西装革履的儿子总觉得有几分不顺眼。她让他以后尽量穿长袍，也不要留小胡子。他不敢抗拒母亲的意愿，立即上街找理发匠剃去胡子。当他告诉母亲他是美国名牌大学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并有正规的学士头衔的时候，他的母亲反问他耶鲁的学士相当于中国科举中的什么功名，凭此能挣多少钱。他对此虽然笑嘻嘻地回答学士相当于中国之秀才，且为常人难得之“稀贵荣誉”，内心却免不了为东西文化观念的歧异和他自己与父母之邦的隔阂而惴惴不安。

容闳在家乡大约呆了二三个月。在此期间最使他震惊的是西方侵略者勾结中国贪利之徒在乡间拐卖绑架华工一事。他后来回忆说：“当1855年，予初次归国时，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辮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苦难的猪仔形象犹如贫弱祖国的缩影，在容闳心目中留下了永久的刻痕。它不断鞭策着容闳为中国富强振兴寻找道路，加倍工作。

1855年夏初，容闳告别母亲，来到广州咸虾栏突击补习汉语，此时，广州刚好发生了红中军起义。残暴的两广总督叶名深血腥镇压起义军。容闳的住处因靠近清朝的刑场，得以目睹叶名深的暴虐行径。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苗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予寓去刑场才半英里，一日予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观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且因骤觅一辽阔之地，为大坑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90度或90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旨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上，吸血既饱，皆作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六章，《学成归国》，第27页。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两学东渐记》，第六章，《学成归国》，第28页。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八章，《秘鲁华工之调查》，第96页。

储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地……后闻于城西远僻处觅得一极大沟渠，投尸其中，任其自然堆叠，以满为度，遂谓尽掩埋之能事矣。当时有住观者，谓此掩埋之法，简易实甚。掷尸沟中后，无需人力更施覆盖。以尸中血色之蛆，已足代赤土而有余，下令群尸露少隙也……人或告余，是被杀者有与暴动毫无关系，徒以一般虎狼胥役，敲诈不遂，遂任意诬陷置之死地云。容闳读过世界历史，知道古罗马尼罗王（Nero）的暴民行径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惨剧，但绝没有想到在他的祖国、在他的眼前会发生比前者残酷千百倍的暴虐。刚从自由之邦归来的他无论如何不能适应。所以，当他从刑场回寓后，有好多天变得神志恍惚，“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脑筋之中”。愤怒之极，他恨不得自己也能参加太平军行列，以尽早推翻满清王朝。

然而，当冷静地思考之后，他还是回到了他原有的计划。全力加速补习汉语，按部就班地行事，以便达到彻底改造中国的目标。经过半年左右的努力，容闳虽还不能娴熟地运用中文写作，但口语表达已经可以做到“毫无扞格”。

消除了语言障碍后，容闳开始打算寻找一种既能维持生活，又能使改造中国的理想得以实现的职业。由于美国商人希柯克（M. N. Hichcock）的介绍，他结识了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校友、此时已被美国政府任命力驻华公使的伯驾博士。伯驾此时需要一位私人秘书协助工作。容闳认为此一职位可以经常接触清朝的高级官员，有助于推进他的振兴中国的计划，欣然应聘。但是，伯驾对容闳却十分苛薄，每月只给十五元的薪水。对容闳“教育救国”的计划也不感任何兴趣。于是，容闳只在他那里干了三个月，便自行辞职赴香港重找工作。

香港是容闳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有许多老朋友还在那里居住生活。《德臣日报》（China Mail）主笔蓄德鲁特先生（Andrew Sliortre）招待了容闳，并把他推荐给香港高等审判厅作译员。这是一个薪金较高的职位，每月可得75金。但容闳不满足只做一名翻译，他利用空余时间跟随英国律师派逊（Parson）学习法律，期望将来能当一名社会作用更大的律师。在英国的司法制度中，律师资格可分为两种。一种称小律师（Attorneys or Solicitors）或称法律事务代理人、状师等），专门负责收集证据、抄阅公文、摘述案情等工作；一种称大律师（Barristers），有出庭辩护的权利。容闳所习的是前一种。尽管如此，香港英国社会立刻警觉到这是中国人对他们包揽“法律生意”的挑战，群起鼓噪，向容闳兴师问罪。香港报纸，除《德臣日报》外，一致主张禁止容闳涉足法律界。小律师协会著文宣称，如果允许一个兼能中英文的中国人在中国居民占绝对多数的香港取得律师资格，则所有的英国律师只有收拾行装回英国去。在英国社会的联合反对下，容闳最终不得不放弃在香港做开业律师的打算，辞职离港，前往上海。他的法律老师派逊也因教授中国人学习英国法律而遭到同行排挤，被迫买掉回英。

容闳对“学律未成”一事并不觉得的有所损失。他事后曾说：“我可以断言，当时没有在香港做律师真是一件大幸之事。因为要是在那里工作下去，生活交际的圈子必然受到限制。假如我把自己束缚在这块荒芜多石的殖民地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六章，《学成归国》，第30页。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六章，《学成归国》，第31页。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六章，《人世谋生》，第33页。

上，我就不会接触到中国的思想主流。尽管我开业后可能运气极好，业务兴旺。”显然，容闳是从振兴中国这一大目标来看待职业选择问题的，而没有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中国近代到西方窃取西学圣火的普罗米修斯们一开始就显示出他们具有无限宽广的胸怀。

容闳于 1856 年 8 月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刚刚发生了小刀会起义，英、法、美等国利用清朝地方官的慌乱，乘机窃据了上海海关的管理权。容闳有心实现由中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愿望，前往上海海关谋职。海关主持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把他安排在翻译处工作。这是一个薪水优厚（月薪 75 两白银）而又清闲无事的职位，不合容闳的愿望。加之他看不惯海关里贪污收贿的恶习，希望能有职有权加以革除，便在入关三个月之后的一天去找李泰国“理论”。他问李泰国：“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李泰国鄙夷不堪地回答：“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容闳一听，怒火万丈，立作辞职书一封，“书谓予与彼受同等教育，且予以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国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总税务司耶？”

一贯趾高气扬的总税务司李泰国第一次遇到来自中国人对外人霸占中国海关最高职务的挑战。他不了解容闳，以为容闳一定也会象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只要长上一些工资，就会俯首帖耳。他允诺将容闳的工资提高到每月二百两，以期容闳收回辞职声明。容闳表现出了真正中国民族脊梁的气概，坚决回绝了李泰国的重金挽留。他这样写道：“彼固以为中国人殆无一不以金钱为生命者，宁知众人皆醉之中，犹有能以廉隅自守，视道德为重、金钱为轻耶？且予之为此，别有高尚志趣，并不以得升总税务司为目的。予意凡欲见重于人者，必其人先能自重。今海关中通事及其余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能实行吾志，此辞职之本意也。”

容闳的朋友们认为容闳丢弃这个每月二百两白银的职位，而去寻找前途未卜的新职业，是犯了呆瓜才会犯的傻病。容闳全然不理睬他们的讥笑，而坚持自己的选择。他在自我反思中表示说：“我十分清楚我在回国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三换职业。也许我不切实际，太爱幻想，或是太高傲难以成功。但是，一个人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必须要有幻想，这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了作为一个动物性存在而服役。我曾为求学而努力工作，特别希望能将含辛茹苦所得来的学问奉献出来，以发挥其造福同胞的最大作用，而不是仅为自身的利益考虑问题。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自己能干什么和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中国的人。”然而，满怀人生理想的容闳辞职之后立即就遇到了吃饭生存问题。他是洋学士，在中国官僚和人才制度的阶梯上得不到承认，因此不可能在清朝的官员俸禄中分得一份“养廉之银”。而十里洋场，钱臭薰天，没有职业、没有薪水，人又怎能活得下去。他陷入了左右两难之境。”在痛苦的徘徊之后，他不得不先委屈他的理想，而进入一家专收中国丝茶的英商公司做职员。

容闳在这家英国商号大约工作了半年之久。在这半年之中，他更深刻地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P.62.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七章，《入世谋生》，第 33 页。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七章，《入世谋生》，第 35—36 页。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rnerica, P.65—66.

感觉到外人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和中国人地位的跌落。有一天傍晚，他队苏州河边礼拜堂做完祈祷回家，看见一小队外国水手高举着灯笼沿马路摇摇晃晃地叫喊而来。路两旁的中国人象是见到恶魔一样惊恐万状，四散而逃。当他们遇到并未向他们让路的容闳时，恣意挑衅，夺去容闳仆人手中的灯笼，其中一人并试图踢容闳一脚。容闳先以为这是一群醉鬼，不与计较，但当他发现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醉，而是有意以欺侮中国人为乐时，他大为愤怒，当场与这群家伙“理论”起来。他以流利的英语向这群外国水手说，外国人在本国时很注重名誉，在中国也不该做那些与名誉不相称的事情。欺软怕硬的外国水手见他英语流利且义正词严，居然未敢对他再施以无礼，甚至告诉了他踢人者的名字。事后，容闳又为此致函责备这群水手为其工作的美国船长，这位船长立即上岸拜访容闳，赔理致歉。又有一次，在一个家具拍卖会上，一位身高六尺以上的苏格兰人在容闳的发辫上悄悄扎了一串棉花球以为取乐。容闳当即把他抓住，以冷静而严厉的态度要他把棉花球解下来。苏格兰人挺着肚子，双臂抱在胸前，表现出一副极为傲慢和嘲弄的神情。然后突然向容闳的嘴上击了一拳。容闳丝毫没有被这位苏格兰人的魁梧身材和傲慢态度所吓倒，立即回手自卫，一拳就将对方口鼻打得鲜血直淌。在场的其他英国人企图帮助苏格兰人，容闳义正辞严的对他们说：“你们的朋友看起来象个上等人，实际上是个流氓，我打他只是为了自卫。”这群家伙自知理屈，不敢再施暴。容闳以中国人矮小的个头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击身躯高大的苏格兰人一事在上海租界内轰动一时，被揍的那位苏格兰人有整整一个星期没好意思在公众场合露面，容闳则因此而被中外人士看作令人尊敬的勇士。容闳事后在写自传的时候为这件事感慨说：

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侵夺我治外法权以来，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凌侮，时有所闻。然从未有一人敢与抵抗，能以赤手空拳，自卫其权利者。此实由于中国人赋性柔和，每受外人无礼之待遇，辄隐忍退让，不敢与较。至养成一般无意识外人之骄恣，喧宾夺主，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也。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容闳在英商公司工作半年之后，因所在公司破产而再度失业。他不得不以翻译文稿为生活手段。翻译工作虽然赚不到什么钱，却为结识中国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打开了道路。在此期间，他因为翻译了中国商人为赈济苏北灾民而向国外侨民散发的募捐公启并将它刊登在上海英文报纸上而名声大著。中外人士都知道上海滩上有一位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许多沪上名士都争相与他结交。如数学家李善兰、化学家徐寿、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和中国驻日副公使的张斯桂等，这些社会关系是日后容闳得以获知于曾国藩、进而实现教育计划的通道。

在容闳的上海朋友中，与他过从最多的是买办商人曾寄圃。此人社交圈极广，通过他容闳又认识了宝顺洋行（MesSrs.Dent & Cc.）的经理韦伯（Webb）。韦伯非常赏识容闳的学历和才识，打算任命容闳为宝顺行驻日本分公司的总买办。容闳认为当买办不过是当奴隶的头子，有辱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名誉，而且，前往日本不利于他的教育救国理想的实现，谢绝了韦伯的

好意。韦伯遂改任他为公司代表，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去考察和收购丝茶。容闳觉得这一工作不仅可以使他看到中国内地农村的真实情形，而且还可能使他遇到清朝的封疆大吏，有利于改革中国计划的实施，便愉快应聘。

容闳此次的内地之行自 1859 年 3 月 11 日开始，至同年 9 月 30 日结束，历时达七个月。在长时间的考察中，容闳最为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国人民的苦难；二是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当他看见内地农村禾苗干枯，灾民遍地的景象时，他的心就象在流血，在哭泣。他在回忆中写道：“惟有一事，令予生无穷之感慨。予素阅中国纪载及旅行日记等书，莫不谓中国人口之众，甲于全球。故予意中国当无地不有人烟稠密之象。乃今所见者，大不相符，是则最足以激刺予之脑筋者也。此种荒凉景象，以予所经之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为尤甚。当予游历时，为春夏两季，正五谷播种、农事方殷之际，田间陌上，理应有多数之驴马牛畜，曳锄相接。乃情形反是，良可怪也。”

当他看见扬子江上外国轮船来往不息的景象时，他的心就象在被鞭打、被焚烧。他谴责说：“于扬子江中，行舟可直达四川边境之荆州。全航路之长，约三千英里，六七省之商务赖以交通。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驶其主权，则扬子江开浚后，其利益实未可限量，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也。彼西人者何不与中国以时机，俾得自行解决其国内问题耶？又如工人问题，自有欧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中国人民的苦难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是容闳谋求振兴中国计划的加速器。在强烈的民族情感的驱动下，他更加积极地寻找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途径。1860 年，他找到了太平天国。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七章，《入世谋生》，第 49 页。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九章，《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第 45 页。

二、访问太平天国

容闳自从考察了内地，真切地看到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人民的苦难之后，有一段时间精神上十分苦闷。中国的实际状况超出了他在美国时对中国国情的预想。他找不到一条实现振兴中国计划的道路。他后来对他的恩师布朗说，那一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黑暗时期。“他看不见实现他的计划的希望，他只是把一切交托给上帝就是了”。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灰心丧气。布朗博士 1859 年前后在上海访见他时，发现他不仅“对于最迟可能实现他的计划一点未曾失望”，而且，正在“改进和发展他的心思，为着一个伟大的将来做准备”。1860 年 11 月，当他听说有人要到太平天国占领区去考察时，他立即怀揣他的救国救民计划随同前往。于是，象本书的第一位传主王韬一样，容闳在找不到实现理想道路时，也把希望寄托在新生的农民政权之上。他此时一心期待中国大地上能出现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政权，以取代满清贵族腐朽不堪的统治。

容闳此行一共有四人，两位是美国传教士，一位是中国人曾兰生。11 月 6 日船离上海，9 日到达苏州。苏州太平军官员刘肇钧接见了他们，并为其颁发前往南京的通行护照和准备路上的食物。11 日，容闳等离开苏州向南京进发，沿途受到太平天国地方官员的友好接待。当小船进入运河后，容闳发现两旁农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有稻秧麦穗”。但他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太平天国的责任。因为清朝官军之残暴比太平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这一看法在太平天国的后方丹阳得到证实。丹阳居民对太平军并无恐惧之心，“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17 日，容闳一行赶至南京附近的句容。此时，太平天国主力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正全力西征武昌以缓和湘军对安庆的围攻。长江下游镇江一带力量空虚。民间风传清军已大败太平军于镇江。句容城内外交通断绝，风声鹤唳。同行之传教士心惊胆怯，打算折回上海。容闳有心要见到太平天国高级官员以了解这一政权对他的改造中国计划的态度，与传教士“持论久之”，坚持冒险前进。18 日，终于赶到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住在于王府附近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的寓所里。

到达南京的次日，容闳谒见太平天国总理干王洪仁玕。洪仁玕是容闳在香港时的旧相识。那时，洪仁玕是伦敦布道会的成员，跟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做传教和文字助理工作。洪仁玕曾对容闳讲过，希望两人以后能在中国内地见面。所以，这次两人相见十分欢洽。洪仁玕一见面就热情邀请容闳参加太平天国。容闳由于对太平天国的政策还把握不定，没有正面回答洪仁玕的邀请，而是向洪具体提出了他的改造中国的七条方案：

H.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London, 1881). 译文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册，第 420 页。

H.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London, 1881), 译文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册，第 420 页。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章，《太平军中之访察》，第 52 页。

罗孝全（1822—1871），美国传教士，1837 年来华传教。1847 年洪秀全曾向他学习基督教教义。1860 年应洪秀全之邀到达南京，被任命为通事官领袖，襄助干王洪仁玕工作。

- 一、在科学原则基础之上组织军队。
- 二、开办一所陆军学校以培养有能力的军官。
- 三、为筹办海军设立一所海军学校。
- 四、组织文官政府，聘请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
- 五、建立银行系统确定度量衡标准。
- 六、为民众建立一套由各年级学校组成的教育系统，并把《圣经》作为教课书内容之一。
- 七、建立工业技术学校系统。

容闳的七项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凝聚着他长期以来改良中国的理想与热情。其中兴办教育一项更是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核心。所以，他在提出这些方案的同时还向洪仁玕表示，假如太平天国政府有意采纳和实行这些方案，并为此拨出适当款项，他愿意贡献他的力量以促成其事。

同样具有改良中国思想的洪仁玕对容闳的七项建议十分重视。两天之后，又邀请容闳去他的王府讨论这项建议。但是，此时的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跌落，特别是作为总理的洪仁玕，上有天王洪秀全的挟制，下有拥兵自重的军事将领们的抵制，根本没有力量来实施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计划。他向容闳表示，尽管这些建议至关重要，有立即付诸实施的必要，但在出征在外的诸王回来之前，他一切都不能决定。为了表明他对容闳的敬重，几天之后，洪仁玕又派人送来一个黄布包，里面包有封容闳为“义”爵的委任状和刻有容闳名字的官印。容闳此时已看出太平天国的危机，认为太平天国天王、干王及其将领们的“行为、品格和政策”都不足以证明这个政权能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因此他辞却了洪仁玕的好意。他只向洪仁玕申请了一张太平天国的通行护照，以便未来在适当的机会能够重往太平天国“办事和旅游”。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对太平天国的希望，留下一个走“回头路”的缺口。果然，他的临别赠言说明了他的这一意向。他向洪仁玕说：“假如太平军决定实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所提议的全部或其中任何一项，倘若需要我的帮助，我将十分乐意地为其服务。”

容闳一行于 1860 年的 12 月 24 日离开南京，翌年 1 月上旬回到上海。可是，容闳人虽在上海，心却还在太平天国。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在思考有关太平天国的问题。

他在思考中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明确指出太平天国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对传教士把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归结为上帝启示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促其爆发的导火线而已。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恶根”在于清朝“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馈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在这样的“欺诈机关”统治下，即使没有基督教，没有洪秀全这个人，“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

第二，他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纪律松弛和道德堕落。容闳指出，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P.109.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lca, P.111.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P.112.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R.112.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一章，《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第 61 页。

太平军沿途吸收大量流民和社会渣滓入伍，不但没有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反而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声誉。这些没有信仰，只知发财的乌合之众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消减了人民对太平军的支持。在这些新加入的流民传染下，太平天国老战士也丢弃宗教心，开始追求财富。特别是在占领了以财富和美女著称的苏浙地区以后，太平军将士的颓废和堕落走到了极端，“盖繁华富丽固足以销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

第三，他断言太平天国式的农民起义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不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容闳分析说，中国历史上的叛乱或革命是屡见不鲜的事，但这些叛乱或革命的功效只是更替另一个新的王朝而已，政权“在形式和原则上都没有变化”。所以，中国历史至少有两千年之久犹如一潭死水缺少创新之意。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在宗教方面略有一点新内容，但本质上与历史上的叛乱或革命是一样的，中国不会因此而走向新生。“他们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政治思想、新的政治理论或原则，以作为建立新型政府的基础。所以，不论从宗教还是政治方面来说，中外均没有从这次运动得到益处。”中国历史的进步需要新的动力。

三、投归曾国藩

容闳在他的自传中曾回忆他从太平天国回沪后的打算，他写道：“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然而，经商既不是他的长处，也与救国救民的抱负相隔甚远。1861年到1863年前后三年长江流域的“业茶”实践，不仅没有带给他巨额的财富以使他具备实现计划的财力，反而差一点让他丢了性命，轻于鸿毛地死在土匪的乱刀之下。

于是，他又开始重新审视他的选择。经过冷静地考虑，他认为他应该有比贩茶更高尚、更有价值的事业目标。命运之神惠顾了他。1863年，他遇到了曾国藩，终于踏上了一块实现计划的“上马石”。

这一年的3月间，容闳在九江接到一封张斯桂写来的信。张氏原是容闳在上海的老朋友，此时正在安庆曾国藩的大营当幕僚。他在给容闳的信中说，曾国藩已经听说了容闳的大名，极希望容闳能赴安庆会面。容闳好长时间没有与张斯桂通信，突然接到这一邀请，有些拿不定主意。他担心曾国藩知道了他到过太平天国访问的事，想通过张斯桂的“以礼相邀”把他骗去杀头。因此，他这一次婉言回绝了邀请。

两个月后，容闳又接到张斯桂的第二封邀请信，里面还附了容闳另一好友李善兰的一封信。李善兰在信里解释说，他曾在曾国藩面前提到容闳受过西方正规教育，有爱国爱民之心，“急欲为国服务以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之国家”。曾国藩听后极感兴趣，想面见容闳委以重任。李善兰并告诉容闳，他的另外两个上海朋友华蘅芳和徐寿也在曾国藩大营效力。李善兰的来信使容闳对曾国藩的疑惧顿时消散于无形。他立即作了回复，答应在手上的商务活动结束后立即前往安庆拜见曾国藩。但是，曾国藩求见容闳十分心切，不久又通过张斯桂和李善兰写了第三封邀请信。信中更明确地请求容闳弃商从政，即刻动身去安庆。

曾国藩此时为什么如此急切地要见到容闳呢？这是因为他这时需要一个精通“西学西语”的兵器工业专家。

19世纪60年代以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地方实力派迫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抗外来侵略的需要，走上了自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求强致富之途。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之尊，独领风气之先，于1862年在安庆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军械所。为了扩大和完善兵工厂体系，他准备采买一批能够完成机械加工的西洋机器。当他听说容闳在美国生活了八年、精通英语和西方科学技术之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适当不过的人才，有必要折节持礼将其尽早罗致帐下。

曾国藩“三顾茅庐”式的以礼相邀，使已经厌倦商务、正在为理想无法实现而苦恼的容闳大喜过望，他迅速处理了商务收尾工作，于同年9月间赶赴安庆。

容闳著，徐凤石、挥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二章，《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第63页。

容闳著，徐凤石、挥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二章，《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第68页。

曾国藩以及容闳的老朋友们热情欢迎他的到来。在安定下来之后，李善兰、张斯桂、华蘅芳、徐寿等幕僚们开始与容闳谈论建立机器厂之事，并询问容闳对此事的意见。容闳一贯最看重的是他的教育救国的计划，但他意识到曾国藩的幕僚们所关心的事正是曾国藩所关注的事，因而没有大谈他的教育计划，而是就势畅谈他对设立机器厂的看法。他表示意见说，根据他在美国的观察和一般经验，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办机器厂就应办基础性的普通的机器厂，而不是建立那种只适应特殊需要的机械厂。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建立一个能够由此再派生出许多专门性分厂的母厂，这个母厂能够生产制造枪炮、机车、农业器械、钟表等等的机器。他的这一意见被幕僚们转告给曾国藩。曾国藩对容闳的建议极为欣赏，他在日记中郑重其事地写下“制器之器”这个新名词，并立刻第二次召见容闳，当面肯定了他的意见。随后，曾国藩礼授容闳五品军功，正式委任他前往国外购买机器，以建立中国第一家正规的现代化机器厂。

从到达安庆大营的第一天起，到曾国藩明确表态支持容闳意见，前后大约只有三个星期，正是在这三个星期里，容闳从一位不大被中国士林所重视的“准洋商”而一跃成为中国最有实权的官僚的座上宾，进而踏进了中国政治的权力之圈，取得了实现改良计划的入门之钥。所以，这三个星期也牢固确立了容闳一生对曾国藩的感恩之情。他在自传中写道：“曾国藩的伟大是不能用爵位来衡量的；这不在于他克服了叛乱，更不是因为他收复了南京，而是在于他的了不起的品德：他的纯洁而无私的爱国精神、他的廉洁奉公和他的深刻而有远见的政治头脑。他在历史上以正直著称，所以死后被溢为“文正公”。

1863年10月，容闳由广东藩司和上海道提取款银68000两，从上海出发赴美。启程之前，容闳正好遇到为美国罗塞尔公司（Russell & Co.）运送机器来中国的并正准备回国的工程师约翰·霍金斯（John Haskins）先生。容闳与他达成协议，由他先期赴美准备绘制机器与未来机器厂的图样。容闳则先到欧洲稍作考察。

容闳在法国和英国一共考察了四十多天，于1864年初春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纽约。这时正好是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十个年头，他的耶鲁同学在纽黑文举办了一个毕业十周年校友团聚会，邀请容闳参加。于是，容闳在离开耶鲁十年之后，又成了校友们谈论的中心。

购买机器的工作由于美国南北战争而受到了拖延。几乎所有的美国机器厂，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厂全都忙于承造政府的订货，不愿意承担容闳所需要的机器。容闳与霍金斯多方设法，最后找到马萨诸塞州费屈伯格城（Fitchburg）的普特纳姆（Pittnarm）公司承造中国订货。

在等货期间，容闳曾忽发奇想，跑到华盛顿去找一位同学的父亲巴恩斯将军（Barnes），请求让他作为北方的志愿军参加战斗。他向巴恩斯将军表示说，美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有义务为其服役。但当巴恩斯将军获知他来美国的主要任务后，认为采购机器比服役参战更具重要性，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P.149—150.

《曾文正公手书记》，卷十八，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P.147—148.

直到 1865 年初春，订购的机器才全部交货。这些机器由纽约装船，经大西洋，过好望角东行运到上海。容闳本人则有心作环行地球的第一个中国人，他自纽约乘船南下，穿巴拿马地峡至旧金山，然后再由旧金山西行过太平洋，经日本到达上海。

容闳回到上海之时，曾国藩已调至徐州负责“剿捻”。因此，容闳采买的这批机器就被并入了江苏巡抚李鸿章控制的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来自三个渠道：一是从李鸿章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炮局继承而来，二是李鸿章购买的上海虹口洋人机器厂的旧机器，三是容闳采购的这批机器。三者相比，容闳购买的最为先进。由于有了容闳购自美国的这批机器，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当时好望角以东最大最现代化的制造厂。

采买机器的成功也使容闳身价陡涨。1865 年，当他在华蘅芳陪同下来到徐州大营向曾国藩汇报工作时，曾国藩表示要立即专折奏请皇帝嘉奖封赏。曾国藩的一位幕僚将奏折的内容透露给容闳，奏折写道：

花翎运同銜容闳，熟习东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于同治二年十月，拨给银两，令前往西洋采办铁厂机器。四年十月回营，所购机器一百数十种，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查该员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讨程越四万里，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励，合行仰恳天恩俯准，以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补。

果然，容闳回到上海不及两个月，总督正式任命容闳为五品实官的公文就寄到了上海。容闳从此成为一名有清朝正规俸禄的官员。月薪 250 金，超过当时的四品候补道。

容闳的职责是帮助上海道丁日昌管理江南制造总局。在这期间，他与丁日昌的私人关系极为融洽，由于丁日昌的晋升和对他的推荐，他也被赏戴花翎。在政务空疏之时，他还翻译了哥尔顿的《地理学》(Colton's Geography)和帕森的《契约论》(Parsons on Contracts)。

容闳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期间最为得意的事，是他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附属学校的建立。他描述他劝说曾国藩时的情形说：1867 年，曾国藩在回任两江总督前视察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他在制造局里兴趣非常浓厚地四处观察。我指给他看我购自美国的那些机器。他站在那里始终欣然不倦地注视着机器自动运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机器和它的运转情形。我借他这次参观的机会，成功他说服了他在制造局里附设一座机械学校，以培养中国青年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和操作。这样，到了相当的时候就可解雇外国工程师和机械师，使中国人能完全独立操作。这项建议很投合中国式的讲求实际的特点。制造局终于附设了一所学校。”显然，容闳在办理机器厂事务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他最初的教育救国的计划，他在等待和寻找着适当的机会。

《曾文正公保举容闳折》，见何广棧《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载台湾《书目季刊》，1979 年 9 月号。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P.167.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P.168—169.

第三实施教育计划

容闳通过赴美采办机器获得了清朝洋务派大员的信任和赏识。在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大力帮助下，他构想多年的教育计划终于上达清廷并得到了批准。1872年8月，中国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揭开了中国人主动走向世界学习西学的历史新篇章。此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学说通过留学生这一活的文化载体，更大规模地涌入中国。虽然由于封建顽固派的阻挠破坏，中国留学生计划在1881年遭到挫折。但由这一计划所导引的西学东渐大潮却已经不是任何顽固分子所能随意阻抑的涓涓细流了。它奔腾着、呼啸着，穿透大清王朝的封闭城垣，最终将大清王朝的“铁统江山”淹没在它所唤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中。

一、教育计划的提出

成功地劝说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学校一事，大大激活了容闳心中蕴藏了 15 年之久的教育计划。此后，在与丁日昌共事的几年里，他几乎时时“进言”，谈论他的教育救国的设想。来自广东一向以开明自视的丁日昌受了容闳不断游说的影响也变得十分热心教育事业，“对于一切革新措施，都跃跃欲试”。他向容闳透露说，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握有实权，且赞同洋务，如将教育计划写成条陈上呈给他转奏皇帝，定可批准。容闳立即如策而行，与他的中文助手写成条陈一份，交丁日昌转寄文祥。条陈这样写道：

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欲巩固公司之地位，并谋其营业之发达，拟请政府每年拨款若干以津贴之。其款可由上海镇江及其他各处运往北京之漕米项下，略抽拨数成充之。漕运旧例，皆运米而不解银；每年以平底船装运，由运河驶赴北京。故运河中专为运漕而设之船，不下数千艘。运河两岸之居民，大半皆借运潜为生。但因运法不善，遂致弊端百出。水程迢迢，舟行纤缓，沿途侵蚀，不知凡几。值天气炎热，且有生蛀之患。以故漕米抵京，不独量数不足，米亦朽败不可食。官厅旋亦知其弊，后乃有改用宁波船，由海运至天津，更由天津易平底船以运京。然宁波船之行驶亦甚缓，损失之数，与用平底船等。愚意若汽船公司成立，则平底船及宁波船皆可不用，将来漕米即得以汽船装运。不独可免沿途之损失，即北方数百万人民仰漕米以为炊者，亦不至常食朽粮也。

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名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监督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

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坊外力之侵入。盖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谋之象。苟留心一察天主教情形，即可知予言之非谬。彼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已不仅限于宗教范围，其对于奉教之中国人，几有管辖全权。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竟由教会自由裁判，不经中国法庭讯理。是我自有之主权，已于法律上夺去一部分也。是实不正当手段，若不急谋防范，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故政府当设法禁止。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

这是一整套使中国现代化的方案，涉及中国在步入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矿产开发、铁路建设、轮船航运、政治主权保护和留学生出洋学习等。其中派遣留学生一项是它的重点，也是容闳作为近代先进中国人的特殊的富有个性的标志。

可惜的是，容闳这一次的建议因艾祥的“丁艰守孝”和随后不久文祥自己的不幸过早去世而搁浅。对容闳来说，这是一次十分沉重的精神打击。他回忆道：“此条陈上后两阅月，丁抚（指已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著者）自苏驰函告予，谓文相国丁内艰。盖中国礼制，凡现任职官，遭父母之丧，谓之‘丁艰’。‘丁艰’必辞职，居丧三年，不得与闻政事。予得此消息，

心意都灰，盖至此而元龙湖海豪气全除矣。抑蹇运之来，天若不厌其酷者。得第二次恶耗，希望几绝。盖文祥居丧不三月，亦相继为古人矣。于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试。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亦安能无快快哉。失望久之，焮余复热。自 1868 年至 1870 年，此三年中，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并恳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 爱国之士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从中殷然可见。

有志者事竟成。容闳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在 1870 年有了结果。

这一年的 6 月，天津民众因误信天主教教士和修女拐卖残害儿童掀起了大规模的“打教”活动。怒不可遏的群众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及各国教士修女 20 人，并焚毁天津城里的教堂、育婴堂和领事馆。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政府慌忙委派曾国藩、丁日昌、毛昶熙等赴天津处理善后事宜。在列强压迫之下，清政府最后除了将肇事者 20 人判处死刑和赔偿大量抚恤金以外，还派崇厚为钦差大臣代表清政府到法国谢罪。中国的外交尊严一落千丈。

天津教案发生后，容闳作为了日昌的随员和中国方面翻译也前往天津参与交涉。他在分析教案发生的原因时，认为中国民众的愚昧无知是这场外交纠纷的根源，为了减少和杜绝这种有害无利的外交灾难，只有加速推进能够提高民智和增进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教育工程。于是，他再次向丁日昌和曾国藩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和丁日昌认为容闳的分析和建议切中时弊，同意联名向清廷会奏。1870 年冬天，皇帝同意派遣留学生的上谕寄达南京。容闳在思想的船台上建造了十多年的船体终于因天津事件这一偶然压力的振动而滑行下水。容闳为此兴奋不已，当曾国藩把“著照所请”的朱批给他看时，他不禁飘飘然如踏云端。他写道：“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的教育工程终于成为一项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这将在中国编年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六章，《予之教育计划》、第 88 页。

Yung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P.182—183.

二、留学生派遣

在曾国藩领衔的给清帝的会奏中，容闳的名字和他写的有关条陈都被提及，因此，按一般程序做法，容闳理应成为留学计划的负责人。但是由于丁日昌害怕“洋秀才”出身的容闳当留学生监督会引起朝廷中顽固派官僚的围攻而使留学计划再度搁浅，建议以翰林出身的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监督，以杀减来自顽固派的阻力。而容闳只以副监督的名义做实际工作。容闳弄不清楚封建官场的关节，相信了丁日昌的话，因而在与曾国藩的谈话中他主动要求不做正监督。这一最初的退让埋下了日后留学计划失败的祸因。

容闳于1870年末赶赴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商量选派出洋留学生的具体事宜。从后来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会奏文字，我们可以获知曾容两人当时商量的内容。会奏这样写道：

试办之难有二：一日选材；一日筹费。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有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幸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选游异国，安心学习，则选材难。国家帑项，岁有常额，增此派人出洋肄习之款，更须措办，则筹费难。凡此二者，臣等亦深知其难，第以成山始于一篲，蓄艾期于三年，及今以图，庶他日继长增高，稍易为力。爰饬陈兰彬、容闳等悉心酌议，加以复核，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业，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闻前闽粤宁波子弟亦有赴洋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语，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此则入选之初，慎之又慎。至带赴外国，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傅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才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至于通计费用，首尾二十年，需银百二十万两，诚属巨款，然此款不必一时凑拔，分析计之，每年接济六万，尚不觉过难。除初年盘川，发给委员携带外，其余指有定款，按年预拔。交与银号陆续汇寄，事亦易办……

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

一、商知美国公使，照会大伯尔士顿，将中国派员，每年选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书院肄业缘由，与之言明，其束脩膏火，一切均由中国自备，并请俟学识明通，择材拨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至赴院规条，悉照美国向章办理。

二、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札飭在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明幼童，年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如资性聪慧，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局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则撤退，以节糜费。

三、选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订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自先回，遽谋别业。

四、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如访有金山地方华人年在十五岁内外，西学已有几分工夫者，应由驻洋委员随时募补，以收得人之效，临时斟酌办理。

五、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载细册，齐送上海道转报。

六、驻洋派正副委员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四百五十两。翻译一员，每月薪水二百五十两。教习二员，每员薪水银一百六十两。

七、每年驻洋公费银共六百两，以备医药、信资、文册、纸笔各项杂用。

八、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川资，每员七百五十两。

九、幼童来回川资及衣服物件，每名七百九十两。

十、幼童驻洋束脩、膏火、房租、衣服、食用等项，每一名每年计银四百两。

十一、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使费开单知照上海道转报。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若正款实有不足之处，由委员随时知照上海道禀请补给。

十二、每年驻洋薪水、膏火等费约计库平银六万两，以二十年计之，约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

从会奏确定的办法看，容闳在与曾国藩的讨论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民间风气未开可能给挑选幼童带来困难，对出洋幼童都规定给以优厚待遇。尽管如此，招生工作依然不太顺利。刚刚从闭关自守状态下睁开眼来的中国人大多还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陌生的异邦去接受洋人的教育。一位幼童后来回忆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人野蛮，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的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消。”这样的民间文化氛围给招生增添了障碍。

容闳把招生目标主要放在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地区。可报名投考者无论如何也不足第一批的30人之数。容闳只好再跑到香港英国人开办的学校中招揽补充。经过容闳的多方奔走，至1871年秋季总算凑足了名额。随后，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对面设立留学预备学堂一所，专门训练即将赴美留学的幼童。

上海留学预备学堂由曾国藩的幕僚刘瀚清任校长，聘请中、英文教习各三名，对幼童进行初等的中文和英文补习。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30名幼童出国前中英文会考全部及格，获准“放洋”。

1872年7月，容闳先期一个月赴美，为留美幼童安排住宿。他从旧金山上岸，乘火车经纽约、华盛顿，再至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在这里，容闳拜访了耶鲁教授詹姆士·哈德莱（James Hadley）。通过他的介绍，容闳与康涅狄克州教育部门负责人若斯洛普（B.G. Northrop）进行接洽。若斯洛普表示非常乐意接受中国留学幼童，并建议把学生二三个一组安顿在新英格兰的美国居民的家中，以便于以最快速度跨过语言关。容闳采纳了他的建议。为了方便管理，又在康州适中之地哈特富德市沙姆大街（Sumner Street，Hartford）设立中国学生肄业局总部。

同年8月11日，30名幼童由监督陈兰彬、教习吕源浚、容增祥和翻译曾恒忠带领自上海启程赴美。将近一个月以后，船抵旧金山。接着改乘火车前往东部。关于此次旅行的详细情形，幼童温秉忠曾有生动记述：

出国前夕，每位学生发给铺盖一床及小箱子一只，内有长袍马褂，他们并学习如何在官员面前应对，以及一些礼仪。

各批学生必须到上海海关道台衙门叩头谢恩，使他们得此留美机会。理论上说，海关道台是他们的“主考官”，而且当时上海海关道台是全城最高长官。那次接见使幼童感到如同觐见

皇帝一般的震慑，因为道台是第一次特准他们可以抬头看他脸的大官。

第二天，幼童们特去拜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他热诚接见幼童，并飨以简单茶点。最后，幼童与老师及同学告别，在一种复杂而茫然的心情下搭上日本的一条轮船，向岸上挥泪的亲人及微笑的亲友告别。在当时，到美国的旅程，好似到天涯海角一样，而一般家长是不愿其子弟远行的……横渡太平洋花了 28 天，一个漫长疲困的航程，但对幼童而言，太平洋是风和日丽水波不兴。他们在甲板上散步，注视着蓝天和飞鱼，来打发他们的晕船。有时一只鲸鱼向空中喷出一道水柱，引起大伙无比的兴奋。有时在甲板上游戏，在不知不觉中旅程到了最后一天——他们的船驶到旧金山大桥下。

旧金山给幼童们初次的印象，在以后很长的岁月中他们仍生动地记忆着。许多轮船穿梭行驶，并排停泊。鳞次栉比的整洁民房，树荫草地中的大厦，市区蜂窝似的商场——这一切，对幼童们都是一番难忘的景象。

船靠码头后，幼童住进丸层楼的“皇宫大饭店”——当时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他们在旧金山停留了三天，观光游玩极为愉快。幼童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旧金山，坐上了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六天六夜，走了三千里。他们乘着一节车厢，当时火车尚无餐车。因此，火车一天停三次，以便旅客进餐。火车站附近有许多餐馆，经常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摇着铃，一个打着锣，来招徕食客。火车仅停 15 分钟。因此，车一到站，旅客均奔向最近的餐馆进食。当火车要开行的钟声一响，大伙又狼狈不堪地赶回车厢。因此这六天中，大家进食是囫囵吞枣，使胃口不适。

……火车奔驰在中西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在许多火车站旁，幼童们看到穿着土著衣服的红印第安人，黑色头发上插着鹰的羽毛，脸上象中国评戏中戏子一样涂有颜色，挽弓佩箭，好不神气！

第一批幼童抵达新英格兰地区后，容闳将其分在康州和麻省大小城镇 15 户之内。各户家长即为中国幼童监护人，照料中国幼童起居生活并为其补习英文。所需费用由中国留学肄业局支付。

在随后的 1873、1874 和 1875 年连续三年中，中国的第二、第三、第四批留学幼童全部按计划如期赴美。中国第一波留学教育浪潮进入了它的高峰期。为了维持住这一高峰期，使清政府不至于随意后退而导致留学运动退潮，1875 年，容闳建议清政府动用了 4.3 万美元巨款在哈特福德市柯林斯街（Collins Street）建造了一座“堂皇而坚固”的三层楼房作为中国出洋幼童肄业局永久性驻美总部。该楼建有教室、办公室、厨房、餐厅、浴室、宿舍等，足够中国留学生和官员学习与工作之用，与此同时，容闳本人也似乎下定了在美国永远办理留学事务的决心。在他的老朋友吐依曲尔牧师的介绍下，他于同年 2 月与康涅狄克州的玛丽，克洛格小姐（Mary Louisa Kellogg）结为伉俪。

中国各批留学幼童，最大者为 16 岁，最小者为 10 岁。根据年龄，他们在经过最初的家庭英语补习之后分别进入中学和小学学习。生活依然由美国居民照料。主人大多为基督徒，对幼童们的关怀无微不至。幼童在这些家庭里生活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负责管理幼童生活的中国留学事务所教习祁兆熙曾与翻译曾兰生一道前往幼童祁祖彝、朱宝奎住处探望，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初四日癸酉，礼四。六点半起，八点钟同兰生乘马车，换火车至祖彝塾师家，路十五“麦”。祖彝与朱宝奎有喜色。师家有苹果树，连日畅吃苹果。其家在山上，屋上下八间，家儿四人，女师姊妹二人，老母年近六旬左右。无邻居，后即园林也，依山傍水，大有秀气。祖彝与宝奎谓我曰：“自到馆，目见不满二十人”。余曰：“读书之处，得此清静琅嬛也”。方到之日，女师为理衣箱，派书几，有大抽屉。二人同一大榻，被褥全备。夜俟其睡，熄灯。余见其师将二人所用洋布手巾缝边，嘱二人取苹果馈余与兰生。取携能应对。现即将日用起居，随时随地教一句，写一句。其读书之时，亦九点起，四点止。《环游地球新录》的作者李圭在游历美国时留心考察中国幼童和美国房主的关系，他发现他们之间感情融洽，“爱之情，几同母子”。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的留美学生詹天佑在回国后写给房主兼老师的信中说：“当读你的信时，我忆起过去和你共处的日子，我们在你的园子里尽情欢笑，在你住处欣赏美丽的黄昏。”

在美国友人的大力帮助下，中国幼童的英语水平进步极快，学业成绩也大多在就读学校中名列前茅。许多人在中学毕业后考入了耶鲁、哥伦比亚等美国著名大学深造。以詹天佑为例，他在纽黑文中学时学习成绩就十分突出，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多次获数学考试第一名，两次获数学奖学金。美国《纽约时报》曾以十分赞赏加嫉羨的笔调写道：“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的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象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

然而，以陈兰彬为代表的留学肄业局中的旧派人物最关心的是所谓学生的道德和“中学工夫”。他们害怕在美国学校中读书、与美国家庭融成一片的学童们再也不愿回到儒学所规定的旧有道路上去。于是，他们在留学肄业局的大堂里挂起孔子画像让学生随时参拜，责令学生自觉读写中国典籍，并定期到中国留学生肄业局学习汉语和中国礼仪。从留存下来的注有留学幼童唐绍仪名字的“留学局谕告”，我们可以窥见当时这些旧派人物的担忧情形。谕告这样写道：

谕告诸生等知悉：我国家培育人材，不惜巨币，送尔等肄业。尔父母亦不耽溺爱，令尔等离家前来。无非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为尔等终身之计。试思中国人家子弟，若万万，若千万，岂易得此美遇？既可学新奇学问，又不用毫末钱财，又早已顶带荣身，又将来回中国后，功名超进，种种好处，不可言宣。

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工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若尔等不上等学习，将来考试，岂能争先胜人？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莫待彼时改变不来，后悔莫及也。

至洋文汉文，更会融会贯通，方为有用。否则不但洋人会详文到中国者不少，即中国人在外国通洋话者不多。何以国家又令尔等出洋肄业？反复思维，其理易晓矣。现已一面将汉文洋文会通之法，纂习一书，以便印出后，发为尔等程式。尔等当先于学中完毕功课之时，少歇息

祁兆熙：《游美洲日记》，1874年9月30日。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卷二，第26页。

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一，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二期。

转见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三，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六期。

后，抽出闲谈及作无益诸事功夫，即将四书温习，或互相讲论。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总之洋文汉文，事同一理。最是虚字难明，如有未解之字，或此句有，别句亦有，当即摘出记录，以便到局请问，或随时写信求益不可，自能旁引曲征，令尔等明白晓悟也……特谕。

然而，陈兰彬一类封建旧派人士所提倡的四书五经毕竟抵挡不住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强力进攻。多年耳濡目染之后，幼童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遽然一变，由此导出了幼童及其他的代表容闳与封建旧派人士的磨擦和交锋。中国最初的留学教育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顾敦鏊：《百年留美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见于包遵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六册，第159—165页。

三、留学运动的夭折

诚如美国《纽约时报》所指出的：“中国幼童们，除却书本、老师传授的知识，并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的影响，这是可以意料之事。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仅由工程、数学、科学的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无动于衷，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留美学生的行为观念摆脱了陈兰彬一类旧派人物设计好的“中体西用”模式，而向与美国学生一样的“西体西用”的方向日益偏离。在美国资产阶级文化影响下，幼童们不再对四书五经、国朝律例、圣谕广训一类传统典籍和或规范感兴趣，对定期的“望阙行礼”、“参拜先圣”、“叩头见官”一类封建礼仪也掉以轻心。甚至公然剪掉辫子以示与清朝抗争。另一方面，他们对游泳、滑冰、打球、钓鱼、骑自行车、下棋、旅行、读马克吐温小说、与美国家庭一道参加教堂活动等则大感兴趣。容闳在自传中对此描述道：“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碎事，随时发生……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格兰省，日受新英格兰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踉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

对留学生的这些变化，思想开放的容闳觉得是极其正常和自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翰林出身、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陈兰彬却认为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于是，容、陈之间发生了争执。留学生站在容闳一边，陈兰彬在美国立脚不住，向李鸿章请求不再做留学生监督。

1875年，李鸿章同意陈兰彬的请求，允其回国销差。陈氏为封建官场老手，有翻云为雨的看家本领，不到三个月就骗得李鸿章及其门下之客的好感和信任。李鸿章遂改命他为权力更大的中国驻美公使，并接受他的推荐，任命区谔良为中国留学生监督。容闳亦被调离留学肄业局，以副公使衔至公使馆襄助陈兰彬。

接获李鸿章命令后，容闳忧从中来。他认为留学教育是他一生的最大事业，也是他报效祖国的最有效途径，如果在此“发轫伊始，植基未固”之际，舍之他去，则极可能使为之奋斗的教育计划功亏一篑。他担心地写道：“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福耶？况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感情之亲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则此诸生且如孤儿失怙，是恶可者？”反复考虑之后，他大胆向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要求李收回成命。信中写道：“过蒙逾格擢升，铭感无既。第公使责任重大，自顾庸朽不堪负荷。拟乞转请政府收回成命，俾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俟将来留学诸生，学成种种专门学术，毕业归来，能为祖国尽力，予乃卸此仔肩。如是量而后入，予个人对于祖国，得略尽其天职。且此学生皆文正手植，譬之召伯甘棠，尤愿自我灌溉之，伸得告罪于文正。况政府既已派陈兰彬为公使，则外交事务以

转见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三，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六期。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第102页。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第100页。

陈独当一面，必能胜任，固无需予之襄助也。”

李鸿章四个月后回信，对容闳所提要求采“不准不驳，亦允亦否”的中庸办法，命容闳以副公使头衔兼理留学生副监督。容闳达到了一半目的。

新监督区谔良到任后不喜管事，容闳得以放手措置。但不久区氏因事辞职回国，陈兰彬再荐吴子登以接任。于是，“留学界之大敌至矣”。

吴子登，名嘉善，江西南丰县人，进士出身。传闻此人“好研究化学”，但“所研究亦未见其进步”。在容闳笔下，吴子登“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加之他原来与曾国藩和丁日昌不睦，对曾、丁二人所倡办之事“尤思破坏，不遗余力”，所以，一到任就与容闳以及留学生冰炭不相容。在就职的最初仪式上，他发现学生不向他下跪便勃然大怒，斥责学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将来即使成才，“亦不能为中国用”。此后，他对容闳先前的一切规章措施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而且，最卑鄙的是，他又不当面向容闳明说，只是一味地向李鸿章告容闳的密状。容闳在自传中不无痛恨的回忆道：

（吴）有所不满意，又不明以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为种种谣言：谓予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实毫无裨益；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

吴子登的造谣中伤在清朝政府中引起了一片反对留学的声浪。先前辞职回国的区谔良通过刘坤一转奏朝廷，大喊留学利少弊多。一些本来就反对派遣留学生的科道言官也乘势反扑，对容闳和留美学生极尽诬蔑之能事。清廷于是命令李鸿章彻查此事。李鸿章接到指令后，一面通知陈兰彬，要他关心留学事务，一面写信给容闳，要他注意不要再犯吴子登所上报的错误。容闳到这时才知道吴子登告了他的“京状”，赶忙回信剖白，并反告吴子登“性情乖张，举止谬妄，往往好为损人不利己之事”，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而不能留任学生监督。

但陈兰彬顽固站在吴子登一边。他在给清廷的奏折和给李鸿章的信中也竭力攻击容闳，诬陷留学生，要求清廷坚决撤回留学生，终止留学计划。清廷和李鸿章原来就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在陈、吴两人的联合影响下，更加不相信容闳。刚好在1878年前后又发生了美国政府拒绝中国学生进入军事学校就读事件，清廷及李鸿章“撤学回国”的决心终于下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第101页。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第101页。

《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见《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12号。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第104页。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第104页。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16页。

定。

十九世纪七、八年代，美国因白种工人的大量失业而发生了全国性的排华骚动。在美华人普遍遭到歧视和骚扰。当时，不少中国留学生已经中学毕业，需要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学习专业。清廷最关注军事工业的建立，因而特别希望留学生能进入美国陆海军专科学校深造。但美国政府受民间排华浪潮的影响，在容闳与其交涉时断然给以回绝。清政府和李鸿章为此耿耿于怀，终于在 1881 年下令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中国。

容闳不甘心留学教育计划就此失败。为挽狂澜于既倒，他四处奔走，联络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resident Porter)等一批美国友人致函中国总理衙门，希望不要半途撤回中国留学生。该函写得有情有理，冷峻之中包裹着爱心，摘要抄录如下：

予等与贵国留美学生之关系，或师或友，或则为其保人。今闻其将被召回，且问贵国政府即欲解散留学事务所，予等咸规自失，且为贵国忧之。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夫在学生方面，今日正为最重要时期，曩之年受者，犹不过为预备教育，今则将进而求学问之精华矣。譬之于物，学生犹树也，教育学生犹农也。农人之辛勤灌溉，胼手胝足，固将以求日后之收获。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

某等对于贵国固深望其日跻富强。即美国国人平日待遇贵国学生，亦未尝失礼。贵国政府乃出此种态度以为酬报，揆之情理，亦当有所不安。至于他人之造谣诬蔑，谓中国学生在校中肄业，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等言，此则某等绝对不能承认。何也？苟所谓无益有损者，指其荒芜中学而言，则某等固不任咎。以某等对于此事，从未负丝毫职务也。况贵政府当日派送学生来美时，原期其得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以习中学？今某等所希望之教育虽未告成，然已大有机会可竟全功。当此事业未竟、功过未定之日，乃预作种种谣言以为诬蔑，是亦某等所不乐闻也。某等因对于素所敬爱之贵国学生，见其忽受此极大之损失，既不能不代为戚戚；且敝国无端蒙此教育不良之恶名，遂使美利坚大国之名誉亦受莫大之影响，此某等所以不能安缄默也。愿贵衙门三复此言，于未解散留学事务所之前，简派诚实可恃、声望素著之人，将此关于学生智育德育上诬蔑之言，更从实地调查，以期水落石出，则幸甚。

另外，容闳还联络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前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Grant)等，通过美国驻华公使馆致函清政府，请求暂缓撤回留美学生。但颠预不灵的清政府对外国友人的劝阻之词完全不予理会，依然严令容闳将留学生迅速撤回中国。容闳无法再予拖延，只得向学生宣布清廷命令。学生群情悲愤，抗议清廷倒行逆施，部分学生更表示不再服从清

政府。容闳见状，不得不安慰学生“此番回华是度假，将来再返美完成所学”。学生得到如此保证才同意回国。1881年9月6日，除26位学生坚持留美未归外，所有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同年11月6日，船抵上海。

中国官民以其特有的冷漠迎接这些远道而回的爱国学子。留学生黄开甲悲哀地描写道：

曾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的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夹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划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陈先生，一个不如平庸中国人的头等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尚的衣服。我们穿的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为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我们蹒跚而行，咀咒这些恶运，冷淡的接待，愚蠢的承办人。还有我们穿的中国式布鞋在打脚，使足趾都拧在一起。总算到达海关道台衙门，是一座面对黄浦江的大楼，比较清洁而通风良好。

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为防我们逃脱，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这被称为学校的地方的。你可能读过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魔”。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容闳所倡导、所经办的中国第一波留学运动虽然因封建守旧人士的破坏而半途夭折，但它的历史功效却没有就此宣告终结。这批留美学生日后大都成为中国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据李喜所先生统计，这批留学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业者有30人，其中矿工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他们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向导”和“纤夫”的双重作用。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容闳开办的留学教育开创了培养人才的新途径。由于这一途径直接与西方文化接轨，绕开了洋务派学堂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守模式，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社会学说犹如乘上了特别快车，更迅速地洞贯中国。此后，封建保守势力再也无法将西学阻之于国门之外了，从西方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活的载体。新的知识与观念通过他们透入中国朝野。而这种新知识

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6，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

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四，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1期。

李喜所：《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与新观念对中国的“ 穿透 ” 又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大规模的来临做了思想的启蒙。从这一点讲，容闳像后来的孙中山一样也是一位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只不过他是采用了和平的手段而已。

第四章从维新到革命

留学计划遭到摧残之后，容闳把注意力放到国内问题之上。他多次向清朝大吏上书，提出他的改造中国的最新方案。然而，由于清王朝害怕大幅度的变革会引发统治危机以及洋务派官员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容闳的这些方案大多被束之高阁，此后，容闳对清政府及其官吏失去信心，毅然投身于资产阶级变革中国政治的斗争。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和平维新到孙中山、谢纘泰的暴力革命，他都乐意与役效力。甚至到了临终弥留之际，他还在孜孜以求地力新生资产阶级共和国操心设计。他的奋斗的一生向人们展示了一位伟大中国人不断探求、不断进取的优秀品格。

一、上书畅言改革

容闳在分析归国留学生的思想状态时曾说：“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比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其实，作为老留学生的他自己，何尝又不是这样呢？

容闳撤差回国后，似乎对一切都觉得看不下去。他到北京销差，竟然要为“循例尽谒政府中各重要人物”花去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弄得精疲力竭。北京城里交通落后，步行之外，只有既重且笨的骡车，而且轮与座厢之间没有弹簧，在车辙“深至数寸”的崎岖道路上行走“震动极烈”。街道卫生条件极差，“浊尘扑衣，秽气刺鼻，漫空涨天者，初非泥沙，乃骡马粪为车轮马蹄捣研而成细末，陈陈相因，变为黑色，似尘土也。飞入耳鼻毛孔中，一时不易擦净”。官民不思振作，以吸食鸦片为尚。烟馆林立于京中。凡此等等，都强烈地刺痛着他的那颗爱国之心。于是，在“地毯式”的拜见京中大老之后，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鸦片问题。他把研究的结果写成条陈，上呈总理衙门，希望清政府采择施行，以彻底禁止鸦片输入，灭绝中国境内之罂粟。可是，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却告诉他：“目前殊乏办理此事之人，故一时未能实行”。容闳的爱国热情又一次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容闳在北京住了三个月便感到沉闷得呆不下去。1882年，他南下空气较为开放自由的上海，准备在这里再施展抱负。不料，到上海不及四月，容闳接到妻子病重的来信，匆忙赴美。此后四年，容闳为妻子治病和照管两个儿子花去了很多精力。1886年，容闳之妻玛丽·路易斯·克洛格不幸病逝，留下一个7岁、一个9岁的孩子。容闳思妻怜子，悲痛欲绝。此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都处于郁郁寡欢，难以振作的状态。他自述说，1880年后的几年“为余生最不幸时期。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顿觉心灰，无复生趣……计嗣后十年，以严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劳鞠育之中”。然而，生活的苦难之磨无法磨去容闳根深蒂固的爱国之心。1894年，当中日甲午战争的烟云笼罩住衰弱的祖国之际，他在大洋彼岸再也按抑不住。他连写两信致昔日中国驻美使馆的同事、此时正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蔡锡勇，条陈对日方略。他提出与日本继续战争的方略有两条，即：“第一策：劝中国速向英伦商借1500万元，以购已成铁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则日本在朝鲜之兵力，必以分而弱。中国乃可乘此隙，急练新军，海陆并进，以敌日本。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一面由中国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强烈的爱国情感、坚决的主战态度在这里竟使他有点饥不择食，他想利用西方之虎来对付东方之狼。

蔡锡勇将容闳的方略立即报告给张之洞。张对容闳的第一策极表赞同，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0章，《北京之行与悼亡》，第110页。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0章，《北京之行与悼亡》，第112页。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0章，《北京之行与悼亡》，第113页。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0章，《北京之行与悼亡》，第114页。

急电委派容闳赴伦敦借款 1500 万元。容闳接电后即刻启程赴英。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交涉，借款草约基本完成。但是，由于李鸿章担心税款应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尚且不足，拒绝以海关关税抵押给英国，借款协议不能落实。而张之洞老奸巨滑，见李鸿章势大气粗，又对此“置诸不闻不问之列”，容闳因而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伦敦银行财团认为容闳欺诈他们，准备到伦敦法院控告容闳。容闳被弄得窘迫不堪，回走美国。

一到美国，容闳就给张之洞打电报请示进止。张让他立即回国。一心想对祖国有所贡献的容闳顾不得自家的困难，将读中学的小儿寄托给好友吐衣曲尔夫妇，自美乘船回国。这是他在离华 13 年之后的再次回归。

1895 年夏天容闳抵达上海。这时，张之洞因刘坤一率兵北上暂代两江总督。容闳改穿官服前往南京谒见。会谈之中，张之洞问中国新败有何振兴之方。容闳回答：

为了恢复中国的声望，使之成为强盛之国，理应采取一项新政策。中国必须即刻行动起来，并至少聘请四位外国人士作为外交、陆军、海军、财政等四部的顾问。他们可以为中国服务十年，期满之后亦可续聘连任。顾问必须是具有实际经验、才德兼备之人。对他们在任期内所提的好建议，政府应切实采纳和执行。另外，应挑选一些年青的有才干的学生在他们手下工作。这样，政府便可在西方的方法、原则和理念的基础上改造、完善中国的行政机构。

这是一个真理与谬误并存、理性与幻想共生的救国方案。19 世纪的中国面临着政治改革的困境。一方面，发自中国内部各阶级，包括地主经世派、洋务派和农民革命领袖的改革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依旧处于贫穷落后状况；另一方面，境外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制度日益显露出它的优越性，连依照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原则移植在中国境内的西方袖珍本——租界也表现出传统中国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在这种背景下，容闳抛开狭隘的地域主义，把改造中国政治的希望放在外部政治模式的输入上，无疑具有高瞻远瞩的理性，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新型的留学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人物的崭新改革思路和学习西方的真诚与决心。把改革、开放、引进人才和学习西方扩展到政治领域标志着对中国政治改革困境的突破。但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具有西化思想的容闳却没有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充当“中国的老师”的同时，还充当着“中国的侵略者”的角色。他们绝不愿意只帮助中国改革政治经济而不享受任何利益。中国人民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反对西方的侵略和控制。从这一点上说，容闳的上述救国方案的确含有极大的冒险性，反映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识的片面、欠缺和他思想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特征。

对容闳的方案，老于世故的张之洞不置可否，其情形犹如一块“只能吸水不能吐水的干海棉”。容闳见此，非常失望。张之洞也无心与他再谈，委任他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闲差。以后，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张之洞返回武昌。容、张二人从此没有再见过面。

容闳不愿在刘坤一属下任白领薪水的闲差，三个月后，主动辞职。在中国官场中，此举显为“不敬上官之举”，有人劝他不必如此。但容闳大志在胸，无暇顾及这些官场大忌了。

1896年，容闳回到上海居住。他是闲不住的人，至沪未几日，便打算在中国设立一个能够扶助工商发展的国家银行。他找来美国的《国家银行法》和1875年公布的《美国改订法及附录》，与留美学生黄开甲一道将其译为汉文。随后，他怀揣银行计划带同黄开甲离沪赴京，找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商讨建立国家银行事宜。

张荫桓原是容闳的老相识。他在1854年至1888年担任中国驻美公使时，与居住美国的容闳时相过从。张氏的《三洲日记》中有多处有关与容闳一道讨论问题和参观美国企业的记载。他听过容闳建立银行的设想之后极感兴趣。经过两人仔细磋商，写就了一份详细的条陈上呈给光绪帝师傅、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翁同龢也表示赞同，将容闳所草条陈及相关章程遍发户部同僚，征求意见。数星期后，由张荫桓署名写成正式奏折上奏朝廷。因有翁同龢从中帮助，清廷很快批谕准许开办。

容闳的国家银行方案包括《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分行章程二十四条》和《续拟银行条程六条》等文件，其中以《银行总纲四条》为核心文件，概括了容闳开办银行的总体构想和推行办法。它这样写道：

一、开办事权

银行仿自泰西，英法诸国，屡经改革，愈变愈精，要以美国为最善。日本银行，亦多采之。今拟参仿美国银行章程，先设总部于京都，续设银行于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总银行资本以一千万元为额，统由户部筹拨。钦派大臣督办，并专派大员总办。分银行即由督办、总办陆续招商集股，择地开设。所有总行、分行，一切应办事宜，随时拟定，咨明户部办理。

二、印发券票

泰西有国债券，无论数千百万，皆由银行筹缴，付息借商民之财，而给以凭据，名为借券。银元能行市面，而代以纸币，名为银票。此两种均由总银行用机器制造，或暂时先往外洋定造，借券年息五厘，以备各银行缴银领券。凡有商民愿买，亦可照买。银票照资本定额，如以一千万元为本，应提六成六百万存库，此六百万之中，又以八成制为银票，计480万元。票内载明有库款存抵，本多票少，随时兑现，与空出纸币者不同，自无折阅之虑。通过各省，可抵钱粮，缴归藩库，即可作京询起解。开办之后，京外流通，资本愈厚，即照章加发银票。该票之钢模定鉴，纸张定造，经数十手而成，正面华文，背面西文，花纹工细，断难仿冒，仍由户部编号加戳，然后通行。每月已未发各若干，详注册簿，发出银票，设或日久破损，准换新票，所缴旧票，点明号数，对众销毁。

三、扩充公行

总行既拨官款，分行应招商股。京都繁盛，可设分行数处，各省会及通商大埠，如上海等处，次第招商开设。泰西因领用券票，称为国家银行。今请设立牌号，称为某某官银行。如集股十万元，应先缴银三万元，给与借券，如缴银之数股本多，则借券递加，总合股本三分之一为度。此项借券，于各处官银行开市时，仍缴存总银行，制给凭单，每年给与年息五厘，核照所缴借券之多寡减成。另领银票，所减成数，又以股本多寡，酌定等差。股本五十万以下者，照听缴借券领银票九成，五十万以上者八成，百万以上者七五成，三百万以上者六成，如此则股本愈多，而所领银票之成数愈减。此项银票，需用若干，系于总银行额设四百八十万元银票之外，另行随时印造。万一分行亏折，已有存总行之借券抵保，且为数多于银票，除抵偿外，尚有余款，以备派员查账等用。再有盈余，仍还给各股商，并照西例，凡银票存项股本，每年正月七月，收税两次，每次通扯银票，已用出者，收税五毫，存项二毫半，股本二毫半，合并一厘，两次共计二厘，收税极微，与生意无碍。其余未领借券之票号钱庄，如有愿改官银行者，亦准缴银领券，一律办理，其牌号悉听照旧，无庸更易。

四、兼管铸造

现在铜钱日少，而金银两品尤阙，拟由京都总银行制造金银钱。近日金钱一项，外洋交涉渐多，其分两成色，务与西式一律，庶中外通行，不致因金价失灵而折阅。审是，则需金日多，金矿宜尽力开采。土法淘洗，所得无几，宜聘矿师。购机器，广开以期迅速。所出之金，统运京都铸钱，不得私售出洋，以杜漏卮。此中收回利权不少。若矿金不敷鼓铸，自可稍待时机，且先铸银元以便民用。现查各省官局已铸银钱，其成色高低，务宜一律，设有参差，关系甚大，请飭将各省新铸式样，送总银行查验，其每年新铸若干数目，亦须咨报，以凭稽核。

在中国近代，提倡兴办银行的不乏其人，在容闳之前，洪仁玕、王韬等都曾为此大声疾呼过。但是，能象容闳这样以西方银行法和有关条规为蓝本，把兴办银行的空洞口号落实为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案的却绝无仅有。在容闳的多达数十条的方案中，关于银行的权责、股本来源、钞票发行控制、财务清算与破产赔偿、征税额度与办法、总分行关系等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甚至连所发借券、银票的样式都附以草图作了说明。因此，它是中国近代最完备、最详尽的兴办银行的方案。它把中国人创办自己的银行的理想朝现实化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

容闳获知清廷批准了他的建立银行的计划后，立即着手购买地皮，选择办事人员，并准备受命赴美与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调查设立国家银行的最佳方法。可正在他兴致勃勃地四面张罗之际，斜路里杀出一个“搅局”的盛宣怀。

盛宣怀时任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他害怕容闳设立银行的方案会阻碍他对中国金融的控制，立即致电翁同龢，请求暂缓实施容闳的银行计划。随后携带巨款赴京，对在京王公大臣和大太监李莲英展开贿赂攻势，要求由他来开办官办银行。奕訢、李鸿章等全力支持盛宣怀，翁同龢也改变态度。1897年4月，总理衙门正式电告盛宣怀，同意由他开办国家银行。容闳以西方银行为模式建立近代银行的计划从而宣告失败。

容闳虽然为此次失败猛烈谴责清朝官场的贪污腐败，但还没有就此失去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他很快又草拟了一项中外合资建筑津镇铁路的计划。计划拟改变过去只招收华股不招收洋股的保守做法，提出要让华股洋股合作，共造铁路，分享利润。

容闳的铁路计划得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支持。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将容闳的条陈全部发表，并附加案语说：“至办铁路，但借西人之资，即以铁路余利为息，并按年除本，逮计年后，即可本利清还，尤为权自我操。”康有为也说：“容乃请筑津镇铁路，吾实助之。”但最后却由于德国的抗议和张之洞因害怕与芦汉铁路形成竞争加以阻挠，此项计划再次功亏一篑。容闳不无惋惜地回忆说：“予之国家银行计划，既为盛宣怀所破坏，乃另改方针，拟向政府请求一筑造铁路之特权。予心中所欲造之铁路，为由天津直达镇江。天津居北，镇江居南，在扬子江口，两地相距，

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曾将容闳的有关银行章程分别发表于《时务报》第九册和第十册。此篇见于第九册。

《客观察闳铁路条陈》，《时务报》，第十册。

《时务报》，第十册。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21页。

以直线计，不过五百英里。若绕山东，过黄河，经安徽，以达湖南（当作江南），则此路须延长至七百英里。予所规划之路线，则拟取其近者。惟德国政府抗议，不允有他线经过山东。谓山东造路之权，为德人所专有，无论何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云。此种理由，殊为奇特。任翻遍中国法律或国际法律，皆不能得其根据之所在。但彼时中国国势屠弱，不能提出此问题，以争回固有之主权。而外交部中，亦无人能引证条文，驳斥德国要求之无理，深恐惹起国际交涉，一惟外人之命是听。以故政府只许予造一曲折之铁路，即上所云绕山东过黄河者。予极力欲成此事，遂拟以此铁路让与外国公司承造。乃政府又命予招中国资本，不许外人入股，且仅限予六月之期。六月之内，若不能招齐路股者，则将特许状取消。当彼时中国资本家，欲其出资任股以兴造铁路，殆难如登天。予既明知此事势有所不能，遂不得已，复将此铁路计划舍去。”显然，是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干预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保守性限制联合剿死了容闳的铁路计划。这一次的失败动摇了他对中国封建官僚和西方列强的幻想，使他开始考虑改走其他途径来拯救中国。

有部分学者认为容闳倡办津镇铁路是受了美国资本家“怂恿”的结果，因此容闳不过是充当了一次美国资本家的“买办”而已。这种观点是颇难令人信服的。事实上，代表美国资本家利益的美国政府并不支持容闳的铁路计划。在遭到德国政府的反对后，容闳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支持，幻想“以夷制夷”。但是美国国务院却以否认容闳的美国公民资格作为答复，拒绝支持容闳。笔者认为，容闳对祖国的忠诚或爱国心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救助中国、振兴中国。正如吐依曲尔评价的那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容闳著、徐凤石、浑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1章，《未次之归国》第120—121页。

孙毓棠：《抗戈集》，第181—186页。

Edmund H. Worthy Jr.,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34, NO.3.

吐依曲尔：《西学东渐记》代跋。

二、参与戊戌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受国耻的刺激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成功的启示，不再满足于洋务运动修修补补的“皮毛之变”，提出了改革中国政治、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要求。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有一千多举人参加的“公车上书”，第一次将这一要求落实为政治行动。随后，政治性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相继建立，呼吁政治改革的刊物《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湘报》等纷纷创刊。至1898年6月，光绪皇帝终于采纳康有为的主张，颁发了一系列实行新政的上谕，从而把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推进到最高潮。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容闳已经是一位整整70岁的老人了。然而，他绝没有因此而袖手旁观。他几乎参与了康、梁维新派一切活动的策划，并竭力影响这场运动的方向。保国会成立的第一天，容闳亲自到场。“百日维新”时，他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康有为在这期间所上呈的奏折里面有许多内容是在与容闳商量以后写成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之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可补救……既与常熟（指翁同龢）言，荐容纯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又草折二份，交御史宋伯鲁、陈其璋上之。枢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所上的请计全局以筹巨款折也说：“皇上若用臣之策，统筹全局，编举百度，则可大借公债，以六万万两为额。吾国先办国家银行以募之，分立银行于纽约、伦敦，而募于美国为尤易。江苏补用道容闳，曾使美国，可用募入。既得如额，海陆军、铁路、民政、刻期举办，限定岁月，应支之额款各万万计，皆未即急需也。可以分立举国各地银行，及劝业银行，以惠农工焉。以此六万万存贮总银行，而改定金市，发行公债纸钞，增长倍数，听民间银行以实业押款，则国有市十万万，常行流通，其昔者借款以偿日赔款，皆可筹还，以轻债息，而民间得十万万灌输，则工业盛，而商业荣，农矿林渔垦植随之而兴，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致也。”康氏主张中的发行公债、向美借款、设立国家银行、开办分行、发行纸钞等与容闳设立国家银行的建议并无区别，康、容在此之前显然有过磋商。

容闳之所以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除了因为他对洋务派官员已经非常不满以外，还有其对光绪皇帝存有严重幻想的原因。他此时的思想状态与康有为的一样，把光绪皇帝看成了中国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以为依靠他的力量就可以在中国实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改革。他说：“光绪当亲政后，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后人读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其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天之诞生光绪于中国，殆命之为中国革新之先导，故其举措迥异常人，洵伟人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2章，《戊戌政变》，第122页。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1—162页。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66—567页。

也。”这是一种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政治且潜藏着危险的糊涂认识。果然，一百天不到，光绪皇帝就在慈禧太后的反扑下被囚禁起来，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容闳自己在一夜之间都成为犯上作乱的通缉犯。

北京政变发生后，容闳首先想到的是帮助其他维新志士逃离险境。他立即致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求他设法救助梁启超。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去见美国公使以设法救助维新党人。《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道：“容纯甫欲请美钦使，然以其无兵，无济干事，却之，天将明乃睡。（初四）九点钟起，访李提摩大与谋，英公使亦避暑北戴河远出，无能救者。”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也记载说：“9月31日（阴历八月初六）梁启超及谭嗣同私自见我，对我说已经有谕捉拿他们。我们商讨办法保护皇帝，他的性命在极危险之中。我们决定了由容闳去见美国公使，因为他是美国籍民；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而我自己去见英国公使，使他们立刻去设法保护皇帝，但是不幸的很，美国公使已去西山，英国公使在北戴河。”后来，堤骑满街，容闳自己没有办法再藏匿北京，匆忙奔赴上海，躲在租界里达数月之久。1899年，再转香港，这才彻底摆脱了清廷的追捕。

容闳虽然逃亡在外，心却还在中国的维新事业。大量史料说明，容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依然与康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康有为在出逃后，曾致函李提摩太，并附函致容闳讨论国事。梁启超在亡命日本后，在与日本外务省官员志贺重昂的笔谈中，说到他们有一个联络英、美形成一个“日清英米(美)四国联盟之局”的方案，并说为达此目的容闳将与康有为一道赴英、美活动。

1900年3月底，容闳在新加坡与康有为磋商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进行起义之事。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容闳就是这样走南赴北，不辞劳苦。而这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翁！

1900年8月，唐才常等人利用义和团于北方给清政府造成的困境在长江流域策划自立军起义。自立军以“勤王”相号召，遥奉流亡在外的康有为为精神领袖，试图以武装起义推翻慈禧统治，扶持光绪帝复出，继续戊戌年未完成的维新事业。起义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召开“国会”，以作为联络各派政治力量的旗帜和奠定起义后组建政府的基础。容闳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的筹划工作。上海国会召开时，他冒险前往上海参加大会。在会上他“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之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与会者章炳麟记载说：“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闳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夏口”，并说所发表的中国国会宣言是“容闳手笔”。

显然，容闳成了这次大会的核心人物。

容闳起草的国会宣言主要内容有：“中国独立协会，鉴于端王、荣禄、刚毅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拳以败国，是以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2章，《戊戌政变》第122页。

《康南海先生墨迹。程涓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21页。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77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414页。

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05页。

（美）史扶林著，丘权政等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94页。

孙宝直：《日益斋日记》，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40页。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05.110页。

权，将欲更始以谋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之乐利，端在起复光绪皇帝，立 20 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生命财产，均力为保护，毋或侵害，望我友邦人民，于起事时勿惊惶。”宣言内容反映了容闳作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员而固有的两面性格。他一方面要求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立宪政府，可另一方面又表示要恢复光绪皇位，承认外国侵略者一切既得权益。但无论如何，宣言所主要表述的要求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主张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国人民追求富强与民主的热切愿望。

这次会议全体通过了容闳起草的宣言，并投票选举容闳为中国国会的正会长，严复为副会长。会议确定容闳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外交和购运军火。为此，他曾将国会宣言译成英文，设法争取英美等国的外交支持；又曾秘密购买外洋军火偷运给自立军，并试图策动张之洞在长江一带成立中国独立政府。

1900 年 8 月初，自立军起义策划就绪，候机待发。张之洞突然下手，阴谋诱捕唐才常等领袖人物。起义不幸归于流产。容闳再次成为清朝指名通缉的政治要犯而流亡海外。容闳在中国境内振兴中国的努力宣告结束。

尚秉和：《革命源流》，《辛壬春秋》，卷三十三。

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982 年，中华书局版）第 30 页。

参见袁鸿林：《容闳述论》一文，《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三、跃入革命洪流

容闳早年虽然认同和平的改良主义路线，但思想中亦不乏激进主义的因素，这从他第一次回国时冒险前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贡献方略、在美采购机器时毅然赴华盛顿报名当兵可以看得出来。以后，随着他和平改造中国计划的不断碰壁，他思想中激进因素逐渐发展增强。他在1900年能够积极参加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由和平改良走向武装革命的自立军活动，也说明他至迟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排斥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以拯救中国的革命方法。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就已经与革命党人有过接触。他曾对人说过，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与他“访谈数日”。他自香港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国会开会时所带的助手容开，既是他的从小堂弟和作监督时的学生，也是孙中山在日本和欧洲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随从。容开与孙中山在1891年就已结识，是兴中会的老会员。容闳在上海国会上被人当作康、梁和孙中山的双重代表而当选会长正是他与孙、康均有关系的佐证。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对清政府的幻想更趋破灭，思想中的革命倾向也更加明显。1900年9月上旬，他又在逃亡日本途中，于轮船上巧遇从广州出逃日本的孙中山。这次相遇和会谈最终坚定了容闳投身资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信念。他在1901年曾对青年学生刘成禹说：“孙逸仙宽广诚明有志，予勋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这段充满赞许和倾慕之情的话标志着容闳已经实现了从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容闳倾向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参加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等人策划的“大明顺天国起义”或“洪全福起义”。

洪全福，原名春魁，为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族人，早年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政权失败后，逃亡香港。兴中会会员谢缵泰为了联合会党进行反清斗争，推举他为起义的军事领导人，准备于1903年1月28日在广州起义。容闳获悉此事后表示全力支持这次武装起义。他并且提议由他来负责外交方面的工作，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谢缵泰喜出望外，经过与另一起义策划人李纪堂商量，拟推容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1902年5月16日，容闳身负革命党人重托，自香港启程赴美，展开对外联络工作。同年9月19日，容闳收到谢缵泰写于8月份的来信，该信请求容闳“在美国组织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支持”。9月21日，容闳复函谢缵泰，表示“我已准备好在世界此端，尽我最大能力来满足您世界彼端的要求。尽快把暗号或密码转送给我，这是我们通讯必不可少的附属品”。

12月19日，容闳收到了谢缵泰的信和密码，12月22日，他复信谢缵泰。

刘成禹：《世载堂杂忆》，第115页。

李喜所：《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关系），卷一。

刘成禹：《世载堂杂忆》，第115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71—72页。

容闳信函收于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TscTsanTai, The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HongKong, 1924.）。

容闳：《1902年日记》，英文未刊稿，藏美国康涅狄格州图书馆。转见于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估计这封复信没有到达香港，起义就因为有人泄密而归于流产了。

此后一段时间，容闳与谢缙泰失去了联系。但他并没有停止反对清王朝的活动。此时，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都在美国有过活动。容闳试图将康梁与革命党人拉在一起进行反清斗争，以壮大革命的声势，因而与康梁都有所接触。他曾与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界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Boothe）联系，帮助康、梁训练维新军。后来，他发现康有为的主张与革命派的主张实在无法凑合在一起，断然与康、梁路线分道扬镳，坚定地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容闳对保皇党的公开抛弃和对革命党人的明确认同大约始于1908年。如这一年他在与谢缙泰重新取得了联系后致函表示了他对康有为的严重不满。在1909年初写给布思和荷马李的信中，他也多次说到康有为不可信任，谴责康将华侨捐款中饱私囊，认为孙中山才是中外人士最可信赖的革命家，大家应该帮助他实现理想与计划。容闳还提出了一个叫作“红龙—中国”（Red Dragon—China）的计划，估计约需500万美金、10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才足以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革命。此后，他多次致函正在新加坡活动的孙中山，建议孙与荷马李和布思会面。经过他的穿针引线 and 精心安排，1909年2、3月间孙中山与荷马李和布思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多次会谈，这些会谈大致达成了五项协议，即：一、暂停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不足的起义，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二、以孙中山名义委任布思为中国革命党人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办理向纽约财团借款事宜；三、在美国训练军官若干，以充实军事力量；四、借款总额为350万美金，分四次支付；五、筹建临时政府。对达成这些协议，容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双方的“信用人”。至于孙中山此时在美国的活动和提议，也多依据容闳建议而为之。

布思的借款计划后来并没有获得实际的成功。但这些会谈看来还是影响了后来孙中山的斗争策略。如他改变了过去起义遍地开花而又旋起旋散的做法，集中力量于1911年4月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

容闳是在80岁左右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他在人生末年所进行的拯救中国的最后一次努力终于在1911年结出了果实。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是，当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时，83岁高龄的容闳已经春蚕丝尽，卧床不起了。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容闳也没能停止对革命事业的关怀。他于1911年12月在病榻之上给国内的革命者写了一封长信，此信反映了容闳临终前的思想状况，概要如下：

上天呼唤你们来领导这次了不起的大革命，它已经在短短的期间内，使满清政府不得不跪下求饶。

一方面，你们一直为遭受压迫和抑制将近三百年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着想，呼求一个共和国，给他们自由和独立，以作慰藉。现在，你们已经把满洲人推翻，不管那些政治骑墙派的言辞可能多么漂亮，好象多么有理，也不能让他们把你们诱离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目

TseTsanTai, TheChineseRepublic: secretHistoryoftheRevolu-Tion.

CharlesBeachBOothePapers. 该文书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此据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参见《孙中山年谱》（1980年，中华书局版），第106—107页。

标。他们会说：君主立宪和你们国家的过去情况更为一致，和你们的民族传统和习惯观念比较协调；有了君主立宪，同时设立一个枢密院，由袁世凯这样的人当内阁总理来领导它，这样，保证你们在政治上会得到一切可靠的希望。

一点儿也不要相信他们这套。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他们全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个什么人？难道他在 1898 年不是背叛了他的主人光绪皇帝吗？他是最受驻京外交家赏识的人。他乘机利用满清皇帝的崩溃，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抢掠。他想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起撵走。

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声；听从这种声音，你们就对了。

但是，在我心里还有另一个微小的声音，那就是：你们互相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紧密团结起来，这是绝对必要的。在任何情况和理由下，你们都不应该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

我无需向你们描述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悲惨后果。你们自己知道它们是怎样的。自相残杀、内战的战争肯定会招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而英明的上帝本来把她留给中华民族，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想想你们的革命给你们和子孙后代开辟了一番多么壮丽的事业！在辉煌的胜利背后看到潜伏的危机，于战争尘埃未落定之前指出中国革命应该前行的方向，容闳的信文几乎全切中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这不仅表明容闳始终在大洋彼岸关怀、注视、研究着祖国的政治形势，而且表明 83 岁高龄、体弱多病的容闳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同凡响的政治洞察力。他所提到的袁世凯的狡滑阴险、革命党人的分裂与争夺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破坏等三个因素正是后来辛亥革命走向失败的三重原因。象容闳这种在人生晚年仍能保持对进步事业的热情并且保持犀利眼光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罕见。

1911 年 12 月 25 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着手筹建南京临时政府。容闳得知消息后，感到非常振奋。他致函老朋友谢缙泰，请他寄一份“完整的内阁名单”，并代向孙中山表示他的“衷心的祝贺”。他还告诉谢缙泰，他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这个新共和国”。在另一封写于逝世前一月的致友人书信中，他甚至还在表示要为编纂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而尽心竭力。对革命的忠诚、对共和国的热爱浸透这一时期容闳的所有书信。

革命党人没有忘记大洋彼岸他这位“本党老同志”。早在 1899 年，孙中山就曾有过推举容闳为中国资产阶级各派联合组织总会长的提议，认为容闳是中国“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后，孙中山又郑重致函容闳，请他归国担任要职，信中写道：“容闳老先生伟鉴：当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达之目的将达之际，逖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起舞。然揆先生其所以羁留至此之源，想亦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之异域，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 324—325 页。

《1911 年 12 月 29 日容闳致谢缙泰函》，附载于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1912 年 3 月 23 日容闳致某友人函》，原信为英文，译文刊于《太平洋报》1912 年 8 月 1 日，此据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孙中山全集》（1981 年，中华书局版），第一卷，第 198 页。

同病相怜，非仅为先生已也，即仆等亦尝饱受此苦。乃今差幸天心眷汉，胡运将终，汉族之锦秀河山，得重见于光天化日之下，仆何幸之！虽然，吾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迄今已二百六十余年矣，而教育颓败，人民之蒙蔽，恐一旦闻此平等自由之说，得勿惊愕咋舌耶！以是之故，况当此破坏之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有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福，悉自先生所赐矣。先生久离乡井，祖国索怀，谅亦不致掉头而弃我也。”

可是，信到之日，容闳已经再也没有力气从病榻上站起来来了。1912年4月21日，容闳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溘然长逝。享年84岁。

回顾容闳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容闳的一生，是为中国的富强与民主不断奋斗、不断奉献的一生。从他第一次归国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进步事业联在了一起。他与太平天国领导人谈过新国家的设想，为中国购进第一批西方的先进机器，办理过中国近代第一批出洋留学生事务，作过创办现代银行和铁路的尝试，参与过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活动和革命斗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象他这样的丰富多采且充满历史感的人生履历。爱国和富有创造性是他的特征：他终身不渝地保持着对祖国的浓厚爱情，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热望；他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不断地为历史提供新意。在这之中，他也不断地超越自己，克服缺陷，思想由洋务进至改良、再由改良进至革命。他的追求和探索呈现出一种不断前进、不断升华的上升路线。其为建设国家振兴中国而不屈不挠、甚至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显示出他具备爱国志士的高尚品格。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晚节，更是近代其他思想家或政治家不可企及的高风亮节。

第二、容闳虽然以其新颖主张和创造性的实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颇具特色的一席之地，但其成就和影响却远不及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或政治活动家。容闳从小就读教会英文学校，青年时留学外洋，后来又长期移居美国，娶了美籍妻子，这种特殊的经历竟使他不能熟练地运用中文。他刚从美国回国时，连“沙滩”这类简单的汉语词汇也讲不出来，受到同行的中外人士的笑弄。后来，他居然以一个土著的中国人跑到广州跟随一位外国传教士学习了半年的汉语。经过努力，他基本上讲说自由，但写作依然没有过关。以至他办事情、写条呈、做翻译都不得不带一个中国助手。这就大大抑制了他的活动能量，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和影响。他没有王韬那样的言词犀利的政论，没有康、梁那种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也没有严复那种具有振动社会效果的译作。他的“汉文未深”还造成了中国官员对他的轻蔑和民众对他的隔陌，官民中有不少人把他视为“准洋人”。这是他上呈或建设的方案往往遭到猜忌、排拒而最终搁浅的心理障碍。

第三、容闳的救国救民方案具有相当程度的“西比”和空想特征。容闳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他所提出的主张往往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他敢于领风气之先，直接将西方的理论或章程或模式搬进中国，固然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和突破困境的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性，不能满足中国近代社会现实实践活动的需

要，如他对太平天国所提出的七条方策、对张之洞提出的改造中国政府的计划以及对清政府提出的招集洋股开办银行和铁路的方案都明显地具有超越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而无法实施的毛病。有些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援助才能实现的条款甚至具有危害性，一旦真的实施可能导致西方列强对中国渗透与控制的加深。

后记

在拙稿发排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老一辈中国近代史专家茅家琦先生。从章节的安排、观点的启发，到字、词、句的修改订正，都倾注了先生不少的心血。

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张爱妹、韩文霖、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书库郭平等同志的帮助。吾妻王煌亦从头至尾帮助校对、打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海林

1993年1月于南京大学

